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

——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

The Alternative Thinking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Study of Boyang and his works

张清芳 著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1-20888-5
9 787301 208885 >
定价：38.00元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

——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

The Alternative Thinking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Study of Boyang and his works

张清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张清芳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301-20888-5

Ⅰ.①中… Ⅱ.①张… Ⅲ.①柏杨(1920~2008)-思想评论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802 号

书　　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
著作责任者:张清芳　著
责 任 编 辑:任　慧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0888-5/I·2490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mm×1020mm　16 开本　19.5 印张　35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言

陈晓明

张清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四年，她的用功发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芳有股子倔强劲，这让她做一件事可以坚持不懈，直至取得成果。她对柏杨的研究就是如此。清芳对台湾散文一直有兴趣，后来我建议她选择柏杨为研究方向，她也欣然应允。她得到一次不错的机会到台湾"中央"大学文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在"中央"大学李瑞腾教授的指导下，旁听了台湾"中央"大学很多老师的课程。这期间她采访过柏杨、张香华夫妇，并且收集了很多台湾文学的资料，为以后研究台湾文学和文化领域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说起那次台湾之行，她对柏杨先生和香华女士有很深的感情。她在台湾学习收获颇丰，这得益于李瑞腾教授的关怀。我也一再敦促她，不能辜负李教授的帮助，更不能辜负柏杨先生和香华女士的厚望，清芳坚持下来了，终于在柏杨研究方向上，写出了自己的著作。

清芳做柏杨研究，建立在她对台湾散文和杂文比较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博士毕业之后，她到鲁东大学文学院任教。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清芳依然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完成了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其专著《台湾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史》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颇受关注。

2009年，张清芳又主持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书即结项成果。在她申请这个课题时，我也是该课题的推荐人之一，我非常支持她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角度来研究柏杨其人其文。当时我的推荐评语是"该部专著改变了此前学者们从传记角度对作家生平和其作品进行研究的视角，而是从系统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角度的综合角度，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来评价、研究柏杨全部的作品文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在国内外柏杨研究领域有其独特的思路，某种程度上可以找到她研究柏杨文学创作的路径。

确实，柏杨的文学作品甚为丰厚，在今天依然有值得研究的充足理由。柏杨显然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发表的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当局为他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于 1968 年 6 月 27 日判处 12 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在 1977 年出狱后，他继续从事写作，不但继续在杂文领域辛勤耕耘，而且还在中国历史领域进行开辟，用现代白话翻译中国古典史籍《资治通鉴》等，并且出版了《中国人史纲》、《皇后之死》和《帝王之死》等史传作品，进入"十年史传"的蓬勃发展期。柏杨的创作生命力非常旺盛，直到 2005 年才真正停笔。概括来说，柏杨的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杂文、诗歌、报告文学和史传作品，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其作品可称得上是卷帙浩繁，而其创作生命长达五十多年，为中国文学贡献了很多文学精品。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柏杨的名字在中国内地的传统反思潮流中不胫而走，而《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在 80 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身为中国人，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等作品中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曾经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为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地指出这些弊端，让中国人有勇气正视它们。

许多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被淡忘，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

年代不应该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的意义和价值。而且柏杨的作品自从问世以来就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五十年来不断大规模地重版、再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同时现在的学术实践也已经证明，柏杨的思想价值和柏杨作品的研究价值已经逐渐被学术界认可。

可以说，张清芳的这部专著《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以柏杨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的出现，就是柏杨研究受到学界重视的一个证明。这部专著以较宏观的多元形态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学术背景，以“野生知识分子”柏杨（柏杨自称是“野生知识分子”，公开宣称自己不同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其人其文为考察中心，第一次以学术专著的形式讨论、梳理出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体系，这是以建构现代市民的主体性为己任，以“自然人性”、“人性尊严”、“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治”为其核心思想观念的独特的现代性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与鲁迅等五四精英知识分子推崇的以启蒙、救亡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不同，又和那些完全迎合市民趣味的文人、民间的、低俗的文化思想体系迥异，是把现代性的精英性层面和世俗性层面平衡起来的一种另类思想体系。正是以此思想体系为指导思想，柏杨才既能够在最形而上的严肃的历史文化中来探讨最日常的男女婚恋和家庭问题，又能够在最普通的社会风俗习惯中，发现“酱缸文化”对人的灵性和人性尊严的侵蚀损害，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批判针砭。

需要指出的是，与申请时的初稿相比，张清芳现在已经完成的这部专著在原来七章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第八章中国历史男性现代化的文化反思”，共包括两小节，标题分别为“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和“中国帝王君主文化本性的现代性反思”。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是从中国历史切入，探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和中国封建帝王君主的“现代化”问题，是对第七章“历史的现代化”中的“中国历史现代化”观点的补充说明，既体现出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又是对柏杨史传作品价值意义的充分肯定和评价。可说第八章在这部专著中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也看出张清芳在这本专著上所下的极大的功夫。正是因为有这种苦功，张清芳今日在学术上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对她真诚地表示祝贺，希望她能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前进。柏杨其人其文是一座富矿，值得持之以恒地去开掘，我期待着新的成果继续面世。

目　录

第一章　柏杨其人其文

第一节　柏杨的创作

柏杨(1920—2008),原名郭定生,又名郭立邦、郭衣洞,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人文大师”。他在1949年随国民党由中国内地迁到台湾,从此就一直生活在台湾。在台湾生活的近六十余年间,柏杨在文坛勤耕不辍,从20世纪50年代登上台湾文坛,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文学创作生命长达五十年之久。他生前发表、出版的各类作品数量极其惊人,而且创作类型和涵盖面非常广泛,不仅有小说、杂文、旧体诗词,以及报告文学、童话、新闻报道、个人传记等众多文体类型的作品,而且还翻译、改写和创作出数量丰富的中国历史史传作品。如果按照文学作品类型来划分柏杨的创作阶段,他经常被称为小说十年(20世纪50年代)、杂文十年(20世纪60年代)、通鉴十年(20世纪80年代)。其实这也只是一个很含混的划分,因为实际上柏杨经常在同一阶段创作出不同的文类作品。以杂文创作为例来说,柏杨杂文创作的高峰期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创作、出版了二十余本杂文集,因而60年代常被称为他的“杂文十年”。而他在80年代的“通鉴十年”中,不但把古代史籍《资治通鉴》翻译和改写成现代白话文,写作出版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皇后之死》、《帝王之死》等史传作品,而且他同时创作出《活该他喝酪浆》、《早期的虫儿》和《丑陋的中国人》等多部杂文集,接续60年代的杂文创作,使80年代同时也成为柏杨后期杂文时期。同样,柏杨的史传创作也延续到90年代,他在90年代末期还出版了三十八册白话版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而柏杨在60年代也不仅是只写作杂文,而是同时也写小说,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可说他同时创作小说和杂文,二者比翼齐飞。也就是说,柏杨的艺术创作生命极其旺盛和多产。

从柏杨作品的内容范围来看,也异常丰富多彩,涉猎面非常广泛:爱情婚姻、个性解放、伦理道德、自然人性、文化批判、社会人生百态、历史分析、中国和西方、古代和当下、传统和现代,等等。具体来说,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柏杨既有对饮食男女的爱情婚恋观念、对普通人性和人心细微之处的探幽体察、深刻剖析,也有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当前社会文化中存在的"酱缸文化"流毒,以及"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的猛烈批判和抨击。同时体现出作者深厚渊博的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性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理论的知识学养。可以说,柏杨的作品既表现出作者丰富渊博的文学知识学养,以及他所拥有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广阔视野,同时又融合进自身的文化认识、社会经验、生命体验,由此表达出拥护民主法制思想,追求和捍卫自由平权、人性尊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和个人灵性创造活力,以及建立一个拥有较完善的市民社会系统结构的现代性思想理念。换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他的作品不但具有文学性、文化性,而且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

还要看到,柏杨的人生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和时代特点。他在学生时代也曾被解救苦难中国的使命和抗击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情怀所激励而投笔从戎,当过国民党战干团成员,亲自经历过战争和死亡,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苦难。1949年在去台湾之初,因"窃听匪谍广播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关押七个月后被保出狱;柏杨在50年初还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主办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很多人认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特务组织,其实,当然不是,它只不过是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迷你王国"①。柏杨随后成为由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支持下成立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总干事。不过他的这段历史后来却被国民党当局清除掉,柏杨在《柏杨回忆录》中自述此段生活:"后来,我离开救国团,尤其是入狱以后,所有该会的历史文献,对我都一字不提,手法干净利落,态度严峻……即令是图书目录上,遇到作者是我时,'郭衣洞'也会被删去'郭',成为'衣洞'。"②而柏杨后来辞职离开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成为《自立晚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58页。

② 同上书,第466页。

报》的编辑,由此进入杂文创作时期。1967年夏天的"大力水手事件"成为国民党当局逮捕柏杨的借口。柏杨从此段时间到1968年3月7日判刑期间,曾经受到特务的刑侦逼供,被严刑拷打后屈打成招:"米达尺嗖的一声抽到我右脸颊上,一道火辣的灼痛使我觉得他用的是烧红的铁条,我大叫说:'你打人……'于是右颊又受更重的一击,那是他的拳头,我的眼镜像投掷出去的飞镖一样,跌到行军床上,我失去重心,连同椅子跌倒在地,他突然一脚踢出,那皮鞋尖端正踢中我的左膝,我正要爬起来,更猛烈的一脚又踢中我的右膝,我似乎听到骨折的声音,两膝剧烈的痛使我哀号,我在地上滚动,又是凶猛的一脚,踢中我的心口,我呼号着爬到墙角,像一条就要死在乱棒之下的丧家之狗,我尽量弯曲膝盖,抱到胸前,但又一脚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头,忍不住大声哀号。……突然,他抓住我的头发,拳头像暴雨一样的猛击我的脸和前胸,我挣扎着,用双手回挡,但他的皮鞋接连的踢中我暴露出来的小腹,我把前额撞到地上,我还不愿死,死也阻止不了他,特务如果在乎犯人死活,他就不是特务了,而我怕他把我踢成脑震荡,踢成残废,我哭嚎说:'我招供,我招供,不要打了。'"① 柏杨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火烧岛监狱关押了近十年,直到1977年才出狱返回台北。实际上遭受这种政治性质的文字冤狱并非只有柏杨一人,早在50年代初期就有很多人以谍匪之名被判刑和处死,50年代末期《自由中国》的雷振、殷海光等人被判刑,60年代被捕判刑的除柏杨外,还有李荆荪、徐瑛、黄英武、施明德、陈映真等知名人士和著名作家。另一个以写杂文闻名的作家李敖也在70年代被判刑入狱。也就是说,柏杨被捕以政治犯名义判刑,并不是一个个案,他只是深受当时台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残害作家中的一员,可说是该阶段台湾文字狱历史的见证者和受害者。他的经历遭遇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在来台湾的外省人知识分子中。因这段牢狱经历,柏杨在90年代还被誉为是台湾的"人权斗士"。因而柏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对"酱缸文化"流毒的针砭,对台湾社会某些丑陋风俗现象的冷嘲热讽,对现代人婚恋观念和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可说是五四精神在台湾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中国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具体呈现。

而且,由于社会时代的变迁,他的爱情婚姻之路也非常坎坷,经历过五次曲折的婚姻。他在中国内地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媒妁之言、父母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04—505页。

之命的包办婚姻。第二次由自由恋爱而得到的婚姻,因为新中国在 1949 年后与台湾隔绝多年的特殊的历史情况而中断。第三次婚姻是他在台湾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标志,他主要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现实生活而去成家立业。第四次婚姻是人到中年的柏杨对爱情执著追求的一个结果。这四次婚姻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继续。只有柏杨的第五次婚姻,也就是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与女诗人张香华结为伉俪之后的婚姻,才是最美满幸福的。柏杨的生命不但焕发第二次青春,而且其创作也再一次进入辉煌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在大部分作品中关注男女婚姻恋爱问题和现代女性解放之路,对人性尊严、自由平等等理想的追求,是融合其自身的人生体验和真实感受在内的,自然具有真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种现实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相结合的特点也是柏杨作品独特魅力的一个体现。

柏杨的作品自从问世以来,除了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海外的一些国家不断出版、重版之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内地之后也不断出现柏杨作品出版热潮。80 年代中期最早被引介入中国内地出版界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仅 1986 年这一年,就被花城出版社、时事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三个出版社争相出版,以后又不断重版,被其他出版社出版。至 2008 年依然有古吴轩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柏杨 60 年代的杂文集《玉雕集》、《死不认错集》等和《早起的虫儿》、《按牌理出牌》等 80 年代杂文集均在 1994 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还有被重新选编的各种杂文集,包括《红尘静思》、《暗夜慧灯》、《元亨利贞——柏杨谈男女》、《契丹三角——柏杨谈人生》、《伏羲九九——柏杨谈历史》等杂文选集,分别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在 2006 年出版的《柏杨杂文精选集》系列在编选本中最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该精选集按照"文明大整合系列"、"传统大反思系列"和"疯狂红颜系列"三大部分,重新编辑整理了柏杨几乎所有的杂文,分为九部杂文集出版。除此之外,柏杨的众多史传作品同样受到中国内地读者和出版界的青睐。以柏杨翻译、改写成现代白话文的《资治通鉴》来说,就分别有四个不同的版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从 1984 年开始就逐年以《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为总标题出版,直至 1993 年把七十二册柏杨版的《资治通鉴》全部出版完毕。而该出版公司从 2000 年到 2002 年期间,又再次出版修订本的十八册《柏杨版资治通鉴》。北岳文艺出版社和万卷出版公司也分别在 2006 年和 2008 年出版该作品。更不用说《中国人史纲》、《皇后之死》等其他史传作品也被出版社争相出版了。柏杨的小说作品最早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版本,是 1987 年中国文

联出版公司出版的由《古国怪遇记》易名的《西游怪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旷野》。之后其他小说和小说集也在中国内地不断出版。而《柏杨家书》、《柏杨回忆录》等作品在中国内地也得到出版发行。所以，柏杨的作品在中国内地文坛同样占有一席之地，长盛不衰。

概而言之，柏杨的作品和柏杨的人生经历，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体现出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立场和举措的文化现象。这些共同构成柏杨其人其文在台湾地区文坛、中国内地文坛，乃至是世界华人文坛中无可或缺的地位。

下面附上柏杨生平事迹简表[①]：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1920	1岁	河南省辉县人。初名郭立邦。父郭学忠，母魏氏，母早亡。继母祁氏。姊郭育英，妹郭育杰，弟郭德漳、郭德洋。
1929	10岁	就读于河南省立开封第四小学二年级。
1930	11岁	第四小学二年级学生。
1931	12岁	九一八事变爆发。第四小学三年级学生。
1932	13岁	转学河南省立开封第六小学，为四年级学生。
1933	14岁	不见容于继母，被送回辉县祖籍，就读辉县县立第一小学上四年级。
1934	15岁	仍读辉县县立第一小学，为五年级学生。
1935	16岁	以同等学力考取辉县私立百泉初级中学。
1936	17岁	百泉初中二年级。暑假后升三年级，前往开封投奔父亲，以同等学力考取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
1937	18岁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时刚升高中二年级，投笔从戎，考取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在河南省南阳县受训。
1938	19岁	由军政班保送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人员训练团，在武昌左旗营房受训，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
1939	20岁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由战干团转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集体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珞珈山受训。冬季分发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部主任。由湖南长沙，经湖北公安、襄阳，抵达洛阳。

① 关于柏杨的生平资料，主要参考了古继堂的《柏杨传》、雷锐的《柏杨评传》、百度百科中的“柏杨”相关资料，网址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90.htm。

续　表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1940	21岁	在河南省林县设分团部。父亲在开封去世。运棺柩返回辉县。(时豫北二十五县,除林县外,全被日军占领。)
1941	22岁	转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河南支团部干事,赴洛阳。
1942	23岁	辞三民主义青年团职,考取国立兰州大学(当时名甘肃学院)法律系。赴兰州。
1943	24岁	暑假,赴玉门游历。休学,转赴重庆,投考其他大学,全未录取。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重庆登记处工作。
1944	25岁	改名郭衣洞,由教育部分发国立东北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往四川省三台县。
1945	26岁	抗战胜利,仍读政治系四年级。在三台。
1946	27岁	东北大学毕业。赴沈阳,任《东北青年日报》社长、私立辽东学院副教授。
1947	28岁	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在沈阳筹办《大东日报》。
1948	29岁	解放军进入沈阳;赴北平。
1949	30岁	由北平经青岛、上海,抵台湾。住鹿港初级中学教职员宿舍。从此在台湾。
1950	31岁	任台湾省立屏东农业学校人事管理员。
1951	32岁	任台湾省立工学院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员。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征文,应征,是为写小说之始。
1952	33岁	任南投县立草屯初级中学教员。
1953	34岁	赴台北,任国际青年归主国际协会讲师。受洗。与齐永培结婚。从此在台北。
1954	35岁	任台北县立树林中学教员。长子本城生。
1955	36岁	任中国青年反共救救国团总团部副组长。十月,小说《打翻铅字架》出版。
1956	37岁	任"国立"成功大学副教授。访问日本、韩国。次子本垣生。
1957	38岁	辞救国团及成大职,与妻齐永培离婚,与倪明华结婚,任《自立晚报》副总编辑。二月,小说《天涯故事》出版
1958	39岁	任台湾省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十二月,小说《凶手》出版
1959	40岁	幼女本明生。十月,小说《挣扎》出版。

续　表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1960	41 岁	在台北《自立晚报》,以笔名柏杨写《倚梦闲话》专栏,是为写杂文之始。
1961	42 岁	十二月,小说《旷野》出版。
1962	43 岁	在台北《公论报》写《西窗随笔》专栏。七月,杂文《动心集》("玉雕集")出版。八月,小说《莎罗冷》出版。十二月,杂文《妙猪集》("怪马集")出版。
1963	44 岁	一月,杂文《降福集》("堡垒集")出版。九月,杂文《骤子集》("高山滚鼓集")出版。十月,杂文《马翻集》("道貌岸然集")出版。十二月,杂文《红颜集》("红袖集")出版。
1964	45 岁	二月,杂文《不悟集》("前仰后合集")出版。七月,小说《怒航》出版。十月,杂文《眼如铜铃集》("神魂颠倒集")出版。
1965	46 岁	一月,杂文《乱做春梦集》("鬼话连篇集")出版。三月,杂文《笨鸟先飞集》("大愚若智集")出版。四月,小说《秘密》出版。六月,杂文《不学有术集》("闻过则怒集")出版。八月,杂文《跳井救人集》("立正集")、小说《古国怪遇记》出版。"云游记"十二月,杂文《吞车集》("越帮越忙集")出版。
1966	47 岁	一月,主编《一九六五年中国文学年鉴》出版。四月,杂文《勃然大怒集》("血来潮集")出版。
1967	48 岁	三月,杂文《孤掌也鸣集》("蛇腰集")出版。六月,杂文《水火相容集》("剥皮集")出版。九月,杂文《猛撞酱缸集》("死不认错集")出版。十一月,主编《一九六六年中国文学·年鉴》出版。
1968	49 岁	一月,杂文《玉手》出版。三月,《因伏虎集》("牵肠挂肚集")出版。三月,因大力水手漫画,被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逮捕入狱,死刑起诉,军法审判。
1969	50 岁	与妻倪明华离婚。以叛乱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开除国民党籍。
1970	51 岁	囚禁台北县景美镇军法处监狱。
1971	52 岁	囚禁台北县景美镇军法处监狱。
1972	53 岁	押解火烧岛国防部感训监狱。
1973	54 岁	囚禁火烧岛监狱。
1974	55 岁	囚禁火烧岛监狱。

续 表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1975	56 岁	减刑为八年。(刑事犯减刑一半,政治犯减刑三分之一。)
1976	57 岁	三月七日,被八年刑期届满。被移送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火烧岛指挥部软禁。
1977	58 岁	四月一日,出狱,抵达台北。被中国内地问题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员。在《中国时报》写"柏杨专栏"。十二月,狱中著作《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出版。
1978	59 岁	一月,杂文《活该他喝酪浆》出版。与张香华结婚。孙观汉回台探亲,首次会面。
1979	60 岁	在《台湾时报》写《皇后之死》。一月,狱中著作《中国人史纲》及杂文《按牌理出牌》出版。十一月,杂文《大男人沙文主义》出版。
1980	61 岁	一月,历史作品《皇后之死第一集》出版。十一月,历史作品《皇后之死第二集》出版。十二月,杂文《早起的虫儿》出版。
1981	62 岁	二月,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六月,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出版。七月,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第五次大会,访问美国。十一月,主编《一九八零年中华民国文学年鉴》出版。
1982	63 岁	一月,历史作品《皇后之死第三集》及诗集《柏杨诗抄》出版。二月,访问泰国金三角。四月,应马华公会之邀讲演,再访马来西亚。五月,报导文学《金三角·边区·荒城》出版。七月,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第六次大会,访问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圣马利诺、梵蒂冈。七月,杂文《踩了他的尾巴》出版。
1983	64 岁	五月,历史作品《可怕的掘墓人》出版。九月,历史作品《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战国时代》出版。十月,第二册《并吞六国》出版。十一月,第三册《楚汉相争》及历史《忘了他是谁》出版。十二月,第四册《匈奴崛起》出版。
1984	65 岁	一月,第五册《黄老之治》出版。二月,第六册《开疆拓土》出版。三月,第七册《宫廷斗争》出版。四月,第八册《万里诛杀》出版。五月,第九册《昏君辈出》出版。六月,第十册《王莽篡夺》出版。七月,第十一册《全国混战》出版。八月,第十二册《马援之死》出版;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十月,第十三册《燕然勒石》出版。十一月,第十四册《跋扈将军》出版。十二月,第十五册《黄巾民变》出版。由爱荷华返回台北。

续　表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1985	66 岁	一月，第十六册《东汉瓦解》出版。二月，第十七册《赤壁之战》出版。三月，第十八册《三国鼎立》出版。四月，第十九册《寿春三叛》出版。五月，第二十册《司马夺权》出版。六月，第廿一册《八王之乱》出版。七月，第廿二册《大分裂》出版。八月，第廿三册《五胡乱华》出版。小说《秘密》英译本在香港出版。杂文《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九月，第廿四册《石虎肆暴》出版。十月，第廿五册《符坚大帝》出版。十一月，第廿六册《淝水之战》出版。十二月，第廿七册《参合杀俘》出版。
1986	67 岁	一月，第廿八册《王始帝国》出版。二月，第廿九册《统万碑文》出版。三月，第卅册《自毁长城》出版。四月，第卅一册《南北朝》出版。五月，杂文《带箭怒飞》出版。六月，第卅二册《刘彧诏书》出版。七月，第卅三册《全盘汉化》出版。八月，《柏杨诗抄》英译本在香港出版。九月，第卅四册《萧鸾眼泪》出版。主编台湾 1985 年现实批判文存《台湾是谁的家》出版。十月，《柏杨小说选》在香港出版。十一月，第卅五册《洛阳暴动》出版。
1987	68 岁	一月，第卅六册《河阴屠杀》出版。三月，应邀参加香港电台及星岛日报联合学办的第三届青年阅读奖励计划“开卷有益”，主持颁奖。主编台湾 1986 年现实批判文存。《谁在说真话》出版。四月，第卅七册《遍地血腥》出版。五月，第卅八册《饿死宫城》出版。六月，第卅九册《禽兽王朝》出版。七月，第四十册《黄龙汤》出版。《柏杨杂文选》在香港出版。八月，《金山角・边区・荒城》英译本在香港出版。九月，第四十一册《突厥可汗》及杂文《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出版。十一月，第四十二册《南北统一》出版。十二月，第四十三册《官逼民反》出版。
1988	69 岁	一月，第四十四册《江都政变》出版。《柏杨说故事》、《柏杨在火烧岛》二书出版。二月，《柏杨小说选读》出版。并主编中国内地作家文学大系《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小城之恋》、《她有一头披肩发》、《天狗》、《黄泥小屋》、《丹凤眼》、《空城》、《老棒子酒馆》，陆续出版。三月，《丑陋的中国人》（日译本）、《是龙还是虫》出版。四月，四十五册《玄武门》出版。五月，四十六册《贞观之治》出版。六月，《挣扎》、《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出版。七月，四十七册《黄金时代》出版。八月，《丑陋的中国人》（韩译本）出版。九月，四十八册《武照夺权》、《柏杨说文化》、《柏杨谈爱情》出版。十一月，四十九册

续 表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恐怖世界》、《异域》、《金三角·荒城》、《玉雕集》出版。十二月，《活该他喝酪浆》、《秘密》、《高山滚鼓集》出版。
1989	70 岁	一月，《按牌理出牌》、《怪马集》出版，小说《莎罗冷》出版，五十册《恶妻恶女》出版。二月，《大男人沙文主义》出版。三月，《挣扎》、《道貌岸然集》出版。四月，《姑苏响鞋》、《温柔乡》、《长发披面》出版。五月，五十一册《开元盛世》出版，《家园》出版，《丑陋的中国人》(韩译本)出版。六月，《柏杨妙语：社会篇》、《柏杨妙语：人生篇》、《柏杨妙语：女人篇》出版，《旷野》、《早起的虫儿》出版。七月，《堡垒集》出版。八月，五十二册《范阳兵变》、《怒航》、《前仰后合集》出版。九月，五十三册《睢阳之围》、《踩了他的尾巴》出版。十一月，五十四册《皇后失踪》出版。
1990	71 岁	一月，《圣人集》出版。二月，五十五册《泾原兵变》出版，《天涯故事》出版，《闻过则怒集》出版。三月，《对话战场》出版。四月，五十六册《猪皇帝》出版。六月，五十七册《元和中兴》出版。八月，五十八册《牛李党争》出版，《凤凰集》出版。十月，五十九册《甘露事变》出版，《神魂颠倒集》出版。十一月，《鬼话连篇集》、《凶手》出版。十二月，《大愚若智集》出版。
1991	72 岁	《家园》(德译本)出版。一月，六十册《中大之治》出版，《蝗虫东南飞》出版，《红袖集》、《越帮越忙集》出版。二月，《立正集》、《心血来潮集》出版。三月，六十一册《黄巢民变》出版，《死不认错集》出版。五月，《牵肠集》、《蛇腰集》出版。六月，六十二册《狼虎谷》出版，《剥皮集》出版。八月，六十三册《军阀混战》出版，《中国人史纲》出版。十月，六十四册《大黑暗》出版。十二月，六十五册《五代时代》出版。
1992	73 岁	《丑陋的中国人》(英译本)出版。二月，六十六册《小分裂》出版。三月，主编《就是他》。四月，六十七册《千里白骨》出版。八月，六十八册《半截英雄》出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十月，《柏杨诗抄》出版。十一月，六十九册《儿皇帝》出版。
1993	74 岁	一月，七十册《横挑强邻》出版。二月，七十一册《高平之战》出版。三月，七十二册《分裂尾声》出版。十一月，《可怕的掘墓人》出版。十二月，《路，要你自己走》出版。

续　表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1994	75 岁	一月,《中国历史年表》出版。四月,《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出版。
1995	76 岁	八月,《酱缸震荡》出版。
1996	77 岁	《异域》(英译本)出版。五月,《柏杨回忆录》出版。
1997	78 岁	三月,《柏杨回忆录纪念光盘》出版。
1998	79 岁	八月,《柏杨曰》出版。
1999	80 岁	二月,《通鉴纪事本末 1 · 范睢漂亮复仇》出版。五月,《通鉴纪事本末 2 · 汗血马战争》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3 · 巫蛊恐怖》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4 · 床上巨星赵合德》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5 · 逐鹿型大混战》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6 · 惨烈窝里斗》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7 · 第一次宦官时代》出版。九月,《通鉴纪事本末 8 · 三国周郎赤壁》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9 · 诸葛亮北伐挫败》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10 · 十三王之乱》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11 · 华乱五胡》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12 · 祖逖击楫度江》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13 · 苻坚大帝悲剧》出版,《通鉴纪事本末 14 · 桓玄篡位闹剧》出版。
2000	81 岁	一月,《通鉴纪事本末 15 慕容超传奇》出版。三月,《柏杨的思想与文学》出版。《柏杨全集 1》、《柏杨全集 2》、《柏杨全集 3》出版,《玉雕集》、《怪马集》、《堡垒集》、《圣人集》、《凤凰集》、《红袖集》、《立正集》、《牵肠集》、《蛇腰集》、《剥皮集》出版。六月,《通鉴纪事本末 16 · 王师北定中原日》、《通鉴纪事本末 17 · 鲜卑羡慕中华》、《通鉴纪事本末 18 · 南北乱成一团》、《通鉴纪事本末 19 · 最美丽的蠢女人》、《通鉴纪事本末 20 · 最严重一次叛变》、《通鉴纪事本末 21 · 人渣家族》出版,《高山滚鼓集》、《道貌岸然集》、《前仰后合集》、《闻过则怒集》出版。七月,《神魂颠倒集》、《鬼话连篇集》、《大愚若智集》、《越帮越忙集》、《心血来潮集》、《死不认错集》出版,《柏杨全集 4》、《柏杨全集 5》、《柏杨全集 6》出版。九月,《通鉴纪事本末 22 · 驴老爷,你赢了》、《通鉴纪事本末 23 改朝换代大混战》、《通鉴纪事本末 · 24 唐王朝一再夺嫡》、《通鉴纪事本末 25 · 贞观对》、《通鉴纪事本末 26 · 恐怖帝国》出版。十一月,《柏杨全集 7》、《柏杨全集 8》、《柏杨全集 9》出版。十二月,《活该他喝酪浆》、《按牌理出牌》、《大男人沙文主义》、《早起的虫儿》、《踩了他的尾巴》出版,《异域》出版。

续　表

时间	柏杨年龄	事件
2001	82岁	《通鉴纪事本末27·安史之乱》、《通鉴纪事本末28·第二次宦官时代》、《通鉴纪事本末29·大黑暗来临》、《通鉴纪事本末30·兵变,兵变,再兵变》、《通鉴纪事本末31·牛李两党殊死斗》、《通鉴纪事本末32·黄巢终结虎狼谷》、《通鉴纪事本末33·独柳下,天才之辩》出版,《通鉴纪事本末34·大屠杀与小分裂》、《通鉴纪事本末35·狗崽长大咬死人》、《通鉴纪事本末36·英雄与流氓》、《通鉴纪事本末37·致命的横挑强邻》、《通鉴纪事本末38·陈桥兵变》出版,《奋飞》出版。
2002	83岁	十月,《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出版,《中国人史纲(上/下)》出版。
2003	84岁	三月,《新城对—柏杨访谈录》出版。十二月,《皇后之死》、《帝王之死》出版。
2005	86岁	十一月,《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写真》出版。
2008	89岁	二月二十四日因肺炎并呼吸衰竭住进加护病房,三月十九日转入普通病房,后来又因胃部问题进行"胃造廔"手术,再次住进加护病房,四月十二日才转入普通病房,以氧气及呼吸辅助器治疗。四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年八十九岁。
2010		八月三日,骨灰运到河南新郑福寿园安葬,魂归故里。九月十二日,遗骨安葬仪式在河南新郑龙湖镇的河南福寿园陵园举行。

为了更方便地了解和研究柏杨的作品,下面就按照惯常的文学类型划分来加以简要介绍。

一　小说创作概况

柏杨最早创作出数量众多的小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台湾文坛的。他的小说大概有近百篇左右,长篇、中篇、短篇俱全,而且类型众多、形式多样。通常被分为七大类,分别是侠义奇情、灵异小说、神话寓言、文艺爱情小说、悬疑惊悚小说、社会写实、意识流试验新小说。从写作时间和艺术成熟程度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郭衣洞"之名发表的一些"反共小说",以1953年的长篇小说《蝗虫东南飞》(再版时改为《天疆》,后又改回原名)为代表,其内容是"苏俄红军,这群飞向东南的蝗虫,其罪行与所造成的灾难,肯定是小说写作的

极佳素材。背景是东北,小说从长春、沈阳写到抚顺,一群苏俄红军以蛮横的态度、残暴的手段,穷凶极恶地要食物吃、要酒喝、要手表带、要女人来发泄性爱、要人来砍来杀,他们灭绝人性,却又振振有词,对于东北人民来说,那是人间浮动的地狱"①。除此之外,还有同主题的短篇小说集《辩证的天花》,也发表于1953年。这类反共小说是为了迎合台湾当局"反共"的意识形态和白色恐怖政策而作,属于一种政治主题先行的命题小说,自然会把苏联红军和共产党严重妖魔化和丑恶化。虽然这部小说获得了当时的文奖会征文奖,但是它的艺术性却极其粗糙,与当时很多其他反共小说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也没有表现出艺术探索精神,只是当时时代的应和之作罢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说到今天已经湮没无闻。可以说,此时柏杨的小说尚处于艺术上的探索阶段,他还没有找到符合自己创作特色的小说形式和主题风格。

其后,从1955年发表《魔鬼的网》(后改名《打翻铅字架》)为开端,直至1965年为止,可以说这是柏杨小说的成熟期和收获期,上面所列举的七种类型就是在此时期出现。这也是柏杨同时创作小说和杂文的一个时间段。此时,柏杨非常注意小说的艺术性,诸多小说作品不但语言通俗流畅、构思精巧,而且吸收了英美国家浪漫主义小说的诸多因素,把爱情、死亡、阴谋、恐怖,以及神经质的人物形象、魔幻鬼魂等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爱伦·坡式的神秘缥缈风格和罗曼蒂克的氛围。其内容主题,主要表达他对社会现实和人生、人性的看法,尤其是对人性之爱——亲情之爱、男女爱欲、父母对子女之爱、友情之爱等的探索和寻找,其中包含了柏杨一以贯之的关心同情下层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其中亦包括对复杂善变的人之本性,以及爱情神秘莫测本质的追问和分析。正如柏杨在196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秘密·序》中,极富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发问:"宇宙间最奥秘难测的莫过于人生,而人生中最惆怅难遣的莫过于爱情。人生短暂,宇宙永恒,已够使人酸鼻了,更何况宇宙也终有毁灭的一天!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将来的结局是彻底的消失?抑真的有灵魂?而灵魂又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我们如果有灵魂,恨固无尽期;如果无灵魂,恨更无尽期。"②作者于1961年12月出版的长篇单行本小说《旷野》,也是此类型的爱情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柏杨在1962年8月出版的中篇小说(一说为九万字的长篇小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5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2册"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67页。

说)《莎罗冷》,他这样自述自己的写作状态:"写的是谋杀和沉船,但没有血淋淋的场面,我仿佛觉得不是我在写,而我只不过一个代笔者,有上苍的旨意使我这样,冥冥中有声音告诉我这个故事。"①作者写作时所处的这种"迷狂"状态,是浪漫主义小说家常有的一种状态,从此处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杨所受西方浪漫主义小说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可从中看出,柏杨此类小说艺术结构形式上的浪漫主义手法——传奇浪漫的故事、哀婉抒情的情调氛围,以及精巧的故事情节结构。

如果说上面所列举的作品属于富有浪漫情调、抒情色彩浓厚的爱情小说,在艺术手法上可归类为浪漫主义的话,那么他在1964年出版的小说集《怒航》中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另一类型,可以划归为幽默讽刺的杂文类小说,即用杂文笔法写出的小说。柏杨在《怒航》自序说:"人生本来是应该快快乐乐的,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人是唯一的幸运儿。可是幸运儿的苦难却似乎比其他不幸运的动物,要多得多。我们看见野兽间互相迫害,难免十分震惊;但对人间的互相迫害,反而往往无动于衷,大概是习惯成了自然的缘故吧。这对那些天真活泼,终有一天要长大成人的儿童而言,真是一种可怕的刑罚。使身为父母的人,一想起他们免不了要跳进这样的社会,便不由得兴起无限悲伤。大半苦难来自人类自身,人的最大罪恶,似乎不在于奸淫烧杀,而在于愚昧自私,多少悲剧和惨剧都由此而生,我们有权利希望我们活得正常。文学先天的有道德性,这并不是向谁乞怜,也不是训练自己对权势驯服。而是,只有悲和愤的力量才能使灵性充分发挥。我非常抱歉,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没有最流行的男女调情谈爱的描写,也没有故事新编式的美妙对话。但我爱它,因它不仅是一个悲和愤的理想,也是一个悲和愤的实践。"②也就是说,《怒航》中的多篇小说其实是提出社会问题的一类小说。

1961年的长篇神话寓言体小说《云游记》(后改名为《古国怪遇记》,直至今日仍用此名)和1955年的短篇小说集《魔鬼的网》(后改为《打翻铅字架》),也属于杂文体的小说作品。因为在《古国怪遇记》中,"柏杨并不是想说些怪诞不经的故事博君一笑,而是批判社会病态现象:《红包国》讽刺红包漫天;《猛生国》讽刺当时国人不知节育、猛生小孩;《开会国》批判开会成习,议而不决等;《歪脖国》写举国之民皆脖歪,原来是'公共汽车'太少,老百姓歪着脖子等车之故也;《西崽国》讽刺崇洋媚外;《恶医国》讽刺恶医招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2册"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55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4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7页。

摇撞骗、草菅人命;《飞帽国》讽刺乱打小报告,胡乱扣人帽子;《官崽国》讽刺'兼差兼薪、兼全兼抓'的恶官"[①]。而《打翻铅字家》中的十八个短篇,也是直指社会的病态现象和具有丑恶倾向的人心和人性,这些病态现象正是柏杨杂文所要加以针砭和抨击的。该部小说集除了幽默讽刺的杂文式风格以外,其思想立足点亦和杂文相近,较明显地表达出作者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和对诸种不良对诸神社会现象的关注。可以这样说,这些通过幽默、荒诞、夸张、讽刺的杂文笔法而写就的小说,颇类似鲁迅的《故事新编》,尤其是《古国怪遇记》中的篇章。这亦证明了,抱持"现代性世俗化"观念的作家,用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依然可以达到批判和揭露社会黑暗的目的。柏杨这个"野生知识分子"肩负的重任,丝毫不输于那些立志救民生于水火的精英知识分子。

而短篇小说《莲》、《强水街》、《晚霞》等所关心的下层民众苦难主题,虽然可以被归为社会写实派小说,但是它们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并非全是现实主义的。例如《强水街》、《龙眼粥》等,虽然是控诉社会黑暗面的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是其主题却是通过描写超现实的鬼魂以及悬疑惊悚等表现出来的。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也吸收了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手法。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一片西方现代主义的主潮中,现代派小说和诗歌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柏杨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也适当地吸收时代环境赋予的艺术宝藏。总而言之,从柏杨小说运用的艺术手法上来说,虽然小说作品可以划分为七类,不过作者在其艺术表现手法上并不拘泥于一种,而是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多样手法,可说是博采众长,兼容并包。并非是当时台湾作家们普遍采用的现代主义流行手法。从主题的角度来说,柏杨的小说也颇具自己的特色。与同是外省人的白先勇的小说相比较,白氏在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极其鲜明地表达出国民党来台之后那种"怀乡"的愁绪,很具有台湾文坛五六十年代"乡愁"作品的时代感和历史感。但是,上面所列举的柏杨小说,却没有露出与此相类似的乡愁来。因为他的很多小说的背景是不分中国内地和台湾的,而且像《莎罗冷》等浪漫传奇小说,发生的背景更像是欧洲等国。更何况,柏杨小说的主题内容多种多样,浪漫言情的小说最关注的是善变的自然人性和爱情,以及由此带来的爱情悲剧;在批判社会黑暗面的社会写实小说中,作者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来关心那些被迫卖淫养家的下层女性等小人物的,而这些人物并没有离乡背井的身世背景;在以幽默讽刺笔法写出的小说作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5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01页。

品中，柏杨的主要关注点与此阶段的杂文相似，立意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即“酱缸文化”及其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内容主题意蕴上，柏杨小说可说是在当时文坛的主流之外，确实是比较特殊和边缘的。大概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柏杨的小说在当时的台湾和华人世界没有引起轰动。尽管他的一些小说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二 散文创作概况

柏杨的散文作品数量更是巨大，虽然他是以小说家身份登上文坛的，但是数量众多的散文作品才是他成名的代表作品。按照广义散文的分类，柏杨的散文作品主要包括杂文、报告文学和回忆录。具体而言，杂文是柏杨散文中最重要的一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杂文不但是最能够体现出柏杨独特的现代性思想的一种文体，而且也是他创作数量最多、质量水平最高，同时也为他赢来国际性声誉的一类作品。并且他的杂文创作时间持续近三十年，不像小说只是集中于五六十年代，这也是作者在创作生涯中坚持最长的一类作品。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玉雕集》、《堡垒集》到 80 年代中期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大概创作出三十本余本杂文集。总体而言，这些杂文集虽然分别创作于不同的时期——60 年代和 80 年代左右，但它们的主题思想和语言等艺术结构和风格呈现出大致统一和比较连贯的特点。在杂文中，最能够代表柏杨思想观念的核心象征意象是“酱缸文化”，以及由“酱缸文化”批判派生出的“四类畸形人”和“丑陋的中国人”两个意象。它们始终贯穿在他各个阶段的杂文创作中，同时使其呈现出“喜笑怒骂之中，隐含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操”[①]之风格。然而，如果进一步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以柏杨 1968 年入狱至 1977 年出狱重回文坛为分界点，其入狱前的杂文和出狱后的作品，不但在内容题材和社会关注点上存在一些细微差别，而且其对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层面的内涵亦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相异的侧重倾向。因此，笔者拟把柏杨杂文分为前后两期，把他 60 年代入狱前的归为早期杂文，而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的杂文则是晚期杂文。具体来说，在早期杂文中，柏杨最早关注的是女性外貌和男女恋爱、婚姻，尤其以台湾平原出版社在 1962 年出版的《玉雕集》，1963 年 1 月出版的《堡垒集》和 1963 年 12 月出版《红袖集》，以及 1967 年《牵肠集》等杂文集最为集中。以《堡垒集》为例来说，共五十二篇，主要论述男女婚姻的种种现象与问题：“‘社会是一个战场，家庭则是一个堡垒’，‘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也是不合乎逻辑的，

① 聂华苓主编：《柏杨小说选》，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0 年。

同时也是虚荣的焉。'故有'座右镜'及'摘麦穗'之妙喻。作者以'座右镜'譬喻现代男女选择伴侣之要:需充分理解自身的年龄、个性、学识等条件,照照镜子,'抬头望明镜,低头思条件。然后再去求偶,便聪明得多矣。'并举'摘麦穗'的故事,说柏拉图有一弟子上询求偶之事,柏拉图嘱之:'你沿着麦垄,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能回头,摘一朵全垄中最大的麦穗给我。'弟子总想摘取最大的一朵麦穗,拼命往前寻找,无奈走到最后,却无一好货色,只能随便拣一而归。作者以此指出:求偶是'不能回头'的,乃因时光飞逝,情势已大不同也。又从男女的性情、修养年岁等,阐论'怨偶'的形成背景,盖男女双方须彼此多求长进,各自检讨,'爱情是相对的',别因一时冲动,盲目了眼睛。"①虽然柏杨的目标是建立起具有独立自主和自由平等观念的现代女性形象,以及现代婚恋观念,由此表达出对女性解放事业的关注,不过,他在该类杂文中所处理的内容主题,虽然牵涉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进行批判,例如裹小脚等,但是大部分内容却是讨论当时女性的外貌打扮,以及台湾现代都市社会市民最关注的爱情婚姻等"人生大事",并非是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大事",因此开始时并没有引起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然而,柏杨在其他的杂文中,却显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尖锐批判和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锋芒,这也逐渐成为柏杨杂文最独特的特征之一。他的第二部杂文集《怪马集》,也于 1962 年出版,该部杂文集已经露出作者集中火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下台湾社会中种种不良现象的端倪。随后在 1963 年 4 月的《圣人集》,1963 年 9 月的《高山滚鼓集》,1963 年 10 月的《道貌岸然集》,1964 年的《前仰后合集》、《神魂颠倒集》,1965 年的《鬼话连篇集》、《大愚若智集》、《闻过则怒集》、《立正集》和《越帮越忙集》,1967 年出版《蛇腰集》和《剥皮集》和《死不认错集》中,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逐渐系统化。他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选择"酱缸文化"这个颇具民间色彩的意象,贯穿此时期的所有杂文集,以此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几千年汇聚起来的糟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和"酱缸文化"其实是同一个概念范畴,可以互换使用。他认为,"酱缸文化"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根本病根,也是最大的病根,只有撞破这个把中国人酱住几千年,并且其余毒仍然在毒害现代市民的大酱缸,中国才能够拥有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精神,建立起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平等、法制和人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365 页。

道主义思想观念的现代社会来。需要注意的是，柏杨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如此通俗易懂的“酱缸”意象，来确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可能与他“野生知识分子”的立场有关。他非常反对那些所谓具有高深艰涩学问的学院派作风，认为“学院派为了唬人，往往把一件简单明了的道理，故意拖泥带水说上一大堆”①。他渣滓有意选择“酱缸”这个最普通和最形象的事物，以其发散出的臭味和沉淀物来象征中古传统文化对国民和国家的毒害。在这些杂文集中，柏杨分别从理论和历史实践两个方面，透彻分析出“酱缸文化”的内涵、外延及形成的历史原因和表现症状。他还提出了“酱缸定律”和“酱缸蛆”两个概念，把它们作为“酱缸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亦成为他“酱缸文化”批判的一个内容。柏杨批判“酱缸文化”的目的之一，是建立起现代市民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这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系统得以建立和完善的一个根基。因此，柏杨在这些杂文中，着眼于改造国民劣根性，他把畸形人批判当做“酱缸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的“畸形人”，分别是指集特权和凶残于一身的封建帝王，依附于政权并是其“帮凶”的“圣崽”类知识分子，狂热追求做官和权势的“官崽”，以及以做官和当圣人为最高目的的普通民众，这四类畸形人是“酱缸文化”的特殊产物，并且现代社会依然残留有这些“畸形人”，如果不改变他们的国民性的话，就无法撞破和清除“酱缸文化”。正是柏杨毫不妥协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当时台湾社会中不良现象的抨击，才使他以文字惹怒国民党当局，招来以政治犯身份关押在牢狱中将近十年时间的厄运。

柏杨前期杂文的创作时间，从 1960 年至 1968 年初入狱前，共计只有八年时间，却创作出 21 本杂文集，近三百万字。他不仅从社会学，而且也从心理学和家庭伦理学等多种角度，来探讨和抨击“酱缸文化”和其种种表现症状，内容涉及面也非常广泛。学者雷锐总结出四个方面的主题：“1. 猛烈抨击中国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文化。这是柏杨杂文的中心内容。21 本杂文集，没有一本不提到，不过有的集子火力集中直接，有些集子分散间接，有些文章迂回进击，有些文章顺手刺之。柏杨在这些集子中，创造了‘酱缸’理论。……2. 辛辣讽刺台湾现代社会的丑陋黑暗。柏杨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国民党政府丧失了在中国内地的统治权，带着失败的屈辱和反攻的热望，在 50—60 年代里日益加速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独裁。特殊的‘戒严’法，使台湾人民生活在没有基本人权的环境中。这些条件恰是柏杨所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6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343 页。

指出的'酱缸'加倍霉烂的催酵剂。于是,社会上的黑暗丑恶现象层出不穷,柏杨的杂文大都是针砭这些丑恶现实。……3.剖析评述爱情、婚姻、家庭现象,对这一系列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提出明智的答案。……而爱情、婚姻、家庭正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生产的重大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爱情又是人类感情中最美丽、最复杂的一种,读者对其兴趣是不言而喻的。柏杨杂文大量涉及这一方面。……4.对其他社会现象、生活现象的剖析、评价、判断。这方面的内容及其庞杂,主要也是因报纸专栏的性质所决定。"①这些内容亦表现出柏杨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追求。

柏杨早期杂文在艺术形式上也颇具特色。形象的比喻、泼辣的议论说理,以及流畅、幽默、讽刺的语言,构成其杂文最明显的艺术特征,这亦成为柏杨式独特的杂文风格,一直贯穿到后期杂文时期。

从1978年的杂文集《活该他喝酪浆》开始,包括1979年1月出版的《按牌理出牌》,1979年11月的《大男人沙文主义》,1980年12月的《早起的虫儿》,1982年的《踩了他的尾巴》和1985年8月《丑陋的中国人》等杂文集,属于柏杨后期杂文。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可说是对其前期杂文,甚至可说是他的所有杂文批判内容的一个汇总和概括:"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炒'、'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我们可以想象当场的震撼程度,从稍后在留学生群中引发的讨论,已经可以预知其演说内容终将引爆。"②不过相比前期而言,其后期杂文行文风格则变得相对含蓄内敛一些,由于"不再指名道姓地骂人,对一些处境艰难却仍奋勉努力的升斗小民更是大加赞扬,这是柏杨以前的杂文较为罕见的"③。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早期杂文以"破"为主的文明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杂文特点虽然仍在,但是后期杂文已经逐渐倾向于提出"立"的建设性意见。他依然进行"酱缸文化"批判,只是开始强调如何改善和稀释"酱缸",使之不再混浊,最终变得清澈。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也以建设性的意见为主,而不仅是早期杂文中的猛烈批判。这也是他提倡自由、民主、人性尊严、灵性和人道主义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随着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蒋介石去

---

① 雷锐:《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175—178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5页。

世后,蒋经国当上台湾领导人,逐渐改变了统治策略,采取了一些较开明的措施。这使台湾紧张的政治局势日渐宽松,自由和民主不再是台湾人民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且,台湾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焦点,已经相应地转移到经济上来。作为普通民众代言人的柏杨,自然会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变化,以此调整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对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和行为礼仪等民间伦理规则更加关注。以《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想》为总标题的系列散文,就是他后期杂文中风格转变的一个典型体现。由此亦可和随心所欲看出,此时柏杨手中"酱缸批判"的宝刀未老,只是在作品中运用得更加谨慎而已。

报导文学(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回忆录是柏杨散文中的另三种类型。以邓克保为笔名创作的报告文学《异域》,早在 1961 年出版之时就震动了当时的文坛。1982 年的《金三角 · 荒城》同样轰动了整个华人区域。能够书写处于中国、缅甸和泰国三国交界的"金三角"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描绘生活于此间的、以血腥厮杀和孤独绝望情绪为其基本生存状态的国民党军人、毒枭们——这些已被处于安稳平和生活中的人们遗忘的边缘普通人,仍然要归因于柏杨拥有的人道主义、人性尊严等现代性思想。更重要的在于,柏杨借着这两部报告文学,把那些边缘处境的国民党孤军们,也纳入到现代市民中来。也就是说,现代市民群体成员不仅包括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市民,也包括这些被都市忘记的普通人。正是为了激起整个华人社会对处于"异域"的国民党老兵的关心和同情,柏杨才用小说的虚构与新闻纪实相融合的艺术手法,写出了这些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家园》,取材于柏杨夫妇在 1988 年回中国内地探亲的真实经历和感想,全文共计 61 篇。柏杨依然坚持反对封建专制暴政,追求人性、自由平等、人道主义为基础出发点的现代性世俗化观念,来观察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及其"酱缸文化"的残渣,以及中国内地当时的社会现状。

柏杨认识到:"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深谷,专制与封建,落后与封闭的腐蚀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沦落成为权势的寄生虫,自己既不培养独立人格,也不训练思考,却把全副精神,去不停的表态——向手握权柄的大爷们表态,包括胁肩谄笑、卑躬屈膝、捶胸打跌、面红耳赤。他和你谈话时,不是希望你听见,而只是希望主子听见,并在听见后频频点头;他写文章时,不是希望广大的读者群看见,而只是希望主子看到,并在看到后频频点头。这种价值取向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遂成为一种异化了的动物,心目中没有自己,只有权势,一言一行,都在向权势挤眉弄眼,目的不过是讨好大爷:'你看,俺多么忠贞!'于是,中国人眼中,两面讨好,才是上策:一面讨好,不

过中策；至于两面不讨好，则是一条绝路，因为没有主子豢养。‘讨好’和‘表态’遂成为专制封建制度下，两门最重要的功课，了解这两门功课后，对官场文化上的任何疑难问题，都可豁然贯通，迎刃而解。有些人，当我们吃惊于他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怎么写出那种文章时，这两门学问就为我们提出答案。”①该报导文学的关注点依然是国民的劣根性。因此当柏杨沉痛地说：“这是一种国营制度下特有的情绪焦灼症，十亿人中，几乎五亿人在这种忿怒、怨恨、嫉妒、绝望的焦灼情绪中煎熬。天长地久，整个民族品质都会堕落。”②的时候，几乎可以触摸到他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式忧伤，是渴望祖国人民能够过上幸福快乐生活的一种祈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爱恨交加的情绪显露。也正是这个原因，柏杨才在结尾深情地说：“中国内地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1995年出版的《柏杨回忆录》，是柏杨在患眼疾和开刀治疗眼睛与脊椎期间，经他口述，周碧瑟执笔记录的传记。周碧瑟曾经回忆此书的成书过程：“我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而竟替一位大文豪执笔，朋友都替我捏一把汗。柏杨一生从事写作，他用字如神，而我却是个门外汉。读者们希望读到的不只是柏杨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希望能享受他绝妙的文句与字里行间洋溢的感情。因此，我尽可能地保留柏杨文字的原味，这本书，我唯一的贡献只在于‘逼供’。在柏杨眼睛开刀以及接踵而来的脊椎开刀，这五个月不能看、不能坐的岁月里，我抢救了他这段时间，写成此书。这是柏杨的朋友（包括我）和读者期盼多年，催问多年的一本书。柏杨的一生充满传奇，知道他成长的环境与过程之后，较能了解他对中华文化的批判。”③从该部自传可以看到柏杨一生的坎坷经历、铮铮傲骨和顽强不屈的斗志，以及他对温暖、温情和美好人性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他逐渐形成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生活基础和社会人生背景，为理解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三　诗歌创作概况

柏杨的诗歌《柏杨诗抄》（后改为《柏杨诗》，内容增加上出狱之后所写的诗歌合而为诗集），在柏杨作品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同样是研究柏杨的文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8页。
② 同上书，第246页。
③ 同上书，第271页。

学思想和其文化思想的重要文本。这是他在将近十年的牢狱生活中,用斑斑血泪陆续写出的作品,共计六十首左右。柏杨曾经以此诗集获得 1992 年美国凤凰城国际桂冠诗人奖。该联合协会主席班杰明·于松如此评价《柏杨诗抄》:"一个天赋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①]可以说,这个评价是很中肯和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说他狱中所写的《中国历史年表》等历史著作,是借古事古人间接抒发自己的忧思,以及对"酱缸文化"继续进行批判剖析,表现出柏杨理性层面的思考的话,那么,《柏杨诗抄》则是柏杨狱中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直接产物,是更加主观感性和个人情绪化的。这些诗歌使作者郁积在心中的人生块垒,得以直接喷发和宣泄出来,以达到遣怀抒情的目的。换言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无可置疑的,诗的写作必然是一种心理的治疗,在珠联玉缀的过程中抒放愁怨,省思个人与家国的千丝万缕之纠葛,生命之悲苦乃化成血泪诗篇,扣人心弦"[②]。由于这些诗歌是作者以自身刻骨铭心的监狱生活体验为素材,具有绝对的现实真实性和社会真实性,这决定了他诗歌中叙事和抒情的独特性——叙自己身陷冤狱的过程和监狱非人生活,抒自伤身世与对黑暗专制的反抗之情,以及对狱中其他政治犯难友的同情等内容。在艺术形式上,则采用五言、七言的古体诗歌和宋词的形式。除了因为柏杨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之外,可能也因为他对白话诗歌始终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白话诗歌在中国文坛是不太成熟的一种文学样式。他在 50 年代的短篇小说《打翻铅字架》,以及《古国怪遇记》中的《诗人国》一章,讽刺的就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现代诗人和诗歌。柏杨的诗歌重视的是"诗言志"的功能。他在"序"中说:"俗云'痛呼父母,穷急呼天。'前者是儿时感情的余绪,后者是成年后逢到绝境时的心声。当哀呼时,只是一种哀呼,忘我的哀呼,没有人还管那哀呼合不合韵律。发之于诗,也是如此。"[③]所以柏杨这个从没有想过专职创作诗歌的作家,在自身被捕陷身监狱这一绝境之时,却情不自禁地开始写作诗歌。其中,"第一首《冤气歌》及第二首《邻室有女》,是在调查局狱,无纸无笔,用指甲刻在剥蚀了的石灰墙上,甲尽血出,和灰成字"[④]。《冤气歌》是一首叙事诗,借历史上的八个冤狱典故和自己的冤狱相对照,以今思古和以古抚今,在今古对比中感叹"苍天曷有极/悠悠我自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2 册"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7 页。

② 同上书,第 12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页。

④ 同上书,第 21 页。

清/冤魂日已远/生魂怜典型/囚室空对壁/相看两无声”。而《囚房》一诗则是纯粹写实，把监狱中的艰难生存状况，以及政治犯们的心灵恐惧如是描绘出来：“身如残尸爬黄蚁/人同蛆肉聚蟑螂/群蚊叮后掌染血/巨鼠嗜罢指留伤/暮听狂徒肆苦叫/晨惊死囚号曲廊”。然而就是处身于如此残酷恐怖的环境中，柏杨仍然没有灰心绝望，而是在“欲求一刹展眉际/相与扶持背倚墙”的举动中，看到了人性的温情和美好，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亦是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此情此境中的展现。尽管他自己也是身陷囹圄，却依然具有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赤子衷肠。上面所列举的诗歌，仅是《柏杨诗抄》中的两首代表作品，不过从中亦可窥见整个诗篇的内容全貌和艺术特点。可以说，在《柏杨诗抄》中，柏杨反对黑暗专制制度，富有人道主义思想情怀的信念不改。因为自身受到非人的迫害，反而更加坚定自己反对黑暗专制的信念，为他出狱之后成为“人权”志士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

四　史学著作概况

在数量上能够和杂文并驾齐驱的是柏杨的史学著作，后者可称是卷帙浩繁，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杂文创作。柏杨在被关押在火烧岛服刑之时，就利用当监狱图书馆外役的机会，仔细翻阅《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著作，并且开始偷偷着手撰写《中国历史年表》等史学著作。在狱中将近十年时间中，柏杨依靠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人史纲》。他出狱之后，这三部史书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出版。他还从1983年起，把古典史籍《资治通鉴》，从文言文陆续翻译、改写成现代白话文版本，共计有七十二册，这就是柏杨自己所称的“现代语文版”的《资治通鉴》。除此之外，他还在1983年出版了专写中国古代帝王之死的《可怕的掘墓人》、《忘了他是谁》，以及在1981年和1982年出版的以《皇后之死》为总标题的三部系列史，分别包括《姑苏响鞋》、《温柔乡》和《长发披面》，来仔细探讨中国古代皇后妃嫔之死和历史女性被皇权、男权压迫的命运，以及妇女如何得到解放的可行性途径。在1985年，《柏杨版资治通鉴》当选为全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也就在同一年，《中国人史纲》也被列为对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这主要归功于他独特的现代化历史观，即“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

充满新鲜刺激的词句作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他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我在脑海中不停酝酿,想彻底取消朝代的框框,改用纪元(一百年)为单位,使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得以更明确地显示出来,把历史上那些令人头昏脑涨的官名,一律现代化"①。柏杨的这种以"小民为本"、以文化普及为主的史观,毫无疑问是他杂文观念的延续和发展,是他的现代性思想倾向世俗层面之理念在史学著作上的一个典型表现和反映。柏杨对史传著作的翻译和改写工作延续到90年代。在1999年,柏杨的白话版《通鉴纪事本末》共计三十八册,也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陆续出版。至此,耄耋之年的柏杨对史传作品的翻译、改写、重写和创作工作才算是完全告一段落。从60年代末狱中服刑期间算起,柏杨翻译、创作中国历史著作作品的时间也长达近三十年。创作时间之长也与杂文创作跨越的时间长度几乎相同。但是,柏杨写作的中国史传著述的时间比较具有连续性,没有杂文创作时的强迫性因素导致的中断(指柏杨在以政治犯身份在牢狱中度过的十年期间,无法写作杂文),而且柏杨的文学思想已经经过小说、杂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各个阶段的磨炼,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深化,虽然史传作品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酱缸文化"批判锋芒不亚于杂文,却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史传作品体现出的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杂文可以与相媲美。

与古代历史典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较,柏杨的白话版本不仅是把文言古文译成现代白话文,更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内容进行重写和改写。柏杨版与司马光版之间的巨大差别,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小民为本",而不是"以帝王为本"的现代化史观之外,还在于柏杨坚持"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柏杨始终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来写作和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的是中国的现代性如何走向世俗化的历程。众所周知,虽然自从台湾光复至今,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中国",台湾人民都盼望统一,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不可忽略的是,由于中国内地在1949年后就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台湾地区两地隔绝,而强调台湾独特的本土特点的思想意识始终作为一股潜流存在着②,悄悄侵蚀着台湾人民希望祖国统一、只有"一个中国"的信仰。作为一个从中国内地来台的外省籍作家,虽然柏杨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84—285页。

② 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湾前卫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从见到美丽台湾的那一刻就爱上了她[1]，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与祖国密不可分、血脉相连，所以柏杨坚决持有一个中国的观念："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唯一的立足点。"[2]正是因为拥有"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豪感，柏杨才能够以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和历史文化作为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书写出如此数量庞大的历史著述来。

正是柏杨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化历史观念，成为他把中国历史典籍《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翻译、改写成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的一个内在动力。他对现代性的世俗化追求，则使他希望能够增添这些史书典籍的文学性和艺术吸引力，这样才能够符合广大市民的阅读和欣赏口味，达到普及推广、改造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目的。基于这种构想，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意从文学角度对这些古代历史典籍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和创新，并且依然以"酱缸文化批判"的思想意识，贯穿所有的历史著述，这也是柏杨的史传作品的另一个鲜明特点。由此也赋予这些古老的历史典籍以新鲜生命，化古代晦涩的历史典籍为今日的通俗白话史书。从这个层面来说，《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和其他史传著作，尤其是《中国人史纲》、《皇后之死》、《帝王之死》等作品，实际上是贯注着作者独特的精神块垒，打上作者独特的"酱缸文化批判"烙印的文本。换另一句话说，柏杨所做的其实是对历史典籍的重写与再造工作。与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倡导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倒有某些相似之处。可以这样说，这些曾经晦涩难懂、无人问津的古典巨著，正是在柏杨手中才拥有了新的文学生命力，并且得以改变被广大普通读者冷落的命运，而被他们广泛接受和阅读。

柏杨还在白话版的《资治通鉴》中添设了"柏杨曰"部分，这是柏杨从文学层面对古代典籍进行改写、重写的一个重要举措，亦使作品更加具有独特的柏杨式特点："柏杨通过'柏杨曰'除了和历史对话，和司马光对话，也和众多的儒家菁英对话"[3]，同时这是柏杨写作该书的目的之一，因为"抚古思昔，历史也就不再是舞台上的往事陈迹，因此他试图从历史着手，去了解我们这一代苦难的根源；他以古为鉴，要表达的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0—67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感受”①。柏杨还把“柏杨曰”从《柏杨版资治通鉴》中摘录出来，专门汇编成专册，就命名为《柏杨曰》而出版发行。《柏杨曰》表现出柏杨“诚实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类发明了文字，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记载下来，成为历史。使后代的人，可以凭藉这些记载，寻觅自己的归属，作生存的依据，不但精神上得到支持，还可以身历其境，感受祖先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倾听他们从旷古的空山，传下来高亢飞扬的言论，揣摩他们在深宫内院窃窃私语的权谋术数。历史让我们分享前人沙场上激烈的战斗，搏命的厮杀，也让我们分享闺房内儿女情长的悱恻缠绵。有了历史的记载，我们短短的人生一世，才不致是一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因后果的荒唐的独幕剧。”“前代研究历史的人如司马光，本来就是皇家的史官或代言人，维护帝王的立场，是他的本分。如王夫之，则是在统治者之前，乞讨一点残茶剩饭的士大夫之流，终其一生，全副精力集中在狭隘的族群和儒生主流利益之上。哀哀无告，受苦受难、辗转呻吟的小民疾苦，全被隔绝在他们的认知之外。”②

当然，如此评价历史人物和文化现象的方式，并非是柏杨的独创。他坦然承认受到过《资治通鉴》中“臣光曰”体例和方法的影响，才创造出“柏杨曰”体式。但是用民主、平等和人道主义等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观念来评价和分析历史人物形象，由此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和文明进行批判、针砭，使之具有《丑陋的中国人》式的杂文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柏杨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第一人。

第二节　柏杨研究概况

对柏杨其人其文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和评论，多年来始终吸引着国内外学者和批评家。但是，迄今为止出现的大部分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是对柏杨某一类作品在文学、文化层面上进行的研究和评论。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些专著和学术论文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价值，成为柏杨研究领域中的亮丽风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内地学者和港台、海外的学者由于学养积累不同和对柏杨作品切入的视角不同，因而他们对其文学、文化、思想性成就和社会价值的评价表现出明显差异来。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综合来说,港台和国外的柏杨研究就其总体情况而言是比较平稳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相比较中国内地学者的理论修养自成一个体系来说,港台的学者和国外的研究者们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和相同性,而且港台的柏杨研究和国外柏杨研究几乎同步发展,因而本文把港台和海外的柏杨研究状况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柏杨研究呈现长盛不衰的繁荣局面。柏杨的小说、杂文和报告文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发表,当时就有非常多的评论性、研究性的文章及时出现。当然,此阶段的文章主要是对柏杨创作的某一类作品进行专题式研究。从70年代开始,尤其是柏杨因文字获罪入狱近十年期间,很多民主人士纷纷在中国香港、美国等地撰文力图利用国际力量来营救柏杨出狱。由此作家柏杨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往往和其文学成就纠缠在一起。从那之后,对柏杨其人的研究随之也成为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需要指出的是,港台地区、东南亚国家和海外汉学界在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切入角度,以及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渠道等方面,均和中国内地的有所不同。他们最先是由报纸媒体对柏杨其人和作品进行简短评论,大部分研究论文首先是发表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也有很少一部分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然后他们再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专著出版。或者是专门召开国际性的柏杨作品专题研讨会,然后把参会学者们的论文汇编出版。迄今为止,以柏杨和作品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已经分别在香港、台湾等地召开过三次,相应的论文集也已经出版过三部。而从研究的时间跨度来说,港台海外研究界对柏杨的研究时间长达五十多年,可说是对柏杨各个阶段的各类型作品和人生遭遇都有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具体而言,港台以及海外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郭衣洞(柏杨是笔名)的小说特点,及时对之进行评价和定位;也是在同一阶段,港台学者们分别从文学和文化的层面,对柏杨杂文中的“酱缸”观点进行评价。在70年代,柏杨因其政治冤狱以及美裔华人科学家孙观汉在美国的营救活动,引起港台和海外社会与研究界的广泛注意,在研究界也出现从社会政治层面分析柏杨个人遭遇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从而从对柏杨作品的研究扩展到把作家本人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现象、文化现象来研究的层面。出狱后的柏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连续出版三部历史著作《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遂引起研究界对其史学作品特点的研究。与此同时,《活该他和酪浆》、《丑陋的中国人》等杂文集的陆续出版,柏杨的《金三角·荒城》等报告文学,以及写于狱中的诗歌集《柏杨诗抄》等作品,均得以出版、发行,也引起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的关注,出现了较

多的新闻跟踪报道和研究、评论性文章。之后，他历经十年时间用白话翻译出的七十二册《柏杨版资治通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直至1993年才全部出版完毕。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柏杨其人其文再度成为文学界、史学界的研究热点。直至今日，虽然柏杨研究在港台和海外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热门，但是因为柏杨在港台、中国内地和国际文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被称为是文坛中永不凋谢的常青树，因此对柏杨的研究，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依然是港台和海外研究界学者们经常涉及的一个领域。

下面将分别从专论（专题论文、专著）和论文集两个层面来对港台地区研究界和国外研究界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梳理。之所以把专题论文和专著放在一个层面来探讨，原因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港台地区和国外的学者、评论家们经常把多篇专题论文汇编成一本专著出版，而且这种类型的研究文章非常多。这也构成柏杨研究的一个特点。

从专题论文和汇编成集的专著来说，早在1966年，黄守诚在《自由青年杂志》35卷8期上发表《谈郭衣洞和他的作品》，这是最早评价柏杨小说的评论文章。文章对柏杨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进行分析和概括，这在柏杨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作用。此后，柏杨的小说陆续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重视。1985年7月台北《新月期刊》22期发表了聂华苓的《寒夜、炉火、风铃——柏杨和他的作品》，而台湾汉光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李瑞腾的专著《情爱挣扎》更是柏杨小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涉及1957年到1965年期间柏杨所有的小说作品，不仅有对单篇小说文本的精彩分析，更有从情节结构、悲剧美学特点和语言特色等层面对大部分小说的审美特色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价，最后明确得出柏杨小说作品的文学意义和价值并不输于其杂文创作作品这一重要结论。

孙观汉在1971年10月11日的香港杂志《人物与思想》上发表了《入狱时的大概》，后来在1988年改为《柏杨入狱前后》再次发表，是最早讲述柏杨冤狱的一篇文章，对柏杨冤狱阶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和详尽的史料。此外，还有依萱《救救柏杨》一文在美国纽约1972年8月20日的《桥刊》发表，1972年12月香港的《南北极杂志》刊载了孙观汉的《笔和剑》等文章，后来在1988年8月由柏杨结集汇编成《我这场冤狱》，由台湾高雄敦理出版社出版。1979年3月由台北的星光出版社出版了梁上元女士编的《柏杨和我》。这两本书籍主要是对作家柏杨人生经历，尤其是十年冤狱的始末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学材料，所有这些都为柏杨研究奠定了生平方面的史料学基础。

1969年渡边英雄出版的《柏杨学》开启了对柏杨的杂文进行系统性研

究的角度，也预示着柏杨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杂文研究高潮即将出现。此后，1973 年 5 月香港《南北极杂志》刊载了孙观汉的《柏杨和酱缸》、1973 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中姚立民发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酱缸》，都对柏杨杂文中的"酱缸文化"思想这一重要内容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为此后柏杨研究领域中的"酱缸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调。1981 年 2 月 18 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陈永犀的《传统的挑战者——谈鲁迅柏杨》，这是海外学者首次指出柏杨和鲁迅精神相通之处的评论文章。还有 1981 年7 月22 日美国洛杉矶《南华时报》发表了君重的《论柏杨的杂文与小说》，1987 年淡林在香港《晶报》上发表的《我看柏杨著作》，艾克思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发表的《极左派为何批判柏杨?》，项庄在香港《明报》发表的《转弯与硬碰》，1988 年 2 月 13 日美国《中报》发表汪子扬的《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从柏杨的心路历程谈起》。从 1966 年到 1996 年为止，港台和海外的研究者共计发表了一百余篇对柏杨杂文的评论和研究性文章，成为柏杨研究中杂文研究的重镇，也使柏杨杂文研究成为柏杨研究领域中力度最大、取得成就也最大的门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 年德国学者周裕耕(Jurgen Rier)撰写了第一篇关于柏杨专论的硕士毕业论文:《酱缸——柏杨文化批判》。该论文分为四章，从"酱缸"中国的角度来评价柏杨杂文的文化思想，是关于柏杨杂文研究的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在 1988 年修改之后由德文翻译成汉语，于 1989 年由台北的林白出版社出版。

此外，研究者对于柏杨的史学著作、诗歌创作也进行了专门研究，从司马文武在 1978 年 12 月 31 日的《自立晚报》上发表第一篇评论柏杨史传作品的文章《一部用中国人立场写成的史话——〈中国人史纲〉》开始，到 1997 年5 月在台北的《复兴岗周刊》发表萧俊仁的《〈资治通鉴〉读后感》，共计出现五六十篇专门讨论柏杨史传作品的文章和论文。大部分文章褒扬柏杨的众多史传作品和其独特的历史观念。而明报出版社在 1988 年 12 月出版了历史学家孙国栋的专著《评柏杨》，却对柏杨的作品，尤其是史传作品有不同的评价。该著作收录了孙国栋本人对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柏杨版资治通鉴》进行质疑和批评的几篇文章。作者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思想为切入视角，对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观点和虚无主义立场，以及《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体现出的历史观、柏杨白话译文中不符合司马光原著思想的地方，均进行尖锐批评。附录部分还附有柏杨对孙国栋指责的回应文章，以及一个中国内地学者对柏杨历史观的辩护。孙国栋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他对柏杨历史观的尖锐批判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在史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一部分历史学对柏杨史

传作品和其具有反叛传统史学色彩的现代史观的不理解。孙柏之争(或称柏杨风波)成为当时海内外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质是历史唯古派和唯今派之争。《评柏杨》一书的观点从反面证明了柏杨对中国历史典籍的翻译和改写是成功的。

2003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黄守诚的专著《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这部著作中,黄守诚充分肯定柏杨在十年牢狱中所作旧体诗的艺术成就,并且与古代诗人杜甫等人的古典诗歌相比较,揭示出柏杨诗歌中的忧患意识、反抗暴政强权的不屈精神,是柏杨诗歌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至于柏杨研究的国际会议论文集方面,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三部。2000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柏杨的思想与文学》,由黎活仁等主编。该论文集分为六部分,按照柏杨作品的文学类型进行分类讨论。在"专题讨论"一章中,收录有唐德刚的《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对名作家柏杨生平的个案透视》。他把柏杨和其作品,放在中国今天的历史与未来的历史的大框架中考察,从多个侧面去理解柏杨其人其文。在"柏杨的思想与杂文"章中,有四位学者的论文:向阳的《猛撞酱缸的虫儿:试论柏杨杂文的文化批判意涵》,用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理论为指导,指出柏杨杂文的文化批判内涵——"酱缸"批判;德国学者周裕耕的《柏杨:非贵族的知识分子》,以柏杨的思想,以及6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台湾和中国内地的政治环境为对象,论证出柏杨所持立场是非贵族的知识分子立场;梁敏儿的《共同体的想象:柏杨笔下的国民性》,将柏杨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批判,纳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脉络中来考察;Aleksander Petrov 的'Bo Yang's The Ugly Chinaman: Generic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文,则引用巴赫金的狂欢化和对话理论,来分析柏杨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得出该杂文集是一部接近后现代主义特色的讽刺作品的结论。在"柏杨的史论"栏中的两篇讨论文章中,龚鹏程的《现代化思潮下的史论:〈柏杨曰〉的精神处境》,以《柏杨曰》为研究对象,以此找出柏杨史学观念的精神所在,提出柏杨翻译、改写《资治通鉴》采用的是今史观,并且对此加以评价。刘季伦的《柏杨的历史法庭》一文,讨论柏杨史论背后的目的,指出柏杨根据民主、法制等现代世界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历史上的人和事,关注个体生命的向度。在"柏杨的报导文学与旧体诗"专栏中,张堂琦的《从〈异域〉到〈金三角·荒城〉:柏杨两部异域题材作品的观察》,提出报导文学中的文学虚构问题,认为《异域》是以真实新闻为题材的"非虚构小说",而《金三角·荒城》则是报导文学。雷锐的《为时代的悲剧小人物撰

史立传：论柏杨的报导文学》，通过对柏杨的四部报导文学作品的详尽分析，发掘出它们的新闻性、艺术性和政论色彩，力图为柏杨的报导文学进行文学史的定位。黄守诚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柏杨旧诗的艺术成就》，从叙事、抒情、言志三个方面，探讨和肯定了《柏杨诗抄》中四十首旧体诗的艺术成就。“柏杨的小说”专栏中的十篇论文，包括应凤凰的《柏杨五十年代小说与战后台湾文学史》，不但详细列举出柏杨小说早期版本的流变过程，而且根据柏杨50年代小说作品，分析出创作类型的演变，指出其中具有的批判精神。张素贞的《游走在神魔与历史之间——论柏杨的〈古国怪遇记〉》，从小说类型和写作技巧的角度来分析评价《古国怪遇记》，指出该部小说看来是嬉笑嘲谑，实际上立意在托讽。黎活仁的《思想家的“阴影”（shadow）：鲁迅与柏杨小说中的幽灵》，以“阴影”理论为立论基础，分析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和柏杨，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阴影”意识。朱嘉雯的《当代中国的放逐者：柏杨及其他同类短篇小说中“失乡”主题探讨》，从三种批评角度逐步深入柏杨50年代短篇小说中的“怀乡”主题。余丽文的《柏杨小说的城市和空间》，以城市空间理论来解读柏杨的小说，认为小说中的城市背景，同样证明城市空间构图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朱耀伟的《反放逐的书写：试论柏杨小说的“放逐”母题》，认为柏杨的小说是对“放逐”母题的另一向度的理解。邓敬宇的《从小说的重复现象看柏杨的〈挣扎〉》，运用小说叙事学理论，论述柏杨小说集《挣扎》中的重复现象。梁竣瓘的《寻找柏杨小说中的女主角：文学、社会的交互考察》，把柏杨小说中的女性划分为四种类型，分析出她们的性格特点。郑雅文的《“中国”历史走向“台湾”社会——柏杨小说的死亡课题》，从纵向的中国文学史观与横向的台湾社会层面，梳理出柏杨小说的死亡描写及其意义。那斯拉夫学者 Dusan Pajin 的英语论文‘Life after death, Life before death fabrics of life in the stories of Bo Yang’，指出柏杨小说《龙眼粥》中的重复模式所具有的意义。在“附录资料”部分，则收录有龚鹏程、李瑞腾等八位学者对柏杨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认识。

而2003年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样收集中国内地、台湾和海外学者研究柏杨作品的多篇论文。“辑一”包括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小说柏杨》，把柏杨的小说与鲁迅的小说相比较，认为前者不但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具有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深刻思想。高肖梅的《从短篇小说谈柏杨的内在世界与文字中影音特色》，认为在柏杨晚期小说中，用象征手法，将文字赋予影像、声音的效果。郑明珠的《寻找乌托邦——论柏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柏杨的传记切入，讨论柏杨传记

和小说中的恶女形象。在黄文成的《何年何月桃花开——论柏杨诗精神场域的救赎与书写》,详述柏杨狱中诗歌的特点,指出这些诗歌还具有自我治疗精神伤痛的作用。王建国的《不安于室:论柏杨囚室之写作场域及狱中诗词作品之时空观》,以柏杨诗作为个案,对监狱文学进行探讨。应凤凰的《"文学柏杨"与50、60年代台湾主导文化》,以柏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为考察对象,试图探究柏杨入狱之前和主导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梁竣瓘的《文学史上的柏杨》,将两岸当代文学史中对柏杨的评价进行梳理,探求评价产生的背景和文学史意义。"辑二"包括李金铨的《柏杨,柏杨的笔,台湾的新闻自由与人权运动》,把柏杨创作的几个重要阶段,放到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脉络中来谈论。陈晓明的《世俗批判的现代意义——试论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从现代性的世俗批判角度来深入探讨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普舍齐(Radosav Pusic)的《柏杨对人性的看法》,力图在人性的基本问题上,来探讨柏杨的人性观。王勇的《超越时空与国界的心灵觉醒——柏杨与菲律宾民族英雄扶西·黎萨思想批判性比较之我见》,从文化柏杨和文化黎萨的角度切入,论证出他们具有一颗超越时空国界的觉醒心灵。李栩钰的《柏杨史观下的女性命运——以〈皇后之死〉为考察中心》,力图在"大历史/小女人"之间,论述柏杨史论中的女性命运。朱洪海的《柏杨思想对中国内地"八十年代人"的影响》,探讨柏杨批判国民性的思想对80年代中国内地青年一代的深刻影响。李瑞腾的《柏杨与南洋》,通过讨论柏杨的南洋经验,力图阐释他的南洋观点。

2007年11月在台湾"国立"台南大学再次召开"柏杨国际研讨会",后以《柏杨与监狱文学》为标题出版柏杨研究的会议论文集。论文集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专题演讲",收录有姚嘉文院长的《监房天地宽》、黎活仁教授的《柏杨短篇小说的结构》和德国教授周裕耕的《柏杨——从"糟老头"到学术研究物件》三篇演讲。在"专题论文"部分,收录有张清芳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世俗现代性的视角:柏杨史论〈皇后之死〉中的两类后妃形象》,从世俗现代性的角度切入柏杨的史传作品,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妃嫔的悲剧命运;许菁娟的《统战工作下的文学现象——对柏杨事件的考察》,对柏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和释放事件所蕴涵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详细剖析;黎活仁的《柏杨小说的空间形式》,主要研究柏杨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以及柏杨小说对此采取的诸种策略;应凤凰的《从〈蝗虫东南飞〉到〈异域〉血泪——郭衣洞与台湾反共文学》一文,从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坛对郭衣洞和其小说避而不谈的角度,来分析柏杨在此阶段的文学活动。李宗定的论文《历史、思想与诠释:柏杨论"儒家"——从"孔子诛少

正卯”谈起》,旨在讨论柏杨对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理解,并且论及其对历史的诠释。金尚浩的《存在的思想,苦痛的寄托:论柏杨的牢狱诗》,以柏杨的牢狱诗歌来观察当时的时代。朱伟祺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创伤——以施明正小说为例》,以柏杨在十年牢狱生活中同处一牢房的施明正的小说为例,来分析当时白色恐怖时代对柏杨、施明正等以政治犯身份入狱的作家们的心灵戕害。陈燕玲的《关不住的爱——柏杨对〈柏杨在火烧岛——写给女儿的信〉探究》,以柏杨在狱中与女儿佳佳的往返信件为中心,探讨狱中书信特殊的时空特质,并通过弗洛姆“爱的理论”来剖析柏杨对女儿的父爱性质。张清荣的《柏杨〈小棉花历险记〉初探》,全文共分六部分来探讨柏杨童话作品《小棉花历险记》的童话素质、写作场域和主题寓意。施保夙的《存在意义的追索》,以捷克作家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为切入点,把柏杨的狱中诗歌与哈维尔写给妻子的书信相比较,来分析监狱文学在哲学层面上的存在意义。朱荣贵的《柏杨的人权观:一位虚无主义者的悲歌》主要是从柏杨的杂文来论述他的人权观念,并且把柏杨当成一位虚无主义者来加以分析。

从以上分析的柏杨研究情况来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是柏杨研究的黄金时期,大部分很有分量和研究深度的专著与专题论文,均出现在这个时期。但是可以看出,对柏杨不同类型作品的研究用力却不均匀,其中对柏杨杂文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和“丑陋的中国人”的阐释上,对柏杨杂文中的现代女性观和婚恋观则很少涉及;对柏杨小说的研究论文同样数量较多也较充分,尤其是对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比较详细和到位。而关于柏杨的史传类、诗歌、报导文学等其他类型作品的众多评论、研究性文章和著作,以及对柏杨冤狱和柏杨本人代表的文化学、社会学研究的专题论文,均可看出柏杨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旺发达。

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对柏杨作品评价的专著和文章有所减少。究其原因,可能与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变迁有关。在狱中的柏杨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他被当做台湾国民党“文字冤狱”的受害人,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出狱后的柏杨在港台再度成为研究热点,在于他既是美国人权外交胜利的一个成果,也是台湾社会解冻的一个象征,他本身就具有文化和社会学的双重意义;80 年代中期《丑陋的中国人》演讲及其同名杂文集的出版,迎合了国内外“反思传统”的大潮流,“丑陋的中国人”和“酱缸批判”再度引起学界的研究热。而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直至 90 年代初、中期,他陆续出版《中国人史纲》、《皇后之死》等史传作品,以及翻译出版

《柏杨版资治通鉴》,也是柏杨再次在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引起轰动;90年代后期只有访谈录《新城对》等出版,柏杨很少再有新的作品出现,对他作品的评价也相应减少。但是当柏杨在2008年4月29日凌晨去世以后,柏杨研究再度出现一股热潮,很多国内外学者纷纷撰写悼文,把柏杨定位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文化大师和人文大师。可以这样说,港台、国外的柏杨研究是柏杨研究领域的重镇。

中国内地柏杨研究的现状与港台和海外的研究有所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普遍而言,中国内地学者的基本学术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而港台学者则没有此特点,这是由于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不同的教育方式导致的结果。同时,柏杨的作品引起中国内地学者的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当时柏杨以杂文《丑陋的中国人》迅速占领了中国内地大江南北读者的视域,刮起"柏杨热",而此时距柏杨50年代初期创作小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中国内地学者也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注意和研究柏杨作品的艺术成就,并且形成了以其杂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特点和格局,这是中国内地柏杨研究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

最早研究柏杨的论文有两篇,均发表于1985年,包括发表在《华文文学》上的李成的《十年铁窗三部书——台湾作家柏杨印象记》,以及《深圳大学学报》上的曦钟的《柏杨和他的文学作品》。前者简要介绍了柏杨在狱中撰写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路》三部历史作品,后者则是对作者和其小说、杂文等文学作品特点的分析。从1987年第3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了梁超然的《鲁迅、柏杨异同论——评〈丑陋的中国人〉》伊始,中国内地学者就形成了一股柏杨杂文研究之风气,一直延续到当下学术界。其特点是把柏杨杂文与鲁迅杂文联系起来,把柏杨的思想看做是五四思想和鲁迅批判的延续和发展。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是1996年第1期《评论与研究》中刘会文的《柏杨杂文的幽默性》。刘文指出,"幽默是'柏杨笔调'中最有才气的成分之一",然后从"理趣的幽默"、"事趣的幽默"和"语趣的幽默"三部分来分析。

除此之外,在1988年第5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上,集中刊登五篇探讨柏杨杂文特点的论文,包括易荣华的《从对国民性的揭示谈鲁迅、柏杨的异同》,潘毅华的《谈〈丑陋的中国人〉》,杨永庆的《对"柏杨毁灭民族自尊心"的异议》,李琼兰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与"鲁迅的国民性弱点"》和伏东辉的《也谈鲁迅和柏杨》。主要视点是以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作为代表作品来揭示出柏杨的国民性批判的思想特点。2003年第6期《湖州师

范学院学报》上，张正阳的《理在杂间现味从笑中来——试论柏杨 20 世纪 60 年的杂文创作》一文，提出“柏氏文风”一说来概括柏杨杂文的幽默特点。2002 年 2 月的《漳州职业大学学报》刊登了章妮的《台湾当代杂文中的鲁迅精神》。2005 年第 12 期的《职教与经济研究》中，刊登了王宗凡、徐续红的《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这些研究论文显然已经挖掘出柏杨杂文的幽默语言特色，为柏杨杂文研究贡献出很大力量。除此以外，还有张清芳于 2007 年发表的《世俗现代性关照下的“酱缸文化”批判——浅论柏杨 60 年代杂文的思想内涵》一文，以柏杨创作于 60 年代的杂文集为目标，详细分析“酱缸文化”的具体产物——四类畸形人形象，并由此得出柏杨杂文的思想内涵。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内地研究者却也在此时无意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在内容上抓住柏杨杂文最显著的“酱缸文化”批判，来阐述柏杨杂文国民性思想批判的特点。在艺术特点上，则抓住其语言上的幽默特点来从不同层面进行论述。虽然这种研究模式能够较详尽地对柏杨杂文中“酱缸文化”批判思想进行文学史的定位和评价，但是柏杨杂文表现出的其他内容，像对女性衣着打扮现象、现代婚姻恋爱观念、对人性的剖析等等，却没有涉及。能够突破这种固定思维方法的论文，首推陈晓明的《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试论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一文。陈文从“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这一高度，来阐述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该文透彻剖析出柏杨杂文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系统形成的根源，令人信服地指出柏杨是为广大市民代言的“野生知识分子”，而非精英知识分子等独特特点，这是对柏杨杂文中“酱缸文化”研究的一个拓展，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柏杨杂文研究的理论水平。

中国内地研究界对柏杨的小说和史传的研究评论则少得多。其中林青在 1989 年第 3 期《台湾研究集刊》上发表《柏杨和他的小说世界》和 1990 年 4 月出版的《台湾文学的走向》中陈锦山的《长歌当哭——郭衣洞（柏杨）小说管窥》最为精彩。这两篇文章，主要是以柏杨在 1957 年到 1965 年期间所发表的以爱情、社会黑暗为内容的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为研究对象。而对柏杨的历史著作的研究性论文则出现的更少。对柏杨生平进行研究的书籍，主要有三部。其中一部是李世家的《走进柏杨》。作者根据柏杨自己的回忆录和社会各界的评价汇编而成此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发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学者雷锐著的《柏杨评传》，在 1996 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该书是最早的一部柏杨评传著作，全书共分十四章，按照柏杨生平经历，结合作品发表的时间，对柏杨的杂文、小说、报导文

学、诗歌、历史传记、自传这六种文学类型包括的全部作品，进行比较详尽的文学史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评传》也是全面评价柏杨文学作品的第一部专著。还有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古继堂的《柏杨传》，主要也是参考了柏杨的回忆录等资料而写成，“从柏杨被诬入狱时开篇。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引入那血与火，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激烈交战的场面中，让读者欲罢不能，一步步走向柏杨人生的核心地带”①，并且“将评和传，通俗和严肃，思想和趣味，叙述和描述，总想和横向融为一炉”，塑造出一个铁骨铮铮、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作家柏杨来，同时也较全面地评价柏杨大部分作品在文学史和史学史上的成就。可以这样说，《柏杨评传》和《柏杨传》是中国内地近十几年来出现的研究柏杨文学成就比较全面和权威的专著。至于柏杨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包括《异域》、《家园》、《金三角 · 荒城》等作品，大概是因为作品中的一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根本就没有任何评论文章出现，中国内地评论界对它们保持沉默态度，不置一词。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内地柏杨研究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于港台、海外的柏杨研究，而且从质量上来看，港台、国外的学者和评论家对柏杨各类作品和柏杨本人作为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的研究、评价，也比中国内地更全面、充分和深入。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内地和台湾互相隔绝三十多年的特殊社会情况，而柏杨的作品是在80年代中期之后才被陆续引介入中国内地，因而中国内地研究者们无法寻找、收集到柏杨的所有作品，柏杨资料相对来说也比较匮乏。而上文所列举的《柏杨评传》和《柏杨传》两部专著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是两位作者趁去台湾访问之机而收集的，还包括柏杨夫妇赠送的相关资料。需要指出的是，柏杨杂文集和各种编选集在中国内地大量出版，因而中国内地柏杨研究中对柏杨杂文进行分析、阐述的论文数量最多，也相对较为充分。但是柏杨的报导文学作品并没有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因而大部分中国内地研究者根本无法看到柏杨该类作品的面貌，自然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其次，由于学者们的切入视角和研究重点不同，具体来说，大部分中国内地学者主要选择国民性批判的角度，专注于柏杨杂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忽略了其他内容主题。可能原因在于，尽管海峡两岸同是中国人，但是太久的隔绝造成了港台学者和中国内地学者迥异的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体系，而港台研究者的知识学养和国外学者却更相似一些。因而港台、国外学者的语言风格、选择作品的角度，以及学术思维与方法自然与中国内地学者的不同，由此会

① 古继堂：《柏杨传》，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438页。

形成两种评价体系。

综观中国内地、港台和国外的柏杨研究，可以看到，虽然已经出现过《柏杨评传》、《柏杨传》等从传记角度、对作家生平和其作品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部能够从系统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角度的综合角度，来评价柏杨全部作品文本的学术专著，这是国内外柏杨研究界的一个空白。而本书则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缺憾，在中国内地、港台和国外的柏杨研究论文和专著的基础上，拟以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观念为贯穿主线，以柏杨全部作品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文学、文化层面来综合地考察、探讨柏杨各个时期的各类作品文本，包括小说、前后期杂文、报导文学、传记文学、狱中诗歌和历史著作等，在现代台湾文学和文化史上，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成就和贡献。

第二章 “野生知识分子”的另类思想体系[①]

作为一名“野生知识分子”(柏杨自称是“野生知识分子”,公开宣称自己不同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柏杨首先属于“野生”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自己与《自由中国》的政论家们身份完全不同,因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谋生”和赚钱养家,而不是启蒙民众和救国救民。其实这是柏杨借此表明自己具有中国文化现代化另类思想体系——把现代性加以世俗化后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也可简称为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体系。正是在此思想体系指导下,柏杨成为中国广大市民的代言人,把建构现代市民的自我主体性当做

---

① 2006年3月初至该年4月底,笔者曾应邀赴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研究学习两个月。在该系李瑞腾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关于柏杨杂文中的女性意识与婚恋观念的学术研究。通过将近两个月的研究学习,笔者比较圆满地完成了研究学习和收集相关资料的目的。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为笔者此后撰写该部学术著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笔者此行的目的除了收集相关的学术资料和研究之外,还希望能够对作家柏杨进行访问,以便获得第一手的资料。2006年4月16日下午,在李瑞腾教授和“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另一位教授康来新的安排下,由散文家黄文成陪同,笔者专门登门拜访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夫妇,请教关于柏杨杂文中关涉到的现代女性问题和男女婚恋问题。当谈论到女性平权的议题时,当时刚过完87岁生日的柏杨,说他之所以在杂文中首先讨论女性,原因在于台湾男女地位不平等。当他从中国内地刚抵达台湾的时候,就发现台湾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没有得到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尤其是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就好像日本人的家庭,当男主人回家时,妇女、孩子都要出来迎接,有时还要跪着迎接。柏杨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开始对此进行思考。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柏杨就从这个他觉得敏感的议题着手进行杂文创作。另一方面,当时也存在着写稿赚钱的现实考虑。柏杨的妻子张香华开玩笑地补充说,这除了反映出作家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批判之外,还因为柏杨是男人,自然对女性很感兴趣。柏杨夫妇的回答内容,给笔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笔者由此事看到了作家柏杨的两个侧面,一个是横眉冷对的社会批判家,对诸如男女不平等、丑陋的中国人等文化现象进行猛烈批判,另一个侧面则是非常人性化的普通人,他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写作。这两个侧面结合起来,才是活生生的作家柏杨。这使笔者认识到,对柏杨杂文的女性观和婚恋观的思想性研究,需要和这两个层面的柏杨形象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说,这次拜访不但使笔者完成了对柏杨杂文中的女性婚恋观念进行学术研究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从感情层面上触动笔者,使笔者在通读柏杨所有作品和相关研究资料之时,能够从形而上的社会批判反思角度和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内容层面相结合的角度去评价和分析柏杨其人其文的独特特点。(转下页)

其思想的核心。然而，他还是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中富有正义感的一面。因而他创作出的诸多作品，显然又带有《自由中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思想的烙印。更具体地说，他是以作家的身份，把《自由中国》所宣扬的诸多抽象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加以文学化、具体化和历史化，不但用其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而且也用来解决人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也就是说，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另类思想体系中“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容，不仅包括世俗生活层面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亦包含着具有理性批判色彩的精英层面的内涵。而这种站在普通城市民众立场上的批判意识，使柏杨在行使世俗化批判的时候，相应就具有了一种理性反思和自我审视的精神。他既能够省视当时台湾社会的病态层面，用笔及时予以揭露和痛击，也时刻省视自身的批判态度——是否代表了广大普通市民的利益，以及是否站在他们的视角来发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作品体现出的这种现代性，亦可以称作现代性的世俗化。这使柏杨既不同于鲁迅等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又不同于毫无批判意识地全盘接受普通市民阶层趣味的一些文人，这是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另类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立场。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柏杨独特的现代性观念解决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中长期的“雅”、“俗”之分，改变了现代性理性启蒙的雅层面对其世俗层面压抑的问题，而把形而上的“雅”——深刻的思想和理性批判意识，和形而下的“俗”——关注现代市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做到了现代性在雅俗两个层面的融合，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历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与内在规律的一个体现。

实际上，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历程和其建构问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有时甚至是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逆转。五四时期，基于传统的政

（接上页）如果说拜访柏杨夫妇，只是使笔者从感性层面上模糊认识到柏杨其人和其作品文本的独特之处，那么陈晓明专门讨论柏杨杂文的一篇文章《世俗批判的现代意义——试论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则从学术理性层面上给笔者以启发。陈晓明认为，柏杨杂文始终是世俗的文化批判，与其他知识分子行使的精英化的政治批判显著不同。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他看到柏杨力图从人性、人情、文化的层面上来改善社会，其杂文属于文明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范畴，而非政治性色彩浓厚的鲁迅式杂文。可以说，陈晓明较详尽地论述出柏杨杂文的一个独特特点——世俗化的批判思想。如果以陈文观点为坐标，仔细考察和分析柏杨所有的文学作品，就可以发现这种独特的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观念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这也是柏杨把中国文化加以现代化的最独特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说陈文精确地阐释出柏杨杂文不同于政论型杂文的一个特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陈晓明并没有梳理出柏杨现代性世俗层面批判的另一个层次，即刊物《自由中国》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对柏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

治管理机制由于战争等原因形成了特殊的失范真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依据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借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思想开始对这个古老国度进行大规模的现代性建构。但是这种现代性建构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危机,1922 至 1924 年间的新文化落潮期就已经昭示了这一点。究其原因,所谓的西方现代性经验其实主要依托的根基是现代市民阶层及其意识形态,而就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大规模的都市还没有出现,所依托的只能是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化的市民或者直接就是农民,而知识者和市民(实际上更多带有农民精神特质)二者并非处在同一个思想层次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隔绝或曰断裂的。换言之,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和市民的关系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与农民(即群氓)关系的变体,暗含着一种等级关系,即前者高后者低,不仅是指社会地位,更是指思想境界和文明程度。这自然会造就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曲折性与复杂性。这些要素反映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之中,作家们的现代性思想建构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或者是绝望感,如鲁迅等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精英与民众之间断裂关系的思考;或者是怀疑感,如老舍等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性能否在所谓中国市民阶层中建立的犹疑。从上述背景出发,此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和发展其实也就有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从精神层面来建构起现代性的主体——现代市民——的主体性。具体措施是通过清除中国愚昧民众负载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最终通过发展和建立起他们的主体性来完成此一历程。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建构道路,体现出现代性普遍的一面,其核心是市民阶层体系和现代市民人格的建构。二是建构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一般地说往往通过分离现代性系统来完成,先政治后经济再到阶层主体性的建构路径,这一道路体现的是现代性建构的特殊性,其核心是社会形态的更改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20 世纪 40 年代解放区文学所建构的就是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联系到柏杨的具体创作,其现代性的建构在第一种可能性上获得了确认。一方面他要继承五四以来鲁迅等人的精神层面的清除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在现代市民的主体建构方面有所突破。从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层面上来说,所有这些既是柏杨其人其文存在的文学依据和历史依据,同时也表现出不同于鲁迅等精英知识分子的“野生”知识分子柏杨的独特之处来。所以,如果我们在这种大的历史语境中再来探讨柏杨对现代性的建构,其思路和内容就比较清楚。

可以说,作为五四思想的一个继承人,柏杨把清除工作的重心放到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糟粕的猛烈批判和针砭上,并深刻地总结出这种文化的根

本性特征——“酱缸文化”。在柏杨看来，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酱缸文化”特点使中国人丧失了自尊、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以至心理扭曲变态，产生了四类“畸形人”——集特权和凶残于一身的封建帝王，依附于政权生存并为其“帮凶”的知识分子（亦被柏杨称为是“圣崽”和“酱缸蛆”），狂热追求做官和权势的“官崽”，以及以做官和当圣人为最高目的的普通民众。其中帝王是其他三类畸形人的“主子”，对后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后三者自然就是奴才了，他们也甘愿充当帝王的奴才。并且奴才也分为三六九等，处于最底层的是普通民众，任其他阶层的主子们宰割。至于“官崽”和被称为“圣崽”和“酱缸蛆”的儒家知识分子，两者其实都是直接受到帝王主子奴役和压迫的奴才。不过因为他们属于能够获得荣华富贵和金钱、权势、地位的“高层”奴才，因此他们也是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向往的目标。同时从社会制度层面的角度来看，中国封建帝王实际上是通过政府官员对民众进行直接统治和压迫，通过灌输儒家礼教和其道德伦理观念对人们进行精神上的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官崽和圣崽们又变成了普通百姓的“主子”。所以这两类“奴才”的身份和地位具有了双重性：对帝王而言是卑颜屈膝的“奴才”，任帝王宰割，对普通百姓而言却是有权有势的“主子”。这亦使他们处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中间位置，中国封建制度的主奴之分不但得以形成，而且层级分明，等级森严。可以说，这四类畸形人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又为后者延续几千年起到重要的维护作用。只有消除了这四类“畸形人”，才存在打破“酱缸”文化的可能性，才能够达到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同时也是建构现代市民主体性的一个必要举措。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柏杨为了建构自己独特的现代性思想，他对“酱缸”文化和四类“畸形人”的批判，虽然和鲁迅对处于传统“染缸”文化中的、有国民劣根性的中国民众的批判有相似之处，但是又和鲁迅等精英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思想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柏杨努力要建构起的现代市民社会体系和其主体——现代市民，是过强调现代性的“世俗性”面向，即倾向广大普通市民阶层的文化趣味，以及代表他们的价值利益和伦理立场——来达到的。现代性本应该包含比重一致的两翼——精英性与世俗性，但因为中国社会情况与西方社会的不同，这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导致现代性的发展偏向精英性一翼而忽略、压抑世俗性的一翼。具体来说，被现代性从中国封建传统伦理观念下解放出来的“大写的人”——这是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追求的奋斗目标，纵然是理性和启蒙的化身，但是逐渐发展成为那些满怀救国救民政治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权。

而现代文学史中的“雅”、“俗”文学之分化的理论根源也缘于此。可以这样说,倾向“雅”文学的现代性,已经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专利,而现代性的世俗层面,或曰是现代性的世俗化的含义,却被现代性的启蒙理性的精英一翼所压抑和遮蔽。由此可知,构成现代性的两翼——精英化和世俗化——就变成不平衡状态,甚至是精英层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远远超过世俗层面。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性实际上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广大市民阶层是现代性的主体和推动力。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虽然晚清小说和张爱玲、梅娘等人作品对现代性世俗层面的追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是主流,是“被压抑的现代性”,但是始终或隐或显地顽强存在着。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较为曲折的一个表现。而柏杨的现代性建构,不但强调从理性层面上对“酱缸”文化进行批判和对四类“畸形人”进行启蒙,以达到建构现代市民的现代人格之目的,而且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他同时也把现代性的世俗化层面作为建构现代市民体系的一个必要元素,成为广大现代市民的代言人。因此,柏杨一方面关注市民最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层面,一方面又不断审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黑暗痼疾以反观今日社会,采取的是文化和文学的批评立场。具体到作品文本来说,柏杨虽然在作品中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国民性批判等严肃宏大的主题,却是立足于男女婚姻、恋爱和家庭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等俗世生活百态,以及现代人的外貌打扮与举止等普通的日常生活内容。并且在作品中把这些内容互相贯穿和结合起来,既能够在最形而上的严肃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来探讨最日常的男女婚恋和家庭问题,又能够在最普通的社会风俗习惯中,发现“酱缸”文化对人的灵性和人性尊严的侵蚀损害,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批判和针砭。同时,他还敏锐地观察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随时把当前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西方的历史文化对比、穿插在一起,能够以古鉴今、中西互鉴,也以今看古、以“西”看“中”。由此可以说,柏杨的所有作品其实是兼顾、平衡了现代性的精英性和世俗性两方面的特征。因而其作品既高雅而又通俗,既可以当做高深的学术书籍来阅读,从中可以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又能够把其当做通俗而又具有生活指南作用的畅销读物,尤其其中对男女人性和婚恋的看法,即使在今天也颇具现实有启发意义。

不过,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也曾经出现过微妙波动,表现出试图改变其世俗化立场而重返现代性精英性一翼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柏杨早期杂文时期最后出版的一本杂文集《死不认错集》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杂文自身的艺术特质有关。众所周知,杂文是在鲁迅手中成熟和得以发扬

光大的，其精炼的形式和批判性、攻击性的主题——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成为杂文最独特的特点。而政论文在形式短小精悍、承担着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职能上，与杂文其实有某些相似之处。更具体一点来说，政论文和杂文的区分并不是很严格，两者有相似到的一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政论文如果只是批判某些社会现象而不牵涉对社会政治和社会制度批判的话，可以看成是杂文。对杂文来说亦如此。《死不认错集》把此前杂文集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儒家学说和当时台湾社会现状的批判，拓展到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某些层面，同时少用曲笔而多是直截了当地抨击，一些杂文篇什明显带有政论色彩。另一方面则与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柏杨的潜意识有关。虽然柏杨声明自己只是撰写杂文以养家糊口而已，并不关心国计民生大事，但是感时忧国和启蒙、救亡意识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潜意识的人格结构，更何况是接过《自由中国》“棒子”的柏杨。不过这种转向尝试却因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而被迫中断。而柏杨在近十年后刑满出狱，他的思想意识又回到现代性的世俗化层面，坚持自己的杂文不是批判社会政治制度的政论文，而是挖掘中国人的国民性病根——“酱缸”文化诸要素的文化批判性杂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曾经发生微妙波动，但是他坚持把中国文化加以“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却始终保持不变。

在后期杂文中，柏杨依然坚持原有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立场，强调自己的杂文只关心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坚持现代性的世俗化层面。同时，柏杨以“丑陋的中国人”来代替四类“畸形人”形象，“酱缸文化”批判的范围更加广泛。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总结出中国人的几个“丑陋面”，包括中国人脏、乱、吵，不团结造成的“窝里斗”和“一盘散沙”的冷漠性格，不但不习惯认错，而且还极力掩饰所犯错误并撒谎，以及因为见识少和心胸狭窄而造成的膨胀心理等诸多国民劣根性特点。这亦表现出他尽量避开早期杂文集《死不认错集》持有的政论色彩，而是尽量从文化层面来考察“酱缸”文化的努力。与此同时，他此时在杂文中更关注的是市民社会系统在现实生活中的“立人”问题，而且把国民性纳入其中来考察，更具社会现实针对性，对社会习俗和当时台湾日常生活习惯的批判加重了分量，使现代性世俗化的一面更加突出，而把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清除“酱缸”文化的任务放到了众多的史传作品之中。

可以这样说，更加广泛的消除工作只是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建构的一个方面，在作品中侧重对现代市民主体性的建构则是其现代性建构的另一个核心。因为只有建构起现代市民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柏杨所希望

的充满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观念并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灵性的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文化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柏杨把主体性分成几个层面分别进行建构。由于中国女性几千年来遭受的“酱缸”文化中君权和男权的压迫最为严重，受到“酱缸文化”的戕害相应来说也最为深重，她们缺少独立、健全的人格意识和人性尊严等现代观念，因此柏杨在自己最早的杂文集《玉雕集》、《红袖集》和《堡垒集》等作品中，站在反对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基础上，首先力图建构起现代女性形象。不管是以“浪漫之爱”还是以“激情之爱”为基础的婚恋观，其标的均是建立现代女性的独立性、自主意识，以及在社会和家庭中取得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平等地位。可以说，柏杨此时主要关注的是现代女性主体性的形成和确立。柏杨在稍后出版的《立正集》、《剥皮集》、《闻过则怒集》、《死不认错集》等二十几本杂文集中，就把视野扩展到整个现代人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上，所以毫不留情地猛烈批判四类“畸形人”，以便培养出能够挣脱主、奴等级观念，具有独立自主、平等意识和追求自由人权的现代市民形象。

与杂文相比较而言，柏杨的诗歌是由他将近十年牢狱生活的血泪结晶而成，他在诗歌中建构的现代市民主体性意识又略有不同。如果说柏杨杂文要建构的市民主体性是其现代性建构的一个外化呈现，那么柏杨狱中诗歌体现出的自我主体性则是现代性深入到现代个人内在人格建构的体现。毕竟只有建构起个人健全的内在人格，才有可能建构起广大现代市民群体的主体性。作为深受黑暗的专制制度和政府“冤狱”迫害的受害人，他的悲愤、冤屈和绝不屈服的反抗暴政强权的精神，与为和他相同境况的在押政治犯争取个人自由空间、得到被尊重的基本权利，以及他对美好父女亲情和自由生活的不懈追求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现代人主体性的主干，尤其是塑造出现实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形象来。如果说在《柏杨诗抄》中，柏杨把建立自我主体性当成是对抗政府暴政和残酷的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那么他在《异域》、《金三角·荒城》、《穿山甲人》等报导文学中，则在充满苦难和悲剧因素的坎坷生活中，塑造出勇于去追求正义和个体尊严的小人物。因而自强自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理想而九死不悔的奉献意识等精神层面的特点，均是柏杨力图在“苦难意识”中，为建构被生活压轧的小人物的自我主体性做出的一种尝试。相比之下，作为柏杨最后一篇报导文学，《家园》把现代市民的外延扩展到广大中国人，在历史苦难和现实苦难中，建构起广大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思自我的能力。而写于五六十年代的讽刺谴责小说，是柏杨用杂文笔法写成的小说，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利用讽刺幽默艺术手法产生的狂欢效果，突出强调其产生的不屈

服于强权暴政，虽然迂回曲折，然而不减其尖锐的批判“酱缸”文化的决绝态度，亦是作者为呼应杂文、报导文学等作品，建构起来的现代人的主体性意识之见证。

无论是对传统沉疴与文化积弊的消除，还是市民阶层主体性的建构，其衍生与发展都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获得其具体形态与表现特征，而且批判、针砭“酱缸文化”和“丑陋的中国人”以便把中国文化现代化，由此建立起现代市民体系和其主体性意识，实际上是一个任重道远的、未竟的方案。于是柏杨把其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建构更全面地放置在中国历史中进行反思，使其现代性思想的建构实现了与历史的一次深刻对话。正是因为柏杨走进了中国历史的纵深处，他才能够再次思考“酱缸”文化产生的原因和形成过程。柏杨发现，“酱缸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其实也异常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梳理和整理。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形成了‘酱缸文化’？”这个基本问题，需要回到中国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去进一步探讨，回到漫长历史中的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封建宫廷制度以及历史人物活动的场景中，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并且使“酱缸”得到稀释，最后变清，由此使中国人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柏杨不但重新审视、观察中国历史，更进一步用自己独特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现代历史观”来重新改造和撰写充满“为尊者讳”等传统儒家历史观的中国历史。具体来说，他不但用白话翻译和撰写出《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和《中国人史纲》、《皇后之死》等史传作品，而且通过梳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流变，探讨儒家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力图寻找出包括中国封建宫廷嫔妃以及中国帝王君主在内的其他历史人物的“现代化”出路。唯有在中国“酱缸”文化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历史人物——以帝王君主、后宫妃嫔以及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现代化”问题才能够被凸显出来。也只有在这些历史人物和“酱缸”文化的错综复杂、多向交织的关系上，才有可能深入了解“酱缸”文化的构造和组成成分，以及它是如何发酵、演变成今日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酱缸”文化流毒的，这样才有彻底清除它的可能，才能够从“历史现代化”的角度达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柏杨通过研究中国历史表明，“窝里斗”、“不思进取”、“麻木不仁”等国民性痼疾，并不是所有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缺点和弱点，而是儒家思想在特殊历史阶段产生的一个特殊产物。随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现代中国的建立，以及现代市民阶层主体性的建构成功，是完全有可能消灭和消除国人的这些国民性缺陷的。这亦是柏杨在后期杂文和史传作品中以“建设”为主，不同于前期的以“破坏”为主的重要原因。正是在梳理、分

析中国历史人物的现代化的问题中，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打破或是澄清“酱缸文化”的举措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理由。

也正是在与历史的深刻对话中，柏杨为自己独特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既找寻到了现实合法性，也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历史性。而在与现代性的对话中，历史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本相，重新恢复了自己的生动性、灵性和生命力。可以说，柏杨在历史与现代性的对话中完成了两者的一次双向建构，也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柏杨其人其文展示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现代性世俗化层面的追求，这是随国民党迁到台湾去的外省籍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普遍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文本可看成是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坛五十多年发展变迁的一部风云录。进而言之，这也是现代性世俗化的发展历程在中国20世纪后半叶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与历史见证。

本章将以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为经，以柏杨的创作过程为纬，展开对其独特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内涵和外延的探讨。

第一节　杂音异符的现代性

众所周知，现代性在当下学术界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虽然最早它被应用在哲学领域，但是随后却展现出巨大的生命活力，并且迅速向其他学科扩展和渗透，现在已经成为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术语，相应拥有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诸多内涵和外延。正如法国学者伊夫・瓦岱所总结的：“‘现代性’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出格，这不但涉及历史、美学、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波及经济、政治和广告领域，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①概而言之，在当下中、西方研究领域之内，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现代性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即把现代性看成是一种社会构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内涵就相当于“现代社会”或者是“工业文明”，而且现代性与后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使用，

①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包括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世界观、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的含义。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吉登斯。吉登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标志着一种制度性的转变,现代性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从社会角度来说,现代性确立了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而从个人角度来说,则确立了实现自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

第二种现代性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方案(或曰事业)”,把现代性当做一种代替了传统模式的新模式和新标准。他认为现代性最核心的问题,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问题。哈贝马斯还把个人自由当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是其自我确证的原则。他也把启蒙和理性当成现代性的基础。①

如果说前两种定义是从物质的、客观现实的层面来界定现代性的话,那么第三种现代性则是指一种精神态度。其代表人物为福柯。福柯认为:“所谓态度,我指得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②这种观点通常被用来指称现代性包含的美学和文学艺术层面的内涵。举例来说,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就把现代性当成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向度。陈晓明在其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一书中,总结概括出文学现代性的概念:“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思考现代性的内在特性似乎更为重要。不管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柯),还是一种叙事(列奥塔),都表明了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③

不可否认,以上对现代性概念范畴的三种理解适用于不同的学科领域,而不同的学科领域也相应地赋予和拓展出现代性更多、更复杂多样的内涵。但是,无论是哪种现代性,都以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的宣言,作为它的一个基本标志和特征。也就是说,它确立的主体均是人,是用大写的“人”取

---

① 对这两种现代性概念范畴的归纳,笔者吸收和借鉴了陈嘉明《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一书中对现代性的分类。

② 福柯:《何为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 年,第 430 页。

③ 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7 页。

代了西方传统社会中的“上帝”。这主要归功于在现代性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产生了与宗教相分离的世俗世界，而且启蒙和理性把人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同时天赋人权和生而自由等价值观念，则把人变成了具有理性和深度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认识到的，现代性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陈晓明归纳总结说：“这个过程源自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入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于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启蒙主义哲学家相信通过科学与艺术，人类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公正性的认识和处理会趋于无限完善的境地。”①但是现代性具有野蛮压榨的另一面，很快就被暴露出来。阿多诺那句沉痛的宣言“奥斯威辛后写诗是野蛮的”，就反映出西方理论家和学者对现代性的极度失望情绪。现代性发展到此时，理性的大写的“人”，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统治世界的“上帝”和权威，所以可以理解福柯何以把启蒙称之为“敲诈”了。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并非是一个现代性之后的阶段，其实它只是现代性在晚期资本主义和资讯时代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现代性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人们欢呼“人死了”，以为“词与物”会解决现代性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代替了深度，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传统哲学的结束，新的理论的出现，正是以四种解释，或是四种‘深度模式’的消失为标志的”。这四种深度模式分别为黑格尔或者马克思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明显与隐含差异理论、存在主义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理论，以及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理论。② 但是实际结果却事与愿违，当被后现代极力标榜的欲望旗帜高高飘扬在现代性的风景线上，却随之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社会伦理道德的失范、文化价值的相对主义、感官享乐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也是现代性必须要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然后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再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观念价值。当然，或许那时的现代性又暴露出不同的缺陷，但是现代性的反思特征，会促使它再次对自己进行批判反思并且寻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与途径。现代性的曲折发展过程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螺旋式前进的规律，所以它在发展进程中虽然步履维艰，依然在顽强地不断前行。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232页。

② 杰姆逊主编：《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1—204页。

作为表现出人类精神史和心灵史的文学来说，现代性在文学中的表现又有自己的特点。具体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来说，张颐武曾经把“启蒙和救亡”这两个主题当成是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具体表征①，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得到恢复。这当然是一个文学史事实，不过被现代性从中国封建传统伦理观念下解放出来的“大写的人”——这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纵然是理性和启蒙的化身，却逐渐发展成为那些满怀救国救民政治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权。而现代文学史中的“雅”、“俗”文学之分化的理论根源也缘于此。早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的几年里，后来成为新文化主将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对黑幕谴责、狭邪小说等旧小说进行激烈抨击，在全面否定这些“非人的文学”（见周作人《人的文学》）和“封建糟粕”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文学的选择标准。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是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必须要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激进方式。这使新文化运动能够用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把封建社会连同其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一起埋进历史的坟墓之中。这当然是现代性取得的一个辉煌胜利。但是在事隔多年之后，我们在今天再次回眸这段历史和文化，却发现了现代性激进的断裂观念所导致的压抑层面。因为倾向“雅”文学的现代性，已经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专利，而现代性中的“世俗性”面向——倾向广大普通市民阶层的文化趣味，以及代表他们的价值利益和伦理立场——可以称作市民或者平民现代性，本应该是与现代性的精英层面并行不悖、分量均衡的另一个层面，是现代性的一个必要部分和构成层面，却被普遍忽略。换一句话来说，现代性的世俗层面，或曰是现代性的世俗化的含义，被现代性的启蒙理性的精英一翼所压抑和遮蔽。由此可知，现代性的两翼——精英化和世俗化——就变成不平衡状态，甚至是精英层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远远超过世俗层面。可以说，现代性成为精英化的专利，世俗性一面却被压抑和遮蔽。

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性其实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西方世界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不但基督教和国家政权得以分离，而且逐渐形成了现代都市，正是城市的现代性进程催生了市民阶层。随着现代性不断推动，城市持续膨胀和迅速发展，市民阶层也越来越壮大，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其实是为广大市民阶层的欣赏口味而准备和得以形成的，而市民阶层也不断塑造和推动着它们的发展。中国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与西方当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它亦有自己的独特特点。首先

---

① 谢冕、张颐武主编：《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是因为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进行农业耕种。重农轻商自从汉代以降,就成为历代封建社会统治阶层遵奉的社稷大计,因此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城市存在,不过却无法像希腊城邦的城市那样做到自治和拥有独立主权,其实充其量只是一个大量农产品和人口的聚集地而已。《左传·隐公元年》中提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此处的"都城"其实指的是围绕都邑而建的高大城墙。按照李洁非在《现代性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一文中的看法:"至于'市'字,则完全是一个贸易学的字眼,或指交易场所(《战国策·楚策》:'有人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知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及反,市罢,遂不得履。');或指购买行为(《战国策·燕策》:'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这两个字本来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市,不一定非在城里不可,相反,以便利和实用论,在上古,乡村的集市恐怕要比城里还发达些。而早先专指城墙之'城',衍生出后来的意思,似乎是由'城'与'郭'(郭,外城之意;《孟子·公孙丑上》:'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池'(池即护城河,《礼记·礼运》:'城郭沟池以为固')的词义复合才渐渐转到'城市'上的。由此,我们倒也看得很清楚,汉语里'城市'这个词具有行政和商业的双重含义,而且应该说是以前一种为主。其实,整个人类史上,城的起源都不是因为工商业的需要,首先是军事需要,次而由军事需要演变为政治需要,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这种军政性质。……中国自宋以来,中国古典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色彩渐渐浓厚,世俗化倾向趋强,但是,都不足以影响其官权本位;直到'通商口岸'出现前,中国没有一座城市脱离封建形态,哪怕仅仅显露出些许向现代城市转型的征候。"

"现代城市较古典城市的根本区别,即前者以自由经济为本位,而后者以集权政治为本位。而且,这里所说的自由经济,又不是简单地指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而是指具备完整的近代工业、贸易、金融和服务体系,而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中国从来不曾有过,倘非西方列强借助武力强行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中国固有社会结构来看应该说也尚无任何可能自发地产生的迹象。"①

从清朝末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这段时间,以上海为代表的较大型的现代都市里聚集了很多卖文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既然失去了参加科举的仕进之路,就转而开始迎合市民趣味和新兴的文化市场,创作出数量众多、良莠不齐的各式小说来,在市民喜欢阅读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王德威的

---

① 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0—31 页。

《被压抑的现代性》对晚清这些小说的社会背景和特点，已经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和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但是需要看到，王文敏锐地指出了这些被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全面否定的所谓低俗小说，其实隐含着对文学现代性的另一层面的理解：“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可以指陈三个不同方向：（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在迎向19世纪以来西方的政经扩张主义及‘现代话语’时，曾经显现极具争议性的反应，而且众说纷纭，难于定于一尊。然而‘五四’以来，我们却将其归纳进腐朽不足观的传统之内。相对于此，以西学是尚的现代观念，几乎垄断了文学视野——尽管这渡海而来的‘现代’观念不脱时间上的落差；（二）‘被压抑的现代性’指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在历史进程独一无二的指标下，作家勤于筛选文学经验中的杂质，视其为跟不上时代的糟粕。这一汰旧换新工作的理论基础，当然包括（却未必限于）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或马克思式的‘政治潜意识’影响。弗、马二氏的学说，在解放被压抑的个人或社群主体上，自有贡献。但反讽的是，这些憧憬解放的学说被神圣化后，竟成为压抑主体及群体的最佳借口。于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反愈趋僵化；（三）‘被压抑的现代性’亦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在追寻政治（及文学）正确的年代里，它们曾被不少作家、读者、批评家、历史学者否定、置换、削弱或者嘲笑。从科幻到狎邪、从鸳鸯蝴蝶到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即使有识者承认其不是发抒的新意，这一新意也基本以负面方式论断。”①从这个角度来说，“被压抑的现代性”其实是现代性中倾向世俗化的一个层面，是为数众多的非启蒙文学和通俗流行小说凸显出来的一种现代性，但是它始终处于被压抑和遮蔽的状态之中。

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虽然微弱和不入流，始终处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精英性层面的强大压制之下，却也始终不放弃对精英层面进行反抗，力图争取达到和前者的平衡，尽管有时它以一种非常隐蔽和微妙的形式。同时，其强大的生命力也在不断积聚能量等待爆发的一瞬。因此也经常如同流星一样，在瞬间就会照亮整个文学史的广袤空间，虽然稍纵即逝，但是也会给文坛留下惊鸿一瞥的最美收获。张爱玲的作品堪称是“被压抑的现代性”在20世纪40年代的典型显现。张爱玲的代表作品集《传奇》，曾经在沦陷区的上海风行一时，促使她迅速成为上海大红大紫的作家。因其风格特点颇类《海上花列传》等晚清小说，而且内容专注于都市小人物的儿女情长和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卿卿我我，当时也被称为是“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除了张爱玲之外，在同一时期的北方沦陷区出现了另一个女作家梅娘，她的《鱼》、《蟹》、《蚌》等小说也专写城市平民的恋爱悲欢。可惜的是，她们的作品和艺术风格无法持久占据文坛，在中国文坛上长久占据主流地位的自始至终是体现出“英雄气长”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性启蒙层面的意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虽然强调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出现了赵树理等向中国民间传统汲取写作营养的小说作家，也出现了《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受欢迎的作品，却并非是现代性的世俗一面。预制的读者和接受者是工人、农民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军人，根本没有把市民纳入视野。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解放区传统的文学现代性成为中国内地文学的现代性主流。而晚清小说和张爱玲等作品中的现代性的世俗层面的追求，则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消失殆尽。杨春时在《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一书中则把中国现代性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性的层面”。虽然杨春时的“感性现代性”的内涵有些接近“世俗化”的内容，但是他重点强调“感性现代性是怨恨”的特点，认为中国内地当代文学、文化的发展延续了其“怨恨”的特点：“建国以后，应该给个体欲望的发展留下空间（发展生产力），并使生存性的怨恨转化为个体竞争的动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但集体性的怨恨具有强大的惯性，成为‘左’的思潮的渊源；更由于体制内积存的新的怨恨——由于政治身份的不平等和对‘革命’政治身份的争夺，产生了新的集体性的怨恨，而后终于爆发了‘文革’。‘文革’的起因非只一端，但其深层心理动因在于这种新的集体性怨恨。”①不过现代性的世俗层面虽然在中国内地文学中消失，然而在国民党退守到台湾之后，尤其是台湾在60年代出现经济的腾飞和一些大中型现代都市出现之后，它的生命力却在台湾得到传承，并且在某些作家手中逐渐旺盛，使台湾文学呈现出与当时中国内地文学不同的面貌与风格来。

国民党从1950年起在台湾实行“戒严”制度，50年代的台湾文坛笼罩在国民党提倡的“反共文学”之中，当时“反共怀乡”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主题。不过从50年代末开始，由于台湾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报纸传媒的迅速崛起，台湾文坛此时变成了现代派的天下。可以说，现代派的小说和诗歌带有很多先锋试验色彩，接受的读者可能只是小

---

① 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三联书店，2009年，第5—7页。

圈子内的精英知识分子,而非欣赏通俗易懂的"市民传奇"类作品的广大普通市民群体。从此时开始,台湾文坛也兴起了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己任的杂文文体,颇受都市普通市民的欢迎。在60年代开始写作杂文的柏杨,以及稍晚一些时间出现的李敖、寒爵等一些杂文家,以报纸为阵地,以广大的市民为阅读对象,充分发挥杂文针砭时弊和嬉笑怒骂的特点,创立了继鲁迅、周作人,以及40年代上海"孤岛"中聂绀弩、徐懋庸等作家创作的"鲁迅风"杂文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其中自称是"野生知识分子"的作家柏杨的杂文最具有代表性。虽然他也把杂文变成刺向当权派与丑陋的社会现象的匕首和投枪,不过却有意绕开了文学现代性的精英层面,不是直接对当时台湾的社会制度和政府当局进行批判,如同《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政论倾向,而是从另一个向度——世俗层面来迂回切入,关注的是市民最日常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层面,而且不断审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黑暗痼疾以反观今日社会,占据的是文化和文学的批评立场,把现代性的世俗倾向表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当然他也吸收了胡适、殷海光、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刊物《自由中国》发扬的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的自由主义精神,并且把这些理念放进自己世俗现代性思想体系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柏杨以杂文创作最为著名,其实他早在50年代中期就创作了很多小说作品,包括《莎罗冷》、《旷野》等浪漫色彩浓厚的爱情小说,以及以郭衣洞之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的杂文既非现代派作品的曲高和寡,又并非完全流入市民文学的恶俗趣味,而是把高雅和通俗结合起来,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具体而言,一方面,柏杨天性中具有中国传统侠义精神中的扶危济难、同情弱小的民间侠客精神。而且因为从小饱受后娘虐待,青年时期屡屡遭遇战争祸患,以及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他自身体验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艰辛坎坷,以及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孤独无助,因此他非常渴望人间的温暖和温情。柏杨的人生遭遇和人生态度,使他能够以己推人,在个人感情层面上自愿站在"野生知识分子"的立场,而非是那些远离广大普通人生活的学院派精英的高超姿态,成为广大城市中普通人的代言人,通过报纸、书刊等现代传媒手段,表达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愿望。如果说这是柏杨从感性层面上的一个选择,那么从理性层面上来说,柏杨是处于边缘的、野生的"知识分子",依然拥有现代知识分子传统所赋予的正义和良知。首先,这使他具有不畏专制暴政的反抗精神,经常抱打不平,以同情弱小的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写下文字,来为广大市民说话,为弱小者立言。柏杨在杂文中猛烈抨击"酱缸文化"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其主

要原因其实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和义愤："每天在报社里听到记者们采访回来，尤其是采访警察局回来，常带一些使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我就忍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①其次，这还使他愿意接过《自由中国》的棒子，继承五四精神中的自由主义精神，能够理性地思考、判断和批判社会、文化层面的优劣现象，以及中国国民的国民性问题。这亦是柏杨为知识分子责任感驱使所作的一个反应。由此，他在为普通市民代言的同时，也看到他们无论是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均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封建糟粕观念。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下来的很多糟粕，例如权势崇拜、崇洋媚外和自私冷漠，以及无法治观念和自由平等意识等精神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当下现实生活的多种不良现象和思想潮流。换言之，建立和完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现代市民社会的体制，构建出具有现代人的自我主体性意识的现代市民，是建立具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性尊严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基础。所以，柏杨的所有作品还贯穿着一种反思精神，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及其流毒，批判当下生活中的不好现象，目的是改变和改善这种不好的社会状况，从而使广大人民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可以说，这种批判意识，与为市民代言的立场相互补充，共同勾勒出"野生知识分子"柏杨和其作品的特点来。

综上所述，柏杨正是在感性和理性的双重驱使之下，选择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作为自己和所有作品的追求。他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用通俗易懂和浅显流畅的语言文字为媒介，不但能够做到为广大现代市民代言，解决他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衣食住行和婚恋、价值观等问题，而且也继承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为建立一个较完善的现代市民社会而付出努力。也就是说，柏杨用自己的作品，解决了现代性中启蒙理性层面与通俗感性层面的均衡问题，兼顾到现代性中的精英和通俗层面。并且从构建和完善现代市民社会系统的思想出发，把构建现代市民的主体性当做这个系统的基础和出发点，力图把中国现代性偏重启蒙精英"不食人间烟火"的趋势，通过世俗化而加以纠正和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和他的作品，是继承了晚清知识分子、张爱玲等人的现代性世俗化精神，可以说是后者在台湾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74页。

第二节 “野生知识分子”与《自由中国》

柏杨曾经专门提到自己和《自由中国》成员之间的来往:“《自由中国》是国民大会代表雷震先生创办,受到胡适先生支持,它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对社会弊端的直言不讳,在五〇年代,成为台湾社会唯一的一座灯塔。那是撤退到台湾后,喘息舔伤的时代,中国内地上的惨败,不但没有使国民党有任何醒悟,反而认为:‘共产党的成功,是我们国民党太善良的缘故!’于是更加强化教育和组织训练,最高统帅蒋中正先生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只有《自由中国》杂志,呼吁希望国人从腐败、独裁、封建中觉悟。我到台北后,不久就跟《自由中国》的一些成员,包括社长雷震先生、编辑聂华苓女士、傅正先生,来往密切,我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赞同。”① 从这里能够看出,柏杨无疑受到《自由中国》很多影响。首先,从思想的影响来说,当《自由中国》被国民党查禁的时候,柏杨在《柏杨回忆录》中写道:“救国团上自蒋经国,下到每一位职员,都把《自由中国》视为寇仇。有人警告我,不要再和雷震他们来往,但我不能接受,因为内心里喜欢并且尊敬雷震先生,从不觉得和《自由中国》来往,是一种背叛团体的行为。当救国团发动四面八方围剿《自由中国》时,我没有写一个批评的字。不过我却在《自由中国》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描述一个人一辈子靠运气,而不是靠能力,步步爬上高位。”②因此,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会发现柏杨的思想中有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上文所列举的人性尊严、自由、平等和法治等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核心观念,其实基本上也都是《自由中国》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更何况《自由中国》自从 1949 年在台湾开始创刊,一直到 1960 年被当局查禁这段时间之内,刊物同仁关心时事和批评时政。可说,《自由中国》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一股明显的社会政治思潮,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潮流,不可能不影响到台湾的其他作家和学人,尤其是对以建立现代社会系统为己任的柏杨。

为了更清晰地表明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与《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妨先对西方自由主义及其中国的自由主义,进行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0 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459 页。

② 同上书,第 466 页。

一番历史脉络的梳理。

在西方世界，自由主义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政治和社会思潮。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和自我利益。也就是说，个人利益至上，国家和集体利益其次，个人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社会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国家应该为社会和个人服务。因此，如何处理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自然成为每一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

虽然有一些学者把自由主义的根源追溯至古希腊的政治传统，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的根源是在17世纪，更具体地说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后时期。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霍布斯、洛克等人提出了天赋人权、契约论、自然法等学说，个人主义首次被当做社会的等价物，甚至是先于社会的价值来加以讨论，并且确定了其在政治和伦理价值上的意义。具体来说，霍布斯提出了“消极的自由”的概念理论，他认为自由是免于外界干扰的自由，并非所谓的意志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学说被洛克、密尔等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西方英美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一项自由传统。至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霍布斯认为，国家和社会并非先验地存在，而是每个个体为保护自身而组成的人造之物，是个人确定和调整彼此利益的一种工具。个人利益自然是第一位的，高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不过人既然作为社会整体而存在，就需要有国家的权威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及进行发展，而且国家产生于契约，缔结契约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的共同愿望。洛克更加强调个人的权利，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同意学说”，这个学说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契约的同意组成了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同意建立了立法和政府等权力机关，以及国家对社会共同体成员行使权力和权威必须经过公民的同意。通过“同意学说”，洛克开创了关于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

自由主义的高潮和激进时期是18世纪，以卢梭和伏尔泰为此时期的代表人物。卢梭的“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当中”成为最著名和最具有革命性的口号。卢梭接受和吸收了霍布斯的政治绝对权力的观念，认为既然人们自由地通过契约建立了社会，社会就应该体现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人民服从社会其实就是服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果有人不服从社会，就是违反了其他大多数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个人服从社会，其实并非是一种强制行为，而是为了个体获得自由。这也是卢梭推崇的公意理论的基本内涵。不过卢梭还认为，自由不仅是理论的逻辑起点，更应该是其归宿，是人类根本的价值诉求之一。自由是一种道德的和自主的状态，个人的自由和国家

权力是统一的,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人民实现自由的保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卢梭使自由主义由个人主义走向了整体主义。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功利主义政治观念成为主流,代表人物为边沁和约翰·密尔。他们对启蒙时期的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某些修改,认为在决定人们行为的方面,情感、习俗和经验等因素的力量远远超过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义务理念,而且理性的“同意学说”存在着严重矛盾,即遵照理性观点来说,人们会反抗强权的君王权威,在实际社会环境中却会选择遵从;而且国家的产生不是基于契约,而是源于人们对习惯的服从。更具体地说,边沁认为,功利社会只是社会个人私利的总合,必须维护个人追求自我幸福最大化的个人自由,以实现社会幸福总量的最大化作为最终结果。当个人和社会产生矛盾时,国家和法律依据功利原则进行协调,自然就会解决矛盾。他也明确了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性质。密尔的观点则是从功利的道德原则和痛苦、快乐内涵的角度对功利主义理论加以补充,指出功利主义其实也有利他主义的一面,他也是倾向个人主义观点。密尔改变了把国家和个人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二者协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的观点被 20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加以继承。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自由主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此阶段有以斯宾塞为代表的鼓吹达尔文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弱肉强食,生存竞争”。还有提出了“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概念的柏林,以及强调“公共利益”和“社会和谐”的霍布豪斯,两人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观点。20 世纪上半期是新自由主义形成的时期,代表人物有杜威、罗斯福和凯恩斯。二战之后出现的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素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罗尔斯。

与西方相比,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没有形成一股思潮,也没有明确和完善的理论系统,但是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和观念介绍进中国,而且他们自身也深受自由主义的熏陶,由此可被称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他们以创办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刊物杂志,以及聚餐会的形式,形成了松散的群体,经常集体表达他们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认识。这使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痕迹。具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中心人物,从新文化运动伊始,一直到 1960 年,除了坚持民主、法治,反对专制独裁,追求人权等与西方自由主义相同的理念之外,还始终坚持把五四精神作为他们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基础。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带有反封建、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这亦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一

个重要特点。这同时对柏杨等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外省人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2年创刊的《努力》杂志可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第一个刊物,也奠定了围绕着刊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成员的构成结构及其思想观念。除了胡适和丁文江为其核心成员外,还有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陈衡哲、朱经农、徐志摩等作家和学者。最能够体现出《努力》发扬五四精神的学术努力,主要表现在胡适批判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以及丁文江反驳张君劢引发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上。而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依据的思想资源就是五四精神所推崇的历史进化论和科学论。

还要看到,虽然胡适曾经表示过,他有意创办一个不同于政治倾向浓厚的《新青年》的杂志,不谈政治,而是专事哲学和文学。不过《努力》杂志其实还是具有浓厚的政治指向。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努力》和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矛盾:既渴望拥抱政治,又惧怕和厌恶政治。换言之,他们既想兼济天下,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又清醒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时刻想着独善其身,或曰明哲保身。这种矛盾心理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有的,自然使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在政治和非政治之间来回摇摆的特点来。

在《努力》刊行一年多之后,胡适希望能够把该刊物谈论政治的倾向加以改革,只是因为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他的这个愿望几年之后在上海创办的《新月》杂志上才得以实现。

胡适曾在《新月》2卷6期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解放的历史意义:"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初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然而《新月》的黄金时代也很快过去。直到1931年以胡适为首的北方大学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在北京创办了《独立评论》,对于其创作宗旨,胡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坚持非政治的立场,而是希望把该刊物变成宣传他们政治思想的喉舌,"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得老实话",因为"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意见工作"①。针对国民党复活传统儒家传统的

①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举动，胡适在1934年接连写下了《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和《三论信心与反省》三篇文章，认为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才能够建立起国人的信心。他在1935年发表了《纪念“五四”》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重提五四精神。可惜的是，《独立评论》在1937年7月停刊。

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聚集起来，是以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在台北正式创办为其标志。此时《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胡适之外，还有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申思聪、李中直、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戴杜衡、雷震、杭立武、罗宏诏和聂华苓等人。其中不但有教授、学者等知识分子，还有国民党官员。从刊物内容来看，不但把此前《努力》、《新月》和《独立评论》所提倡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发扬光大，同时明确了《自由中国》具有批判现实的政论倾向和鲜明的政治目的。这可以从雷震在《我们五年来的工作重点》一文中窥见一斑。雷震总结了《自由中国》几个方面的重点：阐释自由与民主的确切意义和价值；强调实行法治以建立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希望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之外出现另一个反对党；鼓励自由经济的发展；建设独立性和批评性的舆论，等等。而且从1957年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涉及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和新闻等方面的问题。不过此时的《自由中国》依然坚持五四精神传统。殷海光在1957年5月发表了社论《重整五四精神》，反对复古，呼吁科学和民主，“凡稍有知识的人士都看得明明白白，时至今日而讲复古，无论讲得怎样玄天玄地，根本是死路一条，不会有前途的。……拿过去的光荣，怎样能弥补现在的空虚？如果提倡开倒车的复古也算是爱国，那么提倡科学与民主以促进国家之新生与进步，为什么反而不算爱国呢？”①他还在1965年发表了《自由的伦理基础》，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张忠栋也曾把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殷海光的加以比较，并且总结概括出他们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总结而言，胡适的自由主义比较单纯，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比较曲折，在单纯和曲折的背后，牵涉到两人年龄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生际遇的不同，性情心理的不同，对现实问题认知的不同，对中国传统了解的不同，乃至两人分别和徐复观来往的差异。由于这么多的不同和差异，两代自由主义者的私人关系始终有些隔阂，殷海光对胡适的评价也是先后不一。然而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终归

---

① 殷海光：《重整五四精神》，《自由中国》第9期，第16页。

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最大的关切是自由民主,胡适终生坚持,殷海光艰苦奋斗,在五十年代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留下的政治主张,今天已有更多人笃信不疑。"①

综上所述,由中国自由主义脉络的发展线索,可以看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思想的接受和改变,尤其是把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精神作为贯穿始终的一个基础。这使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以及反对复古、拟古倾向,与追求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人权和指摘时政弊病的特点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反对个人主义至上,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做一个基本出发点。这与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观点恰恰完全相反,可说中国内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换言之,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存在于台湾一隅。而在 1960 年《自由中国》因为"雷震案"被迫停刊,随着雷震、殷海光等中坚力量的被捕入狱,胡适也离开台湾常住美国,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的衰落。而且,国民党从 1950 年起就颁布的戒严令,也在此时变得日渐严苛和残酷,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中国》遭到铺天盖地的文化围剿,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禁区,这也是上文所引的《柏杨回忆录》中柏杨所谈到的情况。在《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虽然当时台湾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承认与其有关联。而且雷震的一些好友们已经公开斥责他,以示与其划分界限。这是他们的明哲保身之举,否则就要受到"雷震案"的牵连,当然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出于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道义感,柏杨并没有对雷震他们落井下石地进行抨击,而是保持沉默。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在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中,有勇气拒绝当国民党当局的"摇尾系统",也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更何况,在实际创作实践中,柏杨还是接过了《自由中国》的棒子,继承了他们不畏专制强权,为弱小民众说话,以及追求自由、民主、法制、人性尊严等自由主义的精神,并且加以吸收消化,把这些精神追求化在自己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

有意思的是,柏杨当时自称是一个"野生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与雷震等人的政论家身份完全不同,还认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谋生"和赚钱养家,而不是启蒙民众和救国。同样这是他最初写作杂文的一个初衷。他从 1960 年 5 月起在《自立晚报》上写"倚梦闲话"专栏,后来结集成《玉雕

---

① 张忠栋:《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 年,第 58 页。

集》、《怪马集》、《堡垒集》、《红袖集》等专写女性外貌之美和男女婚恋等题材的杂文集。他在《玉雕集·序》中说:“想不到自刊载以来,好像是甚得佳评,来信表示敬意者有之,提出问题请教者有之,索取玉照以便瞧瞧者有之,要求出单行本以便翻阅者有之,但警告我小心点亦有之,劝我‘何必呢’亦有之。使我隆重发现,国家大事,食肉者谋之,谈谈女人,也是养生之道,乃自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起,至一九六二年二月正,零零碎碎,写了三个月,现在将其付梓,一则是供有志之士,大开眼界,以展宏图。一则是希望能赚几文版税,为老妻买一床毯子过今年之冬也。”①不过柏杨写作杂文的目的并非仅如作家自己所说的,只是“为了免于饥寒,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向专制暴政挑战”②。其实,这是柏杨借此表明自己的世俗化立场,因为他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为广大市民代言,以及建立现代市民的自我主体性。因此他以上的话,主要是针对中国现代性脱离广大民众的状况而发,并非是为了有意识地与中国自由主义划清界限。

正如上文所言,柏杨在内心希望能够继承和接续《自由中国》的批判精神。虽然,在“《自由中国》这道墙崩塌之后,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单位的利剑之下,当时我听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警备司令部的人说,柏杨以后该乖了吧!’偏偏,我不但没有变乖,凡而从内心激发出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接下《自由中国》交出来的棒子。这种信念,在我的杂文中,不断出现。在气氛一天比一天肃杀的那段日子里,读者把它十分看重”③。《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精神成为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所依靠的理论资源。

还可以从柏杨的作品中找到很多证据来说明《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虽然柏杨总是宣称自己是非学院派的野生知识分子,不参与政治,只是关注世俗社会生活,其实他创作出的诸多作品,显然带有《自由中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思想的烙印。《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可以在其代表人物雷震的代表作品《舆论与民主政治》中看出。任育德详细指出:“雷震承袭了森口繁治的论点,指出民主政治的民有、民治、民享中,以民治——由人民行使政权或由其代表根据人们的思想行使政权——为最重要,也是分辨真民主与假民主之所在。在近代民主政治中,则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7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74页。

③ 同上书,第476页。

以议会作为人民代表行使统治权。由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为议会政治，衍生出民主政治是平庸政治、凡人统治、常识政治、繁琐政治的论点。民主政治为平庸政治、凡人政治，是因为其系由代表人民多数的议会行使统治权，而不以居于少数的君主、贵族为之，选举时，人人平等、票票等值。民主政治是常识政治、繁琐政治，是因为它处理与我们生活相关事项与之形成的社会问题。……雷震将民主政治的定义导为‘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民主政治以人民的意思或根据人民的意思作为行使政权的基本条件，而不以民本、福利为满足。民意政治——亦即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为：人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国家是由具有相等的独立自由的人民，为谋相互幸福与共同利益集合构成的团体。因此国家的权力出自人民自身，其最高权利亦需藏之于人民自身。因此，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非人民的主人。人民具有相等的独立自由，除了依据共同意思而决定的法律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限制人们的自由。人民服从国家的命令，并非服从某一人的意思，而是服从国家这个团体，意即人民自己的意思。由前述可知，雷震与《自由中国》诸人，均认为民主政治是符合人性的，舆论的形成也是符合人性。”①雷震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人性、人人平等、人民高于国家等观点，正是柏杨60年代诸多作品的焦点和重点。这亦是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点。只是《自由中国》提出的是政治理念，而柏杨则不同。他是以作家的身份，把这些抽象的理念加以文学化、具体化和历史化，用其来解决现实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问题罢了。以小说为例来说，他的长篇爱情小说《旷野》除了探讨多变的人性和爱情主题之外，还包括了很多反封建思想的内容，例如探讨子女对父母的孝道问题、父母对子女的态度等伦理道德问题。柏杨在小说中对此直接进行批判，强烈反对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行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酱缸文化”的流毒依然对现代人的思想进行毒害而产生的恶果。《古国怪遇记》则直接对无独立人格意识的崇洋媚外、崇拜权势等社会现象进行讽刺。这些小说作品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柏杨对他们善恶掺杂的自然人类属性持理性尊重的态度，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小说体现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倡人性尊严的思想观点来。

与小说相比较，柏杨的杂文最能够体现出他与《自由中国》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契合，以及他所受到后两者的影响。向阳已经认识到这一特点：“柏

① 任育德主编：《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第134—135页。

杨的杂文,比起同一时代《自由中国》诸君子的政论,并不特别带有威胁政权的挑战性,但仿佛是功能互补似地,从五〇年代开始的《自由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格鲜明,也企图挑战当时国民党的整体主义政治性格;而柏杨的杂文,则是通过对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嘲讽,对于当时的整体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提出批判。《自由中国》最后以雷震(1897—1979)于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被捕,刊物废刊结束;而柏杨则接下这种使命,直到一九六八年入狱止。”①这可以从柏杨被捕入狱前出版的最后三部杂文集中找到很多例证。在1965年出版的《越帮越忙集》杂文集中,作者漫谈围棋、象棋等棋类典故知识,注重的是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说在柏杨的作品中,该杂文集属于风格比较“温柔敦厚”的一类。不过,柏杨仍然在文章中不时地对中国“酱缸文化”和当下社会现实进行嘲讽和调侃。他在《关键在“围”字》中嘲讽儒家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古人们一脑筋当官思想,批评某人也不贤,某人也混蛋,某人也没前途,差不多都是指他当不上官而言。伊丹朱先生喜欢下棋,圣崽们觉得他那一套不能使他‘位尊而多金’,当然瞧他不起。”②在《天才和努力》一文中:“一个人有上台的一天,必定有下台的一天,天底下没有只上台而不下台的怪事。……好比贵阁下吧,现在尾大不掉,坐在局长校长部长处长的宝座上,舒服带冒烟,但总也有下来的一天,不是你高升,就是你也像名男人翁慨先生一样,十八年不倒,一倒就不可遏止。”③明显是嘲讽当时台湾社会官僚“只上不下”、把社会当成自己发财致富的私产,不把人民放在心上的不良风气。

如果再进一步联系到第二年,即1966年11月蒋介石连任台湾地区第四届领导人的事实,可以推断出,柏杨对当时台湾社会不良现象的概括和推论,其实有意无意地具有影射整个台湾地区政坛,甚至是最高首脑人物之嫌。政论色彩比较浓厚,与《自由中国》干政议政的政论特色非常近似。随后出版的杂文集《心血来潮集》的现实批判性更加强烈。柏杨直接用借喻的方式,假借一个“嫉妒”的例子加以详细说明,揭露出国民党政府大规模设立的文字狱:“谈起各报专栏,大家频频称赞某某,听得我实在难受,就假装心事重重,长叹一声,大官果然在意料中问曰:‘柏老,柏老,

---

① 黎活仁主编:《柏杨的思想与文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7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30—31页。

肚胀仍没有好呀?'我曰:'肚胀倒没啥,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只是为我们文化界悲,为人心悲,为国家悲。'大官一听我如此之悲,大吃一惊,问曰:'愿闻其详。'我曰:'以某某而论,他在那块地盘上种植鸦片,读者竟然吸上了瘾,这该如何是好。'说罢这段话,当时本来要去撒泡尿的,也没去撒,只正襟危坐,露出甜面酱嘴脸。大官听啦,猛点其头,看样子有点若有所悟的情势,我就心中暗喜。我本来想说该某某先生在他方块上种植马克思主义兼灰色思想的,话到嘴边才改成种植鸦片,盖取其比较活泼,容易动人心也。这不过是个开始,以后我还继续奋斗,制造暗箭。如果能把该作家关了起来,判个十年八年徒刑,最是上策。"①

他入狱之前出版的最后一部杂文集《死不认错集》,则是柏杨前期杂文中对中"酱缸文化"批判的一个系统总结和概括,是他独特的现代性思想倾向的最集中体现。其中共收录五十一篇杂文,每一篇都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其内容主题与国民党当局在1966年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干涉现实意味更强,愈发触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痛处。当时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弘扬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柏杨则把中国"酱缸文化"的祸源归结为儒家文化思想的盛行。他明确反对和针砭儒家文化,推崇的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现代化思想。在《只鼓励安份》中,柏杨指出:"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份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利自私,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有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②他把圣人当做由"酱缸文化"生产出来的酱缸蛆,认为"第一是保护自己"的思想只教会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52—153页。

② 同上书,第332页。

中国人民的保守退步,对残暴的帝王权贵与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忍气吞声,更遑论缺乏勇气去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了。除了对儒家文化的强烈批判之外,他也主张从实用和现代化角度,废除文言文,把汉字拼音化,还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权势崇拜、势利眼、冷漠无同情心等特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弄与批判。换另一句话说,柏杨几乎是全方位地,包括从政治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和人际关系等层面,对中国历史和当下社会中的“酱缸文化”、儒家文化思想流毒进行了尖锐批判。《死不认错集》的另一个内容是对台湾当时社会现实的极度讽刺,该杂文集开篇就针对当时刚发生的“野柳溺死人”一案而发:“但这年头,必须大人物用手拨一拨,算盘子才肯动一动。小民即令把嗓子喊哑,也只不过被当做马叫。但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惨剧,官老爷也有儿有女,至少家里总有活人,应该理一理啦。”①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死不认错集》虽然体现出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微妙波动,是柏杨试图回到现代性精英一翼的一种尝试,但是其中一些杂文篇章具有的干政议政的现实批判锋芒却不可否认。可以这样说,《死不认错集》把此前杂文集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儒家学说和对当时台湾社会现状的批判,拓展到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某些层面,同时少用曲笔而多是直截了当地抨击,一些杂文篇什带有政论色彩,风格更接近《自由中国》雷震等人的政论文。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柏杨最后三部杂文集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果再联系柏杨在 1968 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时的理由:“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动摇国家根本”,以及 1969 年被判刑的两条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运用文学技巧,影射政府腐败无能,离间人民对政府之情感,侮辱中国传统文化”②。由此可以看到,接续了《自由中国》“棒子”的柏杨是如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恼羞成怒,再次动用文字狱使柏杨停笔禁口。这也反向证明了《自由中国》对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影响。这些证据充分表明,《自由中国》和其传播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深刻影响到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建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自由中国》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构成了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的理论根基。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6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321 页。
② 参见齐以正《人权与柏杨》、梁上元编《柏杨和我》。

第三节　为市民社会代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并不能因为柏杨受到《自由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他把自由、民主、人性尊严、法制等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把他的杂文归类于政论文。同时，也不能因为他在作品中勇于批判针砭社会现实，就把柏杨归类为雷震类的精英知识分子式的政论家，尽管柏杨在60年代所写的最后一部杂文集《死不认错集》中，或隐或显地流露出柏杨向精英知识分子立场靠拢、其现代性思想转向精英性一翼的企图。原因在于，柏杨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立场，他的出发点与《自由中国》并不完全一致。虽然他独特的现代性立场在《死不认错集》中曾经显露出微妙变化和某种转向，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这种转变却因被国民党当局被捕入狱而被迫中断。但是柏杨在出狱之后，他的思想意识又回到现代性世俗化层面和立场上。正如陈晓明精确分析的："柏杨的政治批判意识在《自由中国》事件之后明显得到加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柏杨的批判立场和态度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他依然是在世俗社会的民间立场来展开批判。柏杨对专制政权的批判经常采取的方式都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指桑骂槐。他从来不作正面的进攻（当然，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也没有做长篇大论，而是对政治的合理性展开各种质疑。更为重要的在于，他是在与民众对话中来展开他的政治批判的，在这样的对话空间中，不合理的政权及政治完全被'他者化'了。当时的政权及政治总是被零散化处理，柏杨有意东一榔头，西一棒，随时随地可以把政权政治拖出来，调侃一下，揭示其虚假性和不合理性。"①可以这样认为，柏杨批判社会不公的主要动机在于为普通民众伸张正义。而他之所以在最早的杂文中抨击警察，原因主要出于正义感和一种义愤："每天在报社里听到记者们采访回来，尤其是采访警察局回来，常带一些使人发指的社会新闻，而报社碍于人情或畏惧后果，往往不敢发表，我就忍不住在专栏里，提出抨击。"②他的杂文主要关注点，在于普通市民们，以及他们会遇到的最平凡的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236—237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74页。

世俗生活事务。甚至包括被主人以偷钱的理由告到警察局的女佣，以及卖笑的妓女等普通小人物。普通市民构成了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的主体，柏杨试图以现代市民为主体，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自由、拥有健全的民主法制和结构比较完善的市民社会体系，某种程度上以此来对抗国民党的政治独裁，以及消除“酱缸文化”流毒对现代人思想的腐蚀。

市民社会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共同体或者城邦国家，“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①。而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对市民社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城市文明的共同体，与野蛮人的社会或野蛮状态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他眼中，市民社会与文明社会、政治社会是同一个概念，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在17和18世纪，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把市民社会当做一种与自然状态相对的“井然有序的社会”，所以市民社会其实指的是国家共同体。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类由于竞争、猜疑以及追求荣誉的本性，可能会使人们之间互相争斗残杀，使人们生活在孤独、贫困、卑污和短寿的恶劣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契约形成国家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安全。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和谐的生活状态，只是缺乏确定的法律和公允的裁判者，人们就通过契约，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来克服自然状态的这种缺陷。卢梭推崇自然的生活状态，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中过着孤独、自在而平等的生活，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们为了获得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才有的便利和高效，因而以契约的形式建立起体现出契约者拥有权利和自由的国家。上面提到的这些自由主义者们建立起了“社会先于国家”的观念，而这个“社会”指的就是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市民社会，它彻底摧毁了君权神授的封建观念，将教会的权威驱逐出世俗社会的领域，认为国家形成是由于人们订立契约保护自己的需要。因而，将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从上帝手中转移到了普通民众那里，人们能够享有自由。

黑格尔是第一个把市民社会概念放在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地位上的哲学家，并且对两者进行了区分。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当做伦理精神活动中连接家庭和国家的中介环节。他认为，家庭是伦理精神直接的和自然的显现，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从自身统一中分离出来的独立实在性，国家则是伦理精神的最终完成和实现。三者分别体现着伦理精神发展的同一、差别和统一三个阶段。从三者各自活动的目的本性上看，家庭体现为单一性，市民社会

---

① 安科亨·阿拉托：《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4页。

是特殊性，国家则体现出普遍性。

对于市民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其职责作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已经有充分的论述。他认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式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①。他进一步说明市民社会所包含的内容："市民社会含有下列三个环节：第一，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第二，包含在上列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物的现实性——即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②而且"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基础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③在市民社会中，"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人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④。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当做独立的个体人格，其特征是自由，而市民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充分表现在经济生活中。黑格尔还认为，是政治国家决定了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概念同样散见于马克思各个时期的著作当中。可以说市民社会是马克思自始至终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具体来说，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的观念。马克思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⑤具体而言，"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活动和工业生活"⑥。马克思不但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

---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4页。
② 同上书，第203页。
③ 同上书，第196—197页。
④ 同上书，第19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⑥ 同上。

物质关系”，而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到经济关系的层面上，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说明社会关系。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这样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他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①]因此得出结论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②]也就是说，是市民社会决定了政治国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恰恰是把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颠倒过来。

如果说马克思主要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强调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把市民社会当成经济基础的话，那么葛兰西则把市民社会看做是上层建筑，是从意识形态的功能上来分析市民社会，强调市民社会作为思想文化关系在国家内部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分析：“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以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③]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对国家的基本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可以说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④]。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既构成了整个国家及政治社会的基础，又是其构成的必要部分，同时它也受到政治社会的保护。他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居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代表社会舆论，它通过不属于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学校、教会和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念。

查尔斯·泰勒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可以说是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的一种集大成总结。他在《吁求市民社会》中，把市民社会分为三种情况：“1. 在最起码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存在于有自由社团之处，而不是处于国家权力的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④ 同上书，第218页。

护之下。2.在较强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只有在作为整体的社会能够通过独立于国家监护之外的社团来组织自身并协调自己行为这样的地方才存在。3.作为第二种意义的替代或补充，只要各式各样的社团的整体能够举足轻重地决定或转变国家政策的进程，我们就能够谈论市民社会。"①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泰勒认为："对西方传统而言，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的确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概念在更早的西方历史中根深蒂固，更为特殊的原因在于它对不同形式的反专制政体的思考来说，已经必不可少。诚然，它的存在和相关性有赖于西方改革式专制主义（在17、18世纪被称为'组织良好的警察国家'）的发展过程。它在城邦或者中世纪政体的语境中是没有意义的，在许多传统的非西方政体中同样如此。人们也许会说，市民社会是在面对西方传统中暗含的对于自由的特殊威胁时，作为一种必要的捍卫工具而产生。但是现代国家仍旧被引领到动员并重组其主体的生活这一职责方面，确切地说只有就此范围而言，那种市民社会/国家的区分才被确保具有一种持久的相关性。"②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查尔斯·泰勒认为市民社会的存在其实是对政治国家可能会产生的专制体制的一种反抗和制约。

从以上这些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们的学说来看，有的学者则把现代国家中的市民社会概括为三大社会功能。一是维护"私人领域"的自由，使之成为个人的天地和自由的王国；二是制约政治国家，防止国家对人民权利的侵吞和剥夺，确保"私人领域"在国家面前的神圣不可侵犯；三是保证市民社会成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体现出个人的参与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市民社会的成熟与否和是否完备，决定着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民主自由，人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综上所述，市民社会的理论思想其实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具有相似的理念和同样的追求：以普通市民为主体，建立一个法制健全、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

然而中西方国家又存在不同的情况。按照葛兰西的看法，"在西方社会，情况则根本不同，由于形成了独立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不但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或者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具有二重本质：强力 + 同意（领导权）。即是说，西方的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③他对以

---

①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196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

俄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却有不同看法:“在东方社会,由于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就是一切,它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全部内涵,它集中体现了传统国家的本质特征:暴力和强权。”[①]这个观念虽然有些偏颇,不过同样适用于没有形成市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系统不完善的所有国家。尤其对中国内地而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市民社会基础的个人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被当做资本主义的观念而被摈弃和消除,出现的是民族主体的“人民性”。

学者李杨在其专著《抗争宿命之路》中精辟地论述了“人民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国革命的内容是既反帝国主义又反封建主义,目标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当年俄国民粹主义表达出来的要‘绕过’资本主义的决心,不仅仅是一种想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恶果的愿望,它还反映出他们确信资本主义不是导向而是离开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许多想法是一致的。因此,1949 年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还不是毛泽东的真正目标,他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一个与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新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仅存在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而且充满了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1949 年以后毛泽东坚决否定了党内有关‘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张,迅速把中国革命推上了第二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不断地批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社会主义改造从 1953 年开始,只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结束了。毛泽东在 1956 年 1 月发动大跃进时指出了新的国家任务:‘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确定经济的落后是‘主要矛盾’的中心。至此,‘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基本完成’,虽然‘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段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在 1957 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已经获得了共同本质的‘人民’如何处理‘内部矛盾’的问题。

---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12 页。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都已经完成了自我超越的过程,真正具有了‘人民’的共同本质,都成为了‘人民’的一部分。

至此,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奋斗多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一个真正的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从此以后,找到了共同本质的中国真正进入了现代,并且将在现代化建设中,展示这种人性的本质力量。‘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①

因此当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造让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体出现之后,“人民性”就从意识形态上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个人性”和“阶级性”,民族主体代替了个人主体,这标志着中国内地选取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试图在民族主题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内地变成了经济落后、人民没有人性尊严的一个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之前这段时间所走的道路,倒是无意中从反面论证了市民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性。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则踏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国民党退守台湾不久即开始实行土地改革,一方面将没收的日本人的土地卖给农民,另一方面用工业股票换取地主的土地交给无地的农民,通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稳定经济基础。在实行第一、第二、第三个四年计划后,台湾经济在6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工业的‘起飞’,主要标志是纺织业和电子电器工业空前发展,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工业出口比例超过农业出口比例,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意味着台湾由农业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加工出口业为支柱的工商经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一环。这是一种质的飞跃。”②现代工业的发达产生了台北、高雄等现代城市。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在文化上试图割断传统,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作品均列为禁书,不许在台湾出版发行,又采取亲美的文化政策,自然使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大规模地涌进台湾。还有,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自由

---

① 李杨主编:《抗争宿命之路》,长春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58—160页。

② 陆卓宁主编:《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中国》所传播的拥护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以及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现代派”文学思潮,以及大批量出现的私人创办的报纸和刊物等均都使普通民众置于诸多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笼罩之下,使他们的眼界得到开拓,自然会产生与西方接轨的强烈愿望。这些均说明台湾社会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文化状况,具有培养出以个人主体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系统的可能性。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无疑是应时代潮流而生,他敏锐地抓住了台湾社会新兴的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各种需求,放弃了精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以与普通市民平起平坐的姿态代表他们发言,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由此,他的创作很容易就引起了广大市民阶层读者的共鸣和响应。柏杨也由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

还要注意到,作为一个从中国内地来台的外省人作家,柏杨并没有产生把台湾土著(被称为本省人)排除在外的观念意识。原因可能也在于,他没有与同样是外省人作家的白先勇等人那么显赫的家世。柏杨只是一个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普通知识分子而已,台湾的生活条件与他在中国内地时的差别并不大。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他都需要自食其力,而非靠父荫庇护来生活。因此,他也不可能会产生白先勇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那种贵族没落的伤怀和浓厚的怀乡愁绪,以及潜意识凸显的外省人情结。在柏杨的作品中,根本就没有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区别,他也没有有意强化自己是外省人的意识,所有生活在台湾的人们统统均是中国的子民。在《柏杨回忆录》中,他详细描述自己从中国内地首次踏上台湾之后的情形:“真正使我爱上这个地方的是岛上的居民,那时候,我(包括几乎所有的外省人)根本不知道岛上竟拥有三个族群,一是马来族,被称为山地人的原住民;另一是华人后裔的被称为闽南人或福佬人的漳州、泉州人;另一是同属华人的客家人。大家的语言并不相同,但对我并不重要,因为反正谁的话我都听不懂,因此也无法分辨他们语言的差异。这时候政府开始推行国语(北京话),我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我那一口河南土话讲慢一点,也还可以让人听得懂。藉着这样的交流,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在外地被接纳。——在四川的时候,我是外省人(下江人);在东北的时候,我也是外省人(关内人),现在来到台湾,身份并没有改变,照样仍是外省人(中国内地人),可是,没有一个地方使我感觉到像台湾这样的,有一种气候、土壤、人情、风俗融合在一起,令人感到被接受的温暖。”①柏杨认识到“台湾中华人的两大族群——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有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36页。

一种移民的性格，那就是包容性”①。因此在柏杨笔下，同样呈现出一种包容性：他把自己当做众多台湾人中的一分子，对台湾岛上生活的诸多族群中的人们一视同仁，没有族群偏见，更没有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区别。

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倾向思想中反抗独裁和特权的反抗意识，也受到台湾民众普遍具有的反抗意识的影响。如果说《自由中国》的思想，对柏杨产生的影响集中在最表层和理性层面上的话，那么台湾民众始终具有的反抗意识则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情感心理上的一种渗透。台湾饱经战乱的历史赋予当地人民一种独特的反抗意识，吴浊流在《无花果》中对此有深刻的描述：“台湾人在无意识中，认为台湾是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我们做子孙的，有保护它的义务。我们的祖先，经过无数的艰难辛苦与努力建设起来的村庄，每一寸土上都有祖先留下的汗、血与泪。为了保卫村庄，与瘴疠、番人或外敌搏斗而牺牲的也不少。现在奉祀在义民庙的神灵，都是为村庄而战死的英雄。……保卫自己的村庄是自己的义务，这种观念，不知何时，在无意识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这种精神，一旦有了外敌，自然就要显露出来。”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经由长久战乱祸患和异族统治激起的自发的反抗意识已经渗透进台湾民众的潜意识之中，一旦遇到外侮就会爆发出来。而且，从日据时期开始，台湾文学就把描写普通民众的反抗意识当做一个文学传统来看待。计璧瑞在其著作《台湾文学简史》中，对此传统有十分生动具体的描述：“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主题下，以赖和、杨逵为代表的抗议文学早已确认了台湾人被压迫、被殖民统治的处境和反抗压迫的不屈性格，大量反映台湾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和下层人悲惨命运的作品着力于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公不义。这当中具有明显问题意识和抗议精神的作品，能明确揭示出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将台湾定位于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族，为其抗争呐喊助威。那些单纯披露社会黑暗和人民生存处境的作品，也以凄惨的笔调、黯淡的色彩勾勒出台湾特别是下层社会悲哀屈辱的形象，台湾成了台湾普通百姓的伤心之地。”③可以说，台湾普通民众的反抗意识，以及台湾文学传统中具有反抗强权暴政统治的文学传统，一起汇入台湾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和集体情感中。虽然这种集体情感对柏杨的影响不会像《自由中国》那样明显和深刻，但是无疑也会产生某些潜移默化的微妙影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36页。

② 吴浊流主编：《无花果》，台湾出版社，1984年，第38页。

③ 计璧瑞主编：《台湾文学论稿》，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响。例如柏杨对警察暴行的勇敢暴露和批判,对他们进行的“三作牌”的讽刺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上的义愤,才不计自身利益,而用杂文为受到警察迫害的普通民众申冤,释放出他们压抑在内心深处和心理潜意识中的反抗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能够通过杂文、小说、史传、报告文学等作品,来批判针砭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国民性的戕害,同时不断揭露出当时社会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其原因除了因为他秉承《自由中国》中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把其作为自己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之外,大概从个人情感层面上,也敏锐地感受到民众对专制独裁政府的愤怒情感和反抗情绪,以及他们对民主、自由、社会公正、公平的向往之情。这些因素均驱使性格正直、疾恶如仇的柏杨承担起为他们代言的责任来。

综上所述,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台湾经济开始由农业经济为主,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此时出现很多较大规模的城市,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也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群体,具备了形成现代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系统的现实可能性。深受《自由中国》思想影响的柏杨,由此看到构建现代市民社会系统以及建设现代市民主体性的可能性。因而,他把建设现代市民社会和现代市民,当做建立自由、民主、法制、人性尊严的现代社会的基础,这亦是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一个理想目标。与此同时,作为台湾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柏杨以作家的敏锐和野生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但感受到台湾普通民众内心汹涌的反抗暴政强权的情绪,以及他们在历史屈辱中凝聚成的反抗情感,而且以通过作品把这种反抗情绪表现出来为己任。可以这样说,他把这些因素当做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现实基础和情感上的基础来源,在其上构建起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大厦。

第四节 现代性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具体来说,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想体系——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系统,最初是通过杂文得到广大读者的赞同,然后经由研究者的认识和梳理,才得以明晰地浮现出来。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柏杨最被认可和得到充分评价的,也是他在杂文中表现出的文学成就。他曾被称为是第一个在海外拥有百万读者的杂文家。而中国内地读者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其杂文《丑陋的中国人》得以认识柏杨本人,以及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劣根性之思想的。因此可以理解,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学者们为何通常会把他和鲁迅进行比较。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所分析的,中国内地学

者通常会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来探讨二人思想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因为"柏杨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生崇拜鲁迅，他继承鲁迅，以杂文为武器，向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扫荡"①。由此很多学者自然偏重挖掘柏杨杂文表现出的政治批判思想，尤其是把"酱缸文化"作为柏杨政治批判的中心意象，而非文化层面上的一个意象，比较深入地探讨柏杨杂文在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层面批判上体现出的特点。台湾学者向阳的《猛撞酱缸的虫儿：试论柏杨杂文的文化批判意涵》，以及中国内地学者王宗凡、徐续红的《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内地学者还通常把柏杨与李敖、龙应台等杂文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侧重点依然是他的政治文化批判立场。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认识到柏杨杂文和鲁迅的差别，"鲁迅杂文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柏杨杂文是属于普通人的"②。不过他们没有再继续深入探讨其原因，以及柏杨杂文的具体特点。而中国内地学者陈晓明却敏锐地意识到了柏杨杂文的独特之处。他从其中看出柏杨对中国现代性曲折发展过程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此提出的建设性的建议。陈晓明在其论文《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试论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中，首次指出，柏杨的立足点是现代性中的"世俗批判"，这是与现代性单一、线形发展和不断进化的特点相左的另一面。主要原因在于，台湾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经济飞速发展，而且媒体相当发达，市民社会也相应得到一个迅速成长和长足发展的机遇，因此，被政治理念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压抑的市民日常生活世界才得以浮出水面，这种环境亦有可能产生一种与市民社会和世俗生活紧密结合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世俗层面，这是与中国现代性的精英性层面并存的另一个面向和层次。

从陈晓明的《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试论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一文，可以清晰地看出柏杨杂文的特色："在于柏杨行使始终是世俗的文化批判，这与其他知识分子行使的精英化的政治批判显著不同。而世俗批判恰恰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构中最缺乏的基础性建设，也是中国市民社会很不健全的症结所在。正是这一严重的基础性的缺失，导致中国现代性建构出现畸形的状况，以及陷入反反复复的曲折与障碍中。"③所以，"他就是

---

① 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

② 江源主编：《中国内地杂文与台湾杂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7期，第7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231—232页。

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①。然后,陈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柏杨杂文体现的世俗批判的特点。这首先在于柏杨的文化立场。陈晓明认为,柏杨在《柏杨回忆录》中就自称是一个野生动物,尽管他实际上是大学毕业、知识渊博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也从不认为自己写作杂文是为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出于承担启蒙救亡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立场和态度:主要是为了生存和温饱而定作。这就决定了柏杨有意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的态度,而主要是从世俗的现实生活层面来选择其杂文的题材。他探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以此为支撑点和基础点,“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传统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②。

陈文还以柏杨最关注和经常讨论的几个问题作为论据,证明后者的关注点侧重于现代性中的世俗社会生活。陈晓明认为,这首先表现在柏杨的国民性批判中。因为柏杨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端均根源于人性之劣根,而不是根源于社会制度。这种“人性论”的观点,使柏杨把现代性反思的重心放在了人性和文化上,讽刺嘲弄的是人性和文化的异化。“在柏杨看来,根本上都是文化问题,从传统至今的文化出了问题,才使人的品性变得恶劣丑陋,而品性之恶劣丑陋,又反过来加强了文化的病症,改造国民性,最重要的是改造民族之文化。”③陈晓明指出,此特点显然不属于推崇革命暴力的中国现代性范畴,而是现代性一直力图忽视和压抑的部分。其次表现在鞭挞道德风习中。原因在于,柏杨最乐于探讨的是人的道德操守的堕落。因为他认定国民性的劣根性均来源于道德操守的异化。而道德操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235页。

② 同上书,第237页。

③ 同上书,第239页。

守实际上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是个人要自觉遵守的一种民间伦理规范，而非官方强制的法律条文和道德操守。“柏杨最关注的还是世俗社会自身的问题，他不断批判的就是世俗社会中出现的那些违背常情常理的道德行为与风俗习惯，举凡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居家伦常，长幼尊卑，邻里关系，社会规则，忠孝节义、宽容嫉妒、恩情仇恨……等等，是柏杨最热衷与拿手的话题。”[①]最后的一个论据，则来自于柏杨拥有的伸张“平等正义”的思想观念。这同样是柏杨在杂文中常流露的一种思想品格。“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新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与尊严。”[②]而这三个主题，其实是世俗生活在不同社会层面呈现出的不同表象而已，其母体均是市民的世俗社会生活。而这三个主题在现代性的论述中，要么被有意遗忘和压抑，要么被加以修改。通常会被以政治化和神化的方式，提升到政治批判的高度，尤其是在处理“国民性批判”的问题上。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陈晓明的确抓住了柏杨杂文最独特的特点——现代性中的世俗批判。他看到柏杨力图从人性、人情、文化的层面上来改造社会，其杂文属于文明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范畴，而非政治性杂文。而且陈文的观点，还间接解释出柏杨多用“曲笔”的原因，由此证明柏杨并非是“没有骨气”[③]的文人。因为正是柏杨对现代性在世俗化层面的建构，才使他不愿意以政论的形式，去直接挑战社会制度的锋芒。

从这个角度来说，陈晓明的《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试论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一文，可称是近几年中国内地学者探讨柏杨杂文的论文中最精彩的一篇。不过，陈文是专题探讨柏杨杂文的思想品格，因此没有涉及柏杨的小说、史论、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的特点。然而，如果以陈文观点为坐标，仔细考察和分析柏杨所有的文学作品，就可以发现柏杨对现代性的独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241页。

② 同上书，第242页。

③ 张骥亮：《潘君密眼中的李敖与柏杨》，《三月风》2004年第3期，第9页。

特认识和“世俗”观念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由此柏杨作品中的“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勾勒出众声喧哗的“多种现代性”①中的另一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陈晓明并没有梳理出柏杨现代性世俗层面的另一个层次，即《自由中国》和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当然，陈文在论证柏杨杂文具有的现代性世俗层面特点上，可说是独具学术贡献。笔者前已言之，《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理论根基。虽然柏杨始终坚守自己是“野生知识分子”的立场，并不会像《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样热衷于参政议政，但是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和对某些社会弊病的严厉批判，确实继承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而且，他的思想观点触到了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的本质，触怒了当时的政府。不过“靠着胆大包天和一时的运气，发挥了聋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断写下去。为了减少阻力，我用最不严肃的方式，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幽默最容易凝聚读者群，也最容易引发更多人关注我们社会的病态”。② 因此可以说，柏杨现代性世俗层面的内容，其实是与其精英层面的理性批判有所交叉和混杂。这种站在普通城市民众立场上的批判意识，使柏杨在行使世俗批判的时候，具有一种理性反思和审视的精神。他既能够审视当时台湾社会的病态层面，用笔及时予以痛击，也审视自身的批判态度——是否代表了广大普通市民的利益，以及是否站在他们的视角来发言。“十年杂文，表面上看起来沉静得像一个没有涟漪的湖面，其实湖面下，恶浪滚滚，漩涡翻腾，我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也有读者带给我的物质生活的水准，和精神层面的鼓舞，每一篇文章在《自立晚报》刊登时，对无所不在的国民党特务而言，几乎都是一记强力震撼。”③而 1968 年的“大力水手案”给国民党特务机构以口实，借机把柏杨安上“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并判刑。

从创作实践上来说，柏杨在出狱之后创作的作品中，依然坚持现代性世俗化的立场。在他出狱之后所写的《早起的虫儿》、《按牌理出牌》等杂文集，以及翻译、改写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历史著作和《皇后之死》、《帝王之死》等史传作品中，虽然是从文化的层面切入，主

---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的主要观点即是“多种现代性”（many kinds of modernities）。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0 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477 页。

③ 同上书，第 484 页。

要剖析的是中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其中对“酱缸文化”的批判不如人狱前那么辛辣和直接。但是，也多了诸多冷静思考，提出很多要求改善社会状况的可行性建议。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和由此产生的没有人权等弊病的批判，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依然非常深刻。从这个角度来说，其理性批判色彩反而较前期更浓。

综上所述，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理论根源是《自由中国》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精神理念，现实根源则在于当时台湾有发展市民社会的历史需求，以及台湾普通民众拥有的对抗专制独裁统治，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反抗精神情绪的传统。至于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的具体内涵，笔者以杰姆逊对现代性的认识为依据和参考，因而并不对其概念内涵进行完整的定义。对杰姆逊来说，鉴于现代性的众多定义和芜杂内涵，他反对现代性的定义，宁可对现代性进行描述。他这样认为：“第二个基本原则：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①笔者深以为然，因此尽量通过对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的一些现象进行描述，从中总结归纳出一些要点，也由此指出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特征来。

首先，现代城市市民系统中的现代市民构成了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主体。柏杨的“酱缸文化”批判和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针砭，其目的均是为了建构起现代市民健全的主体意识，同时这也是现代性的世俗层面得以确立的一个特征。如同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现代性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现代性主体的历史发展脉络来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性进程的开始，西方世界由此进入一个与传统断裂的新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旗帜鲜明地反对中世纪的神学和宗教，重新发现了人性，并且用理性来反对宗教迷信，肯定了人性的价值、尊严以及人对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和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由此理性的“人”代替上帝成为现代性的主体。但是当理性的“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上帝，尤其是当精英知识分子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逐渐成为处于高高在上、与普通民众日益脱离的贵族阶层的时候，自然就对非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一种压抑和遮蔽。尤其是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来说，这种由精英知识分子造成的现代性雅、俗两个层面——既包括社会阶层，也包括文化和文学上的雅俗层面——日趋分化，并且最后分离。而作为世俗化过程的现代性历程，本应包括理性启蒙精神和由理性启蒙所肯定的世俗生活和自然人性。但是

① 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选自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当启蒙和救亡成为现代中国三十年(指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现代性中关涉到民族国家利益的雅层面愈发被张扬,甚至成为现代性最主要的内容。因而,另一个所谓世俗生活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自然被贬低和受到压制,甚至被忽略掉。此时,现代性的主体实质是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体,把其他普通民众,尤其是现代市民均排除在外。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提倡的文学“大众化”,其实也是共产党为了纠正现代性太重雅层面所做出的一种努力,当然也收到了一定成效。现代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农兵代替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性的主体。

不过,新中国在50年代后期进入抒情时代①之后,现代性却表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焦虑和拒绝②,尤其是“个人主体”被“民族主体”所代替,世俗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反而成为被阉割的现代性,被更深地压抑和遮蔽,根本无法解决现代性由来已久的雅俗之分以及主体问题。而如前文所述,台湾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具备了形成市民社会阶层的历史条件,市民社会确立的主体是个人——现代普通市民,而且市民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健全,能够成为一个对抗专制独裁政府、实现民主自由的独立结构,以及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因此,作为一个富有文学良心和正义感的作家,柏杨就在《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台湾民众历史悠久的反抗传统的影响之下,以笔为武器,为建立现代市民社会系统而奋斗。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怀着“感时忧国”的责任感和忧患感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自愿成为当时还是弱势群体的广大城市平民的代言人,站在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来关心最日常的世俗生活,并以民间社会的伦理道德、品位和趣味来针砭社会痼疾和不良现象。同时也要注意到,他并非是一个完全以市民标准和趣味来写作的作家,因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成熟的市民阶层体系,它其实是一个亟待建设的、良莠不齐的阶层,其中存在很多封建传统的糟粕。柏杨的参考坐标是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以西方市民社会为标准来批评、引导台湾的市民阶层,希望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建构起现代市民社会系统,把现代市民作为现代性世俗化的主体,由此改善和解决现代性历程中把知识分子当做主体,而压抑和忽略除此之外的普通人的弊病。

其次,从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包含的内容范畴来看,“自然人性”、“人性尊严”、“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观念为其核心观念。

---

①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② 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5—226页。

这也是柏杨批判和清除“酱缸文化”,以便重建国民性、民族性格以及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这些思想观念在柏杨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可能首先和柏杨自身的身世经历有关。柏杨从小母亲早逝,被凶残的继母打骂虐待,其遭遇更像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他非常渴望人间的温暖。以己推人,柏杨从自身的经历懂得了人世温暖和同情心的重要性,不但在日常生活中把温暖传递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更把这种追求平等、正义的情怀用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呼吁这个社会多一些关爱和同情心。这样才能够改变中国人冷漠自私、不团结的性格,用善良、温情的人性改善和代替凶恶的人性。他争取的是普通市民应该享受的民主权利,无论是在杂文中把鱼肉百姓的官吏讽刺为“二抓牌”——一手抓权、一手抓钱,还是把欺压民众的警察谑称为“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的“三作牌”,以及报告文学《家园》中“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的宣言,均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还要看到,他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情怀,除了受西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之外,亦来自他性格中天生的侠骨柔肠,多少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惩恶扬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更像是因社会不公而为普通城市民众仗义执言的一个游侠,只是他以笔为剑来行侠仗义,活动范围限制在文坛而已。还有,现代性世俗化中所包含的这些核心观念,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接过了《自由中国》的“棒子”的柏杨,理所当然会把《自由中国》所宣扬的这些思想理念,加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建构现代市民的主体性为核心,以“自然人性”、“人性尊严”、“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治”为其核心观念的思想体系。

柏杨在作品中把现代市民的主体性分成几个层面分别进行建构。柏杨对现代人主体性的建构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脉络:他最早关注的是现代女性市民主体性的形成和确立,随后是整个现代市民(现代人)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再到对现代个人内在人格的建构,然后再到把为被生活压轧的小人物纳入到现代人的范围中并力图在“苦难意识”建构他们的自我主体性。

由于女性几千年来遭受“酱缸文化”中君权和男权的压迫最为严重,受到“酱缸文化”的戕害也最为深重,造成她们缺少独立健全的人格意识、自我意识和人性尊严的现代思想观念,因此柏杨在作品中首先把建构现代市民主体性的宏观目标放到对现代女性(女性市民)主体性的建构上。而建构女性主体性的一个关键环节则是重建女性的人性尊严。从对女性平等人权问题的关注,到对女性人性尊严自身内容的建构,再到对善恶相掺杂的自

然人性问题的思考，柏杨形成了特殊的关于女性话语建构的发展逻辑。

具体来说，为了建构女性市民的人性尊严，柏杨先从建构现代女性外部形象入手。因而柏杨对女性外貌服饰的关注具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其实是现代女性追求自我认同的一个外部表现。然后他从心理结构上来建构现代女性的独立平等意识，从灵魂层面来探讨女性自我形象的深度建构和自我主体性建构的问题。由于自由恋爱婚姻所具有的反封建思想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因而柏杨首先选择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形成进行分析。现代女性必须具有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思想意识，这亦是女性心灵觉醒、走向女性解放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关键一步。不过，在柏杨经历十年牢狱出狱之后，婚恋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由早期的“浪漫之爱”婚恋观——爱情通过婚姻与性爱联系起来，因而爱情是婚姻和性爱的基础，爱情婚姻与性爱是一体两面，而婚姻则是爱情与性爱的必然中介和保障的一种现代婚恋观——走向“激情之爱”的婚恋观，后者是只同居不结婚、提倡性爱自由和解放的另一种婚恋观。

但是柏杨看到“激情之爱”提倡的性爱自由与解放同样是双刃剑。他一方面看到性爱解放使现代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追逐情欲的自由权利，对女性获得彻底解放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可能是现代社会情欲解放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使现代女性挣脱伦理道德观念的枷锁，能够自愿参与到情欲解放的社会游戏中。不过柏杨没有对性爱自由与妇女解放的深层关系作进一步探讨。这亦是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的一个缺陷。进而言之，虽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在中国社会城市化的某一个阶段成为济世良方，能够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供较合适的处理方案，但是并非具有永恒不变的优越性，尤其随着台湾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该思想也渐渐显出劣势来：虽然可以游刃有余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社会文化遗留下的“酱缸文化”问题，以及对现代社会的“酱缸”流毒进行批判，成为现代社会市民主体性建构的基础；但是对后工业社会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上面所说的“强哉骄”女性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应该如何不堕入“情欲解放”枷锁的主潮，而进一步获得身心解放，以及同样背景下的男性的“现代化”问题，均无法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因而柏杨在“十年史传”时期转向整理、编撰中国历史典籍，并借此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方面体现出柏杨一以贯之的考察中国“酱缸文化”的历史病根和根除“酱缸”的努力，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正是其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在后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和缺陷所致。

柏杨还以中国文化现代化另类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思想观念——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从另一个层面继续展开对现代市民之建构。他的人道主义观念着重从文化角度出发，针对的是国民性问题。如同鲁迅一样，他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和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以达到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的。柏杨以“酱缸文化”批判和国民劣根性批判为中心贯穿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打破“酱缸”的目的在立“人”，体现出柏杨对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的明确追求。在“酱缸”文化批判中，柏杨明确把“酱缸文化”的形成和加深与中国的各种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并且把权势崇拜当成儒家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产物。也就是说，“酱缸”文化形成的最基本根源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变迁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产生出权势崇拜的“势利眼”观念，而佛教、道教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加深了权势崇拜的程度。这表现出柏杨一贯激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五四文化思想的现代精神来。

再次，从文学层次上来说，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具体表现在追求文化和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上。相比较而言，延安解放区文学追求的大众化，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阅读层次。而柏杨重视的现代性的世俗层面，主要指向的是现代市民的阅读口味和接受水准。因此，柏杨作品体现出的艺术性和文学品位自有其特点。

一、从作品的结构上来说，柏杨在《秘密》、《莎罗冷》等小说、《异域》、《穿山甲人》等报导文学和一些故事性很强的史传《皇后之死》、《帝王之死》等作品中，非常注意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能够吸收西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艺术手法，又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吸取有益养分，从而创作出高雅严肃而又通俗易懂的文学和史学作品，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到把精美的艺术形式和有深度的思想内容结合起来。柏杨正是在此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才创作出众多精美的文学作品。即使在数量众多的杂文集和议论性和说理性极强的《柏杨曰》、《中国人史纲》等史传作品中，柏杨依旧重视作品的艺术性，着重发挥幽默讽刺风格产生的审美作用，“用最不严肃的方式，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幽默最容易凝聚读者群，也最容易引发更多人关注我们社会的病态”①。不但能够逃脱国民党特务的文学检查而达到避祸的目的，而且除了市民阶层之外，也能够被社会其他阶层，包括知识分子群，所广泛接受和阅读。可以说，正是柏杨作品中的幽默讽刺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77页。

语言、浪漫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对人性和人类隐秘幽微心理的探索，以及对中外古今典故和历史掌故的广征博引等体现出的文学性、趣味性和知识性特点，构成了柏杨作品巨大的艺术魅力。

二、从作品的主题来说，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使他关注普通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常见的社会现象。具体而言，柏杨把蓬勃兴起的广大市民阶层的衣食住行、男女婚恋、言谈举止、礼貌问候和市容市貌等等各种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大部分作品关注的内容。由此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作家，柏杨是用文学作品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来阐发自己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他不但使作品拥有丰富厚重的思想内容，使读者能够理解和感受到作家对现代性的世俗层面之追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柏杨以文学艺术形式的美感力量来感染读者。这使他的诸多作品非常注重艺术性、文学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形式试验的先锋色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丑陋的中国人》，不但以其敏锐的文化批判成为闻名世界的佳作，而且在艺术成就上也备受赞誉。其中的幽默讽刺意味、借用小说笔法来写杂文等特点，也对杂文文体类型的拓宽，以及它与小说、诗歌等文类的相互借鉴和渗透有所贡献。柏杨创作的报告文学也向小说领域渗透。他把艺术虚构和写实手法融合起来，使报告文学同时具有小说的诸多艺术特点，遂引发了文坛关于报告文学文类特点的论争。更何况报告文学《异域》和其他一些小说作品曾经被改编成电影，均进一步扩大了柏杨文学作品的影响。柏杨作品文本具有的上述特点，使他的绝大部分作品能够在世界华人圈中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由此亦超越能够台湾国民党和中国内地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时代背景的限制，能够拥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和美学魅力。

毋庸置疑，他的很多小说文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即使今天再来重读，依然会发现这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富有魅力和吸引力，完全可以与当下的一些文学经典相提并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主题除了提倡人性、自由平等等观念之外，还包括一种贯穿很多小说创作的“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其实也是柏杨的现代性情怀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中的一种表现，使浪漫情调能够和苦难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小说格调和悲剧美感。这也可说是柏杨作品的另一个特点。

不过需指出的是，不同的作品文本对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阐释有些不同，彼此间存在着细微差别。也就是说，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观念在每一部作品中的表现并非是均等的。进而言之，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自然人性”、“人性尊严”、“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观念，实际上是随着柏杨创作时间和背景的变化，以及不同文学类型作品的特点而发

生细微变化。还可以这样说，虽然现代性世俗化的观念贯穿了柏杨的整个作品，但是每一类型作品的特点决定了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深浅程度。而且，在不同创作时期和时代背景下，柏杨往往分别针对不同作品文类的艺术特点进行创作。因而他的诸多作品或者偏重思想内涵，或者偏重艺术形式，抑或两者并重。换言之，这些作品表现出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内容和层次也各异。具体到杂文作品来说，由于杂文可以直接表现出作者的喜好、思想倾向，由此达到直接说理和议论的目的，自然是最能够体现出柏杨的现代性思想的世俗关怀的一类作品。而小说则不同，小说的特点决定它必须借助生动的艺术形象来隐晦地表达出思想内容。当然，如果是短篇小说集《打翻铅字架》和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等用讽刺手法写成的小说文本，表达方式接近杂文，能够表达出作者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性尊严的追求，以及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因而从内容主题中就可以直接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以及对现代性世俗化理念的某些理解。但是，如果是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写就的、具有浓厚的浪漫传奇色彩，甚至充满奇幻色彩的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则此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倾向主要通过其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作者只有通过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才能够抓住作者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而柏杨的确创作出很多诸如此类风格的爱情小说，像《莎罗冷》等就属于这类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显然这些具有不同艺术特点的作品文本，均对我们理解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造成了很多困难。当然，同时要指出的是，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构成了柏杨作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作者由于拥有太过于强烈的观念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小说等叙事类作品的艺术性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损伤，容易造成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大于情节，具有太多说教色彩，以及主题先行等艺术上的缺陷。这也解释了柏杨的小说作品为何并非篇篇都是佳作的原因。

除此之外，柏杨的作品即使是同一文类在不同年代亦有些差别。而有些类型的作品，甚至其内容和艺术形式在不同阶段就呈现出某种变化来。其中的现代性世俗化取向，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自然也有所差异。举例来说，在柏杨 80 年代之后出版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和《帝王之死》、《皇后之死》等史传作品中，其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倾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民本的现代历史观念，可说是他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的自由民主、自然人性、人性尊严等现代性世俗化的观念在历史著作中的具体体现。柏杨虽然强调一个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意识，不过这只是现代性世俗化的其他观念的一个、发展而已，并没有构成大的变化。除此之外还

有报告文学作品，虽然《异域》写于60年代，而更具写实报导色彩的《金三角·荒城》则是写于二十年之后。不过贯穿其中的人道主义等世俗观念亦没有什么变化。相比较而言，柏杨前后期杂文却发生了某些变化。入狱之前的前期杂文虽然主要专注于文化传统层面，但是不可否认，他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复古思潮的反驳，不可避免会带有一些政论色彩。更何况，就社会文化批判的角度和杂文自身特点来说，只要他深入社会体制的深层进行批判针砭，就无法避免政论色彩。这在他的杂文集《死不认错集》中有明显表露。虽然柏杨此时的现代性思想出现了从世俗化层面向精英化层面的微妙转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时柏杨对中国的“酱缸文化”，以及对当时社会中不公平的诸多社会现象进行的冷嘲热讽的批判，包括对现代女性外貌、男女婚姻恋爱、人类多变的情感和自然人性等内容所进行的探讨，都饱含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热情，从中可以感受到柏杨“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意气风发之豪情。而柏杨的后期杂文虽然返回到现代性世俗化的基本立场上，不过与前期杂文相比，其杂文写作态度和行文风格还是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柏杨在此阶段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他把视线完全落到文化批判上，公开声明自己所谈论的“酱缸文化”并非是政治问题，而完全是文化问题。因此他对“丑陋的中国人”以及主奴之分的批判，就成为他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因而在后期杂文中，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自然就呈现出与前期杂文的某种差异来。这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详细剖析，在此就不再赘述。

不过也正是因为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在柏杨创作的不同类型和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存在着细微差异，才使柏杨的整个创作风格异彩纷呈，既有统一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贯穿其作品始终，又能够针对不同作品的艺术特点而有所变化，避免了重复的弊病。不过正如上文所言，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实际上具有双刃剑性质，柏杨的所有作品既受益于此，尤其体现在杂文因深刻的思想性获得的世界性声誉上，有的作品也受此限制。柏杨在出狱之后不再写小说，而是转向富有杂文议论色彩和故事性的史传作品，或许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对小说的形象思维所具有的束缚。因此他就专心创作出诸多更适合其幽默讽刺的行文风格，并且综合了杂文和小说特点的历史传记作品。柏杨由此迎来了“史传十年”的蓬勃发展。

可以说，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亦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在文学、文化层面继续发展的一个趋势，尤其是代表着从中国内地到台湾地区之后的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立场观念。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现代性自五四以来偏重精英一翼所造成的压抑、遮蔽世俗一翼现状的一种纠正和补充，虽然与白先勇等主流知识分子坚持的文学态度不同，但是同样继承了《自由中国》中反封建、反复古、追求民主自由、反抗强权暴政等五四新文化精神。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虽然柏杨的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存在着某种缺陷——无法为中国后工业社会阶段出现的“强哉骄”女性与情欲解放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较合适的解决方案，但是体现出该思想的众多文学作品和史传作品在创作实践中已经对台湾社会和中国内地社会，甚至对整个华人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消除中国历史文化中流传至今的“酱缸”文化流毒、改造国人的“窝里斗”、“麻木冷酷”等国民性痼疾，以及建构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人道主义和个人灵性等现代中国形象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杨才被公认为是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代“人文大师”。[①]

---

① 可参考“百度百科”中关于“柏杨”的词条，见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25090.htm。

第三章 重建女性的人性尊严

前已言之,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建构具有现代自我意识的现代市民体系,而妇女占据着现代市民体系的半边天,也就是说,与男性市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女性市民与前者共同构成现代市民体系。由于女性几千年来遭受的"酱缸文化"中君权和男权的压迫最为严重,受到"酱缸文化"的戕害也最为深重,造成她们缺少独立健全的人格意识、自我意识和人性尊严的现代思想观念,因此柏杨就把建构现代市民主体性的宏观目标首先放到对现代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上。而建构女性主体性的一个关键环节则是重建女性的人性尊严。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来看,女性没有或是缺少人性尊严的问题的确是亟须我们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柏杨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她们在家庭中无法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的无尊严的境遇,这是其思考该问题的独特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妇女被关闭在家庭小圈子中,三从四德的传统伦理观念使她们成为依附家庭和男性而生存的一个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们主要是作为传宗接代及男性性欲发泄的工具而存在,根本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尊严,更遑论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了。因此柏杨呼吁和提倡妇女应该得到她们应有的权利,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都市中的现代知识女性,她们在日常社会环境中更应该形成人性尊严意识,以及获得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在工作中与男性同工同酬、在家庭中和男性共同分担家务、抚养后代等权利和人格自由。除此之外,她们也应该拥有追求更充足的物质生活与更美好的精神生活之自由与权利。柏杨之所以重视女性的人性尊严和权利问题,究其原因既与当时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遭遇有极大的关系,也是其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和立场的一个呈现。换言之,柏杨把妇女尊严的建立和她们的解放程度以及所获得的平等、自由等现代人应该拥有的权利,均当做现代社会市民系统形成和完善的一个明显标志,亦是柏杨渴望的人人平等、充满民主、自由、法制观念的现代社

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具体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妇女的生存境况来说，中国内地和台湾的社会状况可说差别很大，而两地妇女们需要面对的现实环境和生活背景之间的差异更是悬殊。我们通过对比期两地女性不同的生存处境，更能凸显柏杨关注女性话语建构的特殊历史指向与意义。

关于中国内地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徐坤在《现代性与女性审美意识的转变》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分析："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成为划分中国政治革命历史阶段的标识，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时间上的分水岭。从此往后的十七年直至'文革'十年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借助于政府机制和行政手段而提出的'男女平等'观念，涵盖控制了整个艺术创作群体的思维空间。这一时期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与五四时期所提出的妇女解放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的女性所追求的是个性的解放，要求摆脱封建桎梏，提倡大胆的反抗和叛逆精神，女性要在内心深处产生独立，不再依附于他人。'娜拉出走'模式被图解和演绎出的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倡导妇女要获得文化思想与人格方面的解放和独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妇女解放，诚如戴锦华和孟悦所言，是承袭了建国以前的解放区妇女的解放特征，'它第一次从政治、经济而不从文化心理角度肯定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人一样的经济权力和政治——社会价值。从鼓励妇女离开锅台下田劳动、男女同工同酬，到提倡婚姻恋爱自由乃至妇女工作协会及各项妇女工作机构的确立，男女平等成了解放区新的社会总体秩序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化或不如说制度性的男女平等关系中，产生了我们今天女性的生存方式。"

"实施这项政府机制真正有意义的方面是确立了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与男性平等权利，与此同时，它却又将问题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个大而化之的平等口号下，妇女被提倡和教化的是对公共准则的简单遵守和绝对服从，'娜拉出走'式的叛逆精神继而消失。无论是对于妇女还是对男人来讲，'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是彼时人们所共同恪守的行动准则。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个人'显然是不存在的，耸立着的坐标只有一条集体和公共利益原则。原以为自五四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而逐渐觉醒复苏的女性自我意识及其所要求的男女平等，会随着这种平等口号的提出而自动获得，而事实上却相反，泯灭男女性别差异的背后，掩盖着的是对人性的无视，是对权威话语的绝对遵从，是以新的菲勒斯专制代替和抹杀了性别平等。"

"泯灭性别以后的所谓'男女平等'，对妇女而言，便是无视其生理和心

理特点，在主观控制上片面强调妇女要跟男人们完全一样，在思想和体力行为模式上，消除了妇女选择的自由权，实则是在传统的尊卑之外又平添了一份妇女所承受不起的负担。传统的妇德教化尚未经彻底打破，她们又必须承受一份走出家门、与男人一道在体力上拼杀、提篮担担、炼钢筑堤的身体艰辛。在外千般劳累，而回到家里之后，她们仍旧还要操持传统的女红，仍要洗衣烧饭伺候男人。那些不愿出门工作的妇女会遭受百般嘲弄，她们一定要被动员、说服出来承担某些社会公职。妇女们只有服从和顺应而不能有忤逆，否则就是与新政权格格不入，担当某种政治风险。被'解放'以后的妇女承受着传统角色与现实选择的双重压力。"①

正如徐坤所分析的，中国内地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依靠国家和政治的力量，获得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虽然这种"无性别"(泯灭男女性别)差异的平等隐含着男权对她们的深层压抑，不过，就社会整体层面的价值追求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女性毕竟不需要再为争取爱情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而与社会和家庭进行拼死抗争，乃至头破血流或疯癫死亡，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当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从带有中国封建色彩的传统观念向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进行转变的特殊时期。对于台湾妇女来说，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和个性自由，实现与男性在经济、政治上的平等，获取现代人所拥有的权利仍然是她们追求自身自由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相较之下，可以说台湾妇女运动和解放步伐比之中国内地在整体上明显落后一步，正如王雅各在《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一书从妇女运动的角度来描述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时所指出的："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到1971年之间，台湾的妇女活动只有狭隘地局限在妇女会、妇公会、妇联会这些与官方关系极为密切的团体中。这些团体，虽然也有偶发性地表达对娼妓、家庭暴力和妇女福利等议题的关心，但在大多数时候，与国民党关系良好的妇女团体，所举办的都是具有稳定并维系执政党治理和政情作用的，诸如模范母亲的选拔、劳军、鼓吹和谐家庭和主张妇女必须在家中做好相夫教子工作、扮演贤妻良母角色等的活动。"②她总结说："以此处的定义来看台湾的妇女解放运动，我们发现从日据时代到1960年代，台湾的妇运是比较沉潜、低调、个人和零星的。即使批判传统男尊女卑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在大众文化和社会中消失过，但大多以个人姿态出现的不同时期的女人，并没有对台湾社会

---

① 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7—78页。

② 王雅各主编：《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9年，第20页。

造成普遍和全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此时期对妇女权益的思考和关怀大多以和农民或劳工阶级的混合面貌出现,几乎看不到其中的性属(gender)面貌,而妇工会等妇女团体事实上也在父家长制政体(state)的监控下,无法发挥太多争取女性权益的效果。"①

从现有的关于台湾女性解放运动资料来看,王雅各对台湾五六十年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当时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等复古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是在此时大量涌入台湾的西方观念,使得这个时期充满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种种混乱不堪、彼此矛盾和相互碰撞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观念和西方现代意识、卫道滞后的思想和新潮摩登的观点等等,均共存于同一空间和时间中。虽然新的社会观念正在逐渐形成和确立,但是旧的、封建的传统观念也依然主宰着妇女们的观念。也就是说,当时诸多妇女正处于从传统观念到现代观念的艰难蜕变之中。不过因为王雅各是从女性(或曰女权)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台湾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程度,其主要依据标准在于是否有女性作家或者女性工作人员来提倡妇女解放的观念和思想,而把男性有意忽略不计或是认为他们的性别使他们始终无法真正理解女性,即使他们也以文字为媒介来积极宣扬、鼓吹女性的个性解放。而柏杨实际上就是50年代中一个积极宣扬女性个性解放思想的男性作家。但是因为柏杨的立足点并非是后来女性(女权)主义者的性别观点,而是秉持了现代性世俗化观念中包含的《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五四精神对女性解放的认识,他对女性解放的提倡不是因为女权思想,而是源于对整个人类拥有人性尊严,以及对由拥有人性尊严而产生的人类合法权利的倡导,从而使他的观点具有更宏阔的囊括面和普遍意义。他在《新城对》中的《女权与人权》一文中明确说:"我想与其单独的提出女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这是整个人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妇女是人、男人是人、儿童也是人;大官是人、囚犯也是人;大商是人、穷人也是人,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尊严,不但不可以迫害妇女,也不可以迫害儿童,也不可以迫害男人。所以女权不可能单独存在,中国自从立国以来,王朝不断地更换,每一个王朝的更换,都杀人千万、血流成河,结果一个新的政权成立,在经过若干年之后,又是杀人千万、血流成河,不断地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像英国人一样,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打来打去,不能建立议会政治?为什么我们的妇女受到这样的迫害,迟迟不醒?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所以妇女不过是大迫害中的一

① 王雅各主编:《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9年,第23页。

部分而已，即使把女权提高得和男权一样，没有人权同样会受到迫害。”①

因此，在柏杨看来，人性尊严产生的权利问题实际上是女权问题的基础与根本，也是其核心内容。同时，人性尊严的发展与建构不仅仅是一个女性权利问题，也包括女性权利与男性权利的和谐共处等问题。唯有建立在人性尊严基础之上的女性和男性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从相辅相成的角度来确认女性和男性话语的本质。由此可见，着眼于人性尊严与女权、男权的辩证建构，关注女性与男性整体的和谐发展与最终的提升突破，正体现出柏杨关于女性人性尊严理念建构的特殊之处。

第一节 自然人性与人性尊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正处于从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向现代社会观念转变的时期，而且欧风美雨已经深深影响到台湾的文坛，出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和诗歌的繁茂昌盛景象，这已经是文学史上的共识，无须多加探讨。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这些小说家和诗人们能够敏锐感受到当时台湾的现代性进程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之外，对这种由中西方思想观念交锋引起的新旧思想之断裂感受最深的，大概当推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市民们。他们受过一定的现代教育，也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平，是台湾市民社会的根基和主体。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市民社会的半边天，市民社会阶层中的女性市民虽然已经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妇女，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在现代生活和城市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戕害和压迫。以上这些特殊情况使她们在现代都市中所受到的中国与西方、传统和现代、新与旧的观念冲突最为剧烈。因此，作为市民社会代言人的柏杨无法忽视这些女性市民的存在和社会境遇，首先把目光转向她们，把她们是否得到平等自由的人权和能否形成人性尊严感，当成衡量现代市民主体性是否形成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准。

具体到不同时期的作品来看，如果说柏杨在50年代早期作品中更多关注的是确立女性人权的具体形式，把包括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等诸多内容看做是女性获得人性尊严的外在表现加以肯定的话，那么60年代的柏杨则看到，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已经成为惯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8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91页。

常的社会风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和建立起人性尊严的思想观念来。与此相反，此时女性对恋爱、婚姻的依赖心理却又成为女性获得进一步解放的最大障碍。因此，女性如何获得真正的独立意识和进一步从更本质层面上确立女性的主体意识、完成自我的深度确认，就成为柏杨最关注的人性尊严之"新"问题，这也是柏杨6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主题上异于50年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这种变化首先体现为柏杨越来越重视人性尊严与自然人性之间的关系，并把对自然人性的尊重当做形成人性尊严观念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柏杨笔下，自然人性并非是脱离社会生活和实践的抽象的人的本性，而是具体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普通现代人的自然本性，可说他们除了具备喜、怒、哀、乐等各种生理情绪之外，还拥有善良、正直、热情等正面的性格特点，亦包括嫉妒、自私自利、任性等各种性格弱点和其他人性的缺点，以及他们对爱情、友情、亲情的诸种不同认识和多样态度。从具体构成因素来说，自然人性并非全是善或者均是恶的因素，而是善良和丑恶俱全、理性和兽性同时存在，它们共同成为人性的必然组成部分。由此，现代人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或者是十恶不赦的恶棍，而是七情六欲、贪痴嗔恨俱全的普通意义上的人。

柏杨之所以强调这种自然人性观念的基础建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他强调现代性世俗化层面的理论基础之主要来源是现代西方思想，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言明，而其主要构成因素皆以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文明现象、文化现象和观念为典范和参照系。具体到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人性论观点来说，其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心理学以及现代生理学、社会学等现代西方的学术理论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柏杨的人性论观念实际上颇具先锋性和革命性色彩，可说开当时的风气之先。其次，这种人性观的提出，也是柏杨有意识地反对儒家的"圣人"观的产物。柏杨认为，在儒家思想系统中，"吃冷猪肉"的圣人们把伦理道德观念放在首位，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婚等，推崇的是由"性善论"想象虚构出来的"完人"形象。他们有意忽略和压抑正常人，尤其是女性的正常生理欲望和生存权利，使女人和小民都成为男性和当权者的附属物，没有自身独立人权和人性尊严观念。而柏杨的人性观又与天赋人权的观念相联系，也就是认为尊重个人的生理属性，认为生理爱欲和善变是人性的基本构成因素，因而正常的人类不仅具有道德理性，更拥有动物的兽性和本能冲动。而现代社会应该尊重这种善恶相掺杂的人性，同时也就是尊重了普通现代人的人权，这也是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明显优于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

这个层面来说，柏杨的人性观充满了反封建的积极色彩。

除了重视自然人性的重要作用之外，柏杨也从爱情婚姻层面体现出他对女性尊严和男性尊严的感性品质的一种独特理解，表现了他对人性尊严更深的思考。他在《玉雕集》、《红袖集》、《牵肠集》、《大男人沙文主义》等杂文集中，谈论的是现代女性和婚姻恋爱；而长篇小说《莎罗冷》、《旷野》，以及短篇小说集《秘密》、《挣扎》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属于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言情小说，表现和探讨的亦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姑苏响鞋》、《温柔乡》和《长发披面》三部史传作品均以后宫妃子为主角，讨论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皇帝与她们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可以看出，对婚姻恋爱之类情感问题的关注，构成了柏杨大部分作品的主题，而具有自然人性的人物形象则是柏杨在作品中极力塑造的主人公，他的人性尊严观念自然也渗透到情感世界中，使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也成为他表达人性观念的一个载体，带有独特的柏杨式特点。

对于爱情的认识，柏杨的理论根基不是中国传统的孔孟儒家学说，而是西方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理论。他在《西洋文明》一篇中明确提出："历史上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性感'来的，此公一箭中的，使得旧社会阵营大乱，盖从性心理学上研究，人类文明的进化，全靠着性的推动，每一个男孩子在潜意识上都有杀父娶母的念头。最高的艺术境界，如舞蹈、绘画、音乐，无一不是性的升华。于是，对别的影响如何，我们不知道，对女人爱美的影响，确实是大而且巨，如果让现代人再去雕刻维纳斯和雅典娜两位女神的裸体像，准雕得腰细如蜂，乳耸如弓。从前人被'无知'和'性的崇拜'二者蒙住眼睛，对女人鬼鬼祟祟，隐隐藏藏，不如今天大家敢于和乐于面对现实。"①也就是说，爱情是人类性冲动的产物，这与他的自然人性观念相一致，同样具有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反驳的也是封建传统文化的爱情婚姻观念。

需要注意的是，在柏杨的爱情婚姻描写中，他对女性人物的塑造和女性情感世界的描绘，占据了男女婚恋世界的最显著位置，女性成为支撑柏杨婚恋观的最重要支柱，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柏杨作品为何对女性着墨最多。当然，柏杨对女性婚恋的关注，并非仅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和市民阶层中占据着半边天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她们在婚恋情感世界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自有其文学史的传统使然。且不论言情小说和其他现代小说中塑造女性和其情感世界的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就以散文为例来说，在散文中谈论女人也是颇为常见的主题，很多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曾经涉猎过此话题。在《谈女人》中，张爱玲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8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6页。

谈论的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某些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彼此相异的举止，她还幽默地说："'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神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奶，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①]而梁实秋散文集《雅舍小品》中的散文《女人》和《男人》，专门谈论女人善意的谎言与善变、善哭和胆小等特点，以及男人的脏、懒和自私的本性。就是与柏杨几乎同时代的杂文家李敖也在杂文中探讨过女人话题。虽然他们对女性问题并没有太多和深入的探讨，不过却使关注女性命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而柏杨自觉不自觉地继承和延续、发展了这个传统，他用百多篇的杂文篇幅来大规模地、细致地谈论女性外表、内心精神和情感世界。

柏杨愿意把笔触放在女性身上，还在于他延续了五四文学运动中关注妇女命运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也是柏杨所接续的《自由中国》所包含的五四精神对他产生的影响。具体来说，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关注妇女解放和爱情婚姻自由当做反封建、反对旧礼教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胡适的话剧《终身大事》首开话剧倡导恋爱婚姻自由之风，其反对媒妁之言而宣传男女平权和恋爱婚姻自由，乃至因抗拒父母之命而私奔的内容曾经轰动一时，惹怒了很多封建卫道士，同时使关注妇女解放和男女婚恋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理念中，同样包括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五四命题。鲁迅曾经对现代女性的命运进行过严肃思考，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他指出了经济独立，而不是婚姻爱情对女性获得自由独立的关键意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②]鲁迅还在他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中提出了对爱情的独特见解："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③]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不是被封建礼教压迫不能结合的痛苦，而是

---

①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1939—1942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② 陈漱渝、肖振鸣主编：《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418、422页。

两人结合之后爱情反而消退的悲剧，经济上的贫困则加剧了两人爱情消退的速度。作为对柏杨创作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五四作家，鲁迅对爱情和经济的重要性的强调无疑影响到了柏杨，虽然柏杨只谈到鲁迅小说的风格形式对他的小说的影响，但实际上柏杨在很多小说和杂文中明确宣扬的"爱情需要培养"、"贫穷是致命伤"的观点，不能说没有受到《伤逝》的爱情观的影响。恩格斯曾经把妇女解放当做社会进步的一个尺度，而柏杨也把女性获得人权和人性尊严看做是社会进步的尺度，因此，在柏杨作品的爱情婚恋的情感世界中，现代女性的婚姻恋爱成为最重要的部分，体现出作者对人性尊严的追求的建构。

总而言之，在柏杨的小说、杂文等作品中，柏杨把现代人的婚姻恋爱情感情问题当做人性尊严建构中的一个重要感性内容。他不仅花费了大量篇章来进行专门讨论，而且他并非只是从社会表层现象罗列出男女婚恋现象，而是以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为宗旨，宣扬妇女解放、批判和剖析传统"酱缸文化"流毒对现代人人性的扭曲，以及对感情层面和自然人性的压抑，以达到张扬自然人性、深化人性尊严的感性品质，达至建设自由平等之现代社会的目的。这既是柏杨构建市民社会理念之现代性的重要一环，也是其思想进入人性问题更深广领域的新起点。从早期对平等人权"问题"的关注，到其对人性尊严自身内容的建构，再到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柏杨形成了特殊的关于女性话语建构的发展逻辑。下文也将沿着这一内在的逻辑对此一思想体系做具体的阐发。

第二节　爱情婚姻与人性尊严观念

小说是柏杨从事文学创作后最早涉猎的一个领域。他在50年代初以迎合国民党宣传的"反共文学"进行小说创作而登上台湾文坛，短篇小说《人民》、《新彼得》、《红灯笼》、《一九八八》等和长篇小说《蝗虫东南飞》均是这类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但是艺术性比较欠缺的作品。真正能够体现出柏杨小说独特个性的一类作品，则是他以本名郭衣洞，在50年代中期至1968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挣扎》、《凶手》、《秘密》，以及长篇小说《旷野》和《莎罗冷》（一说为中篇）。同时，这些小说的浪漫言情内容及其艺术技巧上的特点，不但使我们清楚看到台湾文学在五六十年代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吸取和借鉴，而且可以看到柏杨对鲁迅等五四先驱的小说艺术成就的继承与借鉴，以及柏杨世俗性现

代情怀中“自然人性”观念最初形成的感情根源——当时离婚、结婚的爱情婚姻变故对作者情感上的深刻触动，导致柏杨把爱情放到复杂的人性层面，而非社会伦理学层面上进行思考。

雷锐在《柏杨评传》中认为，从个人感情的角度来说，柏杨50年代与前妻齐永培的婚变，对他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方向均发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的人，他更加感到生活的复杂、人性的复杂、爱情的复杂。如果说离开自己曾一度爱过、共同生活过的女性，是因为性格不合最后彼此理解，那离开自己的孩子，两个无辜的孩子，原因又在哪里呢？局外人是不能理解当事人的苦衷的。郭衣洞眼中含着泪，心头滴着血。午夜醒来，总觉得黑暗中闪动着在他离家时孩子们那两双惊惶不解的眼睛。为什么自己要迈出这一步？为什么两个人起初要走到一起，最后又要分开？为什么新的爱情力量这样强大？……这些问题伴着一幅幅刺人心肺的图画录入了郭衣洞的脑海，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既积累了素材，更孕育了新的深度。……而对郭衣洞来说，这次婚变反映出他性格中对情的极度珍重，反映了他身上艺术气质、浪漫气质大于政治气质、世俗气质的特点。人的一生中要经受多种感情的温煦和锤炼——亲情、爱情、友情、人情、敌情……可以说凡是有人际关系之处就有情。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汇集点。因此，怎能不感到情的力量和影响呢？不过，有的人受情制约得重，有的人受制约得轻而已。郭衣洞幼年时缺乏亲情的岁月，使他成人后对情格外重视，而对情中之最——爱情——就更加珍重了。为了爱情，他可以舍去自己生命中的其他部分。后来，他这样表达自己对爱情的看法：‘我认为爱情是至高无上而神圣的，在人生中居第一重要地位……1959年我为了爱情，宁可离开‘救国团’那个万人称羡的职位，宁愿自陷为贫贱而受千万人指责。’”①

因而可以说，正是感情上的变故，以及对崇高爱情的向往，成为驱使柏杨通过小说作品来探讨爱情婚姻的情感动力。

从文学资源来说，此阶段正是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大规模涌入台湾的时候。1956年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大量发表现代派小说并译介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小说流派及其艺术技巧，这成为台湾现代派文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此时也是柏杨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阶段，正是他广泛阅读和全面接受西方小说著作，尤其是欧美浪漫派小说的时期。这些小说从内容思想、人物形象到艺术技巧，均给予他巨大的熏陶和启发，“他大量阅读外国

---

① 雷锐主编：《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76—77页。

名著,从《简·爱》、《呼啸山庄》、《飘》等长篇小说中,郭衣洞深深感到爱与恨的巨大力量。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几个人的生命;由爱转化而来的恨力量更大,它简直可以摧毁一切。可贵的是,这些小说都是通过活生生的人和他们之间的纠葛表现出来的。有时看到入迷处,郭衣洞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不睡觉,不知疲倦不知饥饿地读下去。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使郭衣洞对小说的迷恋达到了顶点。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众多的人物组成的线索交叉,最后令人心满意足的恩仇俱报的结局,都让郭衣洞尝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他常常将小说放在挂包里,到学校上课后回家上公车站的时候边走边看。到了公车站等车时看,上了车也看,有两次,居然车过了站也不觉得,待车掌小姐吆喝了才醒悟,下车回头再换车。郭衣洞就这样如痴如醉地吮吸着中外名著的营养。他觉得自己的胳膊仿佛在变粗,肌肉也膨胀起来,铺纸写作时,笔尖仿佛有人牵着往前走。"①柏杨创作《莎罗冷》等诸多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其中对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和男女三角、多角关系的详细描写,显然就是对英美浪漫派的借鉴、学习和模仿。

施咸荣在《西方杂草》中对柏杨的艺术源头"哥特派"小说情感基调进行分析时说:"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曾流行一种以恐怖、惊险为特点的爱情小说,文学史家称它为'哥特派罗曼司'(gothic romance)。它流行的时间虽短,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的一些大作家如司各特、狄更斯以及勃朗蒂姐妹,都受过它的影响,而现代的通俗小说如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罗曼司等等,所受的影响则更大。美国的严肃作家,从库柏、爱伦·坡到整个南方文学,无不带着哥特派小说的烙印。哥特派小说有它自己的模式,如渲染恐怖的气氛(鬼怪或鬼怪似的恶棍的出现),设置神秘的环境(古堡、古寺院、荒芜的古宅等等),描写老一套的情节(神秘的遗产继承问题、失踪的遗嘱、家族的隐私、主人公的身世不明,甚至写通奸、乱伦、凶杀等罪恶行为给家族带来的诅咒),这类模式在现代的恐怖小说里间或也有所表现,但大部分都经过花样翻新,多少结合了一些时代精神。"②柏杨的《莎罗冷》就是一部哥特派小说气息最为明显和浓重的作品:充满浓厚欧洲异域色调、神秘冷艳的莎罗冷海湾,高大险峻的山岭、幽深莫测的大海、闹鬼的宏大庄园等外部环境景物描写,以及四十年前的谋杀案,纠缠不清的三角恋爱,等等。因此它被一些人认为是深受《呼啸山庄》

① 雷锐主编:《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79页。
② 施咸荣主编:《西风杂草》,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

和《蝴蝶梦》的影响[1]。不过这并非是说柏杨缺乏进行小说创作的才华，恰恰相反，柏杨模仿的是英美浪漫派小说的浪漫神秘情调，而故事内核则是自己独创的，包含着他对人性和爱情的看法。《莎罗冷》"其主要特征是作者不再拘泥于生活的写实（因为这是作者生活有限带来的一项影响创作的弱点），而是将对世界名著的学习心得融入自己最喜欢又最擅长的爱情故事的编造，发挥了自己个性中感受气氛、营造气氛的敏感长处，在小说中写出了诗的初步意境。由此产生出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使读者可以对其中的破绽予以宽容和忽略"[2]。从这个角度来说，《莎罗冷》是柏杨小说中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从今天的艺术水准来看依然具有魅力。而柏杨在此阶段创作的其他短篇小说和《旷野》等长篇小说如同《莎罗冷》一样，也深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伤感、神秘情调，而且爱情婚姻的结局大部分同样是催人泪下的悲剧结局。

柏杨小说的另一个文学资源则来自于鲁迅的小说。柏杨承认，"鲁迅的小说有一种特质，看了之后不舒服，小说情节可能很简单，但是它给你带来问题，假定你稍微有使命感的话，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这些问题你没办法解决。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的每篇小说都提出问题"。柏杨希望自己的小说同鲁迅的小说一样，是一种提出问题的"问题小说"，而柏杨对于小说"问题"意识的重视增加其小说情感表达上的深沉与厚重感。也确实如此，无论是哪部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柏杨均并非是为了浪漫而浪漫。即使浪漫色彩如此浓重的《莎罗冷》，在表现宿命观点的同时，也以对人性和现代人情感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的探索与思考为己任。以杀人凶手葛医生为例来说，作者既突出他为了得到旧日恋人美棋的爱情，不惜设计海难谋害其夫，却又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生性凶残的坏人，而是挖掘出他身上具有的人性的光辉——他用四十年行医救人的行动来赎罪，每天都生活在忏悔之中。这种思考体现了柏杨对于人性与情感思考的理性特征。

第三节　自然人性问题

柏杨的文学创作以感情为必然的基点，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对复杂爱情问题和对善恶掺杂的自然人性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这也同时使柏杨

① 雷锐主编：《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115页。
② 同上书，第117页。

的这些小说成为专门探讨人性和婚恋的问题小说，标志着其对人权问题、人性尊严问题的思考更体现出具体性、感性的特征。可以这样说，对善恶掺杂的人性和复杂爱情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柏杨小说表现的一个中心，由此使柏杨的这些小说成为专门探讨自然人性和婚恋问题的一类问题小说。

如果对柏杨的一系列小说按照发表时间先后排列的话，可以看出，柏杨对普通人的自然人性最初就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 1958 年出版的《凶手》的《序》中就表达过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人生，如果剔除了爱，只不过是一个会言语的禽兽。然而，爱与恨是一件物体的两面。宗教家们忘掉恨，道德家们反对恨，伪善的人们假装着不恨。事实上，没有恨便很难显示爱，恨跟爱同样的根深蒂固。爱恨交织，才是完整的生命。我们恨嫉妒，恨炫耀，恨狂妄，恨做蒙羞的事，恨只图自己的利益，恨轻易发怒，恨一直牢记别人的坏处，恨忘恩负义，恨曲解或违反真理。恨如果建筑在爱——不自私的爱上，恨就跟爱一样美。只是，谁能把握这个分际呢？悲剧就在这分际上发生。"[①]虽然情感构成的人性是柏杨大部分小说的主题内容，不过在他不同时间发表的小说中，对人性和各种情感描写的重点却有所强调和变化，体现出不同的情感问题意识和对人性尊严的不同理解。

除了童话故事《天涯故事》之外，柏杨最早出版发行的小说集是《凶手》，共计十二篇，这也是柏杨最早集中探讨现代人情感的第一部小说集。除了《一束花》讲述的是亲情之外，其他十一篇小说均涉及各种类型的爱情，既有忠贞不渝、为情而死的纯情真爱，也有欺骗玩弄、自私无情的假意，以及无法压抑的性爱欲望，可以说这是一部探讨爱情婚姻和自然欲望问题的小说集。

《夜掠》是最能够表现出柏杨自然人性观念的一部作品。在当时复古思潮盛行、推崇"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的社会背景下，作者却逆流而上，塑造出一个被社会和自身角色压抑住爱欲本能的女性形象，把女性的自然爱欲议题提到问题层面。柏杨自己这样评价这部小说："至于说以小说表达我对女性及爱情的观点，我有一篇小说，全篇没有一句对话，描写一个苦闷的女人去寻找野男人（按：《夜掠》），我不晓得你们什么感觉，但我碰到很多女士跟我讲，你写这个简直狗屁嘛，你根本就不了解女人！唉！'女人'这两个字，人类的一半耶！不要说我不了解女人，谁了解女人？我是男人我都不了解男人！不过讲那个话的都是学院派，不食人间烟火，人生多态，有些女人想男人却不敢有行动，但我想有的女人会有行动的，我赞扬突破、赞扬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4 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387 页。

勇敢、赞扬发挥人性的任何挣扎!”①

《夜掠》的文学史价值正在于写出了人性中无法压抑的性欲挣扎。小说一开头就充满了惊悚悬念,一个事业成功而年华渐逝的老姑娘在半夜打扮一新,独自一人到荒凉的野外河堤去,原因在于“她有她的重要任务,这任务也可以说是一个企图满足的愿望。她必须克服任何恐怖,假使不能克服,她只有仍缩回到她那寂寞老巢的一途”②。而且她一边沿河堤慢行,一面在搜寻她的“猎物”,这个女人的行动越发诡秘,作品颇有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的味道,由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英美浪漫派小说对柏杨的深刻影响。小说直到结尾才轻轻点出她的真正目的是来寻找会强暴她的男人:“就是前天晚上,就在那个堤岸上,侄女遭受到两个男人的强暴。而她,而她,现在,所有奇异的幻想全离她而去,无情的离她而去了。”③小说以这个女人的行为举动和心理变化贯穿故事始终,尤其是对她微妙的情绪变化描绘得极其生动传神,包括情绪的几度起伏:从对镜细细梳妆打扮成少女时的冷静,到踏上“这正是她侄女昨天告诉她的那个地方”时的激动心跳,到慢慢平静下来压住恐惧感,当误认为一棵榕树是一个男人时的激动欣喜,以及辨明真相时的失望沮丧。尤其是当面对一个盯着她看的男人时“脑海里像滚水一样的沸腾”情绪,然后是在被这个醉酒男人喷了一脸没有消化的秽物后仍旧充满期待的心理,还有她看他吐完之后离开的失望和羞恼的心情。这些细节均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个性苦闷的女性形象,这又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们,特别是施蛰存的《春阳》等专写女性性压抑和性苦闷的一些小说来。很明显,《夜掠》带有浓厚的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的影响,表明柏杨已经把性欲当成是爱情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传统观念,这也是柏杨把现代性加以世俗化之后在小说上的一个呈现。

短篇小说《凶手》在探讨人性的复杂和情爱的多变上堪为典型。在此部小说中,作者提出了恨对人生的破坏,以及情感对人的杀伤力问题。小说基本上用的是写实手法,借一个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个被失恋折磨的男人对另一个炫耀自己正陷入甜蜜爱情的男人的嫉妒之心:“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合眼,翻来覆去,一股愤怒的火苗在心头吐出烈焰,我恨不得跳起来搏斗——我不知道应该和谁搏斗,但我知道我快要爆炸,一种难堪的窒息塞住

① 李瑞腾主编:《情爱挣扎——柏杨小说论析》,台湾汉光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4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43页。
③ 同上书,第550页。

我的咽喉。我明白了,我明白我是在嫉妒。第一次发现我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新式小说中的男主角,我只是一个满怀诡诈的凡夫俗子,不能对自己的不幸无动于衷,也不能忍受别人获得我梦寐都求不到手的幸福。"[①]因此他采取的行动不是报复抛弃他另攀高枝的恋人,而是对另一个无辜男人进行疯狂的打击报复,只因为后者比他更幸福快乐。人性中的丑恶使他伪造了一封绝交信,这固然导致了那个无辜男人跳楼自杀,不过柏杨并非仅想把这部小说写成一个探讨由"嫉妒"产生仇恨的说教性的寓言故事,而是还隐藏着另一个故事——一个女人"阔易夫"的爱情悲剧。柏杨已经认识到"写小说就很难,要构想、要布局,尤其是你的企图心很强的话,你希望在一个完整的故事里表达完整的理念,就得非常用心去思考"。[②] 柏杨在《凶手》的艺术构思上颇费心思,使其罗曼司的韵味不是产生于语言和外部环境描写,而是源于情节结构的突转变化:柏杨所谓的"凶手"其实另有所指,这个心怀嫉妒的男人所有意伪造的绝交信,其实只是使他要报复的那个男人的死亡早降临两天而已,因为后者的未婚妻早就做好了抛弃半身不遂和穷困潦倒的未婚夫的准备,只是拖延到了她认为合适的时间才告诉蒙在鼓里的未婚夫。正是她的变心才是后者死亡的真正凶手。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明明是这个女人学业已成,早就找好了新恋人,有预谋地要抛弃可怜的原未婚夫,她虽然知道已经迈入中年、身体病残且丧失工作的未婚夫,失去她和她的爱情之后会一无所有,但是却以配不上他的理由作为借口离开他。她在信中假惺惺地写道:"将近十年的岁月,我、我的母亲、弟弟,完全依靠着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这种海样深的纯洁恩情,我们没齿不忘,变犬马也无法报答于万一。好容易,现在,在你的栽培下,我的学业总算告一段落,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纠缠着你,我知道是我离开你的时候了。恕我没有跪到你床前叩辞,我怕我见了你那慈爱的面庞,会硬不起心肠。我走了,文生,只有我走,你才会快乐。你才会去找一个更美丽更温柔的妻子。啊,文生,我不配作你的终身伴侣,在你那伟大的人格和无边的爱心之下,我是如何的渺小,我如果不离开你,你会因为怜悯我而和我结婚,你的牺牲就更大了。我常常责备自己,不能这样自私。别了,当我这信到你那里时,我们全家,还有那比你差一百倍的我的未婚夫,已踏上去美国的班机,你不要再找我了。"[③]作者揭开了这个女人的虚伪和狠心,同时也揭示出爱情并非永恒,而是复杂易变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4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70页。

② 李瑞腾主编:《情爱挣扎——柏杨小说论析》,台湾汉光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4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79页。

的。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环境等外部背景发生改变，尤其是当个人的生活、工作条件得到改善之后，爱情也容易随之变化。《等待》中易变的爱情主题与《凶手》相似，《西吉屿》、《大青石》、《约会》和《跟踪者》则讲述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婚姻。但是天妒其真情，这些作品文本中有情人的命运都很悲惨，都以死亡或者生离为结局。可以说，柏杨的这部小说集也奠定了柏杨小说的基本特色：罗曼司小说的模式，倾向浪漫主义的风格，爱情和人性的主题。

1961年出版的《旷野》堪称是全面讨论爱情与人性命运问题的一部长篇小说，既带有柏杨一贯的浪漫主义色彩，擅长营造各种情绪氛围，也重视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把恋爱的美好浪漫情感，以及失恋的痛苦不堪甚至是发疯心理都细致描画下来，利用长篇小说的优势充分表达出作者对爱情和人性的多方位、多层次的理解。柏杨在《序》中说："不知道是谁说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而只是男人生命的一部。'我想这种说法似乎应该修正，爱情并不是所有女人生命的全部，恰恰相反的，反而是所有男人生命的全部。一个女人没有爱情，她不过毁灭了或糟蹋了自己；一个男人没有爱情，他除了毁灭糟蹋自己外，可能还毁灭了或糟蹋了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试研究一下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混世魔王，他们几乎全没有爱情，或是爱情发生困扰。也有些人说，母爱不能代替，这句话我们承认，亲情在本质上有其崇高的情愫。但在万般无奈中，母爱仍是可以勉强代替的，那就是上帝。……天地间真正不能代替的，恐怕只有爱情。金钱、权势、地位、荣誉，可以用之去满足任何一方面，但不能填补心灵的空虚。爱情不能用任何东西代替，犹如生命不能用任何东西代替一样。"①可以说，这是柏杨爱情观和人性观集大成的一部小说，柏杨的人性观基本上在这部小说中完全表露出来。

《旷野》最重要的爱情主线是李士淳、岳政芬、周世信的三角恋，同时还有五六条爱情辅线同时出现。其中包括周世信与李悦华以及李悦华、张泉青之间的恋爱，贫穷的中年教师陆元康与美貌的歌女白蓉之间的悲剧爱情，海大的女大学生赵美华的曲折坎坷的恋爱经历，钱文达对女大学生丁秀云的苦恋，丁秀云与其他男人的感情游戏，甚至包括寺院主持与赵老太太年轻时的恋爱纠葛等。这部小说中的爱情具有无上的魔力，对人生的意义正像上文所引的柏杨《序》中所说的，犹如生命一样重要，无法代替。因此至少有两个男人为爱情而发疯，最先受失恋打击而发疯的是李士淳，因为他深爱的岳政芬不再爱他而爱上了周世信，他尽管发疯了却无法忘记她，即使是在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3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7页。

精神分裂的世界里。而当政芬协助医生共同治疗士淳的疯病，后者也逐渐在复归的爱情的滋润下奇迹般地恢复正常。这可以说是出于作者柏杨浪漫主义的想象，不过柏杨并非是凭空虚构出士淳的发病和康复，而是用了一系列的细节描写，包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些病理学知识来烘托支撑，显得又非常真实可信。装菌子一节是士淳疯病发作以及政芬配合医生对他进行治疗的一个典型范例。作者详细描述了发病和精神治疗的过程，当士淳发病走上假山以为自己是一个菌子的时候，“既然是一个菌子，菌子就有菌子的特征，无边无涯的汗珠穿过浓眉流到眼眶里，再流到脖子和身上，他都不肯去擦，世界上从没有那个菌子会自己擦汗的；一只苍蝇大概被他那久不沐浴的体臭所吸引，发着嗡嗡的声音飞过来。恶作剧似的直落到士淳的鼻子上，他没有动，世界上从没有听说过菌子会赶苍蝇的”①。心理医生林大夫也装作菌子与他一起蹲着，然后是政芬假装仙女给他们送来牛奶面包，诱使他们吃掉这些食物，“就在林大夫和政芬像演出一幕庄严的闹剧，使士淳真正的从神经失常以来第一次的随着自己的意思做出正常的举动，他终于安静地睡了，没有用绳索也没有用栏杆”②，这是士淳疯病好转的关键一步，因此柏杨详细描写出种种细节。而当士淳在与政芬的婚礼上，目睹了妹妹被毒蛇咬死，新娘被咬昏的情景，刺激得士淳的疯病再度发作，这次是通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你的眼睛为什么要生到眉毛上头？”和“妈，你也是四只眼睛，我恐怕不行了，你听见青蛙叫的声音吗？就是弓泊公园的那一只，我和它有算不清的旧账。”③这些描写，尤其是与“青蛙的旧账”一语可以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疯子对“赵家的狗”的感觉相媲美，均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量。而钱文达的发疯情景可说是对士淳最初失恋发疯的一个补充和映照，也是柏杨为了防止重复描写而有意设计的，因此士淳在小说开头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疯子，而钱文达在小说结尾的时候，深受被丁秀云无情抛弃的刺激，出现了幻觉和幻听之后才变疯。

更意味深长的是，《旷野》中因为失恋发疯的李士淳和钱文达均是男性，而那些失恋过的女子虽然也饱经痛苦，她们的悲伤痛苦却被新的爱情或者是时间所治愈。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何政芬最终放弃了彻底疯狂无法痊愈的士淳，而去美国远嫁给自己不喜欢的表哥了。柏杨有意把男性情感世界与女性的相比较，意在说明，人性的复杂除了善、恶交织之外，男性与女性的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3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82页。

② 同上书，第297页。

③ 同上书，第452页。

人性也有所不同，女性在柔弱的外表之下，还掩藏着女性特有的人性特点，女人成为一个永远也讨论不完的文学话题，这也是柏杨在杂文中继续讨论女性的一个原因。而且，《旷野》中的各种女性形象，成为柏杨杂文塑造各类现代女性的基础，从早期杂文《玉雕集》、《红袖集》中美丽的现代女性，到《活该他喝酪浆》中把男性玩于股掌中的"强哉骄"女性形象，以及《大男人沙文主义》中追求性爱欲解放、只同居而不结婚的性爱自由的时髦女性，均可以从《旷野》中找到雏形。

对于人性的理解，柏杨借书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振纲之口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是人，人便有人性，我们不能在爱的时候希望对方有一种失了我便非死不可的情谊，而在不爱的时候却希望对方毫不在乎。"[①]也就是说，正常的人性驱使恋爱中的人们做出各种举动，李士淳和钱文达的发疯，是"爱而不可得"的悲愤情绪压倒理智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失常，表现出人性脆弱的一面。而周世信在被李美华抛弃之后买毒蛇对她进行报复，因爱生恨，也是一种正常人性的表现方式。丁秀云利用色相榨取男人们的爱情和财富，看到他们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再无情抛弃，是另一种真实人性的表露。柏杨对这些人物的性格和举动没有用好、坏的道德伦理进行判断和下结论，原因在于："因之我对《旷野》里每一个人物，都充满了同情，一般人看来再坏的人，都试探着去探讨他的内心。爱恋使人昏迷，失恋使人疯狂。上苍赐给人类这种本能，教年轻的朋友如何有能力寻觅一个众皆赞美的道路？实际上，《旷野》里的人物和社会上真实的人物一样，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每个人都有他不能被原谅的错误，但也都有他的光明面。魔鬼和天使同时并存在人们心窝，有时魔鬼战胜，有时天使战胜。君子小人之分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有时是君子，有时是小人。"[②]因此，普通人性是人的动物本性和神性的掺杂，是魔鬼与天使、小人与君子的混合物，而人性的善变造成了爱情更加多变复杂，这种人性观念成为柏杨作品的核心观点，并且一直延续到杂文、报告文学、史传作品等其他类型的作品中。

正是经过了小说阶段对人性和现代情感的思考，柏杨在杂文中才能够展开对同一问题的更详尽的讨论，《玉雕集》、《堡垒集》、《红袖集》、《牵肠集》等专门探讨男女婚恋问题的杂文集，其实是延续了柏杨小说对人性、感情世界的探讨，甚至是对其进一步的和拓展，亦标志着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中对人性因素的构建日渐成熟和完善。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3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06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第四章　独立自由与妇女解放

如果说柏杨小说对现代情感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主要以一种隐喻方式进行了思考，表现得尚不明晰、系统的话，那么杂文对人性尊严问题所涉及内容的思考则更加明晰、深入和系统，不仅在内容建构上涉及人性与爱情等主题，还更多关涉人性尊严与自由等问题。换言之，柏杨杂文中关于人性尊严的话语系统在思想境界上更为博大，也更为精深了。

虽然柏杨用小说来探讨人性和现代人的情感问题，并且给读者提出了"爱情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把言情小说变成了专门探索情感世界的问题小说，却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即使是他希望能够对此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曾经试图分析过长篇小说《旷野》中的爱情："但《旷野》想探讨的是'爱情到底是什么？'似乎可以使人想到这么一个答案：'形式造成爱情'，'爱情建筑在形式上'，当月换星移的时候，爱情也会跟着换移，所以相爱的人应不断的去培植和去巩固去防卫他们的爱。我不敢说这是一种发现，而只是大胆地提出这个假定。从前元好问曾有《迈陂塘》一词，他遇到一个猎人，手提两只死雁，告诉元氏说：'近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他乃买下来，葬于汾水之上，并作词吟咏，开头两句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两句话有无限的感叹，也同时指出爱情的深奥和不可解释，没有人能了解透彻。所以我深刻的知道，《旷野》所提出的一点意见，实在渺小。"①

由此可知，柏杨认识到了分析爱情的难度，当然这也是因为小说具有隐喻性等多种美学阐释性的特点所致。而杂文显然不同。杂文可以直接进行议论说理，明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可以对情感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对柏杨而言，他在小说中提出的诸多问题，可以在他几乎同一时间发表的杂文中找到相关的答案。这并非是推测，他最早在《自立晚报》设"倚梦闲话"专栏专写杂文，也就是后来汇编成册的《玉雕集》、《怪马集》、《红袖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3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9页。

集》、《堡垒集》等60年代杂文集子中，主要内容是谈论女性外貌之美以及男女婚姻恋爱，而此时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集《凶手》、《秘密》、《挣扎》中的大部分篇章，以及长篇小说《旷野》和《莎罗冷》，已经早于杂文或者与其同时出版，自然会影响到柏杨杂文的写作内容和关注中心。

以《堡垒集》为例来说，雷锐认为："《堡垒集》收入杂文50多篇，中心内容是谈爱情，写作的日期仍是1960—1962年，但估计大部分是写小说《旷野》时的心得、感受、见解，因为《旷野》中所反映的问题，差不多都可以在《堡垒集》中得到回答，诸如：爱情到底是什么，爱情中的年龄问题、理智问题、变易问题、增减问题、贞节问题、金钱问题，顺便谈及眷属宿舍（相当于军人集体宿舍）的妇女长舌问题、节育问题。"[①]由此可知，柏杨在杂文中谈论女性和爱情婚姻并非是无的放矢，写作目的除了谋生赚钱以求温饱和逃避国民党监察机构的文字检查之外，他更想借风花雪月的话题来直接探讨女性解放问题，以及生存于其中的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状况，用杂文来补充小说中无法直接回答的诸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的世俗现代性思想中的自然人性观和人性尊严观在小说时期形成，但是是在讨论女性外貌与婚恋问题的前后期杂文中得到最明确和充分的表达。

第一节　建构现代女性形象

在文学作品中对服饰进行描写，有一个悠久的文学史脉络可寻，并非是柏杨个人的突发奇想。从诗歌史的发展脉络来说，服饰描写曾经在中国的诗歌中占据一席之地。最著名的诗歌当推汉乐府《陌上桑》，该诗歌不是通过罗敷的容貌和身段，而是通过她的穿着打扮来衬托其外貌美丽，其中的诗句"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也成为描绘女性美丽形象的典型诗句。如果说《陌上桑》把女性服饰当做女性外貌美和心灵美的一个标准，那么张爱玲的《更衣记》则从女人的服饰看到了更多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含义。她写道："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下，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

① 雷锐主编：《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118页。

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①

虽然张爱玲对服饰的描述具有很强的史料性价值，不过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看到了服饰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关系，认识到漫长的中国历史是男权的历史，女人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自由打扮自己的服装权，服装的变迁其实与女性地位的变化和提高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把服装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认识到它折射出社会变迁与风俗人情的变化，也由此开辟了在散文中谈论女性衣饰的风气，使现代文学史中的小品散文，除了周作人、林语堂等"闲话风"类的小品文，谈论品评饮食、饮茶和幽默情调的内容之外，还增添了讨论服饰的主题。

柏杨写于60年代谈论女性服饰打扮的早期散文，除了继承张爱玲等作家对服饰进行社会学、历史学的考察之外，还在其中加上议论和感想，把闲适的小品文变成了针砭时事的杂文。进而言之，他对女性服饰的描写相应地也成为其杂文独具的一个特色。具体到《玉雕集》来说，作为柏杨第一部谈论女性外貌服饰之美的杂文集，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柏杨对女性服饰的仔细描绘，并非是想勾勒出台湾五六十年代的女性服饰历史，而把重点放在塑造现代女性的形象，进而建构起现代女性市民的主体性。因此柏杨把衣服与其他女性饰品，包括项链、耳环、皮包等，当做女性容貌的一部分，连同女性的外貌五官、化妆和身材曲线，均从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品头论足达到极致，但是又毫无轻薄之意，而是满含指点之情。因为他是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理论和两性差异的生理学为理论基础，从艺术美的视角来品评女性的外貌和衣着打扮，是用美学的而非色情的眼光来审视女性。其次，虽然《玉雕集》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现代城市女性，不过他却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把笔触延伸到中外古今，深刻挖掘女性美丽外貌和服饰的历史文化渊源，由此在中国古典传统审美观、西方审美观和当时台湾社会流行的现代审美观的框架中来加以比较分析。从而使读者能够通过女性的衣饰打扮和容貌标准的变化，看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和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审美观的变迁，由此具有社会学和美学上的某种价值。再次，这也是最重要的，柏杨从中看到了女性衣饰外貌变迁对女性解放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在探讨女性外貌打扮的字里行间，加上了追求男女平权、女性独立自主、女性人性尊严等思想，反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封建道德观念对女

---

①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性的压迫和戕害，尽到了杂文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责任。借此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中的人权和人性尊严等思想观念。

柏杨在该部杂文集的首篇《天生尤物》一文中指出："爱美似乎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质之一，而以女人为尤甚，连我们这个讲道德说仁义的国度，从前口头上硬是不敢谈女人，不敢谈美，现在也败下阵来，大谈女人，大谈美了矣。"并且，作为天生尤物的"漂亮女人可以把男人的魂都勾走"①，他分析出"美"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人类的普遍性心理——爱好美色，男人对女人的爱情源于此，而女性对异性的好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前已言之，柏杨的依据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这奠定了柏杨杂文的一个基调：以美学的标准来衡量女性容貌，包括穿衣打扮，建立女性之美的标准。当然这并非是随便闲谈，目的实则为建立起现代女性的主体形象，以及女性的人性尊严和与男性平起平坐、同工同酬的权利。因此就可以理解，柏杨在此篇杂文中谈论女性衣饰、外貌打扮等问题，首先选择从女人的高跟鞋谈起，其实是颇具深意。一方面是为了抨击中国传统蔓延上千年的封建陋习——女人缠小脚的社会现象，这是"酱缸文化"对女性戕害的一个表现，以便达到移风易俗、使中国文化得以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以小见大，深挖中国封建传统伦理观念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压迫和戕害。女人把脚缠成"三寸金莲"式的小脚，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审美观念，而这种畸形审美观曾经给女性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中国女人缠足之术，不太高雅，从五六岁缠起，受尽各式各样的酷刑和痛苦，才能达到'美'的境界，（现在看起来美不美，那是另一回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美的标准，说不定后人看我们现在的高跟鞋亦颇可笑，甚至还十分恶心也。）未免本钱下得太大，而且往往缠成粽子脚，成了四不像，与原意相违，那就更惨。然而主要的缺点还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永远奇臭，便是洒上十桶八桶巴黎香水，都不能使它香喷喷和喷喷香。"②

柏杨透过女人缠小脚的社会现象，看到它不仅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损坏，不利于行走和致使她们身体孱弱，更看到其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女人缠小脚其实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亦是封建社会要求女性必须遵守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更可怕的是，缠小脚的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行为虽然刚开始带有强迫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缠小脚的观念却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潜意识，也就是认为女人只有把脚缠成“三寸金莲”式的畸形小脚才符合审美标准。这种中国女人应该缠小脚、以畸形小脚为美的传统文化观念意识，才是柏杨要批判的标的。同时，柏杨以此来顺带讽刺那些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国人：“盖谈到女人的脚，中国女人可以说倒了天下之大霉，中国人最喜欢吹五千年传统文化，跟一个破落户爱吹他八代老祖宗当过宰相一样，谁听过破落户吹他八代老祖宗有羊癫风乎。是以对于女人缠小脚一事，中国人吹五千年传统文化时，从不去碰，偶尔一碰，也汗流浃背，恼羞成怒。”①

柏杨提倡推崇的是中国女人的天足，以及西方女性所穿的高跟鞋。目的不仅是为了外在形体美，因为穿上高跟鞋之后的女人身材婀娜多姿，视觉上能够改变身体比例而增加美感，能够汇入世界审美的潮流。更是为了中国女性的身体健康，天足穿高跟鞋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提倡的是一种健康即美的现代审美观念。为此，柏杨详细列举出高跟鞋的种种优点，尤其强调高跟鞋给女性带来的性感之美，以及突出的女性性别特征，“高跟鞋的妙处是使女人的双乳猛挺，盖不猛挺不行，不猛挺则非摔筋斗不可”。高跟鞋使女性俏伶伶地抖着，并且“跟越高而那种抖也越美，也越抖得男人的心脏大鸣大放，它引起的爱情力量，连火车头都拉得动”②。由此高跟鞋产生的美感首先引起男人的性心理冲动本能，随后就引发男人对女人的爱情。从此处可以看出柏杨的爱情观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柏杨强调普通人的性爱冲动在产生爱情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动物本性是人性构成的一个基本要素，人性是理性和兽性的掺杂混合，这也是他在小说中就已经形成的自然人性观念在杂文中的一个延伸。进而言之，柏杨把女人的高跟鞋和脚看成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风气之产物，并且把中国的小脚文化和西方高跟鞋表现出的现代文化内涵相比较，以小见大，由此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与不文明，并且追寻这种落后与不文明的文化根源，这成为柏杨以女性服饰为主题的杂文集的一个独特批判视角，亦是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的一个特点。

“脚”是身体外部形象建构的一部分，“头发”亦是如此。对于女人的头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2—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发,因为"头发既是女人们在她自己身上唯一可露一手之处,自然会全力以赴"①。各种时髦发式随即应运而生,因此并没有严格统一的审美标准,不过无论女人的发型如何变化,依然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这就是以长发为最美。柏杨在《西洋文明》一文中提出这个标准:"男女间的差别是天生的,但表现在人人可一目了然上者,只有头发。女人如果没有长长的秀发,犹如一朵木头雕刻的花,理会她的人,恐怕几希。只有老光棍阿Q先生才打尼姑的主意,便是杨玉环小姐,如果剃得个秃秃青青,势也不堪入目。"女性长发美丽的奥妙也在此。不过作者并不满足于只提出一个空洞的审美标准,他的目的是利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时的社会现象,以便针砭社会现实:"于是,我就忽然想起台湾中小学堂的女学生来矣,不知道是那个缺德带冒烟的家伙,规定她们梳成现在这种样子,好像一块西瓜皮硬生生的扣到石桩上,前面齐眉,四周齐耳,而且'齐'得可怖,像用东洋刀砍过一样,使一群聪明伶俐的小娃,显得既笨且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发型,最斫丧自然的发型。假使有人在伦敦举办发型选丑,我们随便抓一个女学生去参加,准可夺标而归。"

柏杨在该篇文章中继续指出,现代女性做出各种争奇斗艳的发型,其用意不仅仅是为了外表美丽,增加个人的女性魅力,还受到更深层的心理意识——女人潜意识中的"公主情绪"——的支配。柏杨还深究出女性做头发时的微妙的性心理意识:"太太小姐做头发,大概有同一滋味,年头不同,仆佣如云的时代已成过去,作一个正正派派的女人,最安全最纯洁的刺激,也就是最性感的艺术享受,莫过于找一个男理发师抓抓头,摸摸脸,揉揉脖子。君不见那些被认定户头的理发师乎?不但在广告上登号数,还登上其英俊的照片,一则是使其户头验明正身,再一则就非常有学问啦。人生最舒服的事有三焉,'抓痒'占首位,其次是'挖耳',再次是'捏脚'。太太小姐昂然高坐,理发师用其有力而异样的男性巨手,搔来搔去,杏眼惺忪,在镜中看到该男人卖命之状,芳心无不大悦。"②在此处,柏杨略带调侃地对女性隐藏的性心理进行精辟分析,虽然这是柏杨自然人性观念和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的一个产物,不过却也说明作者对某些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观察,是何等的敏锐和深刻。而这种敏锐与深刻,成为柏杨所有杂文的一个共同特点,甚至延续到80年代的史传作品中。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嘲讽比较起来，柏杨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些野蛮现象，态度则激烈得多，甚至是对后者横眉冷对的严厉抨击和批判。具体到文本来说，他借助议论女性发型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女性祸水"和"美丽女性亡国"的传统观念直接进行驳斥："女人的发型日新月异，基本出发点不过是爱美而已，似乎和道德无关，更和国家兴亡无关。犹如一个小偷之被捕，和他的眼皮跳无关一样，如果小偷只怪眼皮跳，不怪自己偷，你说他有道理没道理耶。然而，圣崽们却对眼皮跳颇有兴趣，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把国家弄亡，不敢说他应自己负责任，反把责任往女人身上推，妲己一个人能亡一个国家乎？褒姒、杨玉环，统统皆然。夫社会风气之坏，乃由于政治风气之坏，与女人的头发何干？却有圣崽大声疾呼，认为只要把女人发型一该，社会风气便也一改矣……女人发型可以移风易俗，此高论如果成立，全世界社会学者就得集体自杀，以谢其所学。国家现在情况实在是不太好，然而凡是圣崽，皆明哲保身之辈，或被胆量所限，不敢探求问题的真正原因；或被知识所限，不敢探求问题的真正原因。无论是啥，反正怪罪到发型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①]从这段言论可以看出，柏杨在杂文中谈论女性头发装扮，如同谈论女人的高跟鞋一样，其目的不但为了建立起现代女性的外部形象，而且为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祸国殃民的女性正名翻案、争取女性应得的权利。同时他把圣崽——儒家文化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当做批判靶子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为他在《圣人集》和《死不认错集》等杂文集中批判"酱缸文化"和酱缸中的"酱缸蛆"奠定了基础。

柏杨除了评价女人的脚和头发之外，同样也评价女人的嘴巴、乳房、眼睛、颈部、大小腿等身体器官。柏杨同样以小见大，他从中看到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别，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野蛮与西洋文明的先进："西洋现代文明，不但搞垮了中国女人的脚，和中国女人的头发，也搞垮了中国女人原来对'嘴''眉''眼'，甚至对丰乳的美感观念，和美感表现。在这一方面，我们又是全盘皆输，一星点儿五千年传统文化都没有保持得住，可谓惨重。"[②]在《颤巍巍耸着》一文中，柏杨认为当下社会已经进入"丰乳时代"，丰乳象征着一个女人的性感形象，因此"一个女人有丰满的乳房，是上帝对她的特别恩典。其美何在乎，大概在于它可颤巍巍的在胸前耸着之故，真能把男人的魂都颤得出窍，都耸得出壳也。而最使男人要命之处还有二焉，一在乳腋之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间，雪白的乳边隆起如坟。一在两乳之间，乳沟下降，不知延伸到何处，女人打扮得如此这般，年轻男人只好昏昏然过日子”。在现代审美观中，除了乳房之外，嘴唇也被认为是女人身上最性感之处，所以女性把它涂抹得像吃了死孩子一样。至于眼睛则是“眼睛要大，乃美的第一要义”。所以，柏杨所称赞的完美女性，其外貌应该是眉目可以传情，无声胜有声，还要明眸皓齿，黛眉如画，鼻子漂亮，脖颈白如美玉，拥有曲线玲珑的大腿和小腿，苗条婀娜的身材，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现代美女形象。不过柏杨还强调，美丽并非都是天生的，女性还需要努力培养自己的美，尤其是内在气质上的美和智慧，需要去掉庸俗气质。因此，女人必须永远不要忘记从各方面来修饰自己，把美丽容貌和优雅气质呈现出来，这样才能够塑造出一个现代女性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山窝土豹子”型的过时的女性形象。后一种女性形象与现代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柏杨略带嘲讽地对“山窝土豹子”型女性进行生动描述：“客人来访，想见见新娘，打死都不肯出来，一再拜托，化妆化了两个小时，手臂上戴了一串金镯，（不叫她戴，她认为丢人，便不肯出来。）穿着十八世纪秃头高跟鞋，一瘸一瘸，（因她过去从未穿过，故不得不瘸。）客人问曰：‘嫂夫人好’她以小手帕掩其芳口，嘻嘻嘻嘻，又把腰扭成海军用的那种钢索，坐在沙发上，一面拉衣襟，一面歪脖子，笑个不停，庸俗交加，使人恨不得上去踢她两脚。”①

总括而论，《玉雕集》的内容主要讨论了人性尊严与女性身体形象建构问题，集中于女性的衣饰容貌、体型美丑等内容，重点都是针对女性外观有感而发。柏杨也力图在形体层面的基础上建构出现代女性形象的意识形态，希望能够依靠女性外部形象的改变，由表及里逐渐改变她们内在心理的文化结构，完成从传统女性审美观到现代女性审美观的转变，以便建构起现代女性的主体性。可以这样说，柏杨在中国文坛中最先提倡现代女性在外部形象上的转变，这也是柏杨现代性世俗化立场的一个表现：从最小的生活细节来入手，用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把高不可攀的女性解放事业落实到最常见的生活现象中来实现。这是因为，女性身体外貌与女性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虽然“福柯说，同前现代世界相比，取决于生物权力的产生。然而，这至多只有一半的真理性，身体成为控制权力的焦点，这是事实，但是，不仅如此，它也成为一个自我认同的可见的携带者，并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5—346页。

且不断地被整合进个体所养成的生活方式中"①。也就是说，柏杨关注女性外貌服饰，在社会学上具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这其实是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女性追求自我认同的一个外部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女人缠小脚、平胸等现象，其实背后掩藏着传统文化观念对女性身体健康的残害以及对她们心理上的戕害。由此逐渐造成女性为了获得生存资源，从身体到心理甘愿依附于父权和男权以及"三从四德"的封建观念的社会、文化现象。女人由此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成为男权社会和男人的附庸与性奴隶，毫无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而言，从而被加诸在她们身上的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观念压迫了几千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穿着打扮的改变与女性的解放程度息息相关。

不过，柏杨也认识到，外貌衣饰的变化虽然把中国女性改变成现代女性形象，但是，这只是女性追求平等人权和形成自尊、自信的人性尊严观念的第一步而已，女性需要更进一步从心理上改变传统观念，才能够抵达女性获得彻底解放的目的地。

第二节　自我心理的建构

柏杨对现代女性外部形象的建构已经在《玉雕集》中完成，在其后杂文集中就逐渐转入对女性心理意识作更深一层的分析，开始从心理结构上来建构现代女性的独立平等意识，从灵魂层面来探讨女性自我形象的深度建构和自我主体性建构的问题。

在《玉雕集》之后，柏杨又出版了《堡垒集》、《红袖集》和《牵肠集》等杂文集，选择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形成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爱情婚姻作为突破口，首先因为这是他同时间所创作的爱情婚姻问题小说中的一个主题，与女性人性尊严观念的建构密切相关，而杂文则延续了这个主题并且试图给出答案。其次由于自由恋爱婚姻所具有的反封建思想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前面已经说过，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女性争取自由恋爱的权利，曾经是五四文学反对封建专制和女性争取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女性自由恋爱，意味着她们已经从孩子变为成年人，同男性一样拥有能力和权力离开父母家庭，去谋求一种自我的独立。可以

①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说这是女性独立性的最外层表现，这也是为何自由婚姻恋爱往往被当成是女性解放标志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则是在柏杨的人性尊严观念中，婚姻恋爱自由不但是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人格独立行为，更是她们反对儒家提倡的权势崇拜思想的一种勇敢举动。柏杨在《乖》一文中说："中国社会上，权势的代表人物有两种，一曰'君'，一曰'父'。'君'包括皇帝和比你大一级的官，'父'则包括爹娘长辈和任何一个比你多吃几天饭的老头老太婆。'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乃成为最高酱缸蛆的境界。"[①]从这个角度来说，赞成女性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其实质是反对由传统残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这是女性追求独立人格尊严与自我意识的一种象征性行为。

《堡垒集》全部篇什均探讨爱情和婚姻问题，其中包括对男女爱情心理、爱情本质的讨论。其具体内容可用柏杨在《序》中的话来概括："中国有句俗话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和基督徒'人神同工'的教义，一模一样。月下老人可能一时吃醉了酒，也可能因赌博输了钱，一气之下，把他手中的红线乱七八糟的瞎拴，看起来无人可抗。问题是，神的意思，必须靠人的行为去完成。只要有相当的智慧和勇气，即令拴好的红线，也可踢断；拴不上的红线，也可硬拴；眼看要完蛋的红线，也可用万能胶粘上一粘，粘的连锯都锯不开。"[②]从这里能够看出，柏杨写作《堡垒集》的初衷，是把爱情当做一门学问，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其分析的出发点依然是自然人性观念，而且在《堡垒集》中强化了小说《旷野》中的"人性易变"和"爱情易变"等论点，力图从各种角度来对人类爱情问题加以深入和更加详尽的讨论。除了爱情之外，柏杨把婚姻问题亦纳入讨论之列，以其爱情观和自然人性论为基础详细探讨婚姻本质。柏杨认为，婚姻是爱情进程的继续，走进婚姻殿堂的夫妻两人地位平等，在家庭中占据同样重要的位置。但是走进结婚殿堂的夫妻两人并非就是进了爱情的堡垒，爱情并非是永远不变的，他们依然要采取许多措施来巩固、强化夫妻两人间的爱情关系。而增进夫妻感情也要讲求方法和运用智慧，因而婚姻其实也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堡垒集》的理论基础依然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而男女平等和恋爱婚姻自由的人性尊严思想依然贯穿该部杂文集，成为矢志不移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58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67页。

的一个信仰，亦是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红袖集》是柏杨第三部专门谈论爱情和婚姻的杂文集，共收录他于1963年5月至10月所作的31篇杂文。按照其序言的说法："按道理说，此集应该称之为《玉雕堡垒综合续集》的，但那样称法，似乎破坏了命名的划一性，乃定名为《红袖集》，盖'红袖添香''满楼红袖招''红袖莫相扶'，种种红袖，当然都是太太小姐的红袖，不过年头不对，女人们变得连领子都没有啦，更何况袖子乎？却是臭男人学洋派，七十岁还穿大红香港衫。但此集学问，却因此较之过去各集，更大更巨。"①也就是说，该部杂文集虽名为"红袖"，却如同前面的两部杂文集一样，内容不仅包括女人的外貌打扮，同时也包括了男女恋爱婚姻问题。相比较而言，《红袖集》谈论女人外貌的话题无出《玉雕集》范围，没有什么新见解，但是它确实对《堡垒集》中的某些爱情婚姻问题，像男人怕老婆等社会现象，进一步进行精辟、细微的探讨，从人性角度和文化层面剖析出婚姻中男权和夫权至上，而女性没有家庭地位和独立人格与人性尊严的原因在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观念对人们的毒害。从这个层面来说，柏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观念和儒家圣崽的批判，态度显然比此前的杂文集更加激进和强烈。

在柏杨的恋爱婚姻观念中，自由恋爱而成的婚姻才是尊重女性人格独立的合理婚姻，它也是男女地位平等的一个产物。现代女性必须具有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思想意识，这亦是女性心灵觉醒、走向女性解放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关键一步。因此，柏杨对自由恋爱的积极倡导，以及对中国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激烈抨击，构成了《堡垒集》和《红袖集》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由恋爱》一文公开指责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野蛮与对自然人性和人性尊严的摧残："在古老的婚姻中，没有恋爱，法律和习俗把两个互相陌生的男女衣服脱光，让他们的身和心，同时赤裸裸相见，并且还要过一辈子那种生活，简直不像是真的，而像是一部传奇小说。在洋大人之国，古时候的儿女婚姻，也多由父母包办，但程度上却大大的不同，父母即令再专制蛮横，也总会安排一个机缘，或舞会焉，或宴会焉，使年轻男女能够单独交谈。只有中国不然，大概是圣崽太多之故——呜呼，一个孔丘先生已受不了啦，再加上孟轲先生，后来又冒出程颢、朱熹，那么多的圣人之崽，男女间的关系，便更束缚死人。素不相识的男女，被纳入一个笼中，说它有趣则可，说它戏剧化则可，说它惨无人道亦可也。"这种封建婚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01页。

姻制度，造成了很多婚姻悲剧。更严重的是，它强迫女人在婚后只能够依附丈夫生活，在经济和精神上均丧失了独立性与自我人格意识："呜呼，古时那种婚姻，乃血泪婚姻，其所以表面稳定，基础乃建筑在女人对男人的绝对屈服上，女人好像狗皮膏药，一旦粘到丈夫身上，就一辈子紧贴，她自己固然不会脱离，便是丈夫硬要掀之，也掀不下。"①这也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形成的一个家庭原因，而女人在家庭中就成为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与生育机器罢了。如果这种婚姻制度不改变，现代女性如何在心理上形成人格平等意识？又如何去追求人性尊严之观念？

柏杨进一步认为，现代女性不但要具有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思想意识，而且要对某些带有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卑女尊假象的婚姻现象，亦要具备深刻的辨别力和分析力。婚姻中"怕老婆"的现象有时候则是典型例子。柏杨在《红袖集》中分别用《不作非份的要求》、《怕老会》《非怕不行》、《葡萄架倒了》、《瞿耐庵先生》、《更为艰苦》、《古〈妒律〉》、《男人露出原形》和《把妻子当破鞋》九篇杂文，详细分析出"怕老婆"现象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女性具有的欺骗性。

首先，柏杨高度重视、甚至是赞成"怕老婆"的婚姻现象（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细分析）。他把男子怕老婆当成是个人具有灵性和修养的标志："一个人的修养和他的灵性，从他对太太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俗谚曰'下等人打老婆，中等人吓老婆，上等人怕老婆。'"②柏杨之所以重视"怕老婆"的婚姻现象，其目的是提醒人们要真正提高中国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乃至社会中的地位，而不能惑于表相。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男人怕老婆的传统源远流长，著名人物包括隋文帝杨坚、刺杀吴王王僚的刺客专诸、家中河东狮吼的陈季常、吃醋典故的房玄龄，以及王偃、沈存中、陈觉等历史上的名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与封建社会中女性无社会地位、男尊女卑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柏杨在指出怕老婆是古今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实之后，试图分析出其中的社会原因，以及背后的文化原因，也借此阐发男女平权、女性人格独立等思想观点。

柏杨借用谢在杭的观点，指明男人怕老婆主要有三种社会原因："穷光蛋起家的怕太太，有美貌妻子的怕太太，妻子有钱有势的怕太太。"③对第一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49页。

② 同上书，第350页。

③ 同上书，第356页。

种怕，具体原因在于"穷苦起家的丈夫，靠太太艰苦支持，一旦富贵荣华，旧恩旧情，一齐爆发，遇到有啥争执，自会油然而兴'算啦算啦，让她让她'之念，遂不得不由让之、躲之、避之，终于怕之亦"①。然后举军阀邓锡侯惧内的故事为证，并且称赞这种怕老婆的行为"这一怕怕得有道义，有灵性，在怕老庙中，应居贵宾之席"②。而第二种怕，"太太漂亮非凡，做丈夫的爱她爱得排山倒海，天昏地暗，最初不忍拂她的意，以后逐渐不敢拂她的意，也不能拂她的意，终于成了善良的风俗习惯，根本就没有想到拂她的意矣"③。这种怕的主要原因，一是在于妻子美貌产生的巨大审美力量，柏杨以老夫少妻为具体例证，说明老丈夫怕年轻的太太，甚至能够忍受绿帽子，均是因为美的力量使然。这和《玉雕集》中建构现代女性外貌形象的观点遥相呼应。二是因为心理学上的原因。因为丈夫们觉得美丽太太从众人之中选择了他们，是对他们的一种赏识，因知遇之恩而感动和敬畏。前两种怕老婆现象，使柏杨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实际上存在着获取与男性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而第三种怕，是由于太太有钱有势，丈夫却一穷二白："而一旦丈夫吃妻子，喝妻子，花妻子，便抬不起尊头。于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妻子，在暴君丈夫脚下，虽然很苦，但总可以苟延残喘，如果反了过来，一个可怜兮兮的丈夫，在暴君妻子脚下，恐怕连一天不能活，即令不被轰出去，他也不会有丝毫家庭地位，他不怕乎行？"④最典型的例子则是那些娶了公主当驸马的男人。公主是她的丈夫乃至丈夫整个家族的衣食父母。其夫自然是如奴仆般百般侍奉和畏惧公主妻子。不过这种怕老婆与前两种性质不同，属于男妓型的害怕。也就是说，在这种婚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女方的权势地位等外部因素，这使妻子能够以权势压迫丈夫。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另一个极端表现。在柏杨看来，女性如果具有这种权势崇拜的思想，虽然表面上与丈夫平等、甚至是高于丈夫，但是她们的内在心理结构依然是男女不平等，她们永远无法达到心灵和人格的独立。

不过柏杨随后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体系中，男人怕老婆很少是因为前两个原因，虽然怕老婆的现象很普遍，但是并不说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更遑论男女平等了。何况多妻制度的存在，家庭中多个妻妾同时并存，所有女人除了受到男人的压迫之外，地位低微的侍妾还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56—357页。

② 同上书，第357页。

③ 同上书，第358页。

④ 同上书，第361页。

要受到正妻的压迫。也就是说,女人受到女人的迫害。这些更让她们处在封建男权社会制度和儒家传统思想的钳制和压迫之下,毫无人性尊严和独立人格可言。柏杨由此在《古〈妒律〉》一文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怕老婆的特征是,凡是怕老婆的人,多半都是由于对妻子的不贞和负心,再不然就是由于道德败坏,或人格破产。直截了当的说,往往不是由于爱她才怕她,而是由于怕她使自己丢人才怕她,其基本出发点固是自私的和兽欲的也。历史上最著名的怕同志,很少可以跳出这个肮脏的范畴。"[①]而且中国古代男人对妻子害怕往往不是因为爱情的原因,事实上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中国怕老婆的行为,往往跟太太的'妒'相结合,这一结合,怕的价值就大大减低。盖丈夫之怕老婆,很少主动的由于内心的爱,而都是因为太太的妒,妒得他天昏地暗,心惊肉跳。但太太因何而'妒'耶?因丈夫不贞之故。如果做丈夫的守身如玉,不胡思乱想,太太便不会妒,太太不妒,丈夫便不会怕。而一个不怕老婆的社会固是死水社会也。嗟夫,一旦'妒'和'怕'成为因果,那就是说,一旦'怕'建筑在自己的不贞上,怕便不是真怕,而只是自私的畏惧,兽性的躲避,而不是对妻子的爱。"[②]中国男人怕老婆正是因为他们对爱情与婚姻的不忠诚造成的,这是男性不贞洁行为产生的严重后果。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贞节与对婚姻的忠诚仅是妻子们的责任义务,否则丈夫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掉甚至是杀掉妻子。多妻制就是封建社会维护丈夫对婚姻不贞的一种制度。更何况这种婚姻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丈夫与妻子之间往往缺乏真正的爱情基础,更容易诱导丈夫寻找外遇。因此,虽然丈夫们害怕妻子,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中却无平等而言。

柏杨还选择了政府官员怕老婆的具体社会现象,来分析其中的复杂原因。目的不仅是分析婚姻中的男女地位差别,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在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体系中展开对"酱缸文化"的严厉批判。即使是在以女性婚恋为主要内容的杂文中,柏杨也不忘从婚姻角度来批判"酱缸文化"中的产物之一——官崽(即官员),不断对其冷嘲热讽和揭露出其身上的酱缸渣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崽害怕老婆的最重要的原因:"为啥官崽们往往都怕老婆乎,这不关灵性,也不关当初艰难,很多官崽根本就是红包世家出身的也。盖官崽也者,差不多都是以不尊严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天下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用的是啥不尊严的手段,该人就是他的妻大人焉。这种要命的底牌握在她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78页。

② 同上书,第379页。

手里,犹如唐僧先生握了孙悟空先生的紧箍咒,闹翻了咱们就抖将出来,便不能混矣,就是有原子弹作后盾,官崽恐怕都很难振起夫威。"并且,如果"以不尊严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如果仅是靠本身不尊严,好比说为了当一个部长,而去尝国务总理的大便,对怕老婆并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是靠太太不尊严,那就不得不怕矣"①。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杨正逐渐形成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的核心意象——"酱缸文化",以及他对"酱缸文化"的批判。而官崽批判正是他后来杂文对"畸形人"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柏杨的分析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引申,谈论起与怕老婆相关联的假怕太太和不怕太太的社会现象来。柏杨把那些假装怕太太,其实在家是暴君的男性称为是"狗吃屎"型的怕老婆,把不怕太太,甚至是杀掉太太的男人称为是"八格野鹿"型。那些号称为了"事业第一"而杀掉妻子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包括了法家代表人物吴起、汉代的周泽、唐代的张巡、东晋末年的将军刘毅、东汉的鲍永,甚至是被尊为圣人的曾参也休掉妻子。他们都无一例外还打着"孝"、"友"、"忠"、"义"的旗号,明目张胆地"把妻子当破鞋"一样地杀掉或是休弃。这正是中国古代妇女没有人性尊严、无平等地位的一个明显表征。

柏杨不但分析出怕老婆的原因和现象,随后还在《怕的分类》一文中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怕老婆'应该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犹如儿女之怕母亲,那才是真正有灵性的怕,……犯人见了法官同样是怕,……同是一怕,本质不同,气氛也因而有异。中国过去的怕老婆,几乎全是'犯人见官型'之怕,而很少'儿女见母型'之怕,犯人见官型之怕,乃生物本能之怕,连狗见了棒子都会怕。而'儿女见母型'之怕,便不然矣,丈夫有要事不回家吃午饭,打个电话通知,非怕太太闹,而是怕她坐在桌旁等也;丈夫出了远门,一天一封信,非怕太太吵,而是怕她寂寞也。丈夫下班回府,经常带一点化妆品或吃的小玩意,不是赎什么罪,而是使她快乐也;丈夫去了北投,妓女小姐既用手拉,又用脚钩,仍无动于衷,非怕太太暴跳如雷,而是怕伤她的心也。呜呼,有灵性的怕和'不忍'是相联的,兽性的怕才是'不敢'。幸好的是,年头渐变,过去的怕渐渐消失,现代化的怕渐渐多起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契机。该怕老婆并不简单,需要有真正的爱情作基础,更需要有幽默感和责任感,鸭子屎人物想怕还怕不成哩。"②只有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中,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79页。

② 同上书,第393页。

由爱情生畏惧情绪，怕老婆现象才具有现代化精神，是女性受到人格尊重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柏杨赞成“怕老婆”的现象的根本原因。

但是也要看到，作为一个恋爱婚姻专家，柏杨态度坚决地反对和批判包办婚姻，他明确地指出包办婚姻对女性的戕害和由此造成的婚姻悲剧以及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不过他也对现代社会的自由恋爱风气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讨论。他首先对自由恋爱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有着清醒的认识：“自由恋爱乃二十世纪新兴的玩艺，但最初仍是偷偷摸摸。至五四而一变，成为半公开状态，未婚男女即令并肩而行，也没有人失惊打怪。至抗战而又一变，女的虽挂到男的臂上，也不保证她一定嫁他。至台湾而又一变，简直可以和美利坚相比，同居者有之，玩一些时作鸟兽散者有之，情奔私奔者有之，形形色色，叹观止焉。这里面有一种自然的趋势，那就是民国初年的恋爱，差不多都是林黛玉、贾宝玉之型，缠缠绵绵，持之以恒，我有一个朋友，他和他的太太相恋达十四年之久，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教人吓一大跳。而以后每变一次，恋爱的时间便缩短一次，将来总会发展到早上认识，中午即爱得不可开交，晚上就去法院公证，吹吹打打兼急急忙忙的入了洞房。”[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由恋爱已经成为必然的社会风气，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她们在人格上和心理上的独立意识已经初步形成。不过随之出现了新的社会现象和婚姻问题：热烈的恋爱与美满婚姻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一致？柏杨对此问题的关注，也是针对当时台湾流行的文艺爱情小说中的爱情观。柏杨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每个人的婚姻生活都能够美满幸福。不过当时社会的发展现状已经证明，那些粗糙的爱情文艺小说是如何幼稚和严重脱离现实社会实践，具有欺骗性。许多爱情小说还打着宣扬爱情的幌子，实则宣传了“一女不嫁二夫”、贞操等封建伦理观念。这些不适合现代城市社会的封建伦理观念与当时社会的复古思潮同流合污，对普通民众具有误导作用，更不利于女性市民独立心理意识的形成。

除此之外，柏杨还仔细辨析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婚姻的稳定和美满与否，虽然需要男女双方经过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过程，但是与恋爱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受到社会风尚、人性本能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现代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使恋爱不太可能保持长久时间，因为“所谓长久的恋爱，都发生在农业社会，移动性小而情绪稳定，没有发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50页。

现更高级的对象,只好'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今社会形态大变,持久的谈情说爱遂成为不可能"。即使是两人经历过马拉松式的长久恋爱,也未必就是感情深厚,因为"凡是有若干年以上恋爱史的人,多半是断断续续,离离合合,乃一'鸡肋',只不过弃之可惜耳。在此漫长时间中,遇到好的,就把他一脚踢,遇不到好的,非结婚不可时,就捡起来结婚,这里面无可奈何的成分多,缠绵入骨的成分少"[①]。这就需要把善变的人性因素考虑进来,如何在尊重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处理好人性与婚姻的关系。而《堡垒集》、《红袖集》中的很多篇幅就是探讨该问题的。

如果说柏杨对带有封建色彩的、反对自由恋爱的婚姻制度立意在"破"的话,那么他对现代社会中的婚姻态度则是"立"。他针对人性善变的特点,对如何改善和保持现代婚姻的美满和稳定,提出自己的建议,形成了关于维持婚姻的法则,并在这些法则中体现了对于人性尊严、人性问题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人性观念,在杂文中并非是空洞抽象的,他试图用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方式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

具体来说,从夫妻双方的个人角度来看,首先需要夫妻双方能够满足社会的、心理的条件,用柏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讲条件"。换句话说,虽然人性善变造成爱情多变,但是婚姻的美满长久也并非是不可能,这取决于维持婚姻的法则。柏杨认为,美满的婚姻应该在于两个人的相配,首先表现在男女年龄的相配上。而年龄相配,并非仅仅是指男女双方年龄相近或是相同,而是具有非常复杂的多种情况,柏杨对此逐一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柏杨强烈反对姐弟恋产生的老妻少夫的婚姻现象,他的理论根据是男女生理上的差异和社会心理学,认为这是婚姻中最不相配的一种情况。因为对女人来说,"女人易老,固是天意,亦由人力,'生育''哺乳'二者,如毒蝎的两把巨螯,硬是活生生的把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蹂躏成一个不堪回首的老太婆"[②]。在《老妻少夫》一文中,柏杨专门指出男女生理结构上的不同,以及由此对外貌产生的影响:"上帝似乎专门拆散那些女大男小的婚姻,他不必直接下手,只要玩点花样就如愿以偿。不知道怎么搞的,女人总比男人容易衰老,两人同是二十岁三十岁时,还看不出什么,一旦进入四十,苗头便开始不对,再进入五十,那就悬殊天壤。一个男人,十年八年不见面,再见时仍是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53—454页。

② 同上书,第467页。

那个模样,四十岁不比三十岁更老,五十岁看起来和四十岁差不多。而女人就危险重重,二十岁或三十岁时,固娇艳如花,可是到了四十岁五十岁,除非天生尤物,或是她听从柏杨先生的意见,经常注意修饰和培养自己的吸引力,否则其模样真将不堪闻问。盖男人耐老,坚韧如木,凋零起来不太明显;女人如花,盛开时美不可言,凋零起来却快得很。"正是在此自然生理基础上,老妻少夫从相貌外表上就不相配。所以当一个进入迟暮之年的女人爱上一个青年男子并且两人结婚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相貌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妻子衰老得如同丈夫的母亲,丈夫很可能会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年轻女人身上,移情别恋,由此造成怨偶。柏杨进一步分析说,老妻少夫的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夫妻双方的角度来看,最终结局其实是损害了女性利益,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上。对丈夫来说,"年纪大的妻子在家庭里,同时具备两种身份和两种心情,一种,她是丈夫的妻子,要做妻子的事;一种,她是她丈夫的母亲,有做母亲的气质,主要的是忍受他的暴跳如雷,甚至忍受他遗弃性的恫吓,或真的遗弃。她不但像对丈夫般的爱他,而且还要像对孩子般的容忍他。……不再要求男人牺牲,而是要求自己牺牲,这其中自包括不少屈辱"①。因此小丈夫可能会从大妻子身上得到被保护、最纵容的幸福感。然而,老妻少夫的婚姻归根结底还是一场悲剧,即使男方具有恋母情结,而且真心爱他的妻子,不过这种婚姻依然会对女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年龄对女人的意义似乎还不仅是变老,也不仅是爱情生活的警报,而根本上乃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如果她的丈夫比她年轻漂亮,那种有随时被遗弃的恐惧,便更难以忍受,即令上天特别垂怜,使她的小丈夫一直爱她如恒,但心理上的负担,也会使她更快的变老,终有一天紧张成神经病。"②女人产生的这种恐惧感,会消除她在自由恋爱中所获得的独立意识,而且为了维持小丈夫对她的爱情与保持婚姻稳定,很可能会忍受丈夫的暴力虐待,甚至是移情别恋。实际上这是封建婚姻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变体。处于这种婚姻中的女性,无法追求男女地位平等,同时也丧失了个人主体意识。

柏杨还指出,年龄相配也并非是指夫妻年龄相同、相近,而是男方比女方大几岁,甚至是十几岁。柏杨的出发点依然是女人比男人易老的生理事实:"丈夫二十岁,妻子二十岁,固是一对万人称羡的璧人,然而三十年后,丈夫五十岁,尚可冒充小伙子,妻子五十岁,已鸡皮鹤发,再不能陪丈夫跳舞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62页。

② 同上书,第463页。

游泳矣。故女大男小固是一种病态婚姻,即令男女二人年龄相同,或男比女仅稍大一岁两岁,其前途也充满了暗礁。"①而比较美满的婚姻搭配则是男方比女方大几岁,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有一个黄金比例,即"二十二岁的妻子配三十岁的丈夫,二十七岁的妻子配四十岁的丈夫,三十三岁的妻子配五十岁的丈夫,其对社会的适应和对家庭的凝固,最为有力。"不可否认,作者的这种年龄观念首先与他自身的婚姻情况有关,他比当时的妻子倪明华大十几岁,夫妻两人琴瑟相和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婚姻比较美满幸福。按照两人的婚姻状况,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的话,应该是能够白头偕老的。至于柏杨在1968年入狱,其妻在一年之后移情别恋,两人以离婚结束这段婚姻,这是政治事件造成的婚姻悲剧,是外界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后果。这种年龄相配的婚姻其实也属于老夫少妻现象中的一种,而老夫少妻正是柏杨极力赞成的一类婚姻模式。柏杨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和当时台湾社会现实中,"很多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孩子竟爱上可做她爹,和可作她祖父的男人,即令他已经结婚,儿女成群,还是照爱不顾"②。可以说,老夫少妻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柏杨针对此种现象分析出七条原因,不仅包括年长男人性格宽容厚道、能够爱护年轻的妻子,以及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等原因,还指出这种与日俱增的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女性恐惧:"事业好比一条船,如果嫁年轻的丈夫,就得亲自下手,并肩建造,弄得满头大汗,血流如注,等到好容易把船造好,容颜凋矣,年龄老矣,而且还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自己可能坐不上那条船。天下多少夫妇档,共同创造一番事业,等到功成名就,丈夫需要一个'拿得出去的妻子',竟把太太赶下了船;诚是年龄相若,助夫成功的女子们一大悲哀。"③这亦从反面证明了丈夫比妻子年龄大的益处,这种年龄上的差距正是男女双方年龄上的相配。

其次,夫妻双方的相配还表现在家庭门第的相配上,即男女双方要门当户对。在《爱情是有条件的》一文中,柏杨直截了当地指出:"门当户对的意义,昨天已经言之,不是金钱上的相对,也不是权势上的相对,更不是社会地位的相对。《堡垒集》上曾经说过,恋爱往往是有条件的,只有少不更事的男女,或别有用心的男女才高喊恋爱没有条件。呜呼,夫无论男的爱女的,女的爱男的,都是爱对方的优点。她爱他强壮焉,会琴棋书画焉,有前途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67页。

② 同上书,第473—474页。

③ 同上书,第477页。

焉；他爱她苗条焉，伶俐焉，漂亮的不像话焉。这些优点便是条件矣"，"任何幸福的夫妻，一定门当户对，这不是说两个年轻男女一定要先弄清楚对方的身世，再谈恋爱，而是相捋的男女自然而然的容易结合，女孩子如果家住洋楼，拥有汽车，今天去维也纳参加夏令营，明天去奥斯陆滑雪，恐怕一个送报为生的报贩很难追到手，（小说上和电影上可能追到手，此小说和电影之坑死人也。）……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做丈夫的如果在经济上不能供应妻子，该丈夫在家庭中就直不起脊梁。做丈夫的如果不能成为妻子的荣耀，妻子就会感到很大的羞辱，严重的影响婚姻"。[①] 这种门当户对实际上是指，在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之下走入婚姻堡垒中的男女双方更容易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思想上更易于沟通和交流，这样就相应地会减少夫妻两人之间的摩擦和不和谐，有利于维持婚姻的稳定。柏杨在此处强调丈夫要给妻子带来自豪感，也是从夫妻需要背景相配的观点出发引申出来的一个结论。

除了夫妻相配之外，美满和持久的婚姻还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经营，因为人性的复杂多变成为破坏婚姻稳定的变数，并且"婚姻的美满，夫妇的结合，以及家庭的幸福，还建筑在吸引力上，不建筑在某一单纯的因素上"[②]。因而对希望保持婚姻美满和夫妻感情的女性来说，必须认识到"爱情如作战"，要时刻保持自己外表上的吸引力和内在修养。而"有吸引力的女人并不是全靠她们的美丽，而是靠她们的漂亮。包括风度、仪态、言谈、举止，以及见识。任何女孩子们都应注意的是，妻子就是妻子，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仆，既不是女儿，也不是娘。丈夫对她有各种矛盾的要求，当伴他外出时，她应是公主；当在家做家事时，她应是佣工；当谈情说爱时，她应是姘妇。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可举出来，当她洗衣洗碗时，他希望她洗得又勤又净，可是当赴宴会和别人握手时，他却希望她的手又白又嫩。男人心理竟如此之怪，甚至如此之坏，作一个妻子的真应该恍然大悟，有所抉择"[③]。当然，这并非是说男人在家庭中占有优势地位，作者主要是从强调男女双方之间保持持久爱情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柏杨再三强调自己的立场："我们前已言之，当指妻子时，也指丈夫；当指女人时，也指男人。盖把同样的话，只换了两个字就再重复一遍，实在辛苦。但在这里，柏老仍要重复这一段：一个丈夫，他有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65—366页。

② 同上书，第505页。

③ 同上书，第620页。

义务使妻子看着他舒服。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是不可救药的臭狗屎。”这说明，在柏杨眼中，男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女人同样具有善变的人性，男人也具有取悦妻子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善变的人性需要丈夫和妻子同时采取增强个人魅力来吸引对方的措施，目的是改善善变的人性可能会给婚姻稳定带来的破坏力量，使夫妻间的爱情能够历久弥新，夫妻双方能够经受得住各种考验。

对柏杨而言，自然人性善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喜新厌旧和追逐新鲜感，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无法彻底改变而只能够改善它，这也是影响婚姻稳定的一个大敌。很多夫妻变心别恋和离婚，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彼此失去新鲜感和魅力。这个问题亦是柏杨在杂文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不仅从现实中，而且从中国古代小说和历史文化中寻找解决的方法和答案，给今人加以借鉴。柏杨在《堡垒集》和《红袖集》中，选择了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中的《恒娘》，以此故事为例，从性心理学和自然人性的角度，深入分析和详细阐明夫妻双方应该如何保持个人魅力，来保持夫妻感情以及击败其他姬妾和野男人（放在现代社会中，就是二奶和第三者）。

在《且看〈恒娘〉》一文中，柏杨借恒娘和重获丈夫欢心的朱女士之间的问答，以妻子把另有新欢的丈夫重新吸引到身边为例，揭示出夫妻双方应该如何以自然人性和性心理学为基础，在日常生活相处和言谈举止中有意识地增强个人吸引力，让对方产生新鲜感，以此来加强和巩固夫妻间的感情与婚姻。当朱女士询问为何要先拒绝丈夫同房要求时，恒娘如此回答：“人都喜新厌旧，珍惜难得的，而看不起轻易到手的。丈夫偷偷摸摸去胡搞，不是因为她长得比你漂亮，而是感觉到她比你新鲜，而又难以到手的缘故。你使他去尽情胡搞，等于吃饭，吃得饱啦，便是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何况粗茶淡饭乎？”①柏杨借恒娘之口，指出在丈夫面前，妻子为了保持新鲜感和把有外遇的丈夫吸引到身边，第一步就是欲擒故纵地保持距离，具体行动是拒绝夫妻同房。不过拒绝对方是为了以后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因此第二步是妻子故意穿着破衣烂衫，个人低调处理感情一段时间，而且不再埋怨和谴责丈夫移情别恋，反而低眉顺眼，非常温顺和善解人意，同意甚至赞同丈夫与新欢常在一起，以便激起丈夫对她的内疚感。第三步则是妻子再突然打扮得艳丽华贵，而且依然对开始回心转意的丈夫拒绝同房，不让他轻易得手。其中原因在于“不常和他见面，好像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18页。

久别。突然焕然一新，乍睹艳妆，则有突破之感。好像穷小子一下子吃到肥肉，自然不吃高粱米矣。偏偏你又大端架子，不肯轻易叫他吃到口。野女人反而成了容易到手之物，此之为以妻为妾，以家为野之法也"①。如是才能够引起丈夫的注意，而且新欢此时也变成了旧爱，不再具有新鲜感。不起眼的妻子则摇身一变为魅力四射的美女，似乎遥不可及，更何况妻子对丈夫不理睬的冷淡态度，使他感到爱情即将失去的危机感。正是美的魅力和喜旧厌新的人性力量，激起丈夫把精力重新转移到妻子身上来，不再理睬原来的新欢，妻子因此在爱情和婚姻中大获全胜。需要注意的是，柏杨以《恒娘》为例的目的在于，"《恒娘》之篇，并不专供女士们参考。对妻子而言，丈夫们就是男性恒娘。为了爱情的持续和婚姻的美满，妻子固要取悦丈夫，丈夫也要取悦妻子。至于如何取悦，乃一种高级的艺术"②。这再次说明，柏杨不是宣扬女性卑谦和毫无人格尊严地去吸引丈夫的注意力，而是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场，认为丈夫与妻子一样，都有义务责任针对人性的善变和爱情的复杂多变，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夫妻双方都有维护和巩固婚姻的责任与义务。

可以说，在这三部以讨论女性婚姻为主题的散文集中，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既有趣味性和故事性，又发人省思。从内容主题具有的现实指涉意义来看，它们完全可以当做现代人爱情生活和婚姻生活的指南，均是对当时台湾现代社会日常男女婚恋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正如柏杨所表明的，"柏杨先生自以为《堡垒集》一旦问世，必有人获益匪浅，甚至可以普渡众生，根绝悲剧，使每一对情侣和每一对夫妇，都恩爱逾恒，千年不衰"③。而从柏杨思想的发展来看，这些杂文集体现出作者早期的恋爱婚姻观念。柏杨把爱情婚姻与自然人性和女性的独立，以及建立女性的自主意识联系起来，看到这是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重要一环，也是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在早期杂文中的一个展现。

第三节　自由爱欲与女性解放

柏杨于1968年被捕入狱，于1977年4月出狱返回台北，他从1977年7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19页。

② 同上书，第320页。

③ 同上书，第321页。

月起就在《中国时报》上开始开设“柏杨专栏”撰写杂文，接续中断了十年之久的杂文写作，进入柏杨后期杂文时期。不过柏杨后期的杂文只集结成了几个集子和一些访谈录，包括1978年出版的《活该他喝酪浆》，1979年出版的《按牌理出牌》和《大男人沙文主义》，1980年出版的《早起的虫儿》、1982年出版的《踩了他的尾巴》，以及1985年结集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1995年由日本作家黄文雄和柏杨共同完成的访谈录式杂文集《酱缸震荡》，还有在2002年出版的杂文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是由八十岁高龄的柏杨口述，别人执笔而成。在后期杂文中，恋爱婚姻问题依然是柏杨的一个关注点，而且经过近十年的牢狱生活，柏杨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更加深刻，更何况台湾社会从1975年蒋经国接任地区领导人以来，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国民党的政治统治色彩淡了很多，台湾经济和都市规模得到进一步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在爱情婚姻领域相应也出现了很多新观念和新现象，与五六十年代相比，人们的婚恋观念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了离婚率增高、同居不结婚等常见现象，作家的敏锐使柏杨捕捉到这些变化，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观念使他能够调整自己的思想，跟上新的时代背景，对婚姻恋爱与人性、自由、人性尊严的关系重新进行思考。

在杂文集《大男人沙文主义》首篇《是会变的》中，柏杨首次赞成同居不结婚的社会现象，这与柏杨早期杂文提倡爱情婚姻稳定的观点大相迥异。这种变化并非在于作家对社会风气的盲目跟从，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并没有改变，他依然坚持早期杂文中的立场：婚姻恋爱与自然人性、人性尊严密切相关，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和获得人格独立。只是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婚恋现象，促使柏杨对爱情婚姻与妇女人性尊严、身心解放之关系的思考。他把性与自由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应该具有性自由的权利，而不再坚持爱情可以使女人获得自由的观点。换言之，他从早期杂文的赞成浪漫之爱，走向提倡激情之爱。可以说这也是柏杨后期杂文婚恋观与早期的最大不同。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后期第一部杂文集《活该他喝酪浆》的《序》中，柏杨明确地表达出对前期杂文的反省：“我于十年前的十年之间，曾出版了二十三本巨著，计《倚梦闲话》(《柏杨选集》)十集，《西窗随笔》(《柏杨随笔》)十集，《挑灯杂谈》(并入《柏杨随笔》)一集，《云游记》(《古国怪遇记》)二集。这些书在台湾已看不见啦，在海外则听说仍大大风行。前些时，出版兼发行这些书的香港文艺书屋，寄了两百美金，教我代购一点别人的书籍。我正穷得发疯，就奋勇的把它转移阵地，当做版税收下，买了一件棉袄、一条尼龙被、一双皮鞋。大阔特阔的享受起来。只是该二十三本巨著的内容，至少应该删掉一半，和至少应该对其中的一部分做重大修正，盖若

于是我思想还没有成熟时的胡说八道，每一想起，既惶恐又出汗。现在已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意见矣，只希望身在海外的读者老爷，能够垂鉴，作选择性的心心相印。"[①]从这段话可以推断出，柏杨后期杂文中对早期婚恋观念的反省和有意识的改变，其实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柏杨的前后期杂文，可以发现，后期婚恋观其实是前期某些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其变化发展的脉络有迹可寻，这可以从前期杂文中看到某种线索，因此可以说，后期变化了的婚恋观其实只是经由早期杂文的量变，在后期杂文中达到了质变而已，依然没有脱离柏杨所提倡的女性解放的框架结构，也没有脱离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范围。

柏杨早期杂文中爱情婚恋观念的主要内容，在于提倡能够走向婚姻的恋爱，以及能够保持婚姻稳定的爱情，其实质是吉登斯所说的"浪漫之爱"。吉登斯认为："与其他的社会变革一道，浪漫之爱的观念传播深深地卷入了影响婚姻和其他人生活环境的重大转型中。浪漫之爱设想了某种自我审视的方式。如：我觉得别人怎样？别人觉得我怎样？我们的感情是否足够'深厚'，能支持长期的依恋吗？不同于反复无常、无根无源的激情之爱、浪漫之爱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将个体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它为长期生活提供轨道，指向一种在希望之中但又切实可行的未来；它创造一种'共享的历史'。帮助把婚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使婚姻关系具有特殊的首要地位。"[②]柏杨早期杂文以《恒娘》故事为例，提出保持永久爱情与永恒婚姻的多种策略与方法，其根源正在于他的婚恋观属于"浪漫之爱"的范畴。柏杨还反复强调女性在恋爱中要自重、自尊，不要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他用"摘麦穗"来形象地比喻恋爱婚姻："男人追女人之时，其急吼吼之状，简直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该时也，女孩子如果没有点学问，而马上答应，他当时固然感激零涕，扬言杀身以报，可是其后患却有点无穷。必须被女人整得颠三倒四，然后结婚，故益加珍视，……女人如果轻易答应男人的求偶，其后果每不堪设想。有些小姐为了赶紧摘下最大的麦穗，不惜牺牲色相，那后果就更为壮烈。"[③]女性在恋爱过程中的自重，主要目的依然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吸引力，以及获得丈夫的尊敬和爱慕，保持爱情与婚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7—8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05—406页。

姻的稳定长久，亦不脱离追求“浪漫之爱”观念的范围。总而言之，在“浪漫之爱”中，爱情通过婚姻与性爱联系起来，因而爱情是婚姻和性爱的基础，爱情婚姻与性爱是一体两面，婚姻则是爱情与性爱的必然中介和保障，这才是合情合法的现代婚恋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只有与异性之间拥有爱情，并且进入婚姻之后，她才能够与对方发生性关系，这样的两性关系也才能保障女性自身的权益，以免被对方移情和抛弃，这是女性实现自我独立性和形成主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反之，对男性来说，也亦然。

但是作为一个对自然人性有深刻了解和具有反思意识的作家，柏杨虽然提倡和鼓吹这种“浪漫之爱”的婚恋观念，不过他此时的思想系统中也还隐含着对这种婚恋观的一种质疑。也就是说，他既然承认喜新厌旧、追逐新鲜感是自然人性中固有的元素，那么爱情婚姻的专一、持久、永恒是否会对人性产生另一种压抑？或者说，是否可以不用直接经过爱情婚姻作为媒介，而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男女异性可以直接发展成性爱关系？不过这种质疑在他的早期杂文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虽然柏杨也承认当时社会中“老处女”现象其实代表着社会观念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女性有不结婚的权利与自由。但是总的说来，柏杨在杂文中没有再对此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此疑问在一些小说中已经初露端倪，例如《夜掠》就已经直接提出了女性性欲的合理性问题，即不需要爱情和婚姻为中介就可以直接实现性爱欲望的权力。这也说明，作为男性的柏杨，同样看到了女性解放之路的艰难：即使女性能够借助自由恋爱从父母那里获得独立权利，争取到了自身的自由，而且通过“浪漫之爱”的形式，能够在婚姻中获得与丈夫平等的地位，那么女性努力保持爱情和婚姻稳定的策略，是否就是最好、最有效和最终的女性解放之途？这些都激起了柏杨对婚姻的继续思考，这也成为后期杂文继续探讨爱情婚姻问题的一个动力。

柏杨在后期杂文中逐渐认识到，女人以爱情婚姻为首要目标的思想观念虽然没有错，不过却如同一把双刃剑，容易造成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依恋和依附感，婚姻关系在确保女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可能也会对女人的自由和人格独立构成一种束缚，因为“当许多人认为婚姻完全是永恒的，浪漫之爱与性伙伴之间结构上的趋同性就变得清晰明白、一望便知。这种趋同的结果也许是苦恼不堪的岁月，在作为婚姻套式的爱和延续婚姻的要求之间只有非常稀薄、脆弱的关联，然而一种即使不是特别有益但也行之有效的婚姻可能通过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得以维持，其中丈夫负责劳动，妻子负责持家。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体面’女性的标志，把女性性关系严格地板范在婚姻当中是何等重要。因为这同时也让男人们与正在悄悄生成的亲密关系领域保持距离，保持着以婚

姻作为女人的首要目标的状态”[①]。这正是“浪漫之爱”婚恋观中存在的一个主要缺陷，即它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中并没有使女性获得预想中的充分人性尊严和自由，并且这种婚姻观念主要是制约住女性，而对婚姻中的男性并没有同等的约束效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浪漫之爱”虽然在女性挣脱封建婚姻压迫和戕害，获得个人经济独立和自我独立的初期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思想观念意识的进一步解放，当男女平等、自由人性尊严的观念已经渗入城市各个角落之后，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浪漫之爱”产生的爱情婚姻并非都是如此理想，反而会产生新的问题，有很多时候可能会酿成人生悲剧。

正是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促使柏杨在后期杂文里对自己早期的女性婚恋观进行反思，重新界定爱情婚姻和自由、人性尊严之关系，“然而，这几个月来，一连串碰到了七八个奇怪的婚姻——说它奇怪，是我老人家嘴下留情，事实上是一连串碰到了七八个恐怖的婚姻，使人毛骨悚然。终于发现同居而不结婚，也有它的实际价值。前面那位老奶一口咬定‘同居跟结婚是一样’的，反而淹没了真相，自己摧毁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假如结婚跟同居果是一样的话，拒绝结婚只不过强词夺理，用以掩饰内心的某种彷徨和恐惧。问题是，结婚跟同居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同居’才有资格向‘结婚’挑战”[②]。也就是说，柏杨虽然在早期杂文中大量谈论“自然人性是易变的”话题，但是他对改善人性总是持乐观的态度，积极地提出种种策略来增加男女双方个人的魅力，例如各种条件的相配，孩子是夫妻爱情和婚姻之船的压舱物。还以《恒娘》为例说明男女双方应该如何改善爱情婚姻的质量，以便抵制爱情的消退和婚姻的不稳定等建议。然而在后期杂文中，随着“同居”日渐成为爱情婚姻领域中的主流现象，以自然性爱为主要特征的“激情之爱”逐渐代替了“浪漫之爱”，柏杨就重新反思爱情婚姻对人类的意义，以及质疑他早期婚恋观中改善自然人性的可行性。因为“把两个会变的动物——一男一女，用结婚的形式拴在一起，而且一拴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冒险。如果男女同时都朝一个目标变——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所谓‘一条被盖不住两样人’，夫妻间是互相影响的，不仅影响思想，影响意识形态，有时候甚至还影响长相，那当然甚妙。可是如果一个变一个不变，或一个往东变，一个往西变，那麻烦可

---

①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8—349页。

就大啦。当思想的和意识形态的层次越来越有距离时，爱情就会越来越消失。如果两个人只是同居关系，那就比较好办。如果是结了正式之婚，恐怕要脱层皮”[①]。可以看出，此阶段柏杨的婚恋思想逐渐转变为对结婚持保留态度，转而赞成同居与离婚。这同时说明他的思考重心发生了转移，已经由早期的“爱”渐转到对“性”，尤其是性爱与人性、人性尊严和自由的关系的思考上。如果说他早期杂文把自由恋爱当做女性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争取个人解放的必经之路，那么他在后期杂文中则对女性解放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看到性爱欲望解放对女性获得彻底解放和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因此柏杨后期杂文就把早期小说《夜掠》等隐含的“性爱的合理性”观念，延伸拓展为后期杂文的“性爱的合法性”和“性爱的普遍性”的公开讨论上来，把其作为早期婚恋观念的一个补充。

台湾社会在70末80年代初出现的“强哉骄”的现代女性形象，是柏杨后期杂文讨论女性性欲解放的一个对象和社会基础。杂文集《按牌理出牌》开头几篇就专门详细讨论了“强哉骄”女性。所谓的“强哉骄”，是指既强悍又骄傲的现代女性。她们已经变成了社会和生活中的强者，甚至比男人更加具有优势地位，“盖从前是男人看女人，现在则是女人看男人；从前是男人追女人，现在则是女人追男人；从前是男人泼皮，现在则是女人的脸似乎更厚（以致连胡子都长不出）；从前是男人赤膊上阵、闯五关、斩六将、献身事业，现在的女人则十指尖尖，犹如钢爪，把男人抓的呼天抢地”[②]。柏杨把强悍的功利型女性分为四种具体的类型，一类是“摸汽车型”，“盖‘摸汽车型’的强哉骄，用的是现代化的精密科技，只要玉手一指，辐射线泉出如涌，男人就立刻浑身麻木，身不由己的俯首帖耳，被抓将过去，压在屁股底下”。[③] 第二类是嫌贫爱富的“铝门窗型强哉骄”，第三种“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擒拿术，即‘一哭，二闹，三上吊’是也，一举一动，都是重量级的，姑名之曰‘三上吊型’的强哉骄，当者披靡，无不臣伏”。[④] 第四种是“刘玉娘型强哉骄”，“一旦英姿焕发，简直是脱了裤子打老虎，既不要命，更不要脸，胆敢迎战，无不大败。男人不是被她驯服，就是被她一脚踢。不是被她奉承的心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51页。

② 同上书，第183—184页。

③ 同上书，第188页。

④ 同上。

里痒痒，就是被她不当人子”。[1] 这四种类型的强哉骄属于典型的现代女性，“在男女关系上，现代化的老奶，把男人当做猎物，其状如老鹰抓小鸡，只要看准目标，一抓一个，丝毫不爽，纵是想当年以男人为主流的时代，对女人也不致这般得心应手。其实现代化老奶不仅对男人如此，对一向被男人盘踞的‘事业’地盘，也高跟鞋林立”[2]。她们一改中国妇女受到男权社会压迫的传统形象，也不再是柏杨早期杂文中，需要依靠衣服饰品来建构自身性感魅力的现代女性形象，而是已经与男性在社会地位上完全平等的“女强人”。有意思的是，这些强哉骄女性形象的出现其实并非很突兀，柏杨在早期杂文中就很关注一种另类女人——“名女人”，并且对此进行过深入剖析。所谓名女人，主要是指一些明星与交际花，周旋在达官贵人之间，以出卖色相来换取金钱和物质享受，当然也包括妓女。在柏杨的早期杂文中，这种“名女人”是作为社会习俗批判的一部分而出现，她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亦是不足取的。而在十几年之后，柏杨笔下的这四类强哉骄形象，虽然属于有正式体面职业的现代女性，但是她们控制、利用男性的手腕却与“名女人”如出一辙，说是“名女人”的变化发展也未尝不可。而柏杨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他在早期杂文中对“名女人”持明确批判的态度，那么在晚期杂文中则不是，虽然含有善意的讽刺，却也乐于承认，这类强哉骄女性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女性形象，也是具有独立、平等意识的现代女性。

除了这四类强悍的强哉骄之外，还有三类现代女性，分别是属于家庭型的“不放手强哉骄”、事业型的“挑大梁强哉骄”，以及娜拉类追求个人理想的“灵性类强哉骄”。相比之下，柏杨更欣赏后两类女性，认为她们既具有现代女性的自强自立、自我意识以及心理独立性，又不会转而走向欺压男性的另一个极端，造成男卑女尊等新的不平等现象。可以这样说，这七种类型的强哉骄均代表着现代女性的不同侧面和多元形象，但是无论如何，她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已经具备了完全的独立性，她们与男性一样可以拥有选择不结婚的自由和权利，而且在现代社会开放的环境之下，她们虽然可以在生活表面形式上是不结婚的“老处女”，但是这种身份并不妨碍她们去追求超越爱情婚姻之外的自然性爱，不需要再像60年代的小说《夜掠》中的主人公那样偷偷摸摸，也不再受到社会道德伦理的谴责，也就是说，只要她们愿意，就可以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追求由“激情之爱”产生的性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91—192页。

② 同上书，第193页。

爱享乐。这些强哉骄女性具有实践新式婚姻爱情观念的可能性和便利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七种类型的强哉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主要形象，可以说女性的解放的确达到了更高的程度，但是并不说明女性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就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柏杨同时也看到，在婚姻领域中普遍存在着另一种对待女性的不平等态度，即大男人沙文主义，依然有残存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作祟。在杂文集《大男人沙文主义》中，柏杨也对有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的男性进行了具体分析："到了二十世纪，老奶接受了教育，有了经济独立能力，一个个生龙活虎，强而且骄，臭男人开始觉得有点罩不住，只好随波逐流，扬言他本来就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但心窝里残存着的大男人沙文主义，仍阴魂不散，不时的蠢蠢欲动。总觉得口号归口号，实践归实践，家里总不能两头马车呀。于是，人格分裂，一方面认为老奶要现代化，学问庞大，仪态万方，既猛赚银子，又光芒四射。一方面又认为丈夫仍是一家之主，仍要老奶保持七出之条时代侍奉丈夫的传统美德。丈夫回到家里，高喊累啦，跷起二郎腿，天塌啦也不理。妻子回到家里，一样累啦，却不能喊累，仍要给丈夫端香茶，拿拖鞋，递纸烟，赶蚊子（假设有蚊子的话），然后下厨房，举案齐眉，喂饱之后，又要洗碗洗筷，打扫清洁，给丈夫放洗澡水，铺床叠被。否则的话，臭男人轻则怨声载道，重则暴跳如雷。经济独立后的老奶，表面上看起来解除了一道枷锁，实际上却换上了两道枷锁。丈夫表面上失去了七出之条，实际上却仍高踞山头，称王称霸。"[①]也就是说，大部分现代妇女和男性依然处于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的笼罩之下，现代女性并非都是强哉骄，婚姻不但没有保护她们的独立权利，反而使她们受到种种束缚和压迫。正是大男人沙文主义，使柏杨看到很多现代女性有必要形成一种新的婚姻观念，作为对"浪漫之爱"婚恋观的补充，这成为柏杨提倡性爱欲望自由的思想基础。

因而，柏杨此时不再坚持早期的婚恋观念，而是把人性因素对爱情造成的更多、更复杂的影响都考虑进来，对爱情婚姻开始持多元看法："爱情旺盛时炽热如火，低潮时若隐若现，消失时像幽灵一样无影无踪。爱的时候，连体臭也是香的，不爱的时候，就是跳到香水缸里泡三天，仍要掩鼻。……因为人类思想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感情的会变，影响男女结合的稳定性。所以产生了结婚制度，希望这个制度像孙悟空先生的金箍一样，套到一男一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66—367页。

女头上,使他们不能变、不敢变,至少使他们的变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个制度几千年来果然大发神威,为夫妻们带来了相当的安全感。但它也有猛烈的副作用——为夫妻们带来了说不尽的悲剧。"①原因来自于人类本身善变的、无法克服的天性,"主要的变,是内在的变,一种先天性身不由自主的变。上帝赋给人类的特质中,有'日久生厌'和'喜新厌旧'两项原素,这正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但适应在爱情上,却像一个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爆炸一次的核子弹"②。可以说,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素是柏杨提倡性爱自由的生理基础,从这个层面来看,柏杨后期婚恋观的基础其实依然是早期就形成的自然人性论,只是在此时进一步推进到一个更加激进、极端的程度而已。柏杨提出,面对人性易变采取的措施除了男女双方不断增强个人魅力与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更治标的办法,就是他们只同居而不结婚,享受爱情婚姻带来的性爱解放,而没有受到婚姻的约束,而等两人的爱情消失之后,就自动离开,这样就会避免产生婚姻中的怨偶,以及因为无法离婚而使夫妻采取谋杀手段摆脱对方的悲剧。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再受到爱情婚姻约束的性爱大解放,的确是女性摆脱残留的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流毒,解放个人自然人性,以及获得性爱平等权利的一个标志,相比自由恋爱婚姻,性爱自由更使现代女性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与平等权利。

如果说柏杨在前期杂文中提倡恋爱婚姻自由,为当时尚处于封建婚姻观念笼罩下的普通市民,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女性市民指出了一条通往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女性解放之路,那么在十年之后的后期杂文集中,柏杨面对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环境,以及正在形成的新式爱情婚姻观念,敏锐观察到城市人群的爱情婚姻正面临着多元化的趋势。而传统的婚姻与新式的同居并存,现代女性在新环境之下具有某种社会优势,成为傲视群雄的强哉骄,以及在爱情婚姻中面临的困境——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的笼罩。而柏杨独特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使他如同十年前一样,依然站在建立较完善的市民社会和尊重人性的一贯立场上,来思考这些新情况。他在后期杂文中提出,现代女性要想获得彻底解放,需要面对多元的婚姻观念,她们要认识到性爱与自由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现实环境允许她们接受性爱自由的新式观念,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现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了这种观念。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54—355页。

② 同上书,第355页。

不过有些令人遗憾的是，柏杨在后期杂文中，对性爱与自由的关系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详细讨论，而且这几本后期散文集对婚姻爱情进行讨论的篇幅只有几十篇，在数量上也远远不及早期杂文。柏杨虽然看到了不结婚只同居等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性爱解放对女性获得彻底解放具有重大意义，也看出女性性爱解放，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柏杨似乎对此失去了兴趣，不再讨论这些问题。柏杨在同时期发表的《白话版资治通鉴》与《皇后之死》等史传著作中，转而对中国历史中的皇族女性的处境与解放问题详加讨论。

可以这样说，这个变化在柏杨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这并不代表柏杨在杂文中已经江郎才尽，而是显露出柏杨思想观念中的一种焦虑，这也是他把现代性世俗化之后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困境，正是这个困境使柏杨无法再写出现实针对性极强的杂文来。具体而言，一方面，柏杨在十年牢狱之后回到现代都市社会，面对日新月异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难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他很快就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智慧捕捉到当下社会中婚恋观念与五六十年代明显不同，而且通过杂文描绘和讨论这种新变化，即现代女性可以有自由和权利来选择多种婚恋方式。因而追求性爱自由将是她们在婚恋领域中获得与男性彻底平等平权的重要一步，是她们一步步摆脱外部条件和环境的束缚，身心获得进一步解放的标志。可以说，柏杨对现代女性获得性爱自由持赞成态度，另一方面却又对此忧心忡忡。因为柏杨看到性爱的自由与解放同样也是双刃剑，表面上使现代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追逐情欲的自由权利，而且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合情、合理，以及被公众默认的合法行为，实际上却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女性性爱解放其实是整个社会性爱欲望泛滥潮流中的一支。换言之，提倡女性性爱解放的思想观念，其实是现代社会情欲解放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使现代女性抖掉伦理道德观念的枷锁，能够自愿参与到情欲解放的社会游戏中。那么，这会使现代女性获得她们期盼已久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彻底解放吗？是否她们在为性爱自由欢欣鼓舞的时候，其实却落入了只重视肉体享乐，而忽视婚恋中责任义务的新式陷阱？而且"强哉骄"女性形象是否反过来形成对男性的某种压迫和不平等，如同中国千百年男性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戕害？应该如何正确衡量性爱解放带给现代女性的得失？正是性爱自由的两面性，说明它并非是女性解放要达到的终点，因而女性也不可能通过性爱自由而获得彻底解放。也就是说，现代女性要获得完全解放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现代女性还要经过怎样的抗争，获得什么样的权力与自由，才能够达到彻底解放呢？柏杨认识到了

女性解放的长久性与复杂性，他无法再像在早期杂文中一样，给予这些问题以广泛深入的讨论以及给出确切答案，或许，柏杨在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提出比较完满的解决方案。

但是，即使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柏杨对女性解放之路的认识，也需要承认的是，他当时已经看到性爱自由的双面性特点，以及它对强哉骄现代女性的双重意义——既进一步获得解放，又得到新的枷锁——已经被90年代台湾社会情欲解放潮流的发展所证明。现代女性性爱上的解放，使很多激进的强哉骄女性率先走到另一个极端，90年代之后的台湾社会就出现了一部分个人情欲极度解放的"豪爽女人"①，她们的行为迎合了社会性爱解放的大潮。虽然女性主义者们欢呼为此进行欢呼，却无法回避带给现代女性的新危机：如果爱情婚恋完全被性爱所代替，男性固然成为女性性爱的发泄对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女性是否也仅变为男性性爱发泄的工具而已？这种性爱解放也产生相应消极的社会后果，随之带来社会道德风气的淫乱堕落，性爱自由产生的不婚不孕亦使台湾人口减少，而且都市中的人们都要面临巨大的精神危机：没有爱情婚姻安全感，人人都变成了及时行乐的薄情郎与放荡女。这些都是情欲解放带来的后果。

柏杨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的存在，从另一个侧面暗示出女性解放道路的艰难，以及女性并没有在心理上完全形成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这样说，虽然性爱解放会使女性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利，不过女性要想真正获得彻底解放，或许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途，因为大男人沙文主义等中国封建社会"酱缸文化"残留下来的余毒，并没有随着人们新婚恋观念的建立而消失殆尽，依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统治着现代都市男女的爱情婚姻生活。从这个层面来说，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性尊严与独立意识的反封建任务并没有结束，对市民社会精神层面中反"酱缸文化"的建设亦亟待加强，这依然是柏杨需要承担起来的写作使命。

这些疑问使柏杨的写作面临着一个困境，即是否继续对女性解放和婚恋问题讨论下去？这些问题是否能够被探讨下去？这亦是他的现代化世俗化思想所要面临的两种选择：要么重新调整现有的杂文思路和作者的婚恋观念，继续讨论当前社会中的妇女解放和婚恋问题；要么另辟新路，避开当下现实，转回到历史场景中去继续探讨它们。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柏杨来说，如果选择前者，那么所面临的现

① 可参考何春蕤著《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一书中的观点，台北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

实难度将非常大。因为柏杨看到现代社会情欲解放的潮流和妇女解放的历程，并非是个体作家仅凭文学作品产生的力量就能够改变的。从 80 年代新的社会环境来说，随着台湾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渐解冻，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和消费文化趋势，正使所有的文学作品慢慢失去它的“轰动效应”，文学创作逐渐变为一种边缘化的社会行为。而中国内地则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也开始经历台湾社会此刻所经过的这种文学衰落，作品失去大量读者群。柏杨的杂文亦失去了十几年前那种左右世道人心的巨大作用，当年他的杂文被某些读者指控为“人心不古，世道式微，柏杨杂文应付其责”①，而且被广大读者当做婚姻恋爱专家来崇拜，达到了一个杂文家生涯的最高顶点，虽然他为此受到某些指责，甚至因杂文批判的尖锐性激怒当局而入狱，却也证明了这些作品曾经产生过的巨大的社会力量。遗憾的是，这种盛况在 80 年代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现实环境不会允许柏杨继续在杂文中深入探讨婚恋问题。如果他希望依旧在文学作品中关注这些问题的话，就必须选择写作转型。除此原因之外，再加上柏杨在狱中十年逐渐培养起来的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均促使柏杨转向关注中国历史和历史中女性的命运，以此来批判“酱缸文化”以便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把《自由中国》的接力棒在历史研究领域继续传承下去。

总体来看，柏杨的罗曼司小说和一部分杂文均涉及女性的婚姻、恋爱、家庭问题，体现了对于女性人性尊严的理解。他从女性身体形象谈起，继而到心灵自我的深度，继而又深入到维持婚姻法则的探索，最后还在渐渐取得自由与主体性的性爱中不断寻找确认人性尊严的形式与内容。虽然柏杨最终在确认人性尊严的道路上没有完成其世俗现代性的建构，但这种探索的意义是超越了时代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从这些被封建卫道者们所鄙夷的婚恋小事中，看到了中国现代女性如何借助自由恋爱来反叛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从而使人格和心理逐渐获得自由解放的过程。他还关注女性解放在当下社会面临的新困境，具体包括女性从外貌穿着打扮到内心独立自主意识的形成，从自由恋爱中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与男女平等观念，到只同居不结婚和追求性爱自由所带来的进一步自由解放意识，以及由性爱极度解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情感与社会问题等。可以说，女性解放之路的曲折复杂亦在这些作品中得到细致呈现。其次，在这些作品中，柏杨还把男女婚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6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260 页。

恋问题当做一门艺术和学问来加以严肃探讨，并非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角度，用科学辩证的态度加以分析。他除了发现婚恋领域存在的诸多实际问题之外，也相应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供广大都市男女参考。并且他的婚恋观念始终贯穿着男女平权、自由平等、尊重人性、人性尊严等把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观念，使其具有了心理学史、社会学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文学史上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全可以把柏杨看成是一个称职的爱情婚姻专家。当然，由于柏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现代市民社会系统，他所关注的女性解放和男女婚恋问题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感。也就是说，他在作品中讨论的这些问题，其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都是当时人们将会和已经在当下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因此在柏杨五六十年代和 80 年代的小说与杂文作品中，没有涉及同性恋之爱，因为那时同性恋现象还没有浮出历史地表，尚处于萌芽阶段，只有到 90 年代情欲解放的大潮中，同性恋才开始公开化并且成为一种风气。毕竟，同性恋爱只是一种处于边缘化的恋爱方式，柏杨没有对此加以探讨，除了因为这种现象在当时社会里尚未成为一种婚恋问题之外，更可能的原因或许在于，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自始至终是柏杨的信条，他希望通过作品文本建构的是具有自由、平等、人性尊严、灵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意识的个人主体，这亦成为他的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柏杨已经在讨论性爱解放的问题上遭遇写作困境，他在内心中更不愿意讨论与他的人生价值观相悖的同性恋现象。与此同时，他的写作兴趣又已经转移到对历史典籍的重新写作上，因而就干脆放弃了对这些具有现实敏感性的婚恋问题的讨论。在由演讲录汇编而成的《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主要关注的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而很少谈论男女婚恋问题。他把婚恋问题留给了《皇后之死》等文学色彩浓厚的史传作品，标志着柏杨已经从一种崭新的角度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由此进入撰写中国历史作品的“十年通鉴”时期。

第五章　建构人道主义

第一节　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

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尺度,乃至历史的积淀最终体现为人的形象,以何种态度对待人成为探试作家思想境界的试金石。和其他为人称道的著名作家一样,柏杨一直秉承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关注着人,思考着人,从而也形成了其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具体表现为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话语——人道主义体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继续展开对现代市民之建构。

柏杨的人道主义思想形成于特殊的现代性语境之中。就其历史性而言,柏杨人道主义思想的来源大致有两个,其一是《自由中国》所拥有的五四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所提倡的"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伊始,把人当成人来看待,重视人的尊严,关心、同情妇女儿童和社会弱者的人道主义就成为五四传统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所包含的一个中心观念。接过《自由中国》传统的柏杨之所以把自由、平等、人性尊严和法治当做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系统的核心观念,正是由于人道主义是其基础理念,他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生发出上述这些观念。柏杨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则是他自身天性中的义愤和正义之感,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论述过,也是他把现代性加以世俗化的一个动因,在此不再赘述。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的人道主义观念框架,具体包含西方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观念,而且融合了个人性情和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侠义精神的特质。因此,这样的人道主义观念,既与现代性的人道主义观念有很多交叉重叠之处,即人道主义具有超越各个种族、阶级、文化和信仰差异的普世性,内容包括天赋人权,每个人生而平等,以及同情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同时具有现代性世俗一翼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柏杨的态度

立场上。换言之,柏杨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市民中的一员,他把那些精英知识分子嘲弄地称作"学院派"。早在60年代,柏杨就声明自己不是学院派,而是一个"野生知识分子"。二十多年之后,柏杨在谈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成因的时候,依然坚持这个态度:"我先要有个声明,我不是学院派,关于'定义'这东西,无法给予精密的说明。我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到现在未写的原因,是没有时间。但我受到《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书的影响。这些书都是作者对自己国度丑陋面的一种感触,一种观察,一种检讨:不是纯学术性的一种分析。我也听过许多专家谈到民族性的问题,实在是术语太多,行话太多,而不是我原来的想法。"①因此他没有精英知识分子们对普通民众居高临下的那种俯视姿态,而是站在平民(市民)的立场来说话。虽然他批判的焦点是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和"丑陋的中国人",不过他却把原本是现代性中理性启蒙批判的关注点放在当时社会世俗的日常生活和道德风俗习惯上。虽然他在60年代写就的最后一部杂文集《死不认错集》中表现出浓厚的政论色彩,公开与当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复古运动唱反调,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进行针砭和对政府工作人员不关心民众死活、只顾自己升官发财的丑恶社会现象进行强烈鞭挞,不过也是放在男女婚姻恋爱等家庭伦理观念以及其他日常生活起居现象来进行分析。柏杨以小见大,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层面上产生的问题,而非政治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他采取的是与象牙塔中的"学院派"完全不同的一种姿态,也不是《自由中国》式的直接干涉国计民生大业和对政府颁布的政策条款进行批判的政论立场。可以说这是柏杨对现代性精英面向的一个纠正和补充,是对现代性久已忽视的世俗层面的一个强调,充分表现出他独特的现代性思想。

虽然柏杨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非是具有严密思维逻辑的理论体系,这主要与他毕竟是一个依靠形象思维来写作的作家,而非职业思想家、理论家有关。不过正如陈映真所说的:"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②可以这样说,虽然柏杨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史传作品体现出的思想,并没有被世人充分认识到其价值意义,但是他在杂文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伟大和无法否认的,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其中尤以"酱缸批判"和"丑陋的中国人"思想最为引人注目。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系统和概念范畴。因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3页。

② 陈映真:《归乡》,昆仑出版社,2001年。

而从这个层面来说，柏杨又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的伟大文艺家。他的人道主义理念也自有其特点，体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折时期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具体思考。

如前所述，由于柏杨的人道主义观念受到《自由中国》所继承的五四精神的深刻影响，因此自然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柏杨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在世界人道主义思潮中来考察的话，则会发现柏杨的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有某种有趣的吻合之处，虽然柏杨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或许，这也能够说明，柏杨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能够简单地用是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而应该用是否会使社会向着更先进和文明的历史阶段前进作为其衡量尺度，这也正体现了柏杨人道主义思想的现代性品质的时代指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是西方社会中很有影响的一股思潮，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陈枢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中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特点："第一，在对人性、人的本质理解上，认为人是人的最高价值、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把人当人看，尊重人，爱人。

第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理解上，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中心。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抽象的个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作为其出发点，并以此来理解和解决一切哲学问题。

第三，在对马克思的异化观的理解上，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分离，异化的克服就是人向自己的'类'本质的复归。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范畴最为确切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核心范畴。

第四，在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上，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体性被忽视了，过分地强调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性。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到萨特的自由选择，贯穿着一条强调和突出人的主体性的路线。

第五，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以人为中介的辩证法。"①

而柏杨也始终把尊重人的个体生命和尊严放在首位，以人为现代性的出发点，把普通人作为社会的主体，这一点与西方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潮一

---

① 陈枢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9期，第9页。

致，他的早期杂文之所以对“酱缸文化”中存在的四类“畸形人”和酱缸蛆猛烈抨击，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畸形人没有生命尊严，没有形成个人主体性，更缺乏个人尊严和人权保障，由此造就了中国人彼此之间缺乏同情心的冷漠猜忌气质，使中国不再是礼仪之邦，而是变成冷漠猜忌之邦。这并非是说，柏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从柏杨的信仰与生活环境来看，他绝无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种观点的一致性只能够说明，柏杨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这也是柏杨的思想在今天并没有过时，依然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具有借鉴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言之，这也证明了，他把现代性加以世俗化的选择是正确的，现代性的世俗化倾向是现代性历程的必然发展趋势。

柏杨的人道主义观念虽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完善的市民社会系统，是把中国建成一个拥有民主法制、自由、富有人道主义的现代法治国家。因此他的人道主义观念着重从文化角度出发，针对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如同鲁迅一样，他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和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以达到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目的。具体而言，柏杨的人道主义除了涉及个人尊严的范畴之外，还包含着民族尊严。柏杨认为，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民族自尊心的保持和个人自尊心的养成息息相关，其原因在于“保持民族自尊心的唯一方法是把别人当人，这要先从根绝酷刑拷打做起。……个人自尊即民族元气，保持一分算一分，一个人的自尊一丧，便啥卑鄙奇怪的事都做得出。民族元气一丧，不亡国灭种，已经算很客气啦”。紧接着，柏杨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三条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希望不要过问别人的私生活。我们必须要新的观念，了解私生活并不那么尖锐的和国家和天下有关。每个人都有保持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安乐窝。如此大家的精力才可以用到正路上，不必努力窥探别人的秘密，这才是消除暴戾之气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把人当人的方法之一。……古人云：‘知人隐私者不详。’意思说将有杀身之祸。我想自己祥不祥没有关系，主要的还是国家不祥，民族不祥。第二，尊重专家。……这种‘权力高于一切’的观念，要想国家有救，必须连根铲除，转而承认专家的价值。任何超级二抓牌，可以利用专家的决定，但不能蔑视专家的决定。而小民遇到官崽和专家的冲突时，必须选择专家，不能由谁乱‘封’。……第三，公教人员必须提高待遇。……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是救国复国，建国强国，甚至是‘平天下’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啥都别谈，谈得多啦，徒费唾沫。无论古今中外，公教人员待遇高低，

和国势强弱，成正比例。"[①]以上这三种办法所针对的主体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尤其第三条主要是针对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居民所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杨的人道主义观念是为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市民社会服务的。

柏杨基于人道主义思想，最激烈抨击的就是封建社会中的主奴之分，以及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奴思想对当前社会与人性自尊的毒害。在柏杨看来，主奴思想与暴君暴政是一体两面，在主奴思想观念中，皇帝是主人，而天下的民众都是他的奴才，要无条件地、甚至是毫无尊严地服从他，为他甘心付出一切而毫无怨言，这样自然很容易使君王皇帝的权力得到无限膨胀和扩大，造成暴君和暴政，这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像隋炀帝等暴君，因为根本就没有其他人能够对他进行制约。反之亦然，暴君的出现更加剧了主奴分化的程度，在暴君暴政之下的小民不但没有个人尊严，可能连生命都有被主人随时夺去的危险。主奴思想和暴君暴政均是"酱缸文化"的产物，"正是'酱缸文化'造成暴君暴官，使他们无法无天；又造就了黎民百姓，教他们奴性十足。两者共同制造灾难，也共同在灾难之中，表演丑态"[②]。也就是说，正是"酱缸文化"对人性尊严和人权的践踏，才造成了毫无人道主义思想的主奴观念。

柏仁执笔的《中国人的十大奴性——论中国人的丑陋致柏杨》一文沉痛指出："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隶。因为'酱缸文化'告诉他：江山属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人民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中国人的希望，也就是在'太平盛世'做奴隶，甘心纳粮服役。因为这样的机会，都并非容易得到，所以一旦得到，自然是拱手相庆，感谢上苍，保证做顺民到底。"然后就依次列举出中国人的十大奴性特征："一、中国人有'万岁癖'。自古喊惯了'万岁'，所以患有遗传性的'万岁癖'，称皇帝为'万岁爷'。无论他是谁，哪怕是流氓、恶棍、强盗，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銮殿，人民就会三呼万岁，顶礼膜拜。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万岁癖'更有恶性发展。……二、中国人有迷信症。这也是遗传性的，生来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贬入地下，从来不敢说自己和皇帝一样，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龙下凡。……三、中国人对于暴君暴官，从来就奉行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4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591—595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66页。

‘忍’字哲学。无论是抓丁拉夫，还是横征暴敛，乃至大开杀戒，中国人都是忍！忍！忍！……能忍者自安——传统的人生哲学，无师自通！四、中国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却奉行‘奴性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人都愿意做奴隶，就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五、中国人惯于同类相残——这大概是‘窝里斗’的一种表现形式吧。面对暴君暴官的欺压和杀戮，中国人的反应不是团结一致，起来反抗，反而是同类相残。官府一旦指某人为‘贼’为‘匪’，人们就会随之骂‘贼’骂‘匪’，并协助官府一起捉之。这一点同样相传至今，并且恶性发展。……永远同类相残、相残同类，胜利者永远是暴君暴官。六、中国人崇尚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在中国内地有两条解释：一是绝不触犯‘天条’，二是在灾难中决不同情任何人。说穿了就是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诚然，他们不陷害无辜，但也绝不反抗邪恶，他们只求苟安、苟活。……七，中国人靠希望过日子。因为中国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君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官，希望暴君变成‘明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如此他们才可以获得温饱。这同样是中国人的传统。历代帝王无不利用这个传统，推行愚民政策。……八、中国人的确有神经质的恐惧症。……因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压，总感到随时都会大祸从天降。一旦大祸临头，不但自己掉头，还会满门抄斩。……九、中国人喜欢框框。……当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古代，不单是写文章、讲话、教书，要遵照框框，就是婚丧嫁娶，以及拍拖恋爱，都不可以超出框框。……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喜欢框框呢？因为喜欢它，就不会超越它，这样就安全得多。所以许多人习惯成自然，真的爱上了框框！不仅自己不超越，也不准别人超越。十、中国人是变色龙。……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欢的。”①以上所列举出的中国人的十大奴性，可说与鲁迅关于中国人奴性之说遥相呼应，并且对奴性的诠释更加全面和具体，把“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揭示出来，才能够引起国人警醒，达到“立（市民）人”的目的。

具体到作品来说，柏杨的人道主义观念主要体现在杂文和讽刺性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短篇小说集《怒航》和《凶手》等文本中。这些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和核心，把立足点放在对完善的市民社会系统中“人”的建设上。柏杨在早期非婚恋类的杂文中强烈针砭“酱缸文化”中的“畸形人”，在后期杂文中鞭挞“丑陋的中国人”，以及在讽刺谴责类小说中，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61—266页。

讽刺完全膜拜西方的"西崽",使他无论是对被"酱缸文化"浸染和腐蚀的中国历史,还是对当下现实中不符合现代化精神的社会风气和陋俗的批判,均带有鲜明的现代性世俗化特色,体现出柏杨一贯的思想品质。但应该看到,柏杨前期和后期在思想重点、批判指向、话语风格上也有不同,其前后两个时期的思想相互参较,以特殊的张力共同建构了其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下面将按前后两个阶段具体探讨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建构与体系合成。

第二节　"酱缸文化"批判[①]

柏杨的作品虽然数量庞大、类型繁多,但是最先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主要是杂文写作。1984 年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后结集成同名杂文集出版,其中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痼疾和其文化背景——"酱缸"的敏锐深刻乃至尖刻的批判,对中国传统粗陋风习的针砭和思考,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华人的震惊和自我反思。而在中国内地的"80 年代中期,正值中国内地反传统的批判思潮风起云涌,柏杨的论说更是推波助澜,引发了对传统文化更全面深入的反省"。[②]

其实早在 60 年代坐牢之前,柏杨就结集出版了 21 本杂文集,其中主要包括《玉雕集》(1962)、《怪马集》(1962)、《堡垒集》(1963)、《凤凰集》(1963)、《红袖集》(1963)、《神魂颠倒集》(1964)、《高山滚谷集》(1963)、《道貌岸然集》(1963)、《圣人集》(1963)、《前仰后合集》(1964)、《大愚若智集》(1965)、《闻过则怒集》(1965)、《立正集》(1965)、《心血来潮集》(1966)、《剥皮集》(1967)、《死不认错集》(1967)等等。柏杨在这些前期杂文作品中就已经提出了"酱缸"文化批判,还提出了"畸形人"的说法,而后者是前者的一个产物,是前者在社会现象中的具体体现。除了前四本杂文主要是以女性容貌和爱情婚姻为题材外,其他杂文集的内容,柏杨自述说"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所看到的和所感觉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

① 本节已经以《世俗现代性观照下的"酱缸文化"批判——浅论柏杨 60 年代杂文的思想内涵》为题,发表在《鲁东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上。与发表的论文相比,本节内容稍加修改,但是基本内容和观点一致。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 年,第 226 页。

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①。所以，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就成为柏杨60年代杂文的主要内容，凸显出柏杨对人道主义所倡导的个人对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的追求。

柏杨在1967年出版的杂文集《死不认错集》中明确提出了对"酱缸"的分析。在《酱缸特产》一文中，柏杨认为："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至少，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因为这些成分，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酱缸文化"也有它的产品，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仅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②雷锐在《柏杨评传》中对柏杨60年代21本杂文集中所涉及的"酱缸"理论的批判内容，有更加具体的认识和形象的比喻："柏杨从中国历史最古老的帝王开始，挖其祖坟，剥开掩盖其黑暗丑恶的华丽包装，结合当代社会中国人的丑陋处，指出几千年的封建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就像一个大酱缸，缸内汇集了大量人性的丑恶内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长期的因循守旧，'酱缸'日积月累，深不可测，一代代的中国人生活于其中，很多人早就失去了其独立人格，丧失其自尊，变成只会媚上压下的软骨动物。因而贪污盛行，忠奸不分，清浊不辨，内讧不已，毫无振作之力，毫无创作灵性，没有同情心与公德感。然而由于长期生活于酱缸内，人们不识其恶臭，懵懵然，昏昏然，甚至怡然自得。从西方的心理分析学说来看，柏杨揭示的'酱缸'酵素，实际上已融入中国人的遗传基因，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腐蚀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挖到了中国近百年来落后的根子，其意义伟大深远。"③

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柏杨杂文思想中的"酱缸文化"批判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释和分析。向阳在《猛撞酱缸的虫儿：试

---

① 柏杨：《柏杨回忆录》，周碧瑟执笔，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37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3—344页。

③ 雷锐主编：《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175—176页。

论柏杨杂文的文化批判意涵》中分析出了“酱缸文化”的道统和民性两个层面：“我们可以发现，柏杨提出‘酱缸’这个概念符号之下，它的符征（signifier）指得是具体的酱缸这样的形象（酱汁的容易保藏，经久不坏，及其发酵生产酱味），符指（signified）则指涉了两个心理概念：一是指涉‘儒家道统’（道德与政治双重威权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符号），二是指涉‘民族性格’（封建意识与士大夫意识混杂纠结的中国人性格）。道统由上而下，是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转的结果；民性则由下而上，是中国人在儒家文化霸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出来的结果。这两者，且又吊诡地互为影响，一方面，儒家道统在两千年的政治控制下，一脉相传，宰制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形成积累；一方面，两千年生活出来的民族性格，也相濡相习，成为常识，回过头去持续强化并支撑儒家道统的宰制。‘酱缸’于是成为柏杨所要表意（signification）的中国统治神化学的代名词，牢不可破，并不断发酵生发，使中国人的社会终于成为‘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①

但是陈晓明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在《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一文中，他认为“柏杨最典型有力的批判——‘酱缸’批判，就把问题的根本设立在国民性（或者说人性）上面。……柏杨归纳酱缸的主要成分都属于人性的范畴，但这种人性是如何形成的？‘长期斫丧’到底根源于制度或是人性？他并不追究。他现在要面对的就是‘灵性僵化’，‘品质堕落’的社会，他集中于批判这个当下的现实本身”②。由此他力图从现代性世俗批判的角度来剖析，为柏杨杂文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不过以上这些研究均是针对柏杨杂文整体的思想品格而言，并没有专门针对前期杂文，也就是60年代杂文的思想内涵进行专门剖析。其实纵观柏杨前期杂文对“酱缸”和“畸形人”的批判，可以视为是他的世俗现代性思想中人道主义观念的一个直接反应——从人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入手，批判权势崇拜，推崇法治和民主自由的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③。在鲁迅眼中，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其实就是“吃人”的文化和文明，这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性世俗化思

---

① 黎仁活主编：《柏杨的思想与文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50—51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239—240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01页。

想情怀的知识分子,柏杨对中国文化则用了更加富有民间色彩的概念——“酱缸”和“酱缸文化”来形容概括:“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酱缸文化”也有它的产品,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殭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①]柏杨还提出了与之相关联的“酱缸定律”和“酱缸蛆”两个概念,它们均是“酱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涉的是“酱缸文化”的具体产物,前者是指中国历史中的英雄豪杰被辱被杀的悲剧结局,后者其实是指“代帝王立言”的儒家体系中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也被柏杨谑称为是帝王将相的“摇尾系统”。与鲁迅的“染缸”说法相比较,“酱缸”和“酱缸文化”的说法更侧重探讨中国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对正常人性的戕害,其重心是放在人的平等和人格尊严上,这亦是柏杨杂文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追求的一个必然选择。

早在1925年,鲁迅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历史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②]相交叉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历史的主体不是人民大众,而只有主子和奴隶两种人存在,奴隶的社会地位只相当于牛马或者还不及牛马。在四十多年后,远在台湾的柏杨接过鲁迅传下来的接力棒,继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果说鲁迅对历史的考察是侧重社会阶级压迫而提出了主奴之区分,那么柏杨的世俗现代性视角则使他不仅仅从社会学,而且也从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多种角度来认识历史。他认识到,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酱缸文化”使中国人丧失了尊严和平等意识,以至心理扭曲变态,由此产生了四类“畸形人”,分别是集特权和凶残于一身的封建帝王、依附于政权并是其“帮凶”的知识分子和“圣崽”、狂热追求做官和权势的“官崽”,以及以做官和当圣人为最高目的的普通民众。其中帝王是其他三类畸形人的主子,对后者有生杀夺予的大权,而后三者自然就是奴才了,他们也甘愿当帝王的奴才,并且奴才也是分等级的,处于最底层的是普通民众,至于“官崽”和儒家“圣崽”,他们其实都是直接接受帝王主子奴役和压迫的奴才,不过因为是能够获得荣华富贵和权势地位的奴才,因此他们也是普通民众向往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3—344页。

② 同上书,第197页。

的目标，而且从社会制度层面的角度来看，帝王是通过政府官员对民众进行统治和压迫，通过灌输儒家礼教和伦理观念对人们进行精神上的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官崽和圣崽又变成了普通百姓的主子，因此，这两类奴才身份具有双重性：对帝王而言是卑颜屈膝的奴才，对普通百姓而言却是有权有势的主子，这亦使他们处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中间位置，中国封建制度的主奴之分不但得以形成，而且等级森严。可以说，这四类畸形人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又为后者的延续起到重要的维护作用，所以柏杨在"酱缸文化"批判中，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继承了鲁迅与恶势力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首先把目标瞄准这些畸形人进行猛烈批判，最能够体现出其前期杂文的"匕首和投枪"的特点来。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封建专制制度是"酱缸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柏杨的杂文中，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互换的，它们也是与柏杨世俗现代性观念最相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他就集中火力轰炸封建专制的标志——封建帝王，把中国历史中的帝王当做第一类畸形人，以此为中心展开对"酱缸文化"的批判。在"酱缸文化"中，帝王们不仅是其他畸形人的主子，他们还是主奴之分的具体实施者，而且为了进一步突出他们的特征，柏杨采用了一个更形象和通俗的比喻——"大嫖客"，来描述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国家和民众的残暴统治。在《前仰后合集》中，柏杨明确把帝王称作"大嫖客"，分别用"嫖客"和"妓女"来比喻说明封建帝王和后妃以及大臣官吏的不平等关系，从后两者对前者的物质与精神依赖性的角度，来分析封建社会中的主奴关系。具体而言，后妃们是专供这个"大嫖客"发泄性欲的"娼妓"，大臣则是精神上的"妓女"，为保住个人的荣华富贵而在精神上、物质上完全依附于帝王，这就使他们必然成为卑贱的奴才。而且"皇帝者，乃地头蛇型人物，又因生活在'妇人和小人'之手，对伦常贞操，根本视为粪土"，兽性膨胀到了极致，宫廷中的乱伦和乱交反而成为生活常态，由此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中缺少灵性的部分，在当皇帝的身上，可以找出一大堆。"[①]封建帝王不仅性爱泛滥，而且暴虐成性，所以宋代的皇帝"愚贱"，明代帝王"愚恶"，他们从不会考虑大臣和后宫妃嫔的生命和尊严，更遑论普通百姓了。皇帝之下的各级大臣官吏遂不得不成为精神上的"妓女"和奴才，为了保住性命和升官发财，不惜丢弃尊严和气节，以逢迎、取悦和获得帝王这个"嫖客"的欢心。柏杨接着分析出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皇帝较世界任何国家的皇帝都有绝

---

① 柏杨：《前仰后合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77页。

对权力，不但法律拘束不了他，连天理也拘束不了他"①。正是封建集权的"人治"制度，使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力，也使他没有任何廉耻之感，缺少任何约束和禁忌，自然产生了这种腐败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封建帝王是造成"酱缸文化"的罪魁祸首。"权势崇拜"自然也就成为"酱缸文化"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似乎有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天理国法人情，都抵挡不住权势"。无人权和社会等级差别等现象由此变成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主流。

中国古代帝王的这种"唯我独尊"的特权，不仅是由封建体制的政治制度和"酱缸文化"造成的，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以"圣人"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为特权现象提供了哲学和制度层面的理论依据，来证明和维护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正是柏杨基于世俗现代性观念所要尖锐抨击的。柏杨在《没有伦理观念》一文中痛斥孔孟等圣人："我们说圣人是帮凶，实在是故意温柔敦厚，其实他们不但是帮凶，简直还是正凶，至少，跟有权的大家伙是共犯。"②鲁迅也曾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过，"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③。鲁迅早就看出了孔子学说其实是证明统治者合法性的"帮凶"，只是柏杨的"帮凶"和"正凶"之说更加直接和尖刻而已。一方面圣人的学说成为封建帝王特权的保护伞，"盖圣人已经为当权派发明了畸形哲学，曰：'率海之民，莫非王臣，率海之滨，莫非王土。'人们的财产和老命原来竟都是他妈的大嫖客的，怪不得皇帝想干啥就干啥，也怪不得政府官员都成了裸体陪酒的娼妓也"④。甚至皇帝多妻制也是圣人们在《礼记》中予以承认的。圣人们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仪规范更是戕害扼杀女性正常人性要求的刑具。柏杨戏称圣人们为吃冷猪肉的"圣崽"，不但对他们毫无尊重之意，而且还猛烈抨击他们作为"帮凶"的伪善和残酷。为此他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酱缸蛆，就是"势利眼主义兼富贵功名之士"⑤，来形容知识分子在"酱缸文化"的浸染下，产生的这种势利眼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只是鼓励安分守己和屈服于权势的特性。

但是柏杨对圣人和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只停留在"帮凶"的酱缸蛆层

---

① 柏杨：《前仰后合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69页。
② 柏杨：《死不认错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3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19页。
④ 柏杨：《死不认错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3页。
⑤ 同上书，第32页。

面，而是看到了这个群体性格上的双重性。他们一面是权势的“帮凶”，是妓女群中的“老鸨”，制造理论来驯化众“妓女”，使她们服从皇帝“大嫖客”的独裁统治。但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种动物，……大多数只有一条路摆在脚前，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追随一位头目，听凭摆布”①。选择当“帮凶”是无奈之举。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是“酱缸文化”的受害者，尽管在名义上他们被尊为“帝王师”，实际上他们同样是处在封建帝王君主特权笼罩之下，同为依附于帝王的另一类“妓女”而已，毫无人权和平等自由而言。

“官崽”是“酱缸文化”中产生的第三类畸形人，被柏杨谑称为“二抓牌”，即一手抓金钱，一手抓权势的政府官员。柏杨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普通中国民众都把做官作为最高的追求，知识分子当然不例外，读圣贤书只为了做敲门砖，真正的目标是“货于帝王家”。即使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传统文化的流毒依然腐蚀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依然把当官以及由此获得权势地位，当做是一个天经地义的追求。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官之所以动人心魄，全因为官和物质享受不可分”②。只有作了官员，才能有金钱名利和权势的享受。柏杨还借《聊斋志异》给“官”下了一个定义，即“出则汽车飞机，欢呼迎送，宴会训话。入则高坐办公桌后，签字盖章，红包滚滚，权势滔滔，见者咧嘴而笑，半屁而坐，为之拉车门而穿大衣。此名为官”③。而圣人被人们推崇的主要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是封建政权秩序的倡导者和维护者，更因为他们有权给人官做。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圣人”也就是一种官职，因为也能给被尊为“圣人”的人带来荣华富贵。所以，“中国人似乎专门喜欢做官，和喜欢当圣人，最上策是既做官又兼当圣人，其次是当官，真到了做官无望，能弄个圣人干干，也还不错”④。

柏杨既详细梳理了帝王的“嫖客”、知识分子的“圣崽”、官僚的“官崽”的人格的种种畸变，又揭示了上述种种人格是怎样作为一种恶性基因沉隐于中国历史之中的特殊现象，这些认识无疑使他已经处于洞若观火的理性高度。在这种理性的烛照下，柏杨发现，与争作“圣崽”、“官崽”大为不同，人们非常不愿意当英雄豪杰，他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在酱缸里，只有愚鲁的人有前途，稍微有思想见解骨气才能的人，便只合有数不尽的灾难。”⑤

① 柏杨：《闻过则怒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79页。
③ 同上书，第78页。
④ 同上书，第64页。
⑤ 同上书，第107页。

由此柏杨又发明了一条定律:"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被轰隆轰隆罩到头上的帽子,跟他的行为,一定恰恰相反。"这就是"酱缸定律",所以"既然英雄矣,按照酱缸定律,就不会有好结果"①。柏杨沉痛地指出,每一个封建王朝的英雄豪杰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自己被抓被杀甚至全族人都被牵连而遭杀害。所有的英雄豪杰都成为"酱缸文化"的牺牲品,中国的历史"于是遂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既倒霉又遭殃的爱国志士和英雄豪杰,另一个极端是既富且贵,又阔而抖之的官崽群。夫'官'是坐汽车,乘飞机,训话签字,去外国落户传种的唯一快捷方式,教人之不爱之若狂,可乎!"②英雄的悲剧和官崽的闹剧,正是中国"酱缸文化"中缺乏灵性和自由平等的现代性意识所致。正是因为当官能够给当事人带来荣华富贵,而当英雄豪杰会带来灾难,因此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味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③而且"盖灵性被酱之后,正人君子,就有两副嘴脸,一曰群众嘴脸,一曰子弟嘴脸。对群众时一副嘴脸,对亲人时又是一副嘴脸。或上得台盘,或写起文章,或致起训词,或坐在办公桌后,是一副嘴脸;该嘴脸也,凛凛然大义灭亲,不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儿女,便另是一番嘴脸也"④。

"官场文化"也就随之产生,成为"酱缸文化"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柏杨把这戏称为"官崽大学堂",并把"一脸忠贞学"列为第一门重要功课,因为其主要有两个功能作用:"一是教主子越看越舒服。二是教主子越看越认为你对他忠心耿耿,千秋万世都不改变。有此二者,不要说当时的大人先生会欣赏,就是现在的大人先生也会欣赏。盖一个人被忠贞惯啦,非每天瞧一下忠贞的脸,便没有安全感也。"只有这种没有个人尊严和人权的"官崽"才能被当权派委以重任,由此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柏杨在《骂》一文中还总结出当官,尤其是当高官的一系列步骤,"'骂'一入官场,其意义即大变特变。柏杨先生在官崽大学堂担任教习,教的就是'挨骂学',对此有关精辟的阐扬,有志之士,可往旁听。夫'挨骂为升官之本',有些人想挨骂还不可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4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③ 同上书,第510—511页。

④ 同上书,第514页。

得。盖你收了红包的结果，如果不是挨骂，而是法律裁判，就一切都玩了蛋矣。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曰'打是亲，骂是爱'，指父母对子女而言，而能给你官做的人就是父母，被人给官做的就是儿子孙子重孙子"，"想当官的朋友必须把握此项秘诀，第一步是先往子孙圈里跳，第二步是取得挨骂资格，第三步是使老板自觉他是黄天霸，第四步是'挨骂学'、'买西瓜学'、'难得胡涂学'、'一脸忠贞学'出笼"。[1] 这就是中国封建官场文化的真面目。柏杨借助人道主义观念，不但在嬉笑怒骂中揭露出中国古代官场文化的丑陋，而且以古讽今，对今人也颇具反省的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柏杨早期杂文在整体风格上来说，虽然是以批判为主要基调，极力针砭上文提到的这四类"畸形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丑恶现象，不过柏杨的目的，是以现代性世俗化后的思想观念为宗旨，在批判中建立具有独立人格、正常人性、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拥有追求民主、法制、人权等思想的市民个体，因为虽然中国封建王朝制度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文化层面的"酱缸"流毒以各种方式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中，依然在有意无意地侵蚀和损害着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以，只有用具有健全现代化精神的市民个体代替"畸形人"，才能有希望打破这个在今天仍然扼杀中国人的灵性、生命、平等、尊严和人性的酱缸，这也是稀释和逐渐消除"酱缸"文化毒害的最关键一步。对于建构现代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体，柏杨提出诸多具体措施，包括"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2]。而为了培养个人的灵性和理智认知，只有通过多读书和思考，当然是阅读具有现代化思想的先进书籍来实现。他也反对把青年人都培养成"圣人"，因为圣人是泯灭了正常的人性和人情的畸形人，不符合他的现代性世俗化中的"正常人（市民）"观念。所以，他在《君子和小人》中明确提出："人性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子，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某一时刻是君子，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3]他以善恶掺杂的自然人性论观念为基础，认为只有正常的、合乎自然人性的独立人格树立起来之后，才存在消除狂热的"官崽"和官场文化的可能；至于"特权思想"的流毒，当然只有提倡法制和"平等"的理念才有希望根除掉，才可能尊重人权。

综上所述，柏杨在20世纪60年代的杂文中，紧紧抓住"酱缸文化"以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4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565—566页。

② 柏杨：《闻过则怒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5页。

③ 柏杨：《圣人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39页。

及由此产生的“畸形人”和各种畸形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中病态的一面，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抨击，并且以古讽今，从“立人”角度对酱缸流毒进行了清算。柏杨运笔尖锐，如同仗剑行侠、慷慨激昂的剑客，遇见世间不平事立即就拔剑出手砍杀，毫不犹豫，同时其反对专制、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情怀，也由此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从这个层面来说，柏杨的这些针砭酱缸“畸形人”的60年代杂文，的确发挥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不仅在台湾文学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第三节 中国人国民性批判

柏杨曾因杂文写作而被誉为“台湾的鲁迅”，他继承了鲁迅在《华盖集》中所说的“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则就会日上”[①]的杂文文风。不过，鲁迅最初写作杂文的目的是为了启蒙民众、反对中国封建文化，而柏杨虽然也是因为出于批判当时台湾社会不良的社会风气、各种陋习的现代性世俗化情怀而开设专栏写作杂文，但是柏杨的杂文主题和杂文风格显然与鲁迅的杂文，尤其是与鲁迅早期的《坟》、《热风》等拥有幽愤深广特点的早期杂文不同。柏杨最早的杂文集是1962年出版的两部杂文集，一本是专谈现代女性外貌和衣着打扮的《玉雕集》，另一本《怪马集》“内容以现状为主，先叙社会现象，指出大众的崇拜与迷思，剖析其中不合理、不恰当之处。他以人性为目标，欲破除迷信……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柏杨的火力目标”[②]。以此为开端，柏杨的早期杂文沿着这两个向度发展，即使是在十年牢狱之后写的后期杂文中，他在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同时，也依然不忘关注女性问题和婚恋问题。虽然可以说他探讨现代女性穿衣打扮和男女婚恋问题的杂文，也贯穿着“酱缸文化”批判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两个向度有交汇之处。但是他如此大量篇幅地、有系统地探讨女性和婚恋问题，这是鲁迅杂文所没有的，主要原因在于，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使他更关注日常生活琐事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柏杨那些专门批判“酱缸文化”和中国人国民性的《怪马

① 鲁迅：《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51页。

集》、《圣人集》等杂文集相比较，这些女性、婚恋主题的杂文反而表现出，他的杂文意识更接近于杂文文体的艺术本质。杂文的首要特征是“杂”和“多”，即各种各样的话题皆可入文，长短形式不拘。其次在于杂文具有独特的杂文意识：“说明了杂文的自我意识：那种‘深’而‘广’，‘高’而‘大’的东西，是不属于杂文的世界的，因为杂文同生活相关联的媒介不是‘静观默想’或‘心开意阔’；不是距离和沉思；不是‘正人君子’的‘平正通达’，而是‘碰钉子’、‘碰壁’；是‘悲苦激愤’；是‘创伤’和‘病痛’；是交着‘华盖运’的‘常人’的‘活在人间’。”[①]虽然这是张旭东通过分析鲁迅处于前后期过渡阶段所写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三部杂文集而得出的结论，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柏杨的杂文。具体来说，柏杨的杂文不仅包括会“碰壁”、“碰钉子”的国民性批判、“酱缸文化”批判等内容，更包括了鲁迅等知识分子没有展开具体讨论的妇女问题和男女婚恋、家庭伦理等更“杂”、与现实生活更密切相关的内容。换一句话说，柏杨进一步发展了杂文内容的“杂”和贴近现实生活的艺术特质。柏杨杂文的这个特点，同样是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一个产物。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杂文不但体现出清醒地“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思想意识，而且《女吊》、《忽然想到》、《马上支日记》等杂文也表现出鲁迅对自己内心黑暗一面的反省和反思，这也构成了鲁迅生命哲学的一个层面。柏杨则把对自我的反省外化为“柏杨糟老头”和“柏杨太太”的形象。“柏杨糟老头”头发花白，是一个依靠稿费为生、爱财如命、思想守旧、贫穷潦倒的普通平民形象。柏杨太太则是一个小脚放大后走路“一拧一拧”，拿着绣花手帕掩嘴而笑、土气平庸的旧式女性形象。这两个人物形象与其说是作家柏杨对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些国民性弱点的形象批判，不如说作家对他们滑稽讽刺、漫画式的描写，更多是为了造成一种幽默的喜剧色彩，类似于鲁迅所言的“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产生的喜剧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柏杨杂文的思想无法达到鲁迅的忧愤深广的层次，但这也是柏杨追求现代性思想世俗化的一个必然选择，因为柏杨夫妇的形象拉近了柏杨杂文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是柏杨这个“野生知识分子”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如同《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是鲁迅杂文从前期转向后期的过渡性杂文集，出现了与此前杂文不同的某些特点来，《蛇腰集》和《死不认错集》也

---

①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是柏杨前期杂文中的最后两部杂文集，从中亦可以看出柏杨杂文和其现代性思想的某些微妙变化来。根据作者的序言可知，《蛇腰集》之名来自描述女性的纤纤细腰，谈论女性和婚恋构成这部杂文集的一个主要内容。可说这部杂文集对女性外貌和婚恋观的探讨没有体现出特别的地方来，依然在柏杨前期杂文内容范围之内。而值得注意的则是稍晚一点出版的杂文集《死不认错集》，这也是柏杨在 1967 年出版的最后一部杂文集，既是前期杂文“酱缸文化”批判主题的巅峰，又是作者杂文风格和其现代性思想出现微妙波动的一个体现。

正是在《死不认错集》中，柏杨首次明确提出“酱缸文化”的概念、表现症状和其产物，可说这是柏杨对此前“酱缸文化”批判思想体系的一个归纳总结和深化，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此时完全、成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杂文相比，《死不认错集》中的 51 篇杂文除了保持柏杨嬉笑怒骂地针砭社会黑暗面和封建文化糟粕的一贯风格之外，其批判性和目的性更加直接和尖锐，带有更多政论性的锋芒。第一篇《亲临学》就以讽刺常见的官场“亲临学”现象为开端奠定整部杂文集的基调，“遇到典礼，准有人‘亲临剪彩’；遇到会议，准有人‘亲临主持’；遇到热闹，也准有人‘亲临参加’。大家伙亲临学，以够誉满天下，芝麻绿豆动不动也亲临学，就更使人感激涕零，不知所云”①。而这些擅长亲临学的“大人物”，却不关心人民的生命安危，只顾自己升官敛财，大部分的普通民众依然如鲁迅笔下观看“示众”的民众一样，愚昧并缺乏同情心，社会也由此成为一个“酱缸文化”的流毒泛滥的“非人”社会。其他的杂文，包括《酱缸特产》、《化淫棍为圣明》、《只鼓励安分》、《一盘散沙》、《第一是保护自己》、《明哲保身》、《中国的“礼”》等绝大部分篇章，均是批判“酱缸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和当下社会中的种种症状。而且柏杨几乎是全方位地，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等层面，对中国历史和当下社会中的“酱缸文化”、儒家文化思想进行尖锐批判，毫不留情。在柏杨笔下，中国古代史书不仅是鬼话连篇的封建帝王史，而且“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②。因而柏杨对中国史书、官场文化和“官崽”的批判，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会连带到对官场制度和封建政治制度的批判，带有某种政治批判的色彩。更何况柏杨对“酱缸文化”进行定义是从社会层面入手：“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6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319 页。

② 同上书，第 379 页。

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①。社会意识往往无法避免地掺杂着某些意识形态，这也是甘阳在《猛撞酱缸的虫儿：试论柏杨杂文的文化批判意涵》一文中，专门分析“酱缸文化”包含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死不认错集》把此前杂文集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儒家学说和当时台湾社会现状的批判，拓展到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某些层面，同时少用曲笔而多是直截了当地抨击，一些杂文带有政论色彩，风格更接近《自由中国》雷振等人的政论文。这与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情怀并不完全相符。柏杨的现代性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微妙变化，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与杂文自身的艺术特质有关。众所周知，杂文是在鲁迅手中成熟且得以发扬光大，其精炼的形式和批判性、攻击性的内容成为杂文最独特的特点。而政论文在形式的短小精悍、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职能上，与杂文有相似之处。更具体一点来说，政论文和杂文的区分并不是很严格，两者有互相渗透、类似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政论文如果只是批判某些社会现象而不牵涉到对社会政治和社会制度批判的话，可以看成是杂文。对杂文来说，同样如此。因而对接过《自由中国》“棒子”的柏杨来说，他在《死不认错集》中对“酱缸文化”的系统性分析，既是他对自己思想的一个系统总结和深化，又是此时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倾向于精英知识分子们的启蒙情怀的一个表征，尽管这种思想变化是微妙的、不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死不认错集》实际上可看做是柏杨试图回到现代性精英一翼的一种尝试，这也说明感时忧国和启蒙救亡意识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潜意识，虽然柏杨声明自己只是撰写杂文以养家糊口而已，并不关心国计民生大事。不过这种尝试却因柏杨被捕入狱而被迫中断。而柏杨在近十年后刑满出狱，他的思想意识又回到现代性世俗化层面，坚持自己的杂文不是批判社会政治制度的政论性杂文，而是挖掘中国人的国民性病根——“酱缸文化”的文化批判性杂文，后期杂文的内容依然是婚姻恋爱、人世生活百态和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因而柏杨的现代性思想在《死不认错集》中表现出的这些微妙变化，就没有机会继续发展下去。柏杨的被捕入狱，既是国民党在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广布文字狱、大肆迫害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又一个铁证，又可说是现代杂文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命运：杂文应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3页。

该体现出现代性倾向世俗化的一面，而不是成为只承担现代性的启蒙和救亡意识的一种工具。杂文没有必要突破自己的艺术特性转向政论文风格，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好作为匕首和投枪，而不是导弹和大炮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功能。在后期杂文时期，柏杨强调自己的杂文只关心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原因也在于此。

柏杨于1977年4月刑满出狱，他从1977年7月就开始在《中国时报》上开设"柏杨专栏"撰写杂文，接续中断了十年之久的杂文写作。不过柏杨后期的杂文只集结成了几个集子和一些汇编成册的访谈录，上一章节已经列举过，具体包括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活该他喝酪浆》、《按牌理出牌》、《大男人沙文主义》、《早起的虫儿》和《踩了他的尾巴》，这是柏杨后期杂文的主要代表作品，柏杨后期人道主义思想和国民性批判中"立人"思想，均包含其中。

此后他在1985年结集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也是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轰动的一本杂文汇编集，除了收录有与该杂文集同名的演讲录《丑陋的中国人》之外，"此篇讲稿和另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及三十二篇杂文组成的'老昏病大展'结集，并收入二十篇回应文章，合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中国内地版、韩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纷纷出版，大约十年之间风波不断，海峡两岸都出有评论专书"[①]。而其中的《老昏病大展》诸篇，均是从早期的杂文汇编集《猛撞酱缸集》和后期的《按牌理出牌》、《早起的虫儿》等杂文集摘录出来的篇章，里面对中国人丑陋面的展示和针砭，其实是柏杨前、后期杂文从国民性角度对"酱缸文化"进行批判的一个资料总汇。从这个角度来说，《丑陋的中国人》并不能够算是柏杨后期杂文的代表作，只能说是他的所有杂文围绕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一个汇编集而已。但是这部杂文汇编集在中国内地引起巨大反响，在80年代的中国内地刮起"柏杨热"之风。香港的《东方日报》曾在1987年登载过胡菊人的《大陆"柏杨热"》一文，详细介绍过《丑陋的中国人》在台湾、海外和中国内地流行的情况："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文，最初在《百姓半月刊》刊登后，便在中国内地辗转流传，到处复印，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手中传阅。接着《丑陋的中国人》一文，加上其他学者、作家的反应文章，汇编成一部书，在台湾出版，风行台湾和海外，而广州花城出版社乃将整部书'盗印'（说'盗'因为未经柏老的同意也没有付版税），行销大江南北。……最近中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页。

国内地有个现象,说湖南出现了‘三种人’的扰乱。所谓‘三种人’,其实是三部有‘人’字为名的书。一是《丑陋的中国人》、二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三是《周作人文选》。扰乱者也,乃是人们纷纷抢购,抬高价到四十元人民币一部。……从去年(一九八六)开始,中国内地就已经刮起了‘柏杨热’,北京大学在去年举办了一个演讲会,题目是《介绍柏杨》,一下就到了三千听众,可见热烈欢迎之一斑。"[①]而朱洪海的《柏杨思想对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人"的影响》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详细探讨了《丑陋的中国人》中的"酱缸文化",在思想上对中国内地80年代的学生和学者们产生的强烈影响,"‘酱缸文化’来到中国内地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内地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1984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中国内地,‘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中国内地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这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②]。也就是说,《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扇大门,国内外大量的读者、学者们通过推开这扇大门才走进柏杨的杂文世界,广泛认识到柏杨杂文的思想价值、社会价值,以后逐渐推广到对60年代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丑陋的中国人》其实是柏杨整个杂文思想的一个总结与深化。

至于访谈录式杂文集《酱缸震荡》,按照访问者日本作家黄文雄的《日文版序》的说法:"为了使读者更理解柏杨‘中国人论’的真意与真谛。去年(九四年)十月初,笔者初访柏杨先生。十一月底、今年一月中旬,自东京来台北计五次请教于柏杨先生,对谈九小时。以‘酱缸震荡’、‘酱缸文化’、‘酱缸蛆惊蛰’、‘仁义道德’、‘中国的出路’等等问题,有如掘宝,就教于柏杨先生,整理成为本书,由日本光文社与台湾星光出版社同时出版。"[③]其实也是柏杨前后期杂文节选的一个汇编集子。在2000年出版的《奋飞》中,"最早的一篇《方言》,写在一九五零年作者甫来台之际;最近的是一九九七年作品,有四篇,包括:《一个台南姑娘的故事》、《同登两峰——漫画和小说》、《领袖人才的EQ教程》、《中国的邓肯》。这些篇章是柏杨十年小说、

---

① 柏杨:《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港"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324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26—327页。

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通鉴》、十年人权之外零星写就的散文，大部分写在八、九零年代。"[①]相比较而言，这部杂文集的情况与前两部很相似，也不能够充分代表柏杨后期杂文的特点。

而在2002年出版的杂文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是由八十岁高龄的柏杨口述，别人执笔写就，至于其内容，"本书有柏杨一贯的批判精神，譬如脏、吵等酱缸中的元素仍不放过，甚至试拟《吵律》。此外，特有一种悲悯情怀在焉，着重在'人权'、'尊严'的课题上，《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缺少'尊重'》、《母亲不再哭泣》、《尊严价更高》等，'活要活得有尊严、死要死得有尊严'，因此，他说：'我赞成安乐死！'"[②]由此可知，这本杂文集凝聚着柏杨对打破"酱缸文化"，以及如何改善国民性的新思考，并且怀着现代性世俗化后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提出了新的建议，即在人权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中国人的尊严感问题，这亦是柏杨后期杂文的一个特点。从这个角度，可以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与80年代前期的《大男人沙文主义》、《按牌理出牌》等杂文集归在一起，均是柏杨后期杂文的代表作品。

当然，不可否认，后期杂文无论是内容主题，还是艺术风格，的确与前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内容题材来看，后期杂文关注的问题和社会现象与前期杂文的基本相同，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雷锐曾经把柏杨60年代杂文的内容归结为四个方面，除了"酱缸"文化批判和女性婚姻恋爱问题以外，还有其他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讽刺台湾社会的丑陋黑暗，包括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占着茅坑不拉屎，警察作威作福（柏杨称之为'三作牌'——'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官员'二抓牌'（抓钱又抓权），在外国人面前奴颜卑膝，又批评恶性补习，体育黑幕，观光事业低劣，火车站混乱，反节育者糊涂误国，青年党夜郎自大。"除此之外，还有"一般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就当天报纸主题触景生情的急就章，政治色彩比较淡"[③]。

而柏杨后期杂文，基本上也就是这四类主题，前后期杂文的变化并不大。也就是说，柏杨现代性思想系统中的世俗化情怀始终不改，呈现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在艺术风格上，依旧具有带有讽刺、幽默的柏杨式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酱缸文化"批判贯穿柏杨前后期的杂文创作，后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8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79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13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200页。

期杂文继承和延续了前期杂文对“酱缸文化”的思考,而且更加富于理论性、系统性和文化逻辑性。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此期柏杨接受别人的访谈较多,这种专门针对酱缸问题的提问式访谈,自然会激发起柏杨对该问题作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对“酱缸文化”的批判更加具有系统性和文化力度。以《酱缸震荡》为例来说,整部杂文集就是对“酱缸文化”进一步作更全面更明确的定位,从各种角度加以探讨,具有更多学理的味道。这是柏杨综合了前后期杂文观点,对“酱缸”文化所做的一个回顾和总结。他在《政治艾滋病》中这样描述“酱缸文化”:“中国人是一个患有政治艾滋病的民族,抵抗权力病毒的免疫系统,几乎全被破坏,一个人有权柄前是一种人,有权柄后则立刻变成另一种人。权柄容易使人腐败,而‘酱缸文化’腐败的力量更是特别强烈。……‘酱缸文化’的形成,应该从汉武帝刘彻时代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与开商店极端相似,多家商店才有竞争。一种文化的没落,主要就是丧失了竞争能力,丧失了对权柄的免疫力。自宋王朝理学之后,儒家思想加速成长,酱缸的浓度也一直加速沉淀。形成这种文化的主要因素,除了儒家思想外,佛教、道教也受到‘酱缸文化’的腐蚀,佛教的大慈悲,导致不计较今世,只计较来生。消极人生观到了极致,就严重的伤害了政治权力病毒免疫系统。而有些道教徒看来,作恶的人,只要肯向神灵行贿,连神灵都会包庇。到了明王朝,中央政府钦定的学术思想成为生活伦理的独门法则,思想结合政治和律法,使得学术完全窒息。明王朝对内是绝对的专制,人民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再加上暴君朱元璋发明‘不为君用律’,人民也没有不当官的自由。对外则是锁国政策,用海禁切断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封闭的绝缘国家,这些因素使‘酱缸’更深不可测。”①

柏杨明确把“酱缸文化”的形成和加深与中国的各种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并且把权势崇拜当成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最重要产物。也就是说,“酱缸文化”形成的最基本根源就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由此产生出权势崇拜的势利眼观念,而佛教、道教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加深了权势崇拜的程度,这表现出柏杨一贯激烈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追求五四人道主义思想的精神。然而,不能够就此而夸大后期杂文对“酱缸文化”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早期杂文就已经形成明确的概念范畴,包括酱缸的各种症状以及对社会的诸种毒害后果。实际上,酱缸批判贯穿着柏杨前后期的杂文创作,是柏杨思想系统的基础支撑点,亦构成现代性世俗化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69—370页。

思想体系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更具体一些来说，在早期杂文中，对“酱缸文化”的认识和批判虽然比较系统，其观点散见于各部杂文集子中，不过却没有如此大规模地集中探讨过该问题，即使是在《死不认错集》中，也是穿插着社会现象来进行描述，而非后期杂文的更多理论层面上的探讨。不过后期杂文对“酱缸文化”的阐发，新贡献主要在于在于归纳总结了前期的一些思想观念，例如“老昏病大展”中的三十二个病症，其实也多是早期杂文涉及的内容，虽然更系统、理论性更强一些，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很明智地把“酱缸文化”批判限制在文化层面上，正如上面已经探讨过的，在早期杂文集《死不认错集》中体现出的柏杨现代性思想的微妙转变已不复存在，后期杂文时期的柏杨依然是坚持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一个远离学院派的“野生”知识分子。

但是，这并不是说后期杂文的思想观念就与前期完全一致。在前后期杂文中，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某些观念，是有所变化的。这可以把前面章节论述过的女性解放和婚恋问题作为其中的一个例子，从中就可以清楚看出，柏杨的婚恋观念，以及与婚恋观紧密联系的人性尊严、人权、自由等观点，在杂文后期阶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除此之外，柏杨后期杂文与前期相比，另一个具体变化体现在人道主义中“立人”的问题上。其原因在于，虽然正如上面所论述的，“酱缸文化”批判始终贯穿柏杨的前后期杂文创作，甚至就是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整个支撑基础，不过，如果仔细加以区分的话，会发现柏杨前后期杂文对“酱缸文化”进行批判的着重点，有所不同和变化，体现出他对“立人”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如果说柏杨前期杂文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畸形人”的批判上，这是他对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毒害国民性进行的反思，更多偏重的是中国历史社会的层面，也带有某些干预当时现实社会政策的政论色彩，其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自由中国》。那么，柏杨在后期杂文中以“丑陋的中国人”来代替“畸形人”，在《丑陋的中国人》演讲录中总结出几个特征，包括中国人脏、乱、吵，不团结造成的窝里斗，不但不习惯认错，而且还极力掩饰错误和撒谎，以及因为见识少和心胸狭窄而造成的膨胀心理等，这表现出他尽量避开在早期杂文《死不认错集》中表现出的政论、色彩，而是尽可能地从文化层面来考察“酱缸文化”的努力。同时，他此时在杂文中更关注的是市民社会系统在现实生活中的“立人”问题，而且把整个华人的国民性都纳入其中来考察，更多社会现实针对性，对社会习俗和当时台湾日常生活习惯的批判也加重了分量，使现代性世俗化的一面更加突出，而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任务放在了众多的史传作品之中。

具体到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来说，柏杨在后期杂文中采取了边“破”边“立”，以“立”为主的态度。换言之，柏杨在后期杂文中，有意识地对消除“酱缸文化”和改造国民性问题提出很多有益建议，重点在于建设性的“立”上，而不是像早期杂文一样，主要把焦点放在对“酱缸文化”进行猛烈批判的“破”上，把四类畸形人和酱缸蛆等产生的根源，全部归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造成的酱缸上，以为只要撞破“酱缸”，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在经过被迫搁笔的近十年时间的思考之后，柏杨发现，在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国民性问题，其实远比他想象的更错综复杂，而且几千年延续下来，致使酱缸中的沉淀物越来越多，也越发浑浊，中国人深陷其中而无法挣脱。因此，他在“十年杂文”时期猛烈批判“酱缸文化”，力图打破深不可测的酱缸，促使广大国民，尤其是市民社会系统中的现代人觉醒，的确是改善国民性的一条重要出路。不过，柏杨在后期杂文阶段已经逐渐认识到，打破酱缸并非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他更需要做的是如何使酱缸首先能够逐渐去掉沉渣滥滓，然后得到稀释并最终变清澈。换言之，也就是能够建立起符合现代市民社会系统精神面貌的现代“人”来。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导之下，柏杨的思想在后期杂文中发生了某些转变，由早期的猛烈批判与破坏，转向此阶段的可行性建设上来。

如果进一步仔细追究这种转变的原因，不但可以发现柏杨对稀释酱缸和改善国民性所作的努力，亦可以从中看出此阶段柏杨所面临的转向史传著作的创作趋势，以及其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观念的细微波动。

首先，柏杨在后期杂文中所发生的转变，无疑受到“狱中十年”读史的影响。不可否认，他在早期杂文中就把中国历史当做一个资源库，对中国历史已经非常熟悉，不但经常从其中引用历史现象和典故当做例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看法，例如，《鬼话连篇集》通篇就是历史典故。而且他在《死不认错集》中对“酱缸文化”概念的定义和对其的猛烈批判，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考察和反思得出的。可以这样说，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建立的一个基础，其实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批判而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柏杨在狱中有机会反复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之时，他是把当下现实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来考察，用历史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实。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无穷灾难和人民的苦难，无疑会激发他把自己个人的苦难，以及所遭受的十年政治冤狱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苦难联系起来，能够以史观己，对“酱缸文化”对国人的戕害，具有更加切己的亲身体验；进而言之，他还会把历史的苦难和时代的苦难联系起来，以史观今，对

当下整个华人世界的苦难，理解得更加深刻。这些新的因素，自然会影响到他对国民性的认识程度。同时，他对灾难深重的“丑陋的中国人”怀有更多的悲悯之情，虽然依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后期杂文对某些现象的批判也依旧充满着锐气和锋芒，但是相比早期杂文而言，较温和的建设性意见也在《早起的虫儿》、《活该他喝酪浆》等杂文集中出现得更多一些。

更何况，柏杨在狱中就开始写作《中国人史纲》等历史传记作品，出狱之后才再次执笔写作杂文，如同柏杨60年的小说《旷野》对爱情婚姻的探讨影响到他的《堡垒集》等杂文集的问题一样，这同样使他的眼光投向中国漫长的历史，无疑会促使柏杨从更系统的中国历史脉络中去寻找杂文所涉及的“酱缸文化”和国民性的症结所在，而且此时期的柏杨正在致力于把《资治通鉴》翻译成白话文，在此翻译过程中，他对中国历朝历代发生的各种苦难事件以及帝王将相的狰狞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楚。相应的，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就了解得更加透彻，看到国民性的发展除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外，也看到了它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民族性之间的复杂纠缠，“到底是中国文化产生民族性？还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我看应是互相循环。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时是非理性的，就像电动玩具，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沙粒，它就会自动转换。也好像在山上踢石头，你有力量踢石头，但是当它滚下去时，你无法制止它不滚下去”[①]。也就是说，国民性痼疾的成因也包含有非理性的偶然因素在内。所以，此阶段的柏杨不再把“酱缸文化”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相应不再持有早期杂文集中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更具体一点来说，柏杨某种程度上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区别对待，力图区分出其中的糟粕和精华。他一方面把最糟糕的部分归入“酱缸文化”之中，不仅是对其猛烈批判针砭，而且积极提出一些建议来加以改善，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华部分，在杂文中加以提倡和宣传，树立较好的典型和榜样，在精神价值层面上，力图为现代市民社会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现代人形象付出努力。

最明显的例子，当推前后期杂文对传统文化中“孝”、“悌”的不同认识，亦可以从中寻找出柏杨前后期思想发生细微变动的某些痕迹来。在早期杂文中，柏杨把孝道归为是对权势崇拜的一种表现，只会培养出国人奴颜婢膝、毫无个人主体意识的“乖”思想，因为“我们对儿童的教育，似乎从小就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3—44页。

训练他们对权势崇拜，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种人简直应在他屁眼里塞一根酱萝卜。对孩子最大要求是‘肖我’，对不成材的孩子，一开口就骂他‘不肖’。肖者，像也。意思说儿子必须像老子，才算理想的国家主人翁，如果不像老子，就是罪大恶极。……想不到一个人一旦当了爸爸妈妈，就好像喝了‘不错汤’，就没有错啦，这是婊子歪理。当然啦，就亲情而言，原意可能是即令父母错啦，也要原谅他，但我们可以强调原谅他，不可以强调老头老太婆没有错也”[①]。柏杨由此看到，“孝”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起到重要的强化作用：“中国社会上，权势的代表人物有两种，一曰‘君’，一曰‘父’。‘君’包括皇帝和比你大一级的官，‘父’则包括爹娘长辈和任何一个比你多吃几天饭的老头老太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乃成为最高酱缸蛆的境界。”[②]他把“孝”当成是“酱缸文化”的产物之一。但是到后期杂文时期，柏杨的人道主义立场发生了微妙变化。他站在父母子女亲情的角度，剔除掉“旧孝道”中的父权意识和封建等级秩序思想，在保留亲情的基础上，用现代化的思想把其改造成“新孝道”，从而把孝道分为“古孝道”和“今孝道”，专门在《活该他喝酪浆》杂文集中用《两头尖的利刃》、《严重的危机》、《德国来的一封信》、《代沟与祸福沟》、《齐天大圣也不敢写包票》、《蒋程九·移民·绿卡》和《活该他喝酪浆》，共计七篇杂文来进行讨论，对前者依然持贬斥态度，对“新孝道”则大加赞赏和宣扬，这并不是开历史倒车和宣扬复古主义，柏杨的目的不但是为了保持父母子女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之爱、中国人彼此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由破转向立的一个证据。他站在社会的安定，以及利于整个人类生存繁衍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因素。

具体来说，“古孝道的精神是‘为父母活着’和‘为祖宗活着’，主要的在保护老一辈，老一辈势如泰山压顶，有百是而无一非——君不见有句话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年轻人被束缚得连牙都不敢痛”[③]。因而，古代孝道是毫无平等人权可言的一种家庭伦理观念，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和孝敬不是来源于亲情之爱，而是因为他们处于较低的等级地位，导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只是家庭中的主奴关系，这亦是柏杨猛烈抨击旧孝道的重要原因。而“今孝道”维护的是父母子女双方的权益，推崇子女与父母在家庭中具有平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57页。

② 同上书，第358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4页。

等地位,子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也不是子女的主人或者负担。从这个角度,柏杨把子女对父母的不孝敬行为,称为是“两头尖的利刃”,既伤害父母的感情,又伤害子女的心灵。柏杨还把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和孝顺,当做是改变“丑陋的中国人”自私和一盘散沙性格的一条有效途径,这可以从柏杨对孝道的定义看出:“孝道是啥? 孝道就是厚道。厚道是啥? 厚道就是恕道。至少孝道的基础是厚道,厚道的基础是恕道。‘换你心为我心,方知相忆深’。这是情人的缠绵,也就是厚道和恕道,用厚道和恕道对待老爹老娘,就是孝道。

自私是厚道和恕道的大敌,也是使我们中华民族几百年来都抬不起头,用尽方法复兴都复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天下没有一个人是不自私的,但我们中国人的自私却到了自杀的地步,就实在使人大汗淋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伟大民族,为啥在这一关上,硬是不能突破?问题太大,既然不得其解,也就不必逞能。我们只提出一点,那就是,自私正是不孝的根源。古人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话并不能全称肯定,但至低可以肯定一点:一个自私的人,他那聪明能干的心灵中,一定缺少厚道。因为缺少厚道,所以缺少恕道。因为缺少恕道,也就缺少孝道。——自私的人而仍能大孝特孝的,恐怕跟继承权有关。我们也可以反转过来观察,凡是不孝父母的人,他对人绝不会厚道,更没有恕道。”①

而自私冷漠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只有现代都市中的人们都奉行新孝道,用厚道和恕道来代替自私的国民性格,才能够逐渐建立起较完善的现代市民社会系统和现代人的文明形象,进而改变中国是“自私冷漠之邦”的外在形象。

提倡新孝道的另一个现实基础,则在于当下台湾社会现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父母要反过来孝敬子女的奇怪的社会现象。柏杨在杂文集《活该他喝酪浆》中指出:“年轻人的两种可怕的趋势:一种趋势是下一代对上一代,毫无感谢之情,而感谢之情是爱的基础,无论是天伦之爱、朋友之爱、夫妻之爱,或对国家之爱。下一代对父母的态度,就像对一个付款机器,要一百元如果只给九十,就大发雷霆。而且认为老子娘的一切牺牲都是活该,都是自作自受。最使柏杨先生发抖的是,有些年轻人竟然认为老一辈谈起他们孩提时候的往事,简直是一种激发他们孝思的阴谋。……另一种趋势是,下一代似乎认为‘天下没有对的父母’,父母永远不了解他,永远在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8页。

'管'他。于是把老爹老娘吓得胆战心惊,啥也不敢问,三更半夜回家不敢问,两天两夜不回家也不敢问,功课不及格也不敢问,交什么朋友也不敢问,'关心'变成了'管','建议'变成了'不了解'、'规劝'变成了'代沟',有些父母千方百计想当儿女的朋友而不可得。"[①]这种现象同样是父母与子女地位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子女、父母的地位倒置过来,只是子女变成父母的主子,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依然是主子、奴才关系的翻版,而且这种新的主奴关系其实是人们的冷漠自私性格在现代社会的一个变体。这种新的不平等关系、不尊重人性尊严的行为自然不会塑造出现代市民社会体系中的现代人来。柏杨对此持坚决批判的态度。

还需要提到的是,柏杨转向"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眼界和视野的开阔,从其他国家的事例看到了消除"酱缸文化"影响和建立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因为柏杨出狱之后,在80年代初期曾经参观访问过许多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他在《踩了他的尾巴》序言中说:"一年三个月中,我去了一趟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又去了一趟美国;最后又去了一趟泰国。"[②]由此写成十篇参观后杂感,每篇副标题均为"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想",正标题则分别为"逾淮而橘"、"中国人·中华人"、"屋顶上的提琴手"、"踩了他的尾巴"、"言语浓于血"、"骨肉情深·相依为命"、"自断命脉"、"安乐之死"、"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和"感谢·误会·致歉·祝福"。除此之外,他在专门去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参观之后,也分别写成《礼仪之邦——美国之行,杂感之一》、《由沙粒看世界——美国之行,杂感之二》、《三句话——美国之行,杂感之三》、《美利坚排队国——美国之行,杂感之四》、《崇洋·但不媚外——美国之行,杂感之五》、《预言和恐怖——美国之行,杂感之六》、《种族歧视——美国之行,杂感之七》、《黑朋友的危机——美国之行,杂感之八》、《两个故事——美国之行,杂感之九》、《欧洲·人间——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一》、《语文·币制·乱七八糟——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二》、《休假·度假·奇疾绝症——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三》、《忧患意识·满面羞愧——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四》、《大嚎集中营——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五》、《卧像·吊像——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六》、《死亡谷——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七》、《请牛容易送牛难——欧洲之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8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60—61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旅·印象·感想·思量之八》、《残忍·人道·议论——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九》、《圣玛利诺——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十》、《视书如仇——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十一》和《庞贝废墟——欧洲之旅·印象·感想·思量之十二》共计21篇杂文。柏杨自然会有意无意地把台湾当时的社会现状与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在西方现代国家中，给柏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美国，柏杨把美国称为“礼仪之邦”，认为美国人在各个方面均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榜样，可以说，美国社会、文化和美国人表现出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以及人道主义情怀等方面，均符合柏杨现代性世俗化之后的思想观点，柏杨也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建立起理想国家的可能性。最能够激励柏杨树立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与国家的信心的榜样国家，则是同为华人国家的新、马、泰。柏杨把新马泰国家的华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形容为“骨肉情深，相依为命”，新马泰华人和中国人曾经同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孙中山先生曾曰：‘华侨是革命之母。’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之前，他们确实是华侨，因为他们身属中国国籍，手拿中国护照。可是四〇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还经过大小百余血战，才把自封为主子的荷兰朋友赶出大门。华侨遂逐渐的变成华人，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公民，不再是流落天涯地角的中国游子，而是嫁出去的中国女儿矣。女儿在夫家——那块美丽的国土上，生根开花，茁壮结实，继续繁衍中华民族的苗裔”①。然而，新马泰等国家的华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文明、法制、民主的现代国家，这些国家已经成为像美国一样的“礼仪之邦”，人人讲文明礼貌，遵守交通规则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热心待人。新马泰之行，使柏杨看到了西方现代国家文明已经出现在东方国家中，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样存在改造的可行性，能够把深受“酱缸文化”毒害的“丑陋的中国人”，变成文明的现代中国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柏杨后期杂文中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此阶段，他开始以辩证的态度去认识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糟粕部分归为“酱缸文化”，同时从人道主义的悲悯角度来看待“丑陋的中国人”，对改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充满信心，而且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提出“新孝道”等建议。正如他所说的，“传统可以改变，可以抛弃，但不是盲目的，它有它的最后堡垒，犹太人最后的堡垒是宗教种族，中华人最后的堡垒是华文华语。堡垒一破，全体都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8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27—228页。

要抱头鼠窜。满洲人的下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中华人要想获得自尊和受人尊重，需要‘屋顶上提琴手’的忍耐、让步、修正，和最后的坚持”①。

柏杨宣称完全是从文化角度来谈论“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以及改造他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在于他仍旧把自己定位在市民代言人的位置上，这是他始终坚持现代性世俗化立场的一个表现；再者，柏杨在后期杂文中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的风俗变迁，而实际上社会风气的变迁，总是牵涉到文化意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在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他就把自己限制在文化的视角之内，只能够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自然无法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他因素对社会风俗习惯和国民性格产生的各种影响，当然这也是因为杂文独特的艺术特征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批判其实无法超过其前期对四类“畸形人”猛烈针砭的力度，后期杂文反而不如前期的立场鲜明和尖锐深刻。虽然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某些新的发展，但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在文化批判的格局内，基本上沿袭的仍是早期杂文的思路，这也是很多研究者不把柏杨杂文分为前后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柏杨后期杂文数量偏少，这大概也是中国杂文作家的一个缺点，即一旦进入提供建设性的“立”的建议时，作家们就逐渐捉襟见肘，其思想观点无论是深度还是敏锐性上，均无法与他们提供的批判思想相比较。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政治家的缘故，只能够本着文学的良心，去提供一个理想化的思想体系而已，柏杨亦如此。

更何况，柏杨虽然看到了通向较完善的现代市民社会之路的途径，不过建构现代国家、社会的实践活动，依然无法避过政府机构操作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潜移默化。也就是说，并非他一个作家就能够左右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潮流，如同他在女性解放之路上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样，他在“酱缸文化”批判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上依然面临着困境：一方面，他不愿意再持有早期杂文《死不认错集》中干政议政的浓烈的政论色彩，他依然坚持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立场。因此，现实针对性极强的杂文难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无法再继续写下去；另一方面，作家在 80 年代已经逐渐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杂文已经不再具有 60 年代的社会轰动效应。如果柏杨继续站在城市市民的立场上，在杂文中为他们代言，恐怕无法避免会顺应当时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8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215—216 页。

的社会潮流,尤其是情欲化、物质欲望泛滥的社会趋势。而这是柏杨并不愿意为之的,尽管他自称是一个“野生知识分子”,毕竟潜意识里依然带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操守,大概是无法无原则地苟同物欲化的社会潮流。这其实也是他的现代性思想加以世俗化之后所面临的困境,即在一个价值观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当现代都市中的市民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获得解放的个体时,他们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否还如此需要一个代表他们发言的作家?或者说,柏杨还有必要在杂文中继续为他们代言吗?

这些因素都促使柏杨重新思考。此时他已经认识到杂文在80年代的日渐式微和边缘化。他就逐渐放弃杂文创作,完全转向对中国古代史传作品的翻译和对其重新创作,在史传作品中继续思考、批判“酱缸文化”和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由此造就了柏杨“史传十年”的辉煌。

第六章　重建自我主体性

第一节　主体性建构之意义

在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思想——具体表现为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之中，柏杨认识到，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形象建构的关键一环，在于建构起他们的自我主体性。柏杨在杂文中对此着力较多，尤其是在女性婚恋散文中，把女性通过自由恋爱、婚姻以及追求情欲自由等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当成是女性获得解放的重要因素；他对“酱缸文化”中的四类“畸形人”的批判，最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形成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彼此之间只是不平等和没有人权自由的主奴关系；而对后期“丑陋的中国人”的针砭，目的依然是要建立起现代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在小说作品中，浪漫色彩浓厚的爱情小说类的关注点，在于自然人性论和善变的爱情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对早期杂文中由自由婚恋获得的独立自主性意识之补充，作者把建构个人主体性的重任放到了那些杂文类的讽刺抨击小说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建构起自我主体意识，建立起现代人的观念来，才能够达到根除或改善“酱缸文化”并达到把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从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来看，主体性的确是它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现代性的起点，文艺复兴时代张扬的理性与启蒙意识，包括了对神的反叛和“人的发现”，尤其确立起人类的主体性，即人是万物之灵，同时具有自然动物性与理性神性的属性。对人类的主体性的认识和建构，现代性从启蒙时代至今已经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亦可由此发展过程看出把现代性世俗化的趋势来。

从人类主体性的发展脉络来说，从文艺复兴时代发展到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阶段，这是近代认知主体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他们对主体性问题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主客二分式的经验思维方式上，认为主体性就是人在外

部对象世界中的外部行动自由，主体性并非是人的一个本质属性。随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反对单纯从外部的实践活动这一立场来理解人的主体性，而是主张从本体论的高度来理解人的主体性，认为主体性是通过人的精神逐步超越经验自我，不断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而得到实现。可以说，认知主体从理性和自我意识角度来理解主体，在现代性中把主体和人统一起来，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和对世界的能动关系，奠定了人们对具有现代意蕴的主体性理解的基础。但是，认知主体是从人的存在层面来理解人的主体性的，把人当成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意识的能动性实际上变成了抽象的能动性，人也就变成了抽象的人，主体性并没有被当做是人的内在本质属性。20世纪上半叶，生命主体论发展起来，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一个产物，其代表理论家是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克尔凯郭尔。他们把主体性阐释成是历史性的、超越性的和生成性的过程，强调一个人生存的内在价值性，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人的主体性应当体现在主体和客体的原始同一性即"生存"上，即人能够把握自我，懂得自己的存在价值。生命能够超越存在，而且外部实践活动只能是主体性得以实现的桥梁或者中介，只有在生存获得了无限的精神自由的情况下，人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生命本体论的观点突破了认知主体性的局限，增添了人现实生存的内容，奠定了现代人学理论理解人和主体等现象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体现出独特的实践性、历史性品格。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即实践活动入手，是研究主体性范畴的最好视角。换言之，马克思推崇的是实践主体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同时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主体性，看做是主客体的融合，看到人既具有把握自己和其精神世界的感性能力，又拥

---

①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有改造外部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抽象的人进行的外部实践活动,而是具体的人所拥有的由内而外的实践活动。

柏杨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是他的主体性思想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是他把“人”的概念范畴,限制在现代市民社会系统中的现代人身上,具体转化为现代人的自主、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观念,以及为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用柏杨的话来说,就是现代市民的灵性。

可以看到,在为数众多的作品中,柏杨依据作品归属的文学类型和相应的艺术原则,把现代人的主体性分成几个方面分别进行建构。正如上文所言,柏杨杂文是站在反对封建伦理束缚、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在最早的杂文集《玉雕集》、《红袖集》和《堡垒集》中力图建构起现代女性形象。不管是他的以“浪漫之爱”为基础,还是以“激情之爱”为基础的婚恋观,其标的均是建立现代女性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在家庭中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柏杨此时主要关注的是现代女性主体性的形成和确立。柏杨在稍后出版的《立正集》、《剥皮集》、《闻过则怒集》、《死不认错集》等二十几本杂文集中,把视野扩展到整个现代人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上,毫不留情地批判四类“畸形人”,以便树立起能够挣脱主奴等级观念、具有独立、平等意识和追求自由人权的现代市民形象。与杂文相比较而言,柏杨的诗歌是由他将近十年牢狱生活的血泪凝聚而成,他在诗歌中建立的主体性意识又与杂文的略微不同。如果说柏杨杂文要建构的现代市民的主体性是现代性建构的一个外化呈现,那么柏杨狱中诗歌体现出的自我主体性则是现代性深入到现代人内在人格建构的体现。毕竟只有建构起个人健全的内在人格,才有可能建构起广大现代市民群体的主体性。具体而言,作为深受黑暗的专制制度和政府“冤狱”迫害的受害人,柏杨的悲愤、冤屈和绝不屈服的反抗暴政强权的精神,与为和他相同境况的在押政治犯争取个人空间、得到被尊重的基本权利,以及他对父女亲情和自由生活的不懈追求、向往,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自我主体性的主干,塑造出“现实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形象来。如果说,柏杨在《柏杨诗抄》中,把建立自我主体性当成是对抗政府暴政和残酷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那么他在《异域》、《金三角·荒城》、《穿山甲人》等报导文学中,则在充满苦难和悲剧因素的坎坷生活中,塑造出勇于去追求正义和个体尊严的小人物,他们自强自立,为实现理想而九死不悔。这些精神层面的特点,均是柏杨力图在“苦难意识”中,为建构被生活压轧的小人物的主体性做出的尝试。

相比之下,作为柏杨的最后一篇报导文学作品,《家园》把现代市民的

外延扩展到广大中国人，在历史苦难和现实苦难中，建构起广大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一个特点——反思自我的能力；写于五六十年代的讽刺谴责小说，是柏杨用杂文笔法写成的小说，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利用讽刺幽默艺术手法产生的狂欢效果，突出强调其产生的不屈服于强权暴政，虽然迂回曲折，然而不减其尖锐的批判“酱缸文化”的决绝态度，亦是作者为呼应杂文、报导文学等作品建构现代人的主体性思想之见证。

第二节　主体性建构的感性基点

1982 年 1 月 1 日，柏杨为台湾四季出版社将要出版的《柏杨诗抄》撰写序言，这是柏杨在狱中十年所写诗歌集的第一次出版。在 2001 年重新汇编出版的《柏杨全集》中，易名《柏杨诗》而收录其中，改名的各种原委，柏杨在新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人事沧桑，诗集亦沧桑，十年后的一九九二年，《柏杨诗抄》再由台北跃升出版公司出版。以为这是终结，想不到，转眼之间，又是十年，二零零一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柏杨全集》，收入此书，改名《柏杨诗》，趁此机会，将出狱后二十年间新作十二首，加入作为《后辑》。谨再一次记下对我妻我友的无限感激之情。”①由此可知，柏杨的诗歌其实分为两部分，从形式上来看，皆是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结构形式，除了以五言、七言形式写出的《冤气歌》、《有感》、《梦回》、《读史》等诗歌之外，还有以宋词词牌名《鹧鸪天》、《八声甘州》、《金缕曲》、《满江红》等为名的诗歌；从创作时间上来看，大部分诗歌是在狱中借以血泪而作，可称为狱中诗歌，只有十二首诗歌系出狱之后所作。对于狱中诗歌，一些学者对此有较多的评价，同时也进行过充分阐释和解读。例如对《邻室有女》一诗，台湾学者黄守诚把其诗的意境和艺术与杜甫的《石壕吏》相比较：“柏杨与诗中的女主角，惟一的接触，乃是‘唯曾睹君背，亦曾系君裳。’且所谓‘系君裳’者乃是‘调查局狱囚禁后期，每天有十分钟散步。某日散步时，晾衣架上一件女衣被风吹落地面，柏杨代为拣起，重系绳端’而已。但就在如此简易单纯的接触中，柏杨却以细腻的思维和联想，组合出一篇感人泣下的牢狱悲剧诗。若说柏杨此诗，无逊于老杜的《石壕吏》，应非夸大之词了。杜甫告诉我们的是人民为征战所苦、及参军的恶政；而柏杨用一个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2 册“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19 页。

囚于隔壁的弱女子，指控出文字、言论的冤狱；以及一位诗人的爱心与关怀。"[①]充分肯定了柏杨诗歌的艺术成就，以及诗中所表现出的反抗暴政、冤狱的正义之气。可以说，狱中诗歌是与柏杨切身体验密切相关的一类文学作品，如果说早期杂文和小说还带有很大文学虚构成分的话，那么诗歌则是作者最真实自我的一种呈现，诗歌中对普通人的主体性的建构，更能够表现出其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特点来，即关注的是活生生的普通现代人而非知识分子精英。

其实柏杨的诗歌才华，除了以上这些古典形式的诗歌之外，他的白话诗歌的精湛才华，在小说中已经显露出来。在浪漫色彩的爱情小说《莎罗冷》中，那种浪漫传奇的风格特色，一部分要归功于该部小说在开头和结尾那首缠绵悱恻的诗歌《莎罗冷》，既是点题，又是对两个爱情悲剧故事的概括：

一弯新月
上面排列着三颗寒星
是谁在凝望，凝望那
——乱石，荆棘，马鞍岭
怒涛在大海澎湃
天崩地裂
两颗心结在一起
像花岗岩一样的坚
一样的贞

啊
莎罗冷

当那小舟倾覆的刹那
没有人唤醒沉睡的古城
巨炮口指着海滨水涯
双尸，化作杜鹃
双魂，化作携手的幽灵
在夜深人静

① 黎仁活主编：《柏杨的思想与文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66页。

撒下，
撒下多少热泪

啊
莎罗冷

梦中的痴迷呼唤
上苍的慈祥招引
微笑，微笑
踏进了永恒
对了
——是他们摒弃这世界
还是这世界摈弃他们
且听我呜咽的歌声
冲天的信号
是求救
是欢呼

啊
莎罗冷

诗歌的语调忧伤低回而又美丽，感情真挚感人，可以说是深谙白话诗歌的神韵。除此之外，他也在童话《天涯故事》中写了一些欢快、优美的白话诗歌。这些都表明，他之所以在狱中选择用旧体诗的形式写作诗歌，不是因为不喜欢白话诗，他反对的只是小说《打翻铅字架》中的所谓现代白话诗，对那种条理不通、胡编乱造的艺术手法不屑一顾，他更喜欢的是言之有物、抒发真情实感的诗歌。更何况在监狱中，没有纸笔和纸张来书写，只能够在监狱的墙上用指甲刻下字迹，乃至于经常“甲尽血出，和灰成字”。从实用性角度来说，精炼、简单而内涵丰厚的旧体诗自然是柏杨的首选，换言之，与白话诗的散文体相比，旧体诗歌严谨、整齐的结构形式和精炼语言，所涵盖的意象、表达内容的密度和感情的深度等特点，更适合柏杨在恶劣的监狱环境中抒怀。同时，柏杨在狱中获得了当图书馆外役的机会，有机会阅读文言写就的历史典籍《资治通鉴》，并且开始着手写作《中国人史纲》等白话历史

传记，柏杨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愈发深厚，不但能够很好地把晦涩的文言文翻译成浅白易懂的白话文，而且文言文造诣日深，能够娴熟地进行写作，他因读史而有感而发写出的《读史》、《读史怀古》等诗歌就是明证。然而，也因为诗歌是柏杨在狱中发出的哀呼之声，“当哀呼时，只是一种哀呼，忘我的哀呼，没有人还管那哀呼合不合韵律。发之于诗，也是如此”①。因此可以理解，为何柏杨虽然用了古典诗歌的形式，但是并非压古韵的平、仄，而是变通地采用了现代白话语言的韵律和韵脚，只求最大限度地进行叙事描写，以及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采用旧体诗歌形式并非意在复古和拟古，亦非是对“酱缸文化”的妥协、让步，在骨子里，身陷囹圄的柏杨依然没有改变其现代性的世俗化情怀，中国古典诗歌结构只是外在表现形式，白话语言代表的现代精神，才是柏杨始终不渝的追求。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诗歌是特殊例子之外，柏杨出狱之后创作的杂文和《皇后之死》、《柏杨曰》等史传作品所用语言，均是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

而且，柏杨用古典形式来写诗歌，也有意无意地传达出柏杨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的转向：由早期杂文的全面否定、批判“酱缸文化”到出狱后的辩证对待和部分否定，由猛烈针砭四类“畸形人”到建议改善“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由政治文化批判到后期的只批判文化层面，由杂文写作到全身心地投入大规模史传作品的创作。这些变化均可以在柏杨此阶段创作的诗歌中看出端倪，由此看出柏杨此时把现代普通人的概念由普通市民，延展到处于整个社会最底层的、最边缘化的政治犯人身上，把底层的普通人也纳入现代市民体系中。由此树立了现代人的主体性精神层面最核心的因素——始终保持清醒、理智的自我意识，与不被冤狱酷刑压垮、逼疯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具体到诗歌作品来说，按照内容题材来划分的话，柏杨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苦难的中国历史和冷酷的监狱现实环境的写实与抒怀，虽然大部分诗篇基调悲怆苍凉，但是也不乏《感奋》、《鹧鸪天》等具有、不屈斗志的诗歌，颇具沉郁顿挫之感；另一类则是抒写对女儿的舐犊之情，以及对多方营救他的诸多朋友的深厚友情，是温情流泻的抒情之作，显露出柏杨除了拥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精神之外，还具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柔情来，除了包括《嘱女》、《寄梁上元》等狱中诗歌，还包括出狱之后给亲朋好友写的《寄孙观汉》、《悼江南》等诗篇。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2册“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8页。

第一类诗歌除了《冤气歌》、《邻室有女》和《读史》等篇什外，《几番》虽然只有短短八句，但是也精炼地摹写出十年牢狱生活的残酷与作者自身的感慨。前四句"几番铁链过门前/几番哀号镇铁栏//肠萦儿女悲离别/魂惊鞭后咽寒蝉"，为第一叙述人称，写作者在牢房中亲眼目睹和亲耳所听的铁链和哀号等触目惊心的场景与声音，既是指别的政治犯人经历和发出的，也是指作者自身在监狱所经受过的严刑拷打与发出的哀求哭诉，因此"天上千年如一日/狱中一年似千年//到此人生分岁月/听风听雨两茫然"四句为结尾，抒发作者的感慨和愤懑，也暗含着一种反抗和不平之感，这种反抗意识如同地火，虽然在地下悄无声息地燃烧，不过总有一天会突出地面，点燃地面一切可以燃烧之物，变成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焰。在这首诗中，柏杨以关押在火烧岛的广大政治犯人为主人公，侧重塑造他们不屈服于酷刑折磨的顽强精神。因为，对政治犯人来说，监狱生活的残酷不仅仅是指肉体上所受的严刑拷打，更是指精神上的折磨。柏杨在《柏杨回忆录》中披露出他自己差点被逼疯的亲身经历："在看守所，难友蒋海溶先生有一天警告我说：'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你怎么知道？''因为，'蒋海溶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我否认喃喃自语。'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溶说。我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我最害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为情，但我接受这个事实，向蒋海溶恳求说：'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蒋海溶承诺。于是不久，蒋海溶的一拳击中我的右肘。'有什么事？''你刚才又自言自语。''我没有。'一个难友在旁说：'你刚才确实说了一连串无聊的话。'就这样，蒋海溶把我从疯狂边缘拉回，然而，我却无以为报。"[①]虽然柏杨没有被逼疯，但是有一些政治犯人就在牢狱生活中变成了可怜的疯子。基于这种残酷的现实，柏杨越发认识到自我精神调控能力和意志力的重要性，必须建立起理智、清醒、坚强的主体性。他在其他诗歌中也很少自怨自艾，而是时时鼓励自己和其他人，树立起信心和昂扬的斗志，坚决不向专制政权和黑暗社会屈服。《鹧鸪天》堪称为典型。该诗上阕就豪迈地以浩然正气自勉："义气一身遍九州。江山踏尽不知愁。歃盟笑滴男儿血，剖胆轻骄好汉头。"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的这首豪放词，最能够体现出他的壮怀激烈，又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540—541页。

让读者看到了那个义无反顾"猛撞酱缸的虫儿",依然在笑着面对坎坷的监狱生活,能够做到下阕所书的"今已矣,事都休。魂断残梦复何求。收回四海纵横志,闲对西窗学集邮"。这既为自勉,也是与狱中难友的共勉写照。《读史》、《我在绿岛》等诗歌表达出作者同样的情感和怀抱。

《出狱前夕寄女佳佳》、《嘱女》、《寄虞和芳》等,则是另一类型的诗歌。以五言诗歌《嘱女》为例,从中可看出柏杨在诗歌中构建出普通人主体性的另一个方面:满含亲情和友情的、柔情似水的心灵世界。面对好几年未见到的女儿,以及父女之间天生的血缘亲情,钢铁般坚强的柏杨变得满面柔情,一腔舐犊深情地写道:"千里来探父/父迎乍邂逅//茫茫两不识/迟迟相视久//父惊儿长大/儿惊父白首//相抱放哭声/一哭一内疚//父舌舔儿额/儿泪染父袖//睹儿思往事/利刃刺心薮"当女儿在绿岛住完探亲的两日之后,只能够与父亲依依不舍地分别,乘坐飞机返回台北,而把思念留给了父亲。柏杨忍不住悲伤满怀:"再视儿睡处/抚床泪如漏//小径仍似昨/父影独佝偻//重见尚无期/念儿平安否"即使这样悲伤,他也不忘记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嘱咐女儿在以后的人生路上,要做到"自爱更自强/莫贻他人口"。对于友情,柏杨借《寄孙观汉》一诗表达出对朋友的深厚友谊和感激之情:"今日踉跄回台北/人物都非两渺茫//去时家园如完瓯/于兹覆巢鸣寒蛩//念我身老童心在/仍将丹忱酬热肠//先把无穷感恩意/第一修书报孙郎。"至于在他入狱一年之后就抛弃他的前妻,柏杨并没有记恨她,而是借《出狱前夕寄前妻》一诗表达出一种复杂的感情,虽然他的心中依稀还有对过去伉俪之情的怀念和眷恋,"石烂海枯誓言在/影伴形随叠步从//巨弓惊散同林鸟/鸣镝哀乐已三生",不过此事此情已经成为过眼烟云,无法挽回,经历过政治监狱的生死折磨和考验的柏杨,在即将出狱前夕的欣喜中,能够以理智冷静的态度告诉即将会面的前妻,他依然很感激她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荆棘//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谢君恩",亦是对往事旧情的一种告别,希望出狱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这两种类型的诗歌相辅相成,以在押政治犯人为诗歌主体,分别从两个方面建构起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主体性。具体而言,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冤气歌》、《我在绿岛》、《鹧鸪天》等描述监狱现实生活和政治犯命运遭际的诗歌,把顽强不屈、坚信真理必胜的强大精神斗志,以及保持内心世界清醒、理智的自我意识,作为普通人主体性的一个构成要素。他强调的是个人精神层面中的理智、冷静、乐观等理性因素;而在《嘱女》、《寄孙关汉》、《出狱前夕寄陈丽真》等诗歌中,政治犯们则一改第一类诗歌中壮怀激烈的坚强斗士形象,把钢铁般的理性化为人间感情的绕

指柔，表达出普通人内在心灵中最柔弱、最人性的一面，即对父女亲情、朋友之间深厚的友情、对已逝爱情的眷恋，建立起普通人主体性的感性层面。从而与《冤气歌》等诗歌中构建起的普通人主体性的理性层面相互呼应，主体性成为人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的结合体，亦与柏杨持有的自然人性观、自由婚恋观、平等、人权等观念相吻合，也可说是这些观念诗歌中对人的主体性上的一个具体建构，与报导文学和讽刺幽默小说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遥相呼应。

第三节　草根阶层主体性的彰显

1984年，柏杨在访问美国期间，接受《中国之春》杂志的访问，其中谈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人的苦难，并且认为"中国人的苦难是由中国历史造成的"，"你要看中国历史，五千年历史中，有几天是好日子？我们当然可以情绪化的高声呐喊：'我们很快乐，我们没有一天不快乐，'但是，如果仔细看古人歌颂的汉王朝、唐王朝是怎样记载，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命运，早就如此悲惨。不断发生'改朝换代型'的战争，不断遭遇到'瓶颈时代'的屠杀。好不容易迈过这两关，朝代稳定时，又有倾盆大雨般的暴君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百般虐待"。[①] 柏杨把中国"酱缸文化"看做是中国人所经历的最大、最明显的苦难标记，在杂文中给予最充分的阐释和批判。如果仔细考察柏杨的其他作品，可以发现，他对苦难的理解和阐发也几乎贯穿这些作品，由此建立起一种苦难意识，在苦难和其产生的悲剧感中，来书写中国人的命运。从小说来说，浪漫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莎罗冷》、《旷野》，以及《龙眼粥》、《凶手》、《秘密》等短篇小说，虽然里面也写到爱情的甜蜜和坚贞不渝，不过大部分爱情故事都是以悲剧结尾，有情人难成眷属，悲剧性的爱情成为人类苦难命运的一个象征和寓言。他在短篇小说集《怒航》中，亦把人性恶当成人类苦难的一个源头，虽然他提倡和赞成自然人性论，把其作为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因而把尊重自然人性与人权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但是他并不否认人性恶给人类带来的诸多苦难。在以上作品中，柏杨的"苦难意识"显然是一个作家面对恶劣、悲剧性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自然反应，带有某些悲观色彩。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9—40页。

然而，柏杨诗歌对苦难生活的处理，显然与杂文和浪漫小说不同。他所写的残酷黑暗的狱中生活，当然也是一种苦难生活，不过这种苦难生活带给普通中国人的并非全部都是灾难和毁灭，同时也可能激发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以及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这样说，柏杨在诗歌中，把政府冤狱中的政治犯纳入现代市民社会系统之中，把他们作为现代市民中的一员，来建构他们作为普通现代人的主体性，不但强调他们不屈服强权暴政以及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而且把他们内心深处对亲情、友情的珍惜和渴望表达出来。而柏杨的报告文学则把另一类社会边缘人物纳入其中，包括游荡于金三角边陲地带的国民党"孤军"和一些身体残疾的人，作为普通市民群体成员的另一个补充，把这些被抛出正常社会圈子的小人物也当做现代人来看待，甚至是把这些普通小人物当成英雄来看待。在 1961 年的《异域》、1982 年的《金三角 · 荒城》、《穿山甲人》和 1989 年的《家园》等报道文学作品中均具有此特点。《异域》的《序》表达出这种看法："有台湾面积三倍大的中缅游击边区，虽经两次大撤退，现在仍鏖战未休，每一寸土地，都洒有中华儿女的鲜血，一支孤军从万里外溃败入缅，无依无靠，却在十一年间，一次反攻中国内地，两次大败缅军，以致缅甸政府不得不向联合国一再控告孤军'侵略'，这其间，有无数令人肝肠都断的悲壮事迹，不被外人所知。本报驻曼谷记者李华明先生于去年从泰国写来一稿，对中缅边区基地建立的始末及发展，报道甚详，全文定名为'血战异域十一年'，原作者邓克保先生，以生花之笔，写下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伙伴们碾转入缅，和历次战役的经过。兹将李先生致报社原函，披露于后，可窥知全书的每一字一句，都是英雄眼泪。"①虽然作者的政治立场并不被我们所赞同，但文中却也体现作家建构现代人主体性的另一层面：自强自立的意志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生命的尊严感，或曰是对生命质量的追求，亦体现出五四精神对柏杨的深刻影响。这亦是不同于诗歌建立的主体性的一个方面。

柏杨（以"邓克保"为笔名）发表的报导文学《血战异域十一年》（后改名为《异域》）轰动了台湾、香港等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实邓克保其人是柏杨在中学情窦初开时爱慕的一个女生，后来得病夭折，柏杨正是为了纪念她，才为自己取了一个"邓克保"的笔名。《异域》以"邓克保"为第一人称，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展开故事。这种艺术手法并不新鲜，一些著名现代作家已经使用过。例如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就是借作者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9 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9 页。

在一个隐秘山洞捡到的一本日记，借此揭开了一个国民党女特务的人生遭遇。不过柏杨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艺术手法上的创新，而是为了达到使广大读者误认为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从而增加现实感和真实性，以便引起台湾社会中人们对这些被社会遗忘的国民党孤军的注意和同情。按照台湾学者张堂琦的看法，《异域》也确实取得了这种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他在《柏杨两部异域题材作品的观察》一文中详细列举如下："平原出版社于1961年以'邓克保'笔名出版后大为畅销，'它在只有一万八百万人口的台湾，十五年间，销出一百余万册'，而且'一直是在默默的发行，从没有一位作家写过评介，也从没有在报上刊登过广告，而完全依靠读者先生的口碑'，竟成了'二十世纪最畅销的报导文学'。随着作品的畅销，它发挥了广远的社会影响力，例如1977年大专联考的作文题目是'一本书的启示'，而《异域》最受学生的重视，'竟名列前茅'。出版后的十余年间，经常还'有人写信来问如何可以去滇缅加入反共游击队的行列'。更有趣的是，在一片《异域》热潮下，至少有七种与《异域》同内容的书籍在香港和台北出版。马克腾(姜穆，1929—　)的《异域下集》、卓元相(即姜穆)的《异域烽火》上下集、于衡的《滇缅边区游击队》以及胡庆荣的《滇缅游击史话》、李利国编著的《从异域到台湾》等书，都可视为《异域》一书的变形、延伸或补充。如果没有《异域》一书的巨大影响力，柏杨也不会于1982年在《中国时报》的提议下，亲临《异域》现场，而完成《金三角·荒城》一书。"①由此可以看出，柏杨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内容题材和艺术风格上有很强的连续性，我们可以把《金三角·荒城》看成是《异域》的续集。二者虽然写作的时间不同，分别写于60年代初和80年代，不过却能不像杂文那样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80年代的《家园》等其他报导文学作品，其艺术风格特点也没有变化，可以把这些作品都当做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看待。

除此之外，柏杨报导文学不分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这些报导文学在对现代人，尤其是草根小人物的主体性进行建构的着力点上均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正是在这些报导文学作品中，柏杨把自己对"苦难"的另一种理解表达出来，即苦难意识除了包含悲剧性因素之外，也包含着人类对苦难境况的顽强反抗和超越，不管是恶劣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原始自然森林，还是压抑的、专制社会的现实生活环境，抑或是漂泊无依、被正常社会抛弃等情况。因而在精神上遭受的苦难，以及因身体严重残疾而经历的身体上的苦难，都会激发起普通小人物去追求正义感和个体的尊严，把自强自

① 黎仁活主编：《柏杨的思想与文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68—269页。

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做支撑起自我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报导文学中的苦难意识反而成为一种驱动力，能够充分激发出人们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主观能动性来，在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

在柏杨的作品中，主体对于苦难的超越首先表现为与自然苦难、环境的对抗意识。从《异域》对原始森林恶劣环境和对孤军随时面临的死亡的大量描写中，即可窥见一斑。“我们的苦难，还不仅仅是蚂蟥，瘴气和毒蚊才是更可怕的灾害，我们对热带森林根本没有知识，唯一的知识来自《三国演义》，……瘴气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而毒蚊却使我们衰弱，却使我们慢性的死。啊，世界上恐怕只有我们弟兄，患者十一年来都不痊愈的疟疾，而且还不知道要害到那一天，谁比我们更需要疟疾特效药？——不是‘奎宁’，奎宁对我们这些浑身都是虐菌的人没有用，我们需要的是更猛烈的药，你如果到中缅边区，你会发现我们的岗哨卫兵，都是两人一组，当一个人疟疾突然爆发时，另一个人可以继续执行任务，而你也会常常的看到，一个弟兄突然的倒到地下，呻吟，发抖，流泪，但你不要动他，等到疟疾一阵过去，他会自己爬起来，继续走路，继续作战，这些事情，最初曾使我自伤其类的掉过眼泪，可是当我也被毒蚊叮过之后，便没有多的眼泪为别人哭了。”①除此之外，还有伺机伤人的猛虎，以及敌视他们的原始村落的不时袭击，缅甸政府军队对他们的残酷围剿，使孤军及其亲人不但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最低等的衣食温饱和医药治疗也无法满足，他们必须时时处于艰苦的战争状态。

其次，作者也写出孤军被正常社会遗弃的残酷现实，这是他们在精神上经受的苦难折磨，也是与苦难更深层的对抗。国民党在 1949 年溃败之时，除了大部分撤退到台湾之外，还有一小部分由中国内地东南省份进入边缅地区，开展所谓游击战争，试图反攻中国内地，这是有史可查的真实事件。《异域》和《金三角·荒城》中的孤军，就是由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合成的一支残余部队，他们在中缅边区无比艰苦，同时又进行着无望的游击战争，甚至在随时会死亡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更为悲惨的是，由于当时台湾当局的蒙蔽，这些孤军依然顽固地“坚信”是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而浴血奋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他们抛下，而在台湾的国民党更是把他们抛诸脑后，十一年苦战换来的只是被要求撤退进台湾。而他们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9 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64 页。

进入台湾社会后依然是面对苦难的生活："这些用鲜血而不是用人事关系博得的官阶，在他们回台湾之后不久，部队被编散，便不太算数了，少将成了中将，中校成了少校上尉，而且有的压面条，有的为人当苦力磨豆腐，有的年老力衰，儿女成群，靠着哭泣度日。"①这种被社会抛弃的精神痛苦才是他们要面对的最沉重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柏杨把他们推进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苦难的绝境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描写方式既有报道文学的纪实性和真实性，也有作者有意采用小说笔法进行的虚构夸张。这可以算是柏杨在艺术上的独创之处。前已言之，柏杨的特殊立场、写作目的是为了引起世人对孤军及其处境的关注，尤其是强调孤军在面对非人的苦难时的态度。在其充满感情的描绘下，孤军们面对种种苦难生活，虽然有过消沉的情绪，但是没有绝望、颓废，他们坚信自己是在为生存和理想而英勇奋战，这在柏杨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苦难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打击下，为何孤军们没有灭亡，他们的生命潜力反而被激发出来，如同英雄一样的视死如归和勇敢作战，创造出很多奇迹，无论是战斗的还是生命的？所有这些都引起柏杨深深的思考，当然，他没有把那些孤军塑造成高大全式的英雄，而是处于死亡威胁下的普通人形象。柏杨如实写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甚至是处于文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的心理特点。面对去打仗的战士，妻子每一次都提心吊胆，唯恐丈夫战死在外或者失败被杀。那些孤军战士衣衫褴褛，腿脚瘦得像麻秆，并且在随时可能发作的疟疾的威胁下去参加残酷的、血淋淋的战斗，他们的内心同样充满对死亡的恐惧。

不过在柏杨看来，这些艰苦的外部条件并不能够遮掩住他们崇高的人格和身上的英雄气概。在《异域》的结尾，主人公邓克保等人没有选择回到台湾过平安日子，而是永远留在滇缅边区，为了"理想"而继续战斗，他们及其儿女再度成为《金三角·荒原》的主人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些孤军是硬碰风车、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那种悲壮的为"保家复国"的理想而九死不悔进行战斗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意志，令柏杨和读者们感动。在他的笔下，孤军们更像是西方史诗中被时代和历史抛弃的英雄人物。正是这些活生生的普通人构成了台湾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只有他们具备主体性特点才构建起全中国人的主体性，这是柏杨所谓主体性建构的理想。

除了身处金三角异域的孤军之外，柏杨还把他的目光投射到另一类被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9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72页。

社会遗忘的残疾人身上，在后者身上继续挖掘人类顽强、美丽的生命闪光。《穿山甲人》是柏杨利用写作《金三角·荒城》之余来到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进行采访，根据身残志坚的张四妹事迹而写成的短篇报告文学。《穿山甲人》中的张四妹处于身体残疾的苦难之中，她天生就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鱼鳞癣，全身皮肤紧缩，只能够像鱼一样天天蹲在水中保持皮肤湿润，五官严重变形，外形貌似穿山甲。但是张四妹拥有顽强的毅力和自强自立的精神，用自己的意志挑战这种苦难的绝境，艰难地学会了基本的劳动技能，还学会了用华文进行书写。生命在张四妹这样脆弱丑陋的身躯上焕发出人性的光芒。相对于生理健全的人而言，她的韧性的生命抗争令人感动和沉思。虽然也是草根生命的悲剧人生，但《穿山甲人》一文给人的并非是绝望，而是心灵的震撼。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伤残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在台湾文学中表现得并不够充分。其实，人们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恰恰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化程度，体现了社会爱心的轻重冷暖。柏杨不仅怀着一颗博大的爱心，以同情的目光关注伤残人本身，同时又体现对伤残人的自强自尊的敬重，表现出其广博的人道主义情感。也正是这篇感人肺腑的文字，引发了后来台湾各界对张四妹的募捐，不但让她的病情得到缓解，心灵更是得到爱的滋润。

柏杨在张四妹等残疾人身上，看到了苦难困境中人类生命的尊严和普通小人物身上迸发出的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这种主观能动性改造外界环境和改造主体身心的作用和力量。与那些坚守理想信仰的孤军战士相比，张四妹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她不但改造外部生存环境，学会自食其力，而且逐渐通过学会文化知识，来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可以自理，同时具有独立思想的正常人。

《家园》是柏杨在 1988 年 10 月至 11 月间回中国内地探亲期间的游记。相隔将近四十年，柏杨重返魂牵梦绕的故乡，别是一番滋味上心头。从台湾与祖国中国内地关系的角度来说，台湾是长久离开中国内地母亲怀抱的一个孩子，在台湾定居生活的柏杨，也是被抛离中国内地和亲人四十年。因而，对于祖国中国内地社会来说，柏杨的位置如同生活于中缅边区的孤军对台湾社会一样，他亦是一个处于中国内地社会边缘的普通人。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均是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上。《家园》详细记载了他此次在中国内地的行程。柏杨夫妇在中国内地共参观游历了五个地方，包括上海、北京、郑州、西安和他的故乡河南辉县小城。每到一个地方，柏杨总是由现实进入幽深的中国历史深处，对中国五千年，和刚刚过去的“文革”十年带给中国人的苦难进行思考。可以看出，《家园》也是写

苦难困境的报导文学作品,只是它把中国历史的苦难和“文革”的苦难,作为广大中国人经受过的苦难,并站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位置对这种苦难产生的根源进行仔细反思。正是通过反思,柏杨沉痛地认识到,“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因为人们受尽痛苦,早已觉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恐怕随时都会发生。人们所说的‘再也不会发生’,是指原班人马登场,……那当然发动不起来,历史不能回头重演。问题是,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而中国内地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仍原封不动的存在,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暂时沉寂,一旦九霄云外,响起野心家的巨雷,灾害仍会出现”①。四十年后重回中国内地,加之探访时间短暂,柏杨的这些关于土壤与工厂“仍在”的提法显然并不符合当时的实情。但他提出一个富有警示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不从思想根源上去深入反省“文革”,彻底清除相关的思想流毒,那么历史的苦难与挫折会不会再一次重演呢?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作家,柏杨在《家园》中以普通中国人的身份,怀着对家国的忧思,站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对中国充满灾难的历史和“文革”进行深刻反思,他看到了历史苦难循环发生的可能性,这也是被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不由得忧心忡忡。那么,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困境呢?柏杨在这篇报导文学中也给出了答案,就是人的主体性还应该包括自我反思的因素。换言之,只有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主体性,才能够去反思自身和别人的苦难,由此避免苦难的重复发生,从而改变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环境,达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否则他们就算意志如何坚强、生命力如何坚韧,都不能够成为现代市民中的一员,更无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社会。

从柏杨的整个创作来看,报导文学作品阐释出苦难与人的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做出的一个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些作品中,苦难既是一种生存的绝境与精神的困境,同时也是一块试金石,激发出身处苦难中的普通人的生命力。也正是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这也使柏杨认识到,这些普通人,更具体的说是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底层小人物,他们同样是现代社会的构成主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45—146页。

体,属于现代市民群体中的一个成员。同时他们拥有的主体性特点,亦是现代人的主体性的一个构成要素。从中也可以看出,柏杨的市民社会和市民的概念范畴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可以这样说,柏杨在早期杂文和浪漫色彩的小说中,力图构建起的是现代市民的主体性,带有柏杨早期思想的某些特点。而到狱中诗歌和《金三角·荒城》、《家园》等报导文学作品中,则把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人也纳入其中,此时建构的是全体中国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柏杨把广大中国人都纳入他的市民社会系统之中,均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主体。从柏杨整个创作历程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不同理解,也是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在杂文后期发生的微妙变化之一。通过批判"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来建构现代中国人(后期杂文中亦称为"中华人")的主体性,由此也成为后期杂文和史传作品的目的之一。

第四节　幽默与狂欢

柏杨的小说除了那些浪漫色彩浓厚的婚恋小说之外,还有另一类幽默讽刺的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怒航》、《打翻铅字架》,以及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与诗歌和报导文学不同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柏杨并没有通过曲折动人的小说故事情节来直接建构现代人的主体性,而是利用语言的夸张、嘲讽和戏谑风格产生的幽默、讽刺效果,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进行讽刺批判,建立起自己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以特殊的逆向性方式达到张扬现代性世俗化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柏杨这类讽刺抨击小说与杂文在6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写作的时间也几乎一致,小说与杂文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而且他是用杂文手法和杂文思想来写作这些小说。具体到《打翻铅字架》来说,柏杨在其序言中指出该部短篇小说的内容:"乃找出一九五零年代及一九六零年代初期一些剪稿,集成本书,里面可没有'曰'啦,人物都是'说'的,以示洋化,而表正统。至于内容之精湛,更不必细表。本巨著至少有一项好处——诸如煤球使用、汽车价值、家庭布置、三轮车存在,以及银子的购买力,都是小市民当时的现实实况,纵用来考古,也价值连城。"也就是说,这其实也是柏杨60年代杂文喜欢关注的社会日常生活现象,并且"本集十八个短篇皆以杂文笔法写成,有强烈的讽刺性及幽默感,叙述语句有相当程度的扭曲与

夸张，直指社会的病态现象极具恶质倾向的人心人性"①。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把这些小说看做是杂文的变形，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也是杂文惯用的幽默和讽刺。而《古国怪遇记》则几乎全篇都是杂文式的幽默、讽刺手法和审美效果，"《古国怪遇记》原名'云游记'（二集），以传统章回体的小说形式，将人们所熟悉的历朝人物或传奇人物集中到同一个时间场景，让他们同台演出。如此'怪诞'的构思，将古代名人'玩弄'于掌上的写作方式，颇合乎杂文作家柏杨的基本性格"②。而"《怒航》共十二篇，以发掘人性为主要内容，对于人性的善恶有相当深刻的探索。……像是《七星山》中爱搬弄是非的齐桂芳；《周琴》中骄傲自私的周琴；《隆格》中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莉芙；《重逢》中背叛丈夫的玲华等。"③虽然这些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人性恶，不过抓住人物的一个突出特征，进行极度的夸张描写和尖刻讽刺，也会产生一种幽默感和讽刺性，依然体现出柏杨的杂文风格。而柏杨在杂文中用小说笔法对"柏杨糟老头"和"柏杨太太"形象的塑造，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柏杨杂文与这类幽默、讽刺的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确实有共通之处，可以把它们看做是互文性文本。

还要看到，这类小说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亦与杂文的极其相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古国怪遇记》，该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并不复杂。小说描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回到大唐后，被奸臣秦桧在唐太宗面前所谗陷，弄得他们不仅官当不成，而且吃饭都成了问题。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位徒弟发现社会风气已经改变：佛教已不吃香，通天教才是时髦，唐朝百姓无不争相设法出洋去车池国镀金、嫁人。于是徒弟便说动唐僧，假装通天教主，在长安组织赴车迟国朝圣团，带了一大群美女、小人、马屁精，浩浩荡荡西行，一路上经过红包国、猛生国、开会国、诗人国、歪脖国、西崽国、恶医国、飞帽国、官崽国，出尽了洋相，受够了苦头（最后是否到了车驰国，也不得而知，因小说已停载，柏杨没写完）。这是一部杂文型的小说，是柏杨将自己写了几年的杂文的思想观点形象化、荒诞化，用小说的形式表现杂文的思想，可以说是用一种鲁迅故事新编式的方式体现出对"酱缸文化"的尖锐批判，把"酱缸文化"的种种表现形式，包括杂文集涉及的现象，用更形象的方式进行针砭。因而，他的小说创作可看成是杂文思想的某种补充，杂文同时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507页。

② 同上书，第201页。

③ 同上书，第509页。

也是小说思想的延伸，或者可以这样认为，他因受小说艺术特点的限制，而另创杂文来淋漓尽致地针砭和批判"酱缸文化"。

再具体到作品的内容主题来说，柏杨在这类小说中，把崇洋媚外的洋奴和西崽毫无独立人格和自尊心的特征，作为建构现代人的主体性的反例，对洋奴们极尽讽刺和挖苦。而批判洋奴和西崽现象，其实也是早期杂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换言之，《古国怪遇记》等小说中所要提倡和建立的现代人的主体性，其实也是早期杂文要构建的主体性观念。在杂文集《圣人集》的《洋奴之治》一文中，柏杨精辟地分析了"洋奴政治"的产生和特征："盖自八国联军之后，洋大人的枪炮把中国人打得屁尿直流，大批留学生出笼，看见外洋有抽水马桶焉，有高跟鞋焉，有汽车嘟嘟嘟焉，心中大喜。遇到聪明才智之士，若居浩然先生者，更发明英文可以救国，只要一说英文，便无人可敌；只要和洋大人一握手，哲学就有了根据，于是乎，近百年来的政治，就成了洋奴政治。洋奴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嘴巴英文化'。君没坐过招商局的船乎？中国人乘中华民国政府的船，所填的表，却全是英文的焉。于此可看出洋奴政治的苗头来矣。你如果不会英文，或英文程度不够作临表泣涕之用，连船都坐不成。其实这个没啥可稀奇的，一旦进化到连坐公共汽车都要用英文填表，一旦国民学堂的课本，都成了 book，book，a book，到那时再稀奇不迟。不过到那时候大起恐慌的恐怕不是我们小民，将是那些靠'嘴巴英文化'吃饭的家伙。盖大家都成了英语民族，他的那一套人人都会，他的饭碗就没有如今这么牢靠矣。"①而长篇小说《古国怪遇记》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批判洋奴政治和西崽气质。小说前八回，均是假借孙悟空师徒回到唐朝之后的遭遇，始终在讽刺嘲弄崇洋媚外的种种现象，尤其是人们对西方英语国家的卑躬屈膝和无限奉迎。在第十四回中，干脆就以"西崽国"为标题，因"敝国上下官民人等，敬的是外邦人士，尊的是东西夷人"②而得名为西崽国，以得到夷人的一踢为荣，因为"五岁之子，踢之以夷脚，可以成神童矣。二十岁之女，踢之以夷脚，可以嫁擦皮鞋的亦。三十岁之夫，踢之以夷脚，可以出国矣。四五十岁之叟，踢之以夷脚，可以成学人专家矣"③。而柏杨在杂文集中对西崽的讽刺同样非常尖刻，"西崽办理工程招标，土产便永远抵挡不住洋产。不要说东西啦，就是学者专家，洋产的就比土产的值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05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5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93页。

③ 同上书，第401—402页。

钱,美国野鸡博士就比中国国立大学堂博士有份量。盖在西崽眼里,中国乃一殖民地而已,怎能不唯洋是观,唯奴是表乎?”[①]除了《古国怪遇记》的讽刺对象可与柏杨杂文对应之外,还包括短篇小说集《打翻铅字架》也是杂文的互文文本,因为《打翻铅字架》中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杂文所批判、讽刺“酱缸文化”中的一种现象,《魔匪》是讽刺复古主义者们坚持文言文,不肯简化和拼音化的酱萝卜态度;《上帝的恩典》的故事与《古国怪遇记》中的《西崽国》类似,均为讽刺国人崇洋媚外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西崽气质;《妻的奇遇》则可与柏杨杂文对“名女人”的嘲讽相对应,《一条腿》和《古国怪遇记》中第十一回《开会国》,都是呼应柏杨对当下社会中“开会”现象的讽刺。总而言之,柏杨的杂文和这些幽默讽刺小说关注的内容主题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

不过,由于杂文可以对“酱缸文化”及其现象直接发表议论和进行批判,而小说的艺术特点则决定它必须通过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间接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批判。前已言之,幽默讽刺类小说的重心不在于编造曲折的故事情节,而在于利用幽默和讽刺的艺术风格,把幽默和讽刺当做针砭“酱缸文化”的武器和工具,来达到与杂文所产生的同样的社会效果。

柏杨之所以在小说中选择幽默、讽刺作为主要的艺术表达方式,首要原因在于避祸自保,他能够把最尖锐的社会文化的批判锋芒,隐藏在幽默、诙谐之中,而不引起白色恐怖政权的过分注意。正如他在《柏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在杂文中大量采用幽默的表达方式,主要是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文字检查,以及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和阅读兴趣,杂文体的幽默讽刺小说亦如此。

其次,选择幽默和讽刺作为“酱缸文化”批判的一种方式,也是由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特点决定的。也就是说,柏杨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接过了《自由中国》的棒子,把批判、改善“酱缸文化”和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作为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但是他也时刻不忘记自己野生知识分子的身份,他是现代市民社会系统中普通市民的代言人,并不是雷振、殷海光之流直接干预国策和政治批判的政论家,因而,他在杂文和杂文类的小说作品中就尽量削弱政治意识形态和政论色彩,采取一种既迂回曲折又不减其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锋芒的艺术手法,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酱缸文化”批判。而幽默和讽刺具有的独特特点和美学效果,恰好能够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29页。

达到柏杨的上述目的。

至于幽默本身带有的批判色彩,林语堂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此进行过分析。他在1924年的《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中,把幽默当做仁义道德的反面来看待,看到它具有的反对封建道德传统的意义,同时认为幽默是一种自我的表现。在随后所写的《幽默杂话》中,林语堂就直接提倡“幽默的人生观”,因为“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①。因而,在林式观念中,幽默明确具有反封建的文学和社会意义,“不管你三千条的曲礼,十三部的经书,及全营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严父孝子,板面孔贤师弟子一大堆人的袒护、掩护、维护礼教,也敌不过幽默之哈哈一笑”②。在1933年,他发表《论幽默》,认为“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泪中带笑,笑中带泪”。也就是说,幽默不仅可以使人捧腹大笑,而且这种笑也会使人落泪,即会产生讽刺和劝谕的美学效果,这是幽默具有的一种反抗力量。换言之,幽默实际上产生的是两种美学和社会效果,既能够使人轻松快乐,又包含着一种反抗权威的否定力量。鲁迅则强调幽默拥有的反抗权威的一面——讽刺,反对幽默中那种“会把屠夫的凶残化为哈哈一笑”特点的轻松肤浅,他在《从讽刺到幽默》一文中认为,“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③。

而柏杨的幽默观可能更接近鲁迅,重视强调幽默具有的反抗意义。而且,柏杨在杂文和小说中对幽默和讽刺手法的运用,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又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巴赫金认为,“狂欢式——这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知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一切全卷入自由而亲昵的交往)它为更替演变而欢呼,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并以此反对那种片面的严厉的循规蹈矩的官腔”④。因而,“狂欢化”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狂欢广场、不分阶级等级的亲昵接触、插科打诨、粗鄙的对话属狂欢化;奴隶变帝王,帝王变乞丐的人生双重性属狂欢化;狂欢之王加冕与脱冕所象征的变化与更替精神属狂欢化;庄谐结合的语言风格属狂欢化”⑤等,均是

---

① 林语堂:《幽默杂话》,《晨报·副刊》1924年6月9日。

② 同上。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3页。

④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第223页。

⑤ 同上书,第55页。

通过笑声来反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与此相类似的是，柏杨的幽默讽刺手法也产生这种效果。以《古国怪遇记》为例来说，柏杨对人们崇洋媚外心理的嘲讽，是通过西崽国处理店小二死亡事件的一系列细节描写："只见人山人海，鞭炮齐鸣，店小二挺尸在地板之上，妻子儿女，一个个披红挂绿，笑得像没嘴葫芦，强身向前，向八戒双膝跪倒。'夷大人啊，'那妇人曰，'忍蒙不弃，把俺当家的踢死在南墙之上，真是三生有幸，此恩此德，不知何时才能报也'。"[①]按照常理，杀人凶手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但是死者的家属不但不责怪凶手，反而因为死者是死于夷人（外国人）之手而感恩戴德，这种对有意极度夸张的、不符合常情事理的事件和对话的描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使读者捧腹大笑，同时也会激发起另一种相反的审美感情，即对西崽们的鄙视和愤慨。更何况，后者会逐渐压倒前者，愤慨之情、批判之意会占据大部分情感，一种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风尚的情绪也被培养出来。这也是柏杨要通过幽默和讽刺而达到的批判效果。

在《古国怪遇记》中，这种幽默手法比比皆是，处处是幽默，处处也是狂欢，达到了狂欢化的极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古国怪遇记》是最能够体现出柏杨幽默讽刺风格的一部小说。

正是通过这些小说的幽默讽刺，柏杨形成了与早期杂文相同的现代人的主体性思想——崇洋不媚外和独立的自我人格意识。正如柏杨在杂文《做官与麻人》中所申明的立场："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在于做坏事的人太多，而肯说直话的人太少。从前闭关自守时代，窝里烂还可以说祖先大人所见不广，如今海运大开，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应有尽有，所见该够广了吧。可是，中国人的脑筋却似乎仍停滞在铁器时代，不但科学上停滞，文学、舞蹈、电影、话剧、绘画、雕刻，无不停滞，还不允许有人从酱缸里往外探头瞧瞧，一有人探头瞧瞧，义和团同志马上拉下尊容，攒拳怒目，吼曰：'既然洋人好，你怎么不拉高鼻子呀，你怎么不去认洋人当干爹呀。'如此蛮缠不清，就是被酱的后果。嗟夫，洋大人的优点，当然要学，洋大人的缺点，当然不要学，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现代化'，并不是洋化，不能神经衰弱到那种程度，一提洋大人就屁尿直流，认为柏杨先生要买铁钳拉鼻子喊干爹啦。"[②]

幽默讽刺小说把"崇洋不媚外"作为现代人的主体性的一个方面，与《柏杨诗》和《异域》、《家园》等报导文学作品中建构的其他层面的人的主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5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96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4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47页。

体性特征，共同构成了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中现代市民的内涵和外延，使他能够以此为标准，在杂文中批判“酱缸文化”的“畸形人”和“丑陋的中国人”，最终能够建立起具有现代化精神的现代法治社会，实现他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想。

第七章　历史的现代化

早在60年代早期杂文时期，柏杨在最后一部杂文集《死不认错集》中，就萌生出写出历史“真实”、不为统治者虚饰美化的历史典籍的念头来。其中的《死文字统治活事实》一文通篇谈论的就是这一设想：“中国的史籍，只是文学的，不是史学的；只是美的（也只是酱缸特有的美），不是真的；只是文字诈欺，不是史实报导。——在这里，得插一句嘴，一部二十六史，似乎应重新写过，执笔的朋友必须不是喝尿份子，把其中欺诈的部份，像苹果上的砒霜一样，洗得干干净净。”①原因在于，中国历史典籍是“酱缸文化”的产物，有太多需要校正和修订的地方，柏杨甚至还一一列举如下：“谈起来‘正史’，感慨多如牛毛，文字诈欺不过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学者（除了学问好，还得有灵性，有认识，有分辨，有见解），能为中华民族写出一本真实的正史。史料虽都是在酱缸里酱过的，但可以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嗟夫，实际上说，‘正史’也者，不过一摊乱七八糟的资料，由几百个个人的传记，前后重迭的那么堆在一起，实在使人生气。盖所有的‘正史’都是模仿司马迁先生《史记》的，《史记》当然是一部古巨著，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对史学的贡献，但那种传记文学的方式，却畸形得很。司马迁先生当初目的，不过是要‘成一家之言’。可是自从班固先生以下的史匠，无不战战兢兢，拼命把他老人家的麻绳往自己脖子上套。套的结果是，两千年史书，全从一个畸形模子里浇出来，除了努力说谎，还努力把史迹割裂，好像瑠公圳分尸案，大卸八块，一沟浑汤。我们需要一个有条有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史’。贵阁下看过《美国史纲》乎？不过四十万字，把美国成立、内战，及发展，来龙去脉，源源本本，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板着御脸曰：‘美国立国才两百年，当然可以那么容易呀。’呜呼，两百年三十万字可说清楚，两千年顶多四百万字，也可说清楚矣。中国的‘正史’，恐怕上了亿啦，不要说看得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02—403页。

懂，便是能读成句的，有几人哉？这是智慧和能力问题。便是两万年，用六十万字也可以提纲挈领，也可以写得头头是道。否则的话，请酱缸蛆先生执笔，不但洗不掉砒霜，恐怕跟猪八戒先生一头栽到盘丝洞一样，打他三百金箍棒，他也理不出头绪。不要说别的，仅只乱七八糟的'年号'，和帝王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这'宗'那'宗'，这'祖'那'祖'，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①

虽然柏杨早有重写中国历史的宏愿和志趣，但是真正促使他的中国历史现代化的"十年史传"写作的，竟然不是个人文学趣味的自然转移，而是和当时台湾"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以及柏杨个人的命运遭际密切相关，后两者甚至是促成他创作转变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众所周知，柏杨因杂文写作而触怒国民党当局，被国民党以"大力水手案"为借口逮捕入狱，审问暂时释放之后又再次被捕，随后被控具有"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罪名，于1968年6月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后来蒋经国接任台湾领导人职位之后大赦，因此他被减刑四年。而实际上他被当做政治犯共关押了长达将近十年。当柏杨被关押在火烧岛的政治监狱中服刑时，就充分利用当监狱图书馆外役的机会翻阅了《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并且以此为资源，开始偷偷着手撰写史学著作《中国历史年表》。不过柏杨转向史学著作，不但因为史书《资治通鉴》是他在狱中唯一可以获取和加以阅读的知识资料，而且其目的也是为了避祸。如同沈从文被批斗之后就转向中国历史上的服饰研究的动机一样，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保护自身的无奈之举。国民党当局没有想到，他们的文字冤狱竟然造就了后来的一位史学家。换言之，以政治犯身份在监狱中服刑的近十年时间中，从柏杨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戕害身心的大灾难，导致了妻子离婚、孩子失去父爱的悲剧结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柏杨在监狱生活中机缘巧合地得以潜心阅读中国历史典籍《资治通鉴》，并且在极为艰苦的监狱生活中以惊人的毅力撰写出《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等史传作品，正如柏杨在《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总序》中所自述的："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资料，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另外还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员要我们'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02—403页。

管，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所以只写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几经转折，三部书稿陆续的重回到身边。面对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的感恩和热情。”①并且以此为开端，他在出狱后又陆续写出《皇后之死》、《帝王之死》系列丛书，以及出版《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等历史著作，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成为公认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专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又是幸运的，十年牢狱灾难并未击垮他，反而转化为激励他开辟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契机，使其继续用其另类的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观点，回到中国历史中继续做澄清“酱缸”文化的工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中男性和女性的“现代化”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竟然是柏杨特殊的坐牢遭遇成全了他重写中国历史的理想，虽然其过程充满了辛酸血泪和痛苦煎熬。

还要看到，柏杨自身具有的历史学养和知识储备，是他顺利走向历史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前文在杂文部分就已经论述过，柏杨60年代的早期杂文已经引用了很多中国历史典故和西方典故，中国古代历史成为其杂文主题常涉猎到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其经常随手拿来引用的知识宝库。可以说，柏杨那时对中国历史典故就非常熟悉。在最初的几本专门写女性外貌打扮和婚恋的杂文集中，包括《玉雕集》、《堡垒集》、《红袖集》等作品集，他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女性，以及她们在封建家庭中毫无人身自由和平等人权，只能够遵从夫权和父权等生存状态，作为现代女性的参照物，并且以此为批判的靶子，由此构建现代女性形象和现代婚恋观。与这些杂文同时或者稍晚一些出版的《怪马集》、《凤凰集》、《圣人集》等杂文集，更多中国历史典故，其中《夺床大战》一文，谈论中国古代宫廷中后妃们的争宠之战，引用的历史资料非常详尽。而杂文集《鬼话连篇集》，甚至通篇为历史故事，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的事迹功过几乎是历数了一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历史知识储备，无疑为柏杨此后撰写史传作品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准备和学养基础。

同时，这也是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情怀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个必然转向。柏杨的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体系虽然在中国社会城市化的某一个阶段成为济世良方，能够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供较合适的现代化处理方案，但是并非具有永恒不变的优越性，尤其随着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后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7页。也可参考《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总序》一文。

期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也渐渐显出劣势来：虽然可以游刃有余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社会文化遗留下的“酱缸”文化问题，以及对现代社会的酱缸流毒进行批判，成为现代社会市民主体性建构的基础；但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问题，例如“强哉骄”女性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应该如何不堕入“情欲解放”枷锁的主潮，而进一步获得解放，以及该背景下的男性的“现代化”问题，均无法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因而柏杨转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方面是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在后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和缺陷所致，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他深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中探究、梳理“酱缸文化”的本质和源头之意图，以便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讨“酱缸文化”在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表现、发展，乃至变迁的轨迹。早在60年代的杂文中，柏杨就已经认识到，正是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酱缸文化”，致使中国人“酱”在其中而无法挣脱，逐渐丧失了个人自尊、人权尊严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意识，以至心理扭曲变态，由此产生了毫无个人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四类“畸形人”，分别是集特权和凶残于一身的封建帝王，依附于政权并是其“帮凶”的知识分子和“圣崽”，狂热追求做官和权势的“官崽”，以及以做官和当圣人为最高目的的普通民众。正如本文此前已经指出的，柏杨的早期杂文作品着重在于批判“酱缸文化”及其流毒在当下社会中的各种表现，他此时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现代性世俗化的观念，《死不认错集》也已经达到“酱缸文化”批判的最高峰。那么，这些举措是否就能够打碎酱缸，改变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呢？事实证明，柏杨的文章某种程度上的确达到了目的，酱缸批判震动了世界华人麻木的心灵，不过这只“猛撞酱缸的虫儿”也以文字获罪，被政府当局找借口当做政治犯关进监狱将近十年。柏杨出狱之后，在70年代末继续杂文创作，但是他发现，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潮流下，杂文批判产生的文学和社会力量无法与五六十年代的相比，杂文自身的建构作用正在逐渐衰落，而且批判“酱缸文化”并非就能撞破酱缸，社会的现代化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一些封建传统观念，反对封建传统观念意识，建立现代化的思想，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分实际上非常复杂多样，并非都是酱缸渣滓，也有很多优秀的因素被包含其中。与此同时，他亦认识到“酱缸文化”产生的原因和形成过程，其实历史渊源也异常复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梳理和整理。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形成了‘酱缸文化’？”这个基本问题，需要回到中国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去进一步探讨，回到中国漫长历史中的封建帝王、封建宫廷和传统社会文化秩序中，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并且使酱缸得到稀释，最后变清，

由此使中国人成为真正的现代人。

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也使他自始至终关心当下台湾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关注现代市民社会系统中市民的素质，因为他们是他希望建立起的那个民主、自由、平等社会中的主体。在《亵渎君王的柏杨》访谈中，柏杨谈到当下社会现状："在台湾，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他们应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及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当然，他们也应该知道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是如何的腐败。"[①]也就是说，新一代成长起来的现代人，虽然所遭受的"酱缸文化"余毒污染的程度没有老一代们的严重，然而他们对历史的疏离和无知也相应会造成两个消极后果，即一方面可能会失去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传统，像后期杂文中提到的"新孝道"问题，另一方面则很可能会美化历史，缺乏应有的分辨能力，把很多属于酱缸糟粕的部分当做历史文化的精华部分而继承下来，而且在复兴国学的旗帜下，很容易产生后面的消极后果。柏杨明确指出："中华文化中有很多是不值得复兴的，像残酷的刑罚，诛杀九族、口供主义、宦官制度、小老婆制度、君尊臣卑、不把人当人的观念，都是邪恶的东西，不但不值得复兴，而且还应该彻底消除。"[②]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在当下生活中担任着镜子和参照系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历史的存在，不但无法反思当下社会现状和现代人的处境，而且中国文化的传承也会出现断裂、断层等问题，中国人(或说是华人)就失去了自身的历史性，同时也必然会失去安身立命的思想与文化传统，更遑论建设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社会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对柏杨来说，采取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重新对中国历史进行评价和撰写，是一个比较急迫的任务。同时，他也可以在中国历史领域内继续展开"酱缸文化"批判，可以通过揭示出中国历史表象下的真实与本相更细化自己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

第一节　现代化历史观

如果按照写作时间来排列的话，柏杨最早的历史作品是他在狱中陆续完成的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人史纲》，虽然它们写完的时间是在70年代初、中期，但是前两部史书直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8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到1977年底才出版,《中国人史纲》迟至1979年1月出版。①他从1983年就开始着手把294卷的中国历史古典史籍《资治通鉴》译成现代白话文,历经近十年时间,直到1992年年底才全部译完,在1993年由台湾远流出版集团出版首次出版,这就是柏杨自己所称为"现代语文版"的《资治通鉴》,从第一册《战国时代》起,直至第72册《分裂尾声》,共计72册之巨。除此之外,他还在翻译《资治通鉴》之前和之间,撰写了专写中国古代帝王之死的史传作品《可怕的掘墓人》、《忘了他是谁》,以及探讨中国古代皇后后妃之死和历史女性命运的《姑苏响鞋》、《温柔乡》、《长发披面》等史籍著作。这些历史著作均在台湾引起巨大的反响,就在1985年,《柏杨版资治通鉴》当选为全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而且就在同一年,《中国人史纲》也被列为对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在90年代末期他又开始译《通鉴纪事本末》,从第一册《范雎漂亮复仇》到第38册《陈桥兵变》,共计38册。这同时也说明,柏杨已经通过自己艰苦的创作实践,较圆满地实现了他在60年代就要重新撰写中国历史的愿望,也为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如果仔细考察柏杨的历史作品,不但可以发现他的历史观在其历史作品中具有的指导作用,而且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观和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来说,前者既是他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产物,又明确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纳入这种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中来,与杂文、小说、传记、诗歌等作品着重阐释的人性、人权、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灵性等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系统,成为柏杨思想和创作中必不可缺的概念范畴。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把今人治史方法归纳为两种:"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知;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而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②柏杨选择的是主观性的治

①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三本史书虽然出版的时间有先后,但是柏杨总是把《中国人史纲》看做是他的第一本史传著作。可参考《〈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总序》一文中的观点。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史方法，他用自己的现代化历史观来重新考察和阐释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正是以这种现代化史观为诸多史传作品的灵魂，才使这些曾经晦涩难懂、无人问津的皇皇巨著，在柏杨手中拥有了新的文学生命力，并且得以改变被世人冷落的命运，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和广泛阅读。

具体来说，柏杨的现代化历史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以现代白话为语言媒介，不仅使这些历史传记作品能够被广泛传播和阅读接受，达到普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目的，更是柏杨"白话文学观"的一个表现。早在60年代的早期杂文中，柏杨就把反对文言文，建立简化的、易于书写的白话文，甚至是拼音化汉语为己任，他在杂文《方块字的困扰》中，就从实用性上推崇汉字简化，以及从左到右的书写顺序："忍不住对汉字拼音化心向往之，如果我们用的是拼音字母，虽然不见得能赶上思想，但对有系统、有组织的思想，一分钟打七十个字的话，一点钟可打四千二百字，也差不多矣，至少比方块字的速度大。现在这种一个方格接连一个方格盖小屋的干法，一小时不过一千个字。人家已坐飞机满天飞，我们还在用手推公交车，未免自甘堕落。而且方块字的中文，是从右往左写的，写着写着，臭汗把刚写好的文章，就染得像武侠小说上的天书，手臂上也沾满了墨渍，如果该手臂再穿着有袖子的白衬衫，这衬衫就报销矣。"①不仅使用文言文会在日常生活中造成很多不便，更可怕的后遗症在于，文言文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惟古是尚"、"尊古炮制"阴魂不散的权威性，潜移默化地腐蚀着现代中国人的国民性和精神气质，"中国传统的学术界，有一种畸形现象，那就是必须'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所本'，才算第一等好手。这就跟中药铺'遵古炮制'的金字招牌一样，是一种不长进不成材的气质，也是一种永远向后看不敢向前看的气质。这种民族要想强大，真得好好折腾一阵"②。

因此，柏杨耗时近十年时间把文言文的《资治通鉴》翻译、改写成现代白话文，实际上也是他反对复古主义，改善"丑陋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澄清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糟粕的一个有力措施，是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在史传作品中的具体呈现。

其次，一改司马迁原著《资治通鉴》的"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以帝王为本的编撰精神，而是改为以普通现代人为本的"民本"为治史基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65页。

② 同上书，第412页。

础。柏杨在《柏杨回忆录》中明确申明自己从事历史作品创作的立场："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充满新鲜刺激的辞句作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他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我在脑海中不停酝酿，想彻底取消朝代的框框，改用纪元（一百年）为单位，使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得以更明确的显示出来，把历史上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官名，一律现代化。"①为了在历史作品中体现出"民本"思想来，柏杨分别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古代史籍进行改写和创新。

第一，在语言文字上作一些小的变动和调整，包括用公元纪年代替中国的王朝号、国号和年号，用今天的名称替代古代人名、地名，而且增加对古代事物的解释和说明等方式，易于读者理解。具体到史传作品中来说，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一律平等，柏杨对帝王们也直接称名道姓，不再称尊号。并且把古代官职换成现代职位。以《柏杨版资治通鉴》第 17 册《火烧赤壁》为具体例子，可以看出柏杨对中国历史典籍《资治通鉴》所作的一些改变。君王孙权自称的"孤"被直接译为第一人称"我"，而"长史"、"赞军校尉"等古代官职名称被现代官职"秘书长"、"参谋长"所代，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这些官职的作用和官位高低。在专门描述封建社会制度之下皇族后妃遭遇的《姑苏响鞋》、《温柔性》和《长发披面》三部史传作品中，皇帝和后妃均直接被换成名字，而不是尊号、谥号。同样，在《可怕的掘墓人》一文中，柏杨介绍了从黄帝时代到春秋时期的十几个帝王，其本名分别为伊祁放勋（尧帝）、姚崇华（舜帝）、夏朝第五任帝姒相、夏朝第六任帝后羿、夏朝第七任帝韩浞、夏王朝第十六任帝姒孔甲、姒履葵（夏桀）、子受辛（商纣王）、姬瑕（周昭王）、姬靖（周宣王）、姬宫涅（周幽王）、周王朝第十八任皇帝姬颓等。而在《忘了他是谁》中，柏杨关注的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期间楚、赵、宋、燕、齐、吴等王国中芈围（楚灵王）、芈槐（楚怀王）、赵雍（武灵王）、田地（齐湣王）等十二位帝王的生平事迹和死亡方式。

与这种现代化史观相反的是儒家推崇的势利眼史观，而这正是柏杨"酱缸文化"批判涉及的一部分内容。正是因为"传统史学家处理君王的地位时，满脑筋政治挂帅。夫政治挂帅也者，也就是权势挂帅，有权大爷高坐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0 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284—285 页。

公堂，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曰‘呔’，手拿笔杆的朋友立刻心胆俱裂。心胆俱裂得久啦，就成了媚态可掬的一群奴才。只敢根据厉害，不敢根据事实。拜读中国史书最大的困扰是，史书上称呼某人是君王时，某人可未必就是君王；史书上称呼某人不是君王时，某人可能正是君王。……更糟的是，有些当过君王的人，因为不合乎当时政治市场上的规格，史学家索性大笔一挥，就把他从史书上挥掉，……篡位夺权之辈，那就更不用提，像晋王朝第三任皇帝司马伦先生，史书只称他的原衔‘赵王’，而南宋帝国第四任皇帝刘劭先生，连原衔也取消啦，直接称他‘元凶’。这些人虽然王八加三级，但评鉴是评鉴，谴责是谴责，事实是事实。你可以跳高捶胸，怒詈某君王是有史以来最坏的君王，连一条蛇都不如的君王，应该杀千刀的君王，但你不能拒绝承认他是君王。柏杨先生的头脑，就是这么简单明了"①。因而柏杨才坚持对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一些记载改正过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杨的这些历史著作又是一种经过某种程度上改写的中国历史著作，是适合现代人阅读、理解的、史实更准确的中国历史著作。

第二，古代史书中传统的年代记载方式也全部被柏杨改换成现代公历纪年方式。其原因可以用《中国人史纲》来解释："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渤海，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给，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皇帝武照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的混乱。我们可以试行作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五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一二六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67—68页。

四，一个始于一三三五。再试行作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答案是它们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纪元前六年，可能是纪元后三三零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零零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零八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柏杨就用公元208年取代了"建安十三年"，解决了他在《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总序》中提到的"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

除此之外，柏杨也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②]。因为王朝号和国号的混乱是造成史观中的"正统"和"非正统"观念的根源："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更谁也都不是中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即四千多年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像样的或不像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九十九个帝王，却没有一个是用‘中国’显示他们的性质的。我们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正式官文书上却是甲午‘清日战争’。这种情形，使王朝号、国号，跟年号一样，造成史籍的混乱。因为谁也没有标出中国的缘故，就发生了谁在中国历史地位上是‘正统’的争执，这争执由政治渗入学术，使从事历史工作的史学家，头上都好像悬着巨斧。"[③]而中国史书中的这种所谓"正统"观念亦是造成史书文字欺诈、颠倒是非黑白的一个主要原因："司马光在他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中，曾为此费劲口舌，解释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恶昭彰的政权，用它们的年号作为正朔，用它们的王朝作为正统……于是集叛徒、土匪、强盗、恶棍于一身的朱全忠之类，明明只是一小块土地的割据局面，年号却成正朔，王朝却成为了正统，因而使中国产生了一种可耻的‘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历史上的忠奸贤愚、是非黑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8—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9—10页。

白,遂大量的受到颠倒、破坏,甚至被恶毒的一笔抹杀。"①所以,顺理成章地"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王朝号、国号,以及年号——包括凡是有记载的草莽英雄们,以及他们所定的王朝号、国号、年号,作一个彻底而广泛的整理,排列出来,由分类而归纳,提供出一个工具性质的参考资料,可以迅速而简便的找出所需要的答案"②。

需要指出的是,柏杨所统计出的中国历史中的"五五九"个帝王国君包括皇帝和拥有独立政权的国王,是取消所谓儒家"正统"史观,而用"现代化"史观观照中国历史之后的结果。柏杨在《可怕的掘墓人》一书中对"皇帝"和"国王"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过较详尽的解释说明:"第一,当中国分裂,独立政权纷纷崛起之际,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互相间打得天昏地暗。独立政权的头目,各以势力的强弱大小,来决定自己的头衔。兵强将广的,仍以'帝国'的皇帝自居,瞧瞧自己的摊子没啥了不起的,只好委屈求全,自甘堕落的当'王国'的'国王',以示距皇帝宝座,还差一截。像大分裂时代的晋帝国焉,北魏帝国焉,头目都称皇帝,乃属自命不凡之辈;西秦王国焉,北凉王国焉,则局促一隅,头目自顾形惭,姑且称'王'自娱。不过,虽然局促一隅,自顾形惭,他们可是自己当家作主,不听别人吆喝,所以仍然是King","第二,当中国统一,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时,头目都继承嬴政先生的一套,一律'皇帝'无误,没有一个例外。此时的'王',便非昔时的'王'。有国王焉,封建采邑的头目也。有'亲王'焉,皇家血统,皇帝的叔伯子侄也。有'封王'焉,与皇家血统无关,跟皇帝也不同姓,靠着对国家的贡献,或靠着对皇帝的马屁功,博得高位的人物也。这三种'王',可不是King,只不过一个爵位罢了"。③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柏杨史传作品的这些改进,会觉得很普通平常,因为把史书年代换成通俗易懂的公历年方式,已经成为编撰、整理史书的一个惯例,但是在当时有开风气之先的惊世骇俗之感。

柏杨还在史传作品中对今人不了解的一些历史事物和风俗习惯部分增加了解释说明的文字。由于很多古代民俗风情和历史事物在战乱和朝代更替等历史变迁过程中消失,因此为了复原中国历史原貌,柏杨史传作品的这个举措是值得肯定的。举例来说,柏杨不但对今人肯定不熟悉的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0页。

② 同上。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2—23页。

东汉末年期间"蒙冲战舰"从形状、构造特点上进行解释，而且增加上刘备惭愧和惊喜心情产生的原因，使抽象的历史事件变得具体可感。① 同时，柏杨还常在今人不熟悉的古地名和古代事物之后加以解释说明。例如，在《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第 18 册《三国鼎立》一书中出现今人并不熟悉的"干戚舞"这个术语，柏杨在该术语后进行解释："'干戚舞'，'干'是'盾牌'，'戚'是'大斧'。《周礼》：'舞有六种：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干舞就是兵器舞，也称武舞。古时舞蹈，有文武之分，文官执羽毛，武官执盾斧。《尚书·顺典》说：'姚崇华推广文化道德，在台阶两旁，分别举行文武舞蹈；七十天后，苗民族顺服。'"②并用括号和稍小的字体以示与正文区别，表明该解释字句是正文部分的补充说明。柏杨史传作品在这些细节方面的改动和创造，均使这些曾经晦涩难懂的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变得通俗易懂起来。

第三，柏杨提倡在不改变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一些创新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历史著述的文学性、趣味性和娱乐性。这是柏杨的民本思想从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来考虑所作出的创新，因为柏杨看到，虽然用通俗易懂、带有时代气息的白话文代替晦涩难懂的文言古文已经使中国历史典籍的读者群不再局限于那些教授学者的小圈子，而是争取到多个社会阶层的读者，包括普通市民阶层的读者，但是由于古代历史与人们的生活距离太过遥远，而且又因为"尊者讳"等儒家史观的影响，中国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有诸多失实和不真之处。毋庸赘言，柏杨重新翻译、改写和创作出众多历史作品，目的首先是使中国人能够了解正确的中国历史。他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过知道一个片断，而这片段还多半来自小说和戏剧。"③从这段话可看出，柏杨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一部符合历史真实，并且能够纠正中国普通读者仅仅通过小说和民间传说而得来的某些错误史实的"正史"来。从广大中国读者的阅读事实来说，明朝作家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最为家喻户晓，讲述的魏、蜀、吴三个国家的历史故事和其中的历史人物，几乎被广大民众认为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这其中颇多谬误和误解，并不符合历史真实。柏杨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的第 15 册《黄巾民变》，

---

① 可参考《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第 17 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 年。

② 柏杨：《柏杨版资治通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 年初版，2005 年二版，第 4548 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6 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12 页。

16册《东汉瓦解》、17册《赤壁之战》、18册《三国鼎立》和19册《寿春之变》，共计五册的容量，具体时间以公元183年的"黄巾民变"开始至280年晋朝统一天下终，勾勒出魏、蜀、吴三国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始末。而其中209年发生的"火烧赤壁"作为最著名的三国历史事件之一，经由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小说笔法的虚构和附会，已经用错误的历史图景遮掩了它的真相，成为国人误解最深和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柏杨通过《火烧赤壁》一书纠正了很多历史错误，并且为周瑜这个历史人物翻案。举例来说，历史上"火烧赤壁"的军事决策者其实是周瑜，而不是诸葛亮，也并没有诸葛亮的"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七星坛祭风"和"智算华容道"等传奇性情节，诸葛亮只是在游说孙权和曹操开战时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而已。而此时周瑜还在番阳未被孙权召回，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诸葛亮，更无从刁难和陷害后者。庞统的"巧献连环计"、关羽的"义释曹操"和黄盖的"苦肉计"更是纯属文学虚构，在历史中也并不存在。"中计"的蒋干之事的历史时间，其实是发生在赤壁一役之后。因而，柏杨认为，在《三国演义》中被描述为气量狭小的周瑜，其实是一个精通军事战略，为人谦逊谨慎，胸襟广大，志向高远的历史英雄人物。柏杨撰写历史作品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够根据历史事实直言，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而不是酱缸蛆们的为"尊者讳"等虚伪、虚假的治史态度。

但是柏杨并不提倡传统的考据式史学研究方法，他指出："考据这玩艺，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自从十七世纪清王朝屡次大型文字狱，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后，文化人心胆俱裂。写吧，随时有被干掉的危险；不写吧，文化人除了写之外，还能干啥？不但心痒，手也很痒；千挑万选，终于发现钻到故纸堆里最为安全。三百年来，东抄抄、西抄抄、左引证、右引证，遂自夸为史学的主流。于是，只要抄得多，引得广，就能把人唬得心服口服，认为这才是天下第一等学问。——我们并不是看不起考据，但专门搞考据的却只能算二流货色，只会在资料里翻筋斗打滚。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不懂考据，盖考据就是判断史料真伪。可是仅只搞考据，却并不是史学。"①也就是说，钻在故纸堆里的考据式方式并不是现代史学家治史的唯一方法，现代史学家除了具有甄别历史真伪和还原历史真实的能力之外——这也是史学家们的一个基本史学素质，还需要其他一些素质。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素质就是对古代历史进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9—20页。

行某种文学性的改写，即在坚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某种程度上改变历史著作惯有的古板晦涩的风格，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具有文学性、趣味性，以便于广大普通读者的阅读、理解，然后才能够被广泛接受。《中国人史纲》就颇具有代表性。现摘抄第一章《历史舞台》几处地方为例："中国版图像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台湾岛和海南岛，像镶在叶柄下方的两颗巨大珍珠。南中国海诸岛，则是无数散落在碧绿海水中的小的珍珠群。中华人就在这个空间上降生、成长，中国历史也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在正式叙述他的成长和演出之前，我们应该对他先有一个了解，包括舞台的各个重要角落，和全体演员。……现在，让我们搭乘可以跟光速相等速度的太空船，从广阔的太平洋，向西飞航。……越过海洋，太空船正式进入中国上空，巨大的舞台呈现在眼底。……不断的时间变换，会扰乱正常的生活程序，这是疆土过于广袤的烦恼。从极东的乌苏里江口，到极西的帕米尔，时距相差四个小时。当乌苏里江口的渔夫在晨光曦微中泛舟捕鱼时，帕米尔的农人还在酣睡。一个人从乌苏里江口，于黎明时乘超光速飞行器向西飞航，他会发现天色越走越黑，当他完成五千公里的旅行，敲他住在帕米尔山下朋友的家门时，却正是午夜。"①其文笔优美抒情，善于运用比喻，更像是一篇叙事抒情的散文。还有，淝水战役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争例子，但是柏杨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提出晋国取得胜利的偶然性，并且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实并没有'战'，而只有'役'，前秦帝国不是战败，而是退败。我们固可事后在前秦帝国内部找出必败的原因，但在晋帝国内部，我们却找不出必胜的原因。我们只好相信即令是国家巨变，或在致千万人于死的战争中，都有命运的影响，至少晋帝国靠命运得以免去覆亡。一种不能预见，不可想象的冲击介入，产生的连锁反应，能使历史的巨轮停止或转向。赤壁战役（二零八）使中国统一延缓七十年，淝水战役使中国统一延缓两个世纪。"②这种对不可知"命运"的议论，明显可看到柏杨早期小说《莎罗冷》等哥特式浪漫小说的某些影子，不过柏杨是在客观真实呈现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再额外加一些议论性段落，目的是冲淡历史典籍的刻板、单调，增加一些趣味性，这亦是柏杨现代化史观一个表现。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0—44页。

② 同上书，第507页。

柏杨在讲述历史事件中也经常顺便提及一些历史人物的民间传说，尤其是通过文学作品被广泛传播的、颇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这也是柏杨史传作品具有文学性、趣味性的另一个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人物的野史传说在柏杨的史传作品中只是插入的一个个小故事，其功能如同作者所使用的比喻和议论手法，仅仅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史传作品的趣味性，并不是去改变历史事实。举例来说，虽然中国历史典籍中明确记载明朝皇帝朱允文的结局是因“靖难之役”失败而纵火自焚，是“死于非命”的历代君王中的一个，但是民间对此有不同的传说和说法。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第二十八章”中专门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段落：“不过民间坚信朱允文并没有死，据说，朱允文在危急时打开祖父朱元璋留下的秘密铁匣，里面有一把剃刀，一份度牒（和尚证明文件），一件袈裟（和尚衣服），和碎银币若干（逃亡时零用）。于是剃发为僧，从宫后水门逃出，浪迹江湖三十余年。到四〇年代一四〇年，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的重孙第六任皇帝朱祁镇，恩怨已消。朱允文才表明身份，回到宫中，终其天年。”[①]但是这个插入段落仅被一提而过，作者柏杨在下一段落中接着回到正史事实中：“朱允文既死，朱棣继位。”由此可以看出，柏杨在史传作品中使用的这种“文学笔法”，是在不影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采用的一种文学策略，同时还兼顾到作品阅读的娱乐性和吸引力，达到了使普通民众都喜闻乐见的阅读效果。

与其他历史典籍不同的是，柏杨在其历史著述中还经常使用地图、图表等现代技术手段，并且在大部分章节中增加了西方历史事件与同时期中国历史事件的横向对比。以十年牢狱中写就的《中国人史纲》一书开始，柏杨的史传作品就经常借助各种表格作为辅佐手段，化繁复的语言文字为简洁明了的数字图表。其史传著作《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一书更具有代表性。该部专著虽然编撰、梳理的历史内容和历史脉络非常庞杂，包括从史前的神话时代开始直至清朝灭亡的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中的五百九十五位帝王，还有若干没有称帝但是被加上帝王尊号的君王和更多的皇后妃嫔、数量巨大的亲王、公主等历史人物的血缘分支、命运情况和历史事迹。但是柏杨采用现代人常用的表格等方式，化繁为简，把以上提到的种种线索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地一一列举出来，并在表格之后再用文字加以简要说明和解释，从而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而整本历史专著《中国历史年表》也是由表格组成的一部中国历史大事记录。从阅读效果来说，柏杨借助现代表格等工具在史传著作中轻松地达到了“既表国，又表官，甚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25页。

至于人、事、物皆可表”①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利用现代表格的形式是国人当下编撰、整理历史典籍的一个常用方法，正如《文史通义·外篇：永志县志选举表序例》中所指出的：“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但是柏杨如此大量地使用表格的形式来分类、编撰、整理中国历史资料的举动，无疑是他另类的中国现代化文化思想体系的一个具体表现。

概括来说，柏杨使用的表格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带有时间和数量因素的图表。这主要是用在描述多个帝王朝代之间、一个朝代之内兴废的具体时间，以及帝王代际传承的时间线索。例如，柏杨把传说中黄帝王朝承继的顺序列为一个表格：②

<table>
<tr><td>第一代
前二六九八
前二五九八</td><td colspan="4">①黄帝
姬轩辕
（五帝之一）</td></tr>
<tr><td>第二代
前二五九八
前二五一五</td><td>玄嚣</td><td colspan="2">昌意</td><td>②己挚</td></tr>
<tr><td>第三代
前二五一五
前二四三七</td><td>蟜极</td><td colspan="2">③玄帝
姬颛顼
（五帝之二）</td><td></td></tr>
<tr><td>第四代
前二四三七
前二三六七</td><td>④喾帝姬
（五帝之三）</td><td colspan="2">穷蝉</td><td></td></tr>
<tr><td>第五代
前二三六七
前二二五八</td><td>⑤姬挚</td><td>⑥尧帝
伊祁放勳
（五帝之四）</td><td>敬康</td><td></td></tr>
<tr><td>六
第七代
八</td><td></td><td></td><td>句望
桥牛
瞽叟</td><td></td></tr>
<tr><td>第九代
前二二五五
前二二零八</td><td></td><td></td><td>⑦舜帝
姚崇华
（五帝之五）</td><td></td></tr>
</table>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11—112页。

在这个图表中，五帝之间的传承顺序，以及出现的历史时间等因素都可一览无余。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补充。在《中国人史纲》第一章《历史舞台》的第二部分“河流、湖泊”中，柏杨首先详细介绍了黄河的发源地、河流长度，以及地理位置等情况，“只有黄河，对它两岸的居民，帮助很少而伤害很大。它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像一条喜怒无常的巨龙，翻滚奔腾，专门制造可怕的灾难。从纪元前二十三世纪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初叶，四千余年间，便有过一千五百余次的小决口，和左表所列的七次大决口，和把此大改道（包括一次人为改道）”①。然后从“次序”、“改道年代”、“决口地”、“河身流经”、“保持年数”和“相当世纪”共计六个方面入手，把相关的数据一一列在表格中，把冗长的文字描述简化为一个表格，更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可以这样说，柏杨在史传作品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表格这种现代技术手段的优势，的确收到了较好的阅读效果。

二、以一些历史事件或是政府官职名称为中心线索，把与之相关的一些因素排列起来的表格。现举一例加以说明。在《中国人史纲》的“第二十一章第八世纪”中，柏杨指出“唐政府在边疆曾设五个总督（都护）。本世纪（八）更在五个总督之外，增设十个战区，战区司令官称‘节度使’”②。然后他用表格形式列出唐朝的“节度使”官职的职责、管辖范围和驻地等因素：

战区	首长	司令部所在地	主要任务	注
平卢	节度使	营州（辽宁朝阳）	防御室卫部落，及渤海王国	后移青州（山东青州）
范阳	节度使	幽州（北京）	防御奚部落，及契丹部落	
河东	节度使	太原（山西太原）	支援单于总督府，防御东突厥汗国	
朔方	节度使	灵州（宁夏灵州）	防御回纥汗国	
河西	节度使	凉州（甘肃武威）	断绝回纥汗国与吐蕃王国交通	
陇右	节度使	善州（青海乐都）	防御吐蕃王国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9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00页。

续 表

战区	首长	司令部所在地	主要任务	注
安西	节度使	龟兹(新疆库车)	统四镇,防御中亚诸国	又称四镇节度使
北庭	节度使	庭州(新疆吉木陇两)	防御西突厥,突骑施坚昆诸汗国	
剑南	节度使	盆州(四川成都)	防御吐蕃王国,及南诏王国	
岭南	五府经略使	广州(广东黄州)	绥靖南中国夷民族,及獠民族	后改称节度使

并且在该表格后加一些解释说明的文字:"总督只负责军事,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除了军事外,还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战区所辖各州,州长(刺史)以下官员,节度使都有任免之权,税收田赋也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留下来作为军费。目的在于集中力量,发挥高度战力。时人称之为'藩镇',意思是国家的屏藩和重镇。当十节度使设立之初,共拥有步骑兵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中国重兵百分之九十都在边疆。"①显而易见,这类表格使读者一目了然,能够了解"节度使"这一官职的诸多构成要素。

三、没有横竖线的表格形式。这可看做是一种经过变形处理的表格形式,柏杨使用的频率也较高。例如,在《中国人史纲》的"第三章传说时代"一章中,柏杨在分析传说时代期间"大禹治水"故事中所治理河流的情况时,为了详尽描述出这些河流在古代和今天的地理位置:"自纪元前二二八六年,到纪元前二二七四年,共用了十三年时间,洪水才算平息。据传说,经过姒文命(即大禹,张清芳特此说明)治理的,有九条河流:

(一) 弱水,发源于祁连山,注入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嘎顺诺尔)。

(二) 黑水,疏勒河,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

(三)黄河。

(四)渭水。

(五)洛水。

(六)济水,发源于太行山,与黄河平行,注入渤海湾。

(七)淮河。

(八)汉水。

(九)长江。"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01页。

然后再加一点补充说明："九条河流中，八条河流直到二十世纪仍然存在，只有济水在若干年后被黄河并吞，成为黄河的下游，只剩下一个尾巴，改称小清河，还微留痕迹。"①之所以采用这种不加横竖线的表格形式，只是通过分行的形式列举出九条河流的名字，其原因在于作者只是让读者粗略了解一下这些河流概况而已，其真正目的是为下个段落的抒发议论奠定基础："仅从这九条河流的数目上，就使人大大的震惊。从黑水到长江口，航空距离有二千六百公里之遥，仅仅徒步游览一周，恐怕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此时还没有铁器出现，完全依靠烧石浇水的原始方法去开山凿洞，姒文命是姬轩辕（即黄帝）的后裔，仍有残留的神灵附体，所以他能够顺利的成功，并受到中华人长久的尊敬。"②也就是说，这类表格的主要作用在于凸显柏杨的另类现代文化现代化思想中的现代地理观和现代历史观。这种表格使用情况在柏杨史传作品中比比皆是。

柏杨在把同一历史阶段发生的中西方历史事件进行对比时，也采用这种不划横竖线的图表形式。还善于把中西方相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相比较，具有广阔的世界性视野，目的亦是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发展或是衰落退步。这亦是柏杨史传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举《中国人史纲·下》中第三十一章"第十八世纪"为例来说，作者在该章末尾部分用对比的方式把18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大事记载下来：

——零零年代·一七零三年（玄烨大帝第四次下江南），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定都圣彼得堡。

——四零年代·一七四八年（清政府第一次讨伐大小金川），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

——六零年代·一七六二年（弘历第三次下江南），俄国皇后喀德邻二世，杀掉她的沙皇丈夫彼得三世，自称喀德邻大帝。

——六零年代·一七六九年（中国与缅甸战役结束），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从此西方跟东方，分歧为两个世界。

——七零年代·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束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美国宣布独立。

——八零年代·一七八九年（中国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法国大革命爆发，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的监狱，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距上世纪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19—120页。

② 同上书，第120页。

(十七)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恰一百年)。

——九零年代·一七九二年(中国跟尼泊尔战争结束),法国改建共和国(第一共和),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

——九零年代·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和珅在狱中自杀),拿破仑解散执政团,称法国共和政府第一执政。①

通过这种对比方式,一定程度上从主观、感性记忆层面加深了读者对中国历史事件的印象和记忆。

四、地图。柏杨还把地图作为一种经常使用的图表形式。这亦是现代历史书籍中常用的一种图表方式。在总标题为《柏杨版资治通鉴》的72册史传作品中,柏杨仅仅用地图这种图表形式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已,并没有凸显地图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人史纲》一书中的地图与前者不同,典型地体现出柏杨史传作品的独特之处。在该部著作中,柏杨共使用了47幅地图,绝大多数地图是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国家地形图。使用地图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一个国家所包括的领土疆域等因素在空间上清晰地表现出来。相比其他的图表形式,柏杨对地图的使用次数并不算多,虽然这些地图是他借用其他历史书籍中的,但是他在使用这些地图时也有些创新性的举措:除了标出地图中的地名之外,还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年代也写在地图上。与其他人史传作品中的地图相比,柏杨史传作品中的每幅地图都用更精炼、更简洁的形式包含了更多的内容要素,不仅体现出城市地名的横向的空间地理位置,还涵盖着诸多时间上的、纵向的历史内容。例如,在《中国人史纲》中第47幅地图“十九世纪·清王朝末期列强侵略地图”②中,作者不但标出了与之有关的“北京”、“雅克萨”、“伊犁”、“台湾”等城市的名称和地理位置,还把与这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标识出来。像该地图不仅标出“台湾”地名,还在其后写上文字“1895《中日马关条约》”,传达给读者的意思是:日本列强依据198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侵占了中国台湾。而本地图上的词汇“雅克萨1858年《中俄爱珲条约》”所传达的意思亦如此,即在原名“爱珲”,今改名为“尼布楚”的这个地方,俄国依据1985年签订的《中俄爱珲条约》规定占据了它。这种例子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柏杨还在不改动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事迹的情况下,不时增加一些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段落,为严肃古板的历史书籍增添某种文学趣味。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很多章节之后都增加上“柏杨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25页。
② 同上书,第612页。

曰”,来臧否历史人物和阐发其现代性世俗化思想。“柏杨曰”并非是柏杨的独创和发明,他承认受到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用“臣光曰”体例和方法的影响,但是用民主法制、人性尊严、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等现代性世俗化思想观念来评价和分析历史人物,由此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和文明进行针砭,批判“酱缸文化”的种种表现,使之继承了其杂文的“酱缸文化”批判,以及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现代化精神,在当今台湾,乃至华人世界,柏杨无疑是第一人。后来柏杨还专门把《柏杨版资治通鉴》中的“柏杨曰”部分摘录汇编成册,单独组成《柏杨曰》一书,一方面更利于读者阅读,使他们既可以不需要从头至尾通读相关的中国历史章节,又可从任何一个章节进入阅读过程,另一方面这也是柏杨运用幽默讽刺的杂文笔法,通过解读、评价诸多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在历史作品中延续着对中国“酱缸”文化,以及联系当下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判的杂文风格之再次体现。如同柏杨在《柏杨曰》的序言中所说的:“就在我们惊心动魄阅读历史的同时,面对当前的人事、景物,抚今思昔,有时不得不击节赞叹,有时又不免低头沉思,无限感慨。于是,这些历史就不再是舞台上的往事陈迹,而是活生生的和我们血肉相连,让我们产生深入了解、透视、分析和批判议论的兴趣。自从白色恐怖压顶,身系绿岛,我就试图从历史着手,去了解这一代苦难的根源,最后,非常震惊的发现,不仅对我们这一代,而是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在,做出的总结是——中国人,你活得没有尊严!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时光隧道中,我们看到的全是统治阶层永无休止的权力恶斗,口口声声仁义道德、诗书礼乐,却根本不顾人民的生死;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活得像虫豸、像罪犯、像奴隶一般。活着,不过是等着被囚、被辱、被杀、被驯服。统治者的暴政之下,有些人被彻底摧残,有些人为了苟且人世,不得不附庸权贵,成为统治者的帮凶打手。中国人唯一盼望的就是出现英明领袖——明君,以德治天下,天下自然太平。从来没有人思考过:人,可以创造出一个人人可以遵行的制度,和人人有机会争取到尊严,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合理的社会。结果,几千年来层出不穷的领袖人物,都在玩弄欺骗的把戏,一旦权力在握,马上百毒并发,无所顾忌的发挥个人贪婪邪恶的欲望。”①从这个角度来说,柏杨历史作品的国民性批判力度并不下于杂文,一以贯之地延续着柏杨对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追求。

除了在《柏杨曰》中通过议论体现出“酱缸文化”批判的目的之外,柏杨在史传作品中增添一些议论性的文字和段落的这种举动,在很多情况下则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4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7—8页。

是为了拉近读者和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情感距离，更便于读者接受和了解，这是他的“民本”史观的另一种直接体现。举例来说，唐代皇帝李隆基和其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杨玉环也由此成为中国古典四大美女之一，是中国普通民众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人物以之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不计其数。因此，柏杨在《中国人史纲》的“第二十一章第八世纪”中描述“安史之变”时，专门增加了对杨玉环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美女之一，有无数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和现在电影、电视，都以她为主题。杨玉环以体态丰满闻名于世，性情忠厚，对政治没有兴趣，也没有任何供人指责的事迹。”[①]这些评论就是建立在中国普通民众对她很熟悉的程度上的。柏杨在描述宋代英勇抗辽的大将军杨继业和其家人的历史事迹时，同样忍不住加上这样的议论：“杨继业是中国抵抗北方蛮族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他的骁勇和被出卖后的壮烈殉国，使他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祖父型英雄。很多作品都在描述他和他的妻子佘太君，以及他的诸子诸女，即‘杨家将’一门，在跟辽帝国无数战役中，所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事迹。”[②]由此可以这样说，柏杨希望通过这些议论文字使广大读者认识到，这些历史人物其实与中国广大民众距离很近，因为他们的故事在很多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传说中都可看到，他们实际上是存活在中国普通民众情感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进而言之，中国历史并不是冷冰冰的、枯燥的“死人的历史”，而是由人们易于理解并且很感兴趣的人物故事所组成的一系列历史故事。还需要指出的是，柏杨此举并不是认同人们对野史传说中历史人物的认识——在前文已经指出，柏杨撰写史传作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写出一部能够纠正国人仅从文学作品中得来的一些错误历史事迹的正确历史——而仅是从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历史的角度来增添这些议论文字，这也是这些议论性文字和段落只是作为额外部分出现在正文的章节中，并且数量极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已经证明，柏杨的这些创新性举措的确赋予其撰写的史传作品新的生命力，使它们既具有知识性又兼具趣味性和文学性，又非常通俗易懂，对包括东南亚华人在内的普通中国民众都产生巨大吸引力，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这亦是柏杨史传作品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原因。

再次，坚持“中国”和“中国人”（柏杨也常使用“中华人”这个更宽泛的概念）的立场，这是柏杨的现代化历史观最独特之处。柏杨翻译、改写的白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04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话版《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等历史著述之所以坚持用公元纪元来代替原著中的王朝号，用帝王本名来取代其尊号和谥号，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其立场："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朝代影响，我们绝不认为后梁帝国是正统，而前蜀帝国是僭伪；更不认为清王朝是正统，而郑成功是海盗。唐亡，不是中国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清亡，也不是中国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固屹立如故。"[①]也就是说，柏杨治史坚持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柏杨再三强调自己的现代化历史观推崇"中国人立场"。他明确表示："我们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不同于'奉旨修史'的官员立场，也不同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层自居的立场——他们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我们反对'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我们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上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②]因而，虽然中国和中国人饱经历史苦难，但是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在排水倒海的浪潮中，它会倾倒。但在浪潮退去后，昂然的仍矗立在那里，以另一面正视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没。就二十世纪，使人沮丧的大黑暗时代结束，五千年专制帝王制度结束，悠久的但已不能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被逐渐抛弃。奄奄一息的中华人返老还童，英姿焕发，创造出中国第四个黄金时代，在全世界万邦之中，充当忠实的跟强大光荣的脚色，而且成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③]。由此可以看到，"中国人立场"不仅是指柏杨站在中国内地、台湾，以及共有中华民族祖先的华人立场，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作者追求历史真实的现代性世俗化精神，不会掩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酱缸"糟粕，也不会遮掩中国人（中华人）优良的文化传统。正是立足于"中国"和"中国人立场"之上，柏杨把现代市民社会系统中的市民主体，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0—11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00页。

扩展到普通中国人(或说是中华人)的更大的概念范畴中,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体系中建立起中国人的主体性,这亦成为柏杨在史传作品中始终坚持的一个治史原则和标准。

在台湾本土意识和台"独"言论甚嚣尘上的今天,来重读和研究柏杨的诸多史传作品尤其意味深长。柏杨历史作品体现出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显然继承了中国五四精神传统的一脉,是他现代化历史观的一个层面,更是其中国现代性世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也是所有中国作家,包括台湾作家安身立命和写作的基本前提,是任何人与事都无法改变的现实。也只有以整个中国为创作素材资源,才能够浇灌出更美丽、生命力更旺盛的台湾文学之花。

但是还需要指出的是,《柏杨版资治通鉴》等历史著述的出版在台湾和中国内地的史学界引起较大轰动,很多学者对柏杨把历史加以现代化的举措持赞扬态度,倪匡在《中国人史纲:好书》一文中这样评价《中国人史纲》:"站在民主、自由、人权的立场上,分析权力使人腐蚀、分析古往今来的帝王几乎没有一个可以通过权力的关口。……在柏杨笔下,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的命运是多么可怜。"[①]不过一些学者对此却持否定态度。以历史学家孙国栋的《评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及〈资治通鉴〉》最有代表性。孙国栋从维护中国历史文化和忠于历史原著的角度出发,认为柏杨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最基本的大病在于对原作者的思想与感情全无了解"[②],同时尖锐指责柏杨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恶意,他不是要中国人反省去改进中国文化,而是要全盘摧毁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③]。显然,这是因为孙国栋只阅读过柏杨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和历史著述《柏杨版资治通鉴》,而没有通读过柏杨的其他作品,包括比前两者写作和出版时间更早一些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等其他历史著作和柏杨早期杂文集,而导致对柏杨"酱缸文化"批判思想、改善国民劣根性和其独特的现代化历史观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所致。可借用龚鹏程在《现代化思潮下的史论:〈柏杨曰〉的精神处境》一文中的观点来回答对《柏杨版资治通鉴》的一些质疑:"但古文'译'为白话,不错是不可能的。至于说柏杨不了解原著,那更是柏杨此书的精神。柏杨这套书不是要向现代人介绍司马光的思想以及传统帝王资治观念,而是反对司马光、反对帝王资治,提倡民主民治的。"[④]由此也就可以

① 柏杨:《一个早起的虫儿》,第409—411页。

② 孙国栋:《评柏杨》,香港明报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③ 同上书,第34页。

④ 黎活仁等:《柏杨的思想与文学——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90页。

理解柏杨为何不正面辩白和回击孙国栋的指责了。

至于孙国栋指出柏杨的其他历史知识错误，例如某个王朝皇帝任数与古典史书记载的不符、直接用古代帝王名字代替尊号、对混淆儒家各派思想观念等等问题，反而证明了《柏杨版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完全迥异于“尊君”、“重人伦”的古史观点。换言之，柏杨的这些历史著作某种程度上已经撼动了历史学界，促使其他历史学家们以一种新的角度来重读和研究历史。可说这是柏杨把中国文化现代化、把中国历史现代化的一个有力举措。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孙国栋对柏杨历史观和柏杨历史文化虚无态度的尖锐指责，其实也是历史学界分歧已久的“释古论”和“适今论”治史两派斗争借《柏杨版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的再次爆发。显然，孙国栋严格以古代史书记载为尚的治史方式属于“释古论”，而柏杨的现代化史观则是“适今论”的典型代表。虽然柏杨在现代化史观指导下，“以此批判传统，也显得异常犀利。而且，大部分的现代化论者固然也采用同样的观点在批判传统，指出中国应该走向现代，但大多只是陈述一种意见、表达一套观点，对传统的批评则仅为泛说，或仅是摘选一二事例以为谈证而已。不像柏杨这样，用庞大的篇幅、完整的史述，深入到史迹与文献之中去，一一拆卸虚饰与伪装，意义指陈其中的残酷与荒谬。因此，他可以说是现代化战士对传统最全面，也是最后一次的攻击。二十世纪，只有他花了这么多精力，这么彻底地去清算史迹”①。但是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观同样面临一些困境，使柏杨腹背受敌。②

不过无论如何，柏杨的现代化史观使他能够对《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进行重新阐释，赋予这些古老的历史典籍以新的生命。仅从这一点来说，柏杨对中国历史的翻译、改写、整理和研究就功不可没。

第二节　历史女性的现代化③

柏杨始终很关注女性的命运遭际，呼吁中国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他

---

① 黎活仁等：《柏杨的思想与文学—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88—189页。

② 柏杨腹背受敌的具体表现，可参考龚鹏程的《现代化思潮的史论：〈柏杨曰〉的精神与处境》一文第五部分“腹背受敌的境遇”。

③ 该节论文的一部分已经被收入2007年11月在台湾台南大学召开的“柏杨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柏杨与监狱文学》中。

在早期的《玉雕集》、《堡垒集》等杂文集中，塑造出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形象，关注现代女性解放的曲折历程。在具有哥特式浪漫主义色彩的《旷野》、《莎罗冷》等小说作品中，柏杨主要以男女爱情的纠葛为主线，关注的依然是女性命运和男女婚恋问题。到"十年"史传创作时期，柏杨则把眼光放到历史女性身上，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继续思考中国女性的命运和解放问题。在《姑苏响鞋》、《温柔乡》、《长发披面》（三部作品原名《皇后之死》）三部史传作品中，柏杨把视角限制在中国古代宫廷、多妻制度和皇宫女性身上，以现代化历史观为指导，集中描写和探讨了从中国的黄帝王朝至三国曹魏王朝期间死于非命的皇后和后妃们，以这些皇族女性和她们的悲惨命运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承载物，以此来挖掘出中国缺乏人权、法治等现代性世俗化观念的文化和政治的历史根源，他继续对中国"酱缸"文化进行思考和批判。

需要注意的是，柏杨之所以选择封建社会中的皇宫后妃们作为中国历史女性的代表，主要原因是为了深入考察和批判"酱缸文化"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产物——多妻制度，通过分析、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多妻制度，达到间接针砭酱缸糟粕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起父权和夫权至上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及男性高于女性的等级观念，成为几千年笼罩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反映出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多妻制度最可怕的还在于对女性精神上的戕害。因为多个女人必须要争取同一个丈夫的爱情，不仅在于爱情是独占的自然规律，而且丈夫的宠爱和宠爱程度的深浅，均与她们，甚至她们所生子女，在整个家庭和家族中的地位、权势密切相关，女人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互相斗争。此时女性不但受到来自男性的压迫，毫无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形成波伏娃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描述的情形："他们阴险凶暴地引导妇女憎恨自己，与自己为敌，发动她们的巨大力量与自己作对，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①]而且女性彼此之间互相压迫、争斗，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一个女人不是把压迫她的男性和男权制度当成直接的敌人，而是把其他同样是受害者的女人当成直接的敌人。也就是说，多妻制度把本来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抗转化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斗争，无疑转移、削弱、瓦解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仇视和反抗意识。这正是"酱缸文化"成功控制女性的一个社会机制，致使女性自觉臣服、遵守男权社会的一切规范，任其宰割。

皇宫则把多妻制度发展到极限，不但皇帝们在数量上拥有庞大的后

---

①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91 页。

妃群，至少三千后宫佳丽，最多时达到西汉时的两万妃嫔，这些皇宫女性虽然属于贵族妇女，但她们是遭受“酱缸文化”毒害最大的受害群体，她们处于酱缸的最底层，无人权、无自由、无平等地位，是帝王的奴隶，大部分女人的结局是被杀或被贬入冷宫，因而所受到的压迫和戕害最为惨烈和严酷。正如柏杨指出的：“盖皇宫者，表面上金碧辉煌，事实上却是最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在那个金碧辉煌的人间地狱里，每个女人都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奋斗。没有法律、没有人性，只有当权人物——帝王，和帝王授权的人，以及管得住帝王和挟制帝王的人。他们操有乱伦和屠杀的特权，不受任何法律的或道德的拘束。皇后有权的时候，她是皇后；皇后一旦没有了权，她的下场就不忍卒睹。即令是猪狗，一旦被宰，总不会连累它的父母兄弟姊妹，而皇后被宰，往往连累她的全家。从宫廷斗争和皇后的大批死于非命，说明中国宫廷的黑暗，远超过欧洲宫廷。大概只有阿拉伯宫廷可以媲美。残酷无情，黑无天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至少在宫廷中找不出来。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女人不但是帝王一个人的玩物，也是宫廷制度下的虫豸。仪态万方，被摇尾系统歌颂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不如一屁。……每一个死于非命的皇后，不管她是杀死、绞死、气死、跳河、投井，都是一桩时代悲剧，有时候也是一桩时代丑剧。她们的人是孤立的，孤立在皇宫之中，但她们的遭遇，却代表说明那个时代女人的命运，也代表说明中国当时政治的和道德的形态。”①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皇宫就是“酱缸文化”的一个缩影和象征，身处酱缸最底层的中国历史女性的悲惨命运，可见一斑。

在这三部讲述历朝历代后宫女性命运的史传作品中，柏杨把后宫妃嫔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失宠和最终身不由己悲惨死去的后妃们，在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另一类是成功地成为皇太后，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一小部分皇后妃嫔，她们反过来利用“酱缸文化”推崇的孝悌观念，以及权势崇拜思想，而掌握住男权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皇权，控制住国家政权命脉和自己的命运。这两类不同的后妃形象，无疑是对杂文和小说中，关注女性命运和婚恋视角的延续和超越，尤其是后一类后宫女性，可说与后期杂文中的“强哉骄”女性有诸多相似之处。柏杨要思考的是，这些后妃均是貌美如花的绝代红颜，也曾经使君王“冲冠一怒为红颜”，受到无限的宠爱，然而有的后妃失宠和薄命横死，有的掌握权柄并且得享善终，原因何在？还有，是否那些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3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2—23页。

成功的后妃女性，就是历史女性中的强者？

下面就拟以皇太后王姞和妃子赵合德两人分别为这两类后妃的代表，详细加以剖析，从中既可看出柏杨史传作品与杂文、小说中一脉相承的、对女性解放和婚恋的认识和理解，亦从宏观上反映出柏杨史传时期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关注的层面和面向重点，以及他深入中国历史脉络之中，力图挖掘、批判"酱缸文化"源泉的努力。

柏杨早在杂文《前仰后合集》中，就对封建帝王有深刻的认识，指出"皇帝者，乃地头蛇型人物，又因生活在'妇人和小人'之手，对伦常贞操，根本视为粪土"，兽性膨胀到了极致，宫廷中的乱伦和乱交反而成为生活常态，由此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中缺少灵性的部分，在当皇帝的身上，可以找出一大堆。"①"中国皇帝较世界任何国家的皇帝都有绝对权力，不但法律拘束不了他，连天理也拘束不了他。"②明确把帝王称作"大嫖客"，而后妃则是专供这个"大嫖客"发泄肉体性爱的"娼妓"。封建帝王之所以如此广置后宫妃子，除了因为男人天性中的"多妻"倾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封建专制文化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女人不被当做人来看待，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和生殖机器，根本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和人权，而且"世间只有劝人不要讨小老婆的，或劝人少讨小老婆的，从没有劝人多讨小老婆，或劝人拼命讨小老婆，而且越多越不嫌多的。只有宫廷才出现这种离奇的节目，官员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把皇帝的身体当做破锣猛敲"③。官员们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为了皇帝多有子嗣，由此保证皇权的稳定以及皇位继承不会发生转移。当然这从保障封建王权的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其实是以压迫女性为代价的。后宫中的女性根本没有机会，也不会有相应的民主和文明的社会环境，来成为杂文《三靠牌》中推崇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更不用说是成为《按牌理出牌》中的几类"强哉骄"女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和皇后、后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且后妃们之间也会产生女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残害，早期杂文《夺床大战》就是对此类后妃争宠现象的讨论。这是由于众多的女性一旦进入宫廷，必须不断地互相争斗和争宠，并非仅仅是为了权势和荣华富贵，也是为了自保和生存，因为"往上爬的过程中，如花似玉间的斗争，十分惨烈。邹阳先生曾曰：'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女无美恶，入宫

---

① 柏杨：《前仰后合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第 77 页。

② 同上书，第 69 页。

③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3 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353 页。

见妒。'非她们都是小心眼窄肚肠，而是不得不你挤我，我挤你。如果不把对手挤垮，自己就会反过来被对方挤垮。所以，宫廷之中，每一位娇娃都生活在不稳定的情绪之中（瞧瞧小老婆编制表，纵是一块木头，都会急得燃烧），互相间勾心斗角，没有友情，没有爱心，只有拼命的向那个唯一的臭男人，降志屈身的百般谄媚"①。所以，后宫之内的争斗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其中的血雨腥风演绎出一幕幕后宫妃嫔的悲喜剧，当然以悲惨命运结局的后妃为最多。柏杨在《姑苏响鞋》、《温柔乡》和《长发披面》中，把杂文中对中国历代皇宫后妃女性命运的关注，具体化为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如同柏杨分析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成功地倾倒过罗马帝国中两个著名英雄凯撒和安东尼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她不仅仅靠她的花容月貌，更靠她的智慧，包括高贵的教养，丰富的知识，锐利的眼光和判断，以及使男人最容易软化的温柔性格。"②也就是说皇宫之中的后妃战争，不仅是她们的美色之争，还是她们的政治谋略和聪明智慧的战争。西汉王朝十二任皇帝刘骜的宠妃赵合德的命运遭遇，在宫廷中可说非常具有代表性，她在皇帝生前始终宠冠六宫，牢牢把皇帝掌握在手中，而且让他为她连杀二子，这的确是她充分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的结果，但是最终难逃死亡的厄运，在皇帝死后就被迫自杀。可以说，赵合德的历史事迹代表着红颜薄命的妃子们的绝望抗争，以及她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具体来说，赵合德的争宠成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当皇帝刘骜听到赵合德的艳名之后，派舍人用皇后专用的百宝凤舆去接她入宫，后者却婉拒了，其实这并非表明赵合德不愿意进入宫中和有意抗旨不遵，而是她牢牢抓住了男性对轻易到手的女性不珍惜，而无法得到的才是最好的这一人性弱点，使用了欲擒故纵之计。这可说是她成功的第一步。皇帝果然"一方面欣赏她的庄重，一方面更急得抓耳挠腮"③，厚待已经成为后妃的她的姐姐赵飞燕，为其日后成为皇后奠定了基础。赵合德的第二个步骤成功了。赵合德从进入后宫伊始，就处处运筹帷幄和小心谨慎，处心积虑为自己和姐姐赵飞燕的生存安危以及荣华富贵谋划。作为一个后妃，赵合德的极度美艳始终使皇帝非常痴迷，"祸水"和"温柔乡"的典故皆出自她的事迹。在多妻制的中国封建宫廷中，女人自身的性别特征——美如天仙的容貌和温柔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3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70页。
② 同上书，第296页。
③ 同上书，第306页。

的性格，甚至成为衡量女性是否具有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不再是女性反抗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一种武器，反而有意强化了“解剖学与生理学意义上的妇女”①，认同男权社会强加于她们的角色意识。这也是“酱缸文化”对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一种扭曲和篡改，使女性完全丧失自我意识。

赵合德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是努力固宠和爬上最高的后妃职位。为了巩固她与姐姐赵飞燕在后宫得宠的地位，姐妹俩人联手利用巫蛊事件诬陷和扳倒了许皇后，让赵飞燕坐上了皇后宝座，赵合德升为仅次于皇后之下的昭仪，姐妹二人把持了皇帝和后宫。然而，赵飞燕为了自己的淫欲和生出孩子，广纳其他男人入宫与其私通，并且与合德争风吃醋闹了起来，当刘骜听到风声之后，要进行追查，赵合德“却不动声色，淡淡的曰：‘我姐姐性情太过刚直，刚直一定招来怨恨，宫廷之中，到处都是仇敌，那些因得不到你老哥宠幸的人，迁怒到姐姐身上，就千方百计，诬陷诌构。我们姊妹的性命都握在你手，只要你听她们一句话，赵家就灭门绝种矣。’说到这里，想一想她们的命运也真是这样，忍不住呜咽流涕，悲痛失声”②。致使皇帝完全相信了她，化险为夷。赵合德此时已经击败了其他后宫佳丽，用美色和手腕完全控制住皇帝，她与姐姐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赵家姐妹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无法生育，“对一个皇族妇女而言——尤其是皇后，生男孩子，几乎是她唯一的任务。没有儿子，便万事都休。历史上凡是没有儿子的皇后和姬妾，大多数结局都是凄凉的，甚至是悲惨的。盖‘皇嗣’关系着政权的维持和国家的兴亡”③。因此历代皇后和宠妃因为无子被废的命运，使她们时时感到危机和焦虑，而为了维持自身地位，就不惜用各种手段来诛杀其他妃子与她们的孩子，包括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来胁迫皇帝。这是赵飞燕采用的第四步骤。此时的皇帝完全听从赵合德的话，大概也是因爱生敬，乃至惧怕她生气，就连杀曹宫母子和许美人母子，致使后宫无人再敢生子，把后宫变成了真正的蛇蝎之窝。但是，一旦刘骜纵欲身亡，“等于赵家姊妹势力的瓦解，积十余年的怨毒，开始爆发”④。赵合德失去了手中的权力魔杖，又没有政治势力可以依赖，所以当她被诬陷谋杀皇帝之后，只能够自杀身亡，一代绝世美女香消玉殒。几年之后，赵飞燕就被废掉皇太后称号，也被迫自杀。

对于赵合德这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柏杨从现代性世俗化的角度出发如

---

① 波伏娃：《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8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3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20页。
③ 同上书，第154页。
④ 同上书，第343页。

此评价她:"反正是她的结局使我们既称心快意,又感慨系之。称心快意的是她的残忍和对宫中母子们一连串的谋杀,终于得到报应。感慨系之的是,一代美女,成了臭男人纵欲的牺牲品,她是该死的,但她该为谋杀宫女和孩子而死,不应该为谋杀皇帝而死。"①柏杨明确认识到赵合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即使她拥有柏杨早在《玉雕集》、《堡垒集》等杂文集中赞扬的女性美貌和内在智慧,但是"酱缸文化"的多妻制把她异化为疯狂迫害、杀戮其他后妃的恶魔,变成男权社会的帮凶。最终,因为没有了嗣作为政治砝码,也无法抵抗被"酱缸文化"侵蚀和必然死亡的宿命。

但是皇宫后妃的命运并非都是死于非命,也有极少数的后妃最后攀爬到皇太后的位置,利用"酱缸文化"极力宣扬的封建"孝道",以皇帝母亲的形象掌控住自己的命运,得享天年,寿终正寝。代表人物除了西汉王朝第一代皇后吕雉以外,西汉第六任皇帝刘启的皇后王娡也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其子是第七任皇帝汉武帝刘彻。作为一个身份地位较低微的宫女,王娡成为皇后的过程同样历经坎坷,充满了传奇性。她虽然没有赵合德的绝世美艳,但是她在入宫前就已经结婚生女,拥有别的后妃所缺乏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所以"王娡女士一进太子宫,刘启先生正当壮年,而她又拥有对付臭男人的丰富经验,于是立刻就上了床,而且以后天天上床,而且又推荐她的妹妹王息姁女士也上床。在一个臭男人立场,女人越多越不嫌多。因这一项推荐,王娡女士在刘启先生的印象中,认为她真是温柔敦厚,十分贤淑"②。皇帝认为王娡不嫉妒的印象,为后者以后击败得宠的栗姬埋下了伏笔。而非常艳丽的栗姬本来比王娡更得皇帝宠爱,她的儿子又是皇太子,她此时已经指使皇帝废黜掉没有儿子的薄皇后,是最有希望坐上皇后宝座的人选。不过栗姬恃宠而骄,她最致命的弱点在于对自身的处境并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女性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宫廷中没有任何地位,只是附属于皇帝的私人物品而已,多妻制决定了后妃都要依靠帝王君主的喜乐来决定她们的命运与生死存亡。这被柏杨归结为,"她没有政治头脑,她想独占皇帝老爷的爱情。呜呼,每一个皇帝老爷都是天生的多妻主义,对他的政权(江山)是独占的,对爱情却大公无私,作无穷无尽的付出,雨露均沾。有这种认识的美女——荣华富贵一生,没有这种认识的美女,也就是企图独占皇帝爱情的美女,她就要为这企图付出代价"③。栗姬毫无顾忌地表现出对其他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3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44页。
② 同上书,第142页。
③ 同上书,第146页。

后妃的嫉妒，丧失了应有的理智和冷静，与王娡的大度和柔顺形成了鲜明对比。王娡的成功还在于她走了政治联姻这关键的一步，与皇帝的姐姐联姻成功之后就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栗姬，试图借这位公主之手除掉这个劲敌。而皇帝的姐姐刘嫖之所以愿意除掉栗姬，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危和保住权势，因为当栗姬拒绝与她的联姻之后，"栗姬女士错过了这场化敌为友的千载良机，刘嫖女士不但没有使女儿当上太子妃，反而灰头土脸，当然既羞又愤。然而更重要的是，刘嫖女士警觉到栗姬的仇恨已不能化解，……刘嫖女士决心先下手为强，要把栗姬女士连根拔掉"①。刘嫖抓住栗姬的性格弱点——嫉妒，加强对弟弟的心理攻势，再三挑拨他与栗姬的关系，又不断夸奖王娡的儿子刘彻聪明能干。与此同时，王娡也抓紧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指使朝中官吏上奏章要求立栗姬为皇后。皇帝果然被此举激怒，因此栗姬被贬以及其子被废掉太子之位的结局可想而知。紧接着王娡被封为皇后，其子刘彻成为皇太子，母子俩人在血腥的宫廷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一方。等刘彻登基成为汉武帝之后，王娡就顺理成章变成了皇太后。

可以说，王娡的成功符合封建宫廷制度和"酱缸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一方面以美色和所谓"贤淑大度"的性格赢得丈夫欢心，另一方面用儿子来加重自身砝码，获得封建社会秩序的认可。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是这反而证明了柏杨对由中国传统历史形成的"酱缸文化"的认识和判断："中国历史上，女人不是人，皇帝老爷更不把女人当人，女人只是玩物，只是专供臭男人发泄淫欲的工具。此所以老奶即令爬到皇后的高位，也随时会被踢下来，或囚或杀。没有人权，同时也没有人格。她们必须更上一层楼，爬到皇太后的宝座，手里还得掌握着儿皇帝这根魔杖，才能真正的维持自尊。"②也就是说，虽然少数后妃成为皇宫争宠斗争中的胜利者，但是她们实际上依靠和遵守的仍是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中国历史上的女性依旧没有人性尊严和平等地位。

同时柏杨也看到，虽然赵合德之类的后妃命运悲惨，但是皇后或者后妃一旦成为有权势的皇太后，又往往把持朝政，尤其在新任皇帝年幼之时，大权独握，滥用外戚，容易造成朝纲混乱和政权的更替，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像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利用自己皇太后的位置完全控制住朝政和国家大权，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系统，虽然仍是以汉王朝的名义发号施令，但是实际上她成为汉朝唯我独尊的女皇帝。而西汉末年的皇太后王政君掌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3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417页。

握朝政之后，赋予外戚王莽无限的权力，王氏家族由此控制了西汉王朝的所有大权。但是这并非是说这些皇太后就由此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人权，尽管她们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她们既然身处整个大酱缸之中，自然就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和获得真正的自由。另言之，这些权倾一时的皇太后虽然一时逃脱既定命运，但是无法避免给亲属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吕雉一旦病死，整个吕氏全族就被残酷诛杀；而王政君的侄儿王莽毒死西汉皇帝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为随后国家的动荡不安和各地战争埋下了严重隐患。可以这样说，处于中国古代封建宫廷中的皇帝后妃们无论如何挣扎和抗争，均是无效的，她们在封建社会中的命运无法改变，因为封建专制制度是“酱缸文化”的源泉，如同天罗地网笼罩着女性，使她们无处可逃脱。如同柏杨在《女权与人权》中所感慨的：“从男人的迫害，女人自己的迫害，到御用圣人的迫害、政府法令的迫害，在十九世纪以前，女人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怜的动物，随时随地被人虐待、玩弄、羞辱、杀戮。”①中国古代宫廷女性的残酷争斗和凄惨命运，正是“酱缸文化”摧残女性人权、扭曲人性的具体体现。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柏杨在《姑苏响鞋》、《温柔乡》和《长发披面》中，有意塑造出这两类后妃形象以及她们的命运遭遇，柏杨依然以人性尊严、自由、平等现代观念为衡量标准，来全面挖掘和批判封建宫廷女性无独立平等地位以及独立人格的状况，探讨中国历史女性“现代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可说这三部史传作品表达出的女性观和婚恋观，与柏杨在五六十年代就形成的女性人性尊严观念遥相呼应。他以历史女性为反面例证，再一次看到心理上的独立意识在现代女性形象建构、妇女解放道路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整个女性在解放之路上的艰难跋涉。从中既可看出柏杨史传作品与杂文、小说中一脉相承的、对女性解放和婚恋的关注，亦从宏观上反映出柏杨史传时期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关注的重点，以及他深入中国历史脉络之中，力图深刻挖掘、批判“酱缸文化”的努力。

除此之外，还需要看到的则是它们在语言结构等艺术形式上也独具特色，有助于表现出柏杨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对整个女性解放事业的关注。具体来说，这三部探讨皇宫后妃命运的史传作品体例比较特别，虽然同是柏杨现代化历史观的产物，但是与《柏杨版资治通鉴》类的史书有很大不同：“《皇后之死》在文类归属中颇为暧昧，诚如上言，‘读史札记’为柏杨自道，既为札记，则一如柏杨著称的‘杂文’，具有幽默、讽刺、辛辣的特质；只不过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8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85页。

它又是读史之后的心得，李瑞腾在《柏杨全集总序》中更明白指出：'狱中读史的三部历史研究丛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人史纲》，是史迁治史精神的延续；出狱之后的读史札记（二本《帝王之死》，三本《皇后之死》）是以古讽今的历史散文。'作家的健笔下，'报导'（亦为柏杨语）的是古代后妃的辛酸遭遇，取材范围已有所选择，亦即关注的对象是在传统父权制度下手压迫的女性。"①也就是说，柏杨这三本专门探讨古代宫廷女性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夹叙夹议的小说和杂文的复合体。既拥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曲折的故事情节，又具有杂文的说理和议论特点，某种程度上与《柏杨曰》的风格相类似，个人主观性特别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其实是延续了柏杨60年代《玉雕集》、《堡垒集》和《红袖集》等杂文集，以及小说《旷野》等专门探讨女性婚恋的主题内容。虽然柏杨把眼光主要限制在古代皇宫女性身上，但是作者也时刻不忘把历史与当前现实联系起来。在这三部作品中，最常用的是对比手法，即把中国古代女性命运和西方女性以及当时台湾社会女性的命运放在一起考察和进行对比，他关心的是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共同命运。举例来说，在《赵飞燕·赵合德》这篇作品中，柏杨为了引出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的历史故事，首先谈到与她们几乎同时代的西方美女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的爱情经历和命运遭际，并且时常插入对当时台湾女性的看法和议论："就在台北，前些日子，柏杨先生听到一位老奶向人炫耀曰：'天下男人，我只要一招手，他都会晕倒。'呜呼，她竟然在大庭广众中说出这样的话，就够证明她的段数不高，盖这话只能伤害男人的自尊心，不能帮助她招徕资本雄厚的户头也。本来要晕倒的朋友，等于喂了他定心丸，恐怕会一直保持清醒。而且，要男人晕倒一时容易，要男人长久的晕倒，就得有克丽奥佩特拉女士的道行。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奶所能想象的，盖高贵的气质在风尘中培养不出来。所以，即令有男人长久的晕倒，恐怕也要看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男人。更主要的是，一个女人一旦到了企图颠倒众生阶段，就不值钱啦，克丽奥佩特拉女士却只求颠倒一人。"②从而把三个历史时期的女性婚恋观念和命运进行对比，由此也看出中西、古今女性命运的相同和不同来，作为宣扬现代婚恋观的一个例证。柏杨还把一些古代的历史现象与当下现实比较："呜呼，古之时也，到底还有淳厚之风。所以刘辅先生一被捕，有些高官贵爵还敢联名上书。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307—308页。

② 同上书，第296页。

如果换了现代，天颜既然震怒，恐怕大家都心胆俱裂，一面高叫做人要有道德勇气，一面脚底抹油，唯恐怕牵连到自己身上。这种镜头柏老可看得多啦，嗟夫。”①目的是达到对当下社会不良现象的针砭，表露出柏杨自始至终坚持不渝的现代性世俗化情怀来。

如同在杂文中喜爱举例来加以说明的风格一样，柏杨在三本史学著作中也是如此，他对赵飞燕姐妹残害皇帝其他妃嫔和孩子的做法加以举例和议论：“在这里，我们发现，即令是绝顶聪明和绝顶智慧的人，也都有所弊。在所弊的某一点上，比糊涂人还要糊涂。也就是说，在某一点上，就偏偏想不通，赵家姊妹实在不需要杀那么多可怜的孩子。盖宗法制度下，皇后是嫡母，嫡母高于一切，不管丈夫跟谁生的孩子，都是她的儿子。对孩子而言，嫡母才是‘娘’，才是‘母亲’。生母既不是‘娘’，也不是‘母亲’，而只是‘庶母’‘姨娘’。闺阁下如果参考《红楼梦》，就弄清楚二者的严重分别矣。那位势利眼贾探春女士有一段话，可代为说明。当她的生母赵姨娘为已死了的弟弟争取几两银子的葬丧费时，贾探春女士大义凛然曰：‘谁是我的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检点（九省巡回法官）了，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理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既然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那位‘升了九省检点’的舅舅，是贾探春女士嫡母王夫人的哥哥，跟贾探春女士八棒都打不上关系，可是，宗法制度下，那家伙却确实是她的舅舅。而她的真正的嫡亲舅舅，却成了外人。盖小老婆只是生育机器，在家庭中没有地位，以致另一位嫡亲舅舅赵国基先生，仍然是个奴才，见了嫡亲外甥贾环先生（环儿），都得立正鞠躬当跟班。当一个小老婆，连亲生女儿都瞧她不起，盖宗法制度下，家庭中没有亲情，只有势利眼。”②这种举例和分析说理，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成为这三部史传作品的重要艺术特点，能够更加形象地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家庭伦理道德秩序加以说明，而且通俗易懂，一目了然，实际上是柏杨为“小民写史”的一个具体表现。同时，这种杂文风格的举例并没有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只是冲淡了历史著作通常具有的古板和晦涩，赋予历史以强烈的现实感，从而把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现象联系起来，达到以历史为鉴的作用。

综上所述，柏杨在这三部史传作品表达出的女性观和婚恋观，与他在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年，第312页。

② 同上书，第337—338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形成的女性人性尊严观念一脉相承。在这些专门描写中国古代宫廷后妃命运遭际的史传作品中，柏杨依然以人性尊严、自由、平等等现代性世俗化的观念为衡量标准，来全面挖掘和批判中国封建宫廷女性无独立平等地位，以及独立人格的状况，试图探寻历史女性的"现代化"道路。柏杨还以历史女性作为反面例证，再一次看到心理上的独立意识在中国现代女性形象建构和妇女解放道路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全体中国女性在身心解放之路上的艰难跋涉。

第八章　中国历史男性现代化的文化反思

第一节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化"

在《可怕的掘墓人》一书的"序言"中，柏杨再次申明自己重新考察、整理中国历史，还中国历史以真面目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达到"中国现代化"之目标："在政治挂帅下，中国史书成为诈欺大本营。遇到帝王老爷们哎哟哎哟，端不起嘴脸，栽倒在地时，总是'讳'个没完。或语焉不详，或根本成了没嘴葫芦，把人气得吐血。呜呼，要想中国现代化成功，第一件事应该是砸碎政治挂帅的枷锁，先使史迹显示出来真正面目。这是一个开端，用它训练我们的思考，思考他为啥有那么一天，思考他为啥恐惧大家知道真相？柏杨先生只希望藉着不断的报导，使浆糊的一代早日死光，下一代起，将是思考的一代。"[1]他明确反对儒家知识分子史学家制定的所谓"正统"史学观："中国史学家最大的错误，没有比强调'正统'这件事，更为严重。强调'正统'的人，认为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君王，于是乎有'统'。又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是'真'，其他的全都是'伪'，千余年来，头脑简单的儒家学派知识分子，钻到这个牛角尖里，挥动手臂，瞪大眼睛，用笔墨口舌，努力奋战，东拉西扯，杂乱不可收拾。其实，一句话就可说明，那就是：自己被奴性所束缚，而又打算煽动后人的奴性而已。"[2]可说这种"正统"史学观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控制的"文化霸权"，因而强调"正统"史学观的消极后果不仅在于强调"主"奴的等级观念，使国人"奴性"不断增强，永远消弭了打破"酱缸"文化的可能性，阅读中国历史书籍的现代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继续受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流传至今的酱缸流毒的毒害。而且这种史学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8页。
② 柏杨：《柏杨版资治通鉴》18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4490页。

观把本应是所有中国人的历史事迹的记载变成了专记载帝王一人和其家族的个人历史："所谓君王的'统'，不过是一家的家谱，一人的传记，不可以假冒国家历史，更不必劳动史学家哓哓争论。把国家正统隶属于君王，等于把全国人民视同无物。全国人民的人格人权，永远坠入九渊，无法自立，都是这种论调造成的灾害。不扫除君王就是正统的错误见解，却打算写作历史，史书即令再多，不过增加人民的痛苦。"[①]显然与柏杨力图通过建构普通市民主体性来建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另类文化的现代化思想相悖。

正是以这种所谓的"正统"的史学观为基本治史原则，"为尊者讳"才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在撰写历史时遵守的一个规则，"文字诈欺"亦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历史典籍中的普遍现象。以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为例来说，这并不是一部专门记载中国历史的典籍，不过其中一章有对尧帝的赞美之词："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柏杨看来，被尊称为儒家学派"圣人"的孔丘对以尧帝为代表的中国远古圣帝的称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尧帝"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力量强大的部落酋长，他那松懈的政治组织，似乎连雏形的政府都谈不上，只是一个大村落里的一个大庄院而已"[②]。也就是说，尧实际上只是一个部落酋长而已，并没有作出惊天动地的可作为后世君王表率的功绩，也不是所谓的"贤明君主"，而且"事实是，伊祁放勋先生（即尧帝，著者特此说明）在位的一百年间——真正掌握权柄的日子，只有六十年。六十年中，中国充满了大苦大难"，"在那么一块落花生般的小小国土上，大旱之后，又有荒年；荒年之后，又有大水，即令嘴巴再硬的朋友，都不忍心说它是一片乐土"。[③] 尧统治时期被柏杨划归为中国第一次大悲惨时代的范围之内。那么，为何《论语》不顾历史的真实，依然推崇尧帝为杰出的古代帝王人物？柏杨这样讥讽孔子和《论语》："《论语》是一部性质平实的儒家学派经典，孔丘先生更是一位世故的老头——老头未必一定世故，世故也未必一定是老头，而世故更不一定就是老奸巨滑。柏杨先生年纪越老，越忍受不了酱缸产物：乡愿、孑孓、酱缸蛆、酱萝卜、变形虫、顺调份子、温柔敦厚的法利赛人。见了这种玩艺，我就火发三丈、鼻孔冒烟。以致酱缸系统纷起反击，给我老人家上尊号曰：'老三八''十三点'，以及'神经病'；还有些

① 柏杨：《柏杨版资治通鉴》18 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 年，第 4491 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2 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32—33 页。
③ 同上书，第 39 页。

政治性的尊号和大批铁帽,往头上猛扣,每一顶都可使人脑浆迸裂。孔丘先生可是老老实实,从不说一句激情的话,纵然发誓诅咒,也文质彬彬:'天厌之,天厌之。'不像我老人家,动辄脏话出笼。然而,孔丘先生一遇到伊祁放勋先生和姚重华先生(即舜帝,著者特此说明),就情不自禁",这并不符合孔子一以贯之"温柔敦厚"的文风,"孔丘先生因为从没有激情过,所以他不是一个诗人。可是拜读了这一段对伊祁放勋先生的赞词,不由大吃一惊。看样子孔丘先生不但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位唱'莲花落'的高手。这种如醉如痴的诗句,连庄周先生和孟轲先生都被感动得情不自禁,跟着他无理取闹"。[①] 产生这种罔顾历史真实、向古代帝王脸上涂脂抹粉而达到粉饰太平之目的的看法的原因,在于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愿面对他们所生活的春秋时代的各国争雄、君主只讲求"霸权"的现状,另一方面在于"孔丘先生政治挂帅,为了达到复古目的,却把这么一个空前的大悲惨时代,形容成为一个花花世界、天上人间"[②]。

柏杨还指出,《论语》对尧帝的夸张性赞扬和虚构其事迹的最根本之目的,是希望为后世君主树立一个理想的楷模和行事规则:"孔丘先生对伊祁放勋先生(即尧帝,著者特此说明)赞词,只是为后世君主——或其他名称的政治头目,提供一个行为标准。同时,孔丘先生也代表小民心声,盼望最高掌权的家伙,最好如此这般。"虽然其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善意的,但是充满讽刺的是,儒家知识分子的这种"苦心孤诣"的写史举措并未被后世君王认可,"——偏偏的,后世君王的表现,使孔丘先生和儒家学派垂头丧气。呜呼,'爱心''智慧'固然很难,纵是'不端架子''平易近人',也不容易。这是人性弱点,只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专医政治上的过滤性病毒。西洋哲人早鉴及此,中国哲人则独缺这种大脑。孔丘先生只提供了'想当年'的思古幽情,却没有为我们绘出未来的蓝图,依儒家学派看,最好的未来,就是过去"[③]。儒家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有这些自欺欺人的举动,还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身所推崇的"正统"史学观在撰写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悖论——既然撰写历史是为帝王和其家族写"族谱",而且"家天下"和"为尊者讳"的观念使话语权力牢牢掌握在以帝王君主为中心的统治者手中,那么撰写史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甄选历史材料的主动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3—34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③ 同上书,第35页。

权和发掘历史真相的权利，更遑论做到"还原历史真面目"了。换言之，就是帝王等特权阶层要求儒家史学家所记录的"历史事迹"其实带有很强的虚构色彩和建构成分，契合、体现并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反之亦然，这种对"货于帝王家"的依赖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奴性，逐渐把他们都培养成为驯顺的、专门为帝王歌功颂德之辈，这亦是柏杨戏称孔子、孟子等为"吃冷猪肉"的"圣人"，以及把儒家知识分子称为是帝王权贵的"摇尾分子"和"帮凶"的主要原因。

从产生的效果来说，这种"正统"史学观不仅直接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瞒"和"骗"的文化糟粕，蒙蔽了广大中国民众，更严重的还在于进一步加剧了帝王君主们自身的愚昧无知和骄横残暴："摇尾分子最喜欢用'天纵英明'，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痞流氓土匪恶棍，只要有了点权，或有了点钱，马屁精大笔一挥，或一声吆喝，这顶毡帽就轰然而出，该家伙想不舒服都不行。舒服得久啦，连自己也都以为是真的。"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不畏权贵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写出了具有"实录"精神的历史，那些君王也不会把这些"奴才"等级的知识分子在史书中所塑造的"三皇五帝"类的理想历史人物当做理想楷模而加以模仿。因为身处中国"酱缸"文化中的帝王们，了解儒家知识分子所树立的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圣帝"典范实际上是经过极力美化的理想人物，带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儒家系统既然打出'尧舜牌'，这牌必须是王牌，即令不是王牌，也得动点小手脚或大手脚，涂涂改改、挖挖补补，使它非是王牌不可。必须强调他所擢用的人，全是好货色，而所杀的人，全是坏蛋。"②

柏杨还用客观历史事实揭示出，中国历史上的舜帝不但不是慈悲爱民的一代圣君，其真实面目还是一个借尧帝之手铲除忠于尧帝而反对自己的异己力量，为自己以后顺利取代尧帝成为帝王而铺平道路的奸诈之徒："这是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型，用君王的手，铲除效忠君王的忠良。姚重华先生（即舜，著者特此说明）为千古权奸，立下漂亮的榜样。为了更彻底的建立威严，姚重华先生再把另外两位潜在的政敌：三苗先生、讙兜先生，一并干掉。连同姒鲧先生和共工先生，合称为'四凶'。残杀忠良而又加上丑恶的帽子，姚重华先生是'斗臭'和'丑化敌人'绝技的鼻祖。"③但是经过儒家史学家的篡改和修饰之后，历史的黑白被颠倒，真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62页。
③ 同上书，第41页。

实被虚假所掩盖，“在政治挂帅的大纛之下，手握权柄的人有福啦，真理正义、公道人心，都是他们的，连圣人都站在他们一边，努力化腐朽为神奇。效忠政府的成了叛逆，血腥镇压的反而倍受歌颂。历史上斑斑史迹，一开始便被野心家利用，扭曲颠倒，黑变成白，白变成黑，成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奇观”①。在儒家知识分子编撰的历史典籍中，舜帝也顺理成章地摇身一变为堪和尧帝比肩的一代“圣君”。从其他角度来说，儒家知识分子在编撰的史书中对这些古代“圣贤君王”的顶礼膜拜，还是文字诈欺的一个产物。柏杨尖锐地指出：“所以拜读中国史书，不能只看字面，还必须查考是不是文字诈欺——敬请读者老爷注意：‘文王’不是 King，‘武王’才是 King。在儒家学派推崇的一条鞭‘道统’中，脓包伊祁放勋先生（即尧）、凶手姚重华先生（即舜）、复仇者姒文命先生（即禹）、算命家子天乙先生（即商朝开国皇帝），非 King 的姬昌先生，真 King 的姬发先生，以及姬发先生的老弟姬旦先生，都是主要角色。——奇怪的是，‘道统’中的圣人，几百年才出一个，而周王朝创业的几年间，竟占了三个名额，当初开名单的朋友，不觉得有点太挤乎哉。”②

但是，这种充满“瞒”和“骗”色彩的历史人物，其对后世的毒害并不仅限于愚弄普通民众，而且也使一些帝王君主成为受害者。在《忘了他是谁》这部专著中，战国时期燕国的第二位国王姬哙就是这样一位相信尧舜圣王美德并在实践中加以模仿的帝王：“他竟把儒家学派政治挂帅大纛下杜撰的良辰美景，当成真的。自从儒家学派把伊祁放勋（即尧帝）先生和姚重华（即舜帝）先生美化成可爱的小绵羊以后，姬哙（即燕王，为燕国第二代国王）先生这位忠实的信徒，是第一个受害最大的人。”姬哙的下场是失去王位，最后死于乱军之手，成为中国历史上死于非命的帝王之一。柏杨也忍不住这样评价和议论姬哙：“我们敢肯定，他准是个智力不足的白痴，盖只有智力不足的白痴，和智力太高的野心家，才相信‘禅让’那一套。”③

如果说《论语》中孔子对尧的评价已经暴露出儒家知识分子篡改历史事实、“为尊者讳”的特点的话，那么在孔子编撰的历史著作《春秋》中，则体现出儒家史学观的其他特点——正名主义。这是儒家知识分子信奉的“复古主义”思想的一种变形，亦是遮掩历史真相的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在春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2 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44 页。

② 同上书，第 135 页。

③ 同上书，第 351—352 页。

秋时期，周王朝衰落而南方的楚部落崛起之后，“当楚部落自动升格为王国，酋长自封为国王之后，孔丘先生在他主编的编年史《春秋》里，却誓不承认，仍坚称楚国王只是‘楚子’，咦，千变万变，正统不变，国王？笑话，不过子爵罢啦。——‘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我们小民的正名主义。儒家学派的正名主义则是政治挂帅兼复古第一。一旦政治挂帅，或复古第一，那就有时候‘是什么，偏不是什么’。楚国王明明已是国王，孔丘却闭着眼咬定他们仍是子爵。这种意淫型的传统文化，到今天都气息可闻”①。

不但《春秋》等典籍中所描绘的历史充满虚构色彩，就是史学大家司马迁也因受儒家史学观的影响，在其著作《史记》中对历史的描绘并非全部符合历史真实：“《史记》作者司马迁先生，是中国史学之父，以他崇高的智慧，不会这么无法无天。只是在政治的巨棒之下，他不敢赋给‘异姓’、更不敢赋给篡位的‘乱臣贼子’应该拥有的地位。政治巨棒对史学发挥的威力是：抹杀事实，扭曲事实，轻视事实，捏造事实。”②而由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同样存在着篡改历史真相的例子。在《忘了他是谁》中讲述战国时期齐湣王田地死亡始末的一节中，柏杨指出司马光篡改《战国策》中相关史料的举动：“这一桩史实《资治通鉴》按照《战国策》原文，可是却在最生动的节骨眼上，动了手脚，做出恰恰相反的更改。田地先生（即齐湣王）遂由‘不知’，成了‘知之’。可能司马光先生之意，‘不知’不过浑蛋加三级，昏庸而已。既‘知之’而不悔改，才是典型的颟顸，似乎正适合田地先生的身份。但一味回答‘不知’，也可显示出田地先生的骄慢：一问三摇头，随你的便。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是：一个史学家引用原文，是不是有权把原文改得恰恰相反？司马光先生并没有证据支持‘知之’，则只是想当然耳，为后世史学家，开了一个恶例。”③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儒家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编撰的史书典籍中均存在着篡改历史事实和“史实不真”的弊病。

不过，柏杨史传作品的深刻和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把儒家史学著作中所包含的“正统”观念、复古主义和“为尊者讳”等思想，以及所产生的篡改、遮掩历史真相的后果，均是“酱缸”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而且作者柏杨还专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91—192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373页。

门回到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关照下，以不同阶段的历史为宏大背景，较详尽地追溯、分析儒家思想和儒家知识分子的特点以及起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探究儒家知识分子成为帝王帮凶的“圣崽”和依附“酱缸文化”而生存的“酱缸蛆”的原因，对中国历史中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思考。这种写作意图的产生可追溯到柏杨早期杂文中。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杂文作品中，柏杨的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就使他把儒家知识分子称为是依赖中国“酱缸”文化而存活的“酱缸蛆”，是封建帝王的“帮凶”，还是四类畸形人中的其中一种——圣崽，专以当政府官员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和追求。而柏杨在经历了“十年牢狱”阶段之后的“史传十年”时期，才有机会通过其史传作品的创作实践把该意图化为现实。

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柏杨指出“儒家”之称最早来自周朝礼仪“宾相”的职位：“周礼的内容很多，仅只仪式程序这一部分，就有祭礼、葬礼、婚礼、冠礼（男子成年时戴帽子）、笄礼（女子成年时戴簪子）等等，以及阶级性专用的国王之礼、国君之礼、贵族之礼。——没有平民之礼，因为礼只是为贵族而设，不是为平民而设，对贵族才用得着礼，平民根本不被看在眼里，奴隶更不用说了。这是一种专门知识，必须专家才能胜任。从事这种以主持典礼为职业的专家，当时被称为‘儒家’。他们按照古老的规定，办理各种重要仪式，小自埋葬死人，大至国君访问。国君访问时或国君相见时，通常都聘请人家担任‘宾相’，他的任务跟二十世纪结婚典礼时被称为伴郎或伴娘的‘宾相’，完全相同；服侍在国君左右，随时提醒国君应该做什么或应该说什么。在普通的贵族场合，儒家则被雇担任司仪、总管之类的职位。我们在此可以了解，儒家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仪式的顾问人员，他们最荣誉的高位是在外交场合，被雇为国君宾相。”①柏杨由此从中国历史中挖掘出儒家维护礼仪传统的真正根源在于：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者君王和贵族的利益并取悦他们——这既是作为礼仪顾问的“儒家”的职业道德，亦是他们保住饭碗的必要手段——而不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从最初产生的根源来说，为帝王权贵服务和依赖前者生存就是儒家的本质，他们根本没有形成独立人格的基础，而其“崇古”的直接原因亦产生于其职业的需要：“儒家因为职业上的需要，对产生‘礼教’的那个时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②而“崇古”特点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直接使后世儒家知识分子产生反对科学技术发展、法对社会进步的消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17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极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自产生之初在思想上就具有后天无法克服的缺陷:只以服务、取悦帝王君主为己任,没有独立人格,不思社会进步而只以回到所谓"人间乐土"的中国古代社会为理想追求等。虽然儒家在思想上还有其他特点和优点,但是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缺陷是儒家与生俱来的一种"痼疾",亦是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改变过,只是随着封建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酱缸文化"中沉渣毒素的积淀而不断加深加重罢了。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儒家在春秋时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阶层——以孔子及其门徒组成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与当时的法家、墨家、道家等同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员。由于儒家天生拥有的"痼疾"缺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编撰的历史典籍体现出"政治挂帅"的"为尊者讳"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柏杨毫不客气地指出,孔子编纂史书《春秋》的目的在于宣传和发扬儒家的"复古主义"精神,不但具有阿Q式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特点,而且为后世史学家立下了一个坏榜样,是"考证式"治史方式弊病的一个源头:"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①孔子所编撰修订的五部历史经典《易经》、《春秋》、《诗经》、《书经》和《礼经》,在客观上起到了进一步禁锢知识分子和史学家头脑的消极作用:"这五部因为孔丘编纂删订而被尊为经典的古书,在大黄金时代结束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五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作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②

除了编撰史书的职能外,儒家知识分子为帝王君主充当礼仪顾问、制定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36页。

② 同上书,第238页。

礼仪规范的社会角色及其职能在后世依然保留了下来。以汉朝为开端,儒家知识分子从维护皇权统治的角度出发,为汉朝皇帝制定了等级严格的臣民叩见帝王之礼仪——朝仪,以便显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①,进一步巩固了帝王君王在国家范围内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换言之,从汉朝开始,中国帝王借助儒家知识分子制定的礼仪规范强化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和帝王的特权。从此之后,广大中国人没有人性尊严和人权便成为中国"酱缸"文化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帝王"帮凶"角色也开始被建立起来。

从汉武帝刘彻时代开始,由于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②。遂使儒家知识分子进入朝堂为官成为常见现象,他们对中国的国家政治开始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儒家知识分子成为唯一能够进入国家庙堂参政的知识分子,却无法改变其取悦、维护帝王君主的基本职能——这亦是中国历代君主看中儒家知识分子和儒家思想,并让他们为自己服务的重要原因。他们的复古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后世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重要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逃避'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从此之后,被柏杨称之为以春秋战国为开端的中国思想的"第一个大黄金时代"面临的情况变成了:"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比道家思想时代——黄老政治,要多出五十倍的时间,直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想的冲击,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③随着儒家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确立和稳固,儒家思想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46页。
② 同上书,第347页。
③ 同上书,第348页。

从东汉开始出现专由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担当的士大夫阶层，“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做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密的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①。柏杨讥讽儒家知识分子是以当官为唯一目的之“圣崽”的原因即在于此。

在晋代和随后的十一国并立、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等历史阶段，除了儒家思想之外，佛教、道家思想亦兴盛起来，儒、释、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儒家思想再次在社会文化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则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实施。儒家的“九经”成为唐代科举考试所用的标准教科书，“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被缩小”②。科举制度的作用和效果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因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隙，但与根本关闭多少有点差异。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缝隙进入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革命了。这种现象，可以减少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③不过唐朝并不把儒家思想定于一尊，而是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情况。

儒家思想在宋朝得到大发展，确立其绝对的主流地位。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它和宋朝的立国精神相契合：“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④而且该时期儒家知识分子提出了“君子”、“小人”两分法：“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成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项重要武器。”⑤这种“两分法”在客观上又为帝王君主强化其政治统治、愚弄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合理理由。与此前朝代相比，宋朝的儒家思想丧失了本来就不多的优点，进一步被“酱”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酱缸”文化中不可自拔。柏杨通过宋朝“濮议”事件分析出宋代儒家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28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56—57页。
④ 同上书，第181页。
⑤ 同上书，第182页。

思想的特点在于:“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之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即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经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勇于内斗的特质。”①由此可以这样说,以宋朝士大夫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已经暴露出“内斗”的性格缺陷,也就是“窝里斗”的国民性痼疾——这是柏杨深恶痛绝并不遗余力地批判的一个靶子。

儒家思想在宋代发生大变化,出现了一个新分支——“理学”:“就在本世纪(十一)末期,儒家学派中兴起一个新的支派(这支派后来发展成为主流)——理学,即由程颐开创。他的哥哥程颢则是他的同志,当时人称之为‘二程’。他的老师周敦颐,是一位唯心论的哲学家,对‘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以及它们的交互影响,有特殊的研究和见解。程颐从他老师那里得到唯心哲学,再吸收佛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学。理学家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认为罪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肃。”②不仅如此,“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③。除了提倡压制人类本性中的感情和灵性以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所谓境界之外,道学思想还从伦理道德层面明确区分了“圣人”和“禽兽”的不同内涵:“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份和既定的尊卑,是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份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之为‘礼教’(以后有称之为‘明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弃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84页。

② 同上书,第212页。

③ 同上书,第213页。

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①]不仅如此，宋代理学的“礼教”还包括中国妇女的贞操名节问题，即明确规定妇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再嫁，也就是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此之后，代表着男权意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找到了压迫、戕害中国妇女的合理借口，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越发低下，以致完全丧失独立的人格观念，沦落为只依附男性而生存的附属物和弱势群体而不觉。因而柏杨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从纪元前一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中国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年的累积，到了本世纪（十二），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②]

正是在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支的不断推动下，越来越多人为制造的沉渣烂滓观念被扔进中国“酱缸”文化中，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闪光点越来越少，“酱缸”亦越积越厚，乃至毒素越来越多。柏杨指出，就是宋代道学家自己也不能够遵守和实践这些灭绝人性的规范而形成分裂的人格，他们不仅扭曲自己的心灵更扭曲毒害他人的心灵：“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③]这种变态心理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之一。概而言之，“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做不好，专心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的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④]。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儒家思想中分蘖出来的道学家之理学思想，至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7 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246—247 页。

② 同上书，第 247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248 页。

此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虽然当时也存在着个别反抗的声音，但因这个反对声音太弱，以致只起到了把“道学”恢复成“理学”原名的作用，“不过，‘道学’这个名词，却因韩侂胄反道学一派，不断公开揭疮疤的缘故，渐带有讽刺意义，如果称某人‘道学’，即等于指责他面貌忠厚而内心奸诈。所以‘道学’逐渐不再使用，而恢复‘理学’原名”①。

然而到元朝时期，蒙古帝王摈弃儒家思想并废除科举制度，并且鄙夷不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儒家知识分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道学家知识分子士大夫，在蒙古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比儒家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这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②。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反而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再受到儒家思想的禁锢，从而获得思想上的解放。柏杨指出：“蒙古帝国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摒弃，固然使知识分子难堪，却也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即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再继续板着道学面孔。儒家学派一旦失去政权的支持，对知识分子也就立即失去控制力量。知识分子再没有柳永‘奉旨填词’的顾虑，和史达祖脸上刺字的危险。因之在性灵上获得解放，呈现元曲时代。”③不仅如此，“知识分子思想得到正常发展后，创造力极为兴旺。他们嘲弄帝王将相，调侃圣贤，歌颂爱情。很少有圣人系统的意识形态，大多数被真实感情充满。这是纪元前二世纪政治力量独尊儒家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现象。”④文学艺术在元朝的兴旺亦是一个明证。也就是说，柏杨由元朝儒家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艺术文化，看到了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存在着“现代化”的可能性：他们也可以不依赖帝王君主而存活，可以跳出“酱缸”文化的腐蚀和毒害，完全可以也有能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果中国历史继续以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儒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指日可待。

但是可惜的是，当明朝接续元朝而继续主宰中国人的命运之时，情况变得比宋代理学时期还要糟糕。明朝统治者不但恢复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而且剥夺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其他道路，使他们只能够依靠科举制度生存，他们身上的奴性亦越来越重，“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53页。

② 同上书，第277页。

③ 同上书，第285页。

④ 同上书，第286页。

于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①]。以八股文作为考试格式，此举进一步限制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灵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②]由此明朝在理学家的荒唐提议下出现荒诞的"大礼议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揭示出明朝"大礼议事件"的荒诞性，柏杨专门把它和宋朝"濮议事件"相比较，"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本，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濮议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报到宫里，当做儿子抚养。大礼议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熜则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议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再发生，但它竟然发生。儒家系统的理学家，根据古老的纪元前五世纪使鲁国国君被按住叩头的儒书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熜虽无法做朱厚照的儿子，却必须作朱祐樘的儿子，然后大宗才算不绝。一切奇异的办法，都由此奇异的论断产生。那就是说，朱厚熜应称伯父朱祐樘为父亲，应称伯母朱祐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③] 由此可见明朝理学家把宋代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观念推到极端，完全泯灭了中国人的人性。以宋明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此阶段的发展，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带入一条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死胡同，"酱缸"气息最浓厚："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17—318页。

② 同上书，第318页。

③ 同上书，第362页。

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广大最可哀的时代。"①

不过在明朝中期之后，儒家思想内部出现了另一支——阳明学派，与原有的理学学派相抗衡，试图纠正理学学说中言行不一致的缺陷，"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起，中国的正统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崇高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大黑暗时代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②。阳明学派的内容则反对儒家知识分子的身心分裂，重在强调知行合一的知识结构和人格结构："阳明学说，包括左列两个主题：一、致良知，二、知行合一。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职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老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嬴政大帝的第二号魔鬼。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已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④。阳明学派当时与理学学派并列为儒家思想的两个分支，削弱了后者在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界的主流地位，重视实践的"知行和一"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治愈了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自宋朝以来就形成的身心分裂的毛病，在客观上取得了净化"酱缸"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阳明学派在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能够和理学学派始终保持并峙局面的话，或许中国历史会是另一种局面。可惜的是，由于阳明学派本身固有的缺陷，正如柏杨分析的："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387页。
③ 同上书，第388页。
④ 同上书，第388—389页。

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证。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下世纪（十七）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①

因此，当中国历史发展到清朝时期，以理学学派思想为核心和主流的儒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代表，"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通过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社会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意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②。清政府初期虽然在对外开拓疆土方面，一方面为中国历史迎来了"第三个大黄金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在政权结构和社会文化上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不但致使清朝重新陷入明代的黑暗之中，而且在大兴"文字狱"迫害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之程度更深，至此中国人深深陷入"酱缸"文化中不可自拔。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说，虽然以阳明学说为中心的儒家思想被清王朝的帝王采用，儒家经典依然被作为科举制度的参考书籍，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依然没有改变依靠帝王权贵生存的"帮凶"和"圣崽"身份地位，也深受毒害，加诸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枷锁越来越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分别为"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宣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据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象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的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③ 即使如此，一些埋头钻入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89页。

② 同上书，第443页。

③ 同上书，第511页。

古典历史典籍治史的儒家知识分子依然无法逃脱“文字狱”的厄运，据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对最著名的清朝文字狱的统计，大概共有22起，牵涉到上万受害者。更严重的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清朝普通民众身上的国民性弱点进一步加深：“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民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柏杨把该阶段和此后的清王朝称为是“大黑暗再度来临”时代：“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象力，都被酱死。”[①]换言之，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已经失去了人性尊严，更遑论是人权保障了，完全被“酱缸”文化吞没，他们变成“以做官和当圣人为最高目的”的一类畸形人，失去了“现代化”的可能。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本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文化思想的支柱，但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顺利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政体，而且日本普通民众也拥有现代人的追求人性尊严、自由平等等现代化观念。柏杨对此中原因进行详细分析：“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左列四项原因：

一、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通统治贵族。他们异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由一种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11—512页。

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业，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碍。”①

也就是说，日本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的，日本政府并没有使他们的人民陷入科举制度“八股文”的酱缸之中。日本是幸运的，因为“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的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的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的文化的意识形态”②。正是因为没有接受“八股文”的科举制度方式，所以日本民族没有闭关锁国和故步自封的弊病，在大胆接受西方思想和改革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法治国家，在19世纪就迈入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之中。

闭关锁国、拒绝科技进步的清政府在晚期统治时期，其国力已经衰落到不堪一击，任由其他西方国家入侵和宰割。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灾难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四千六百年来，所发生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在本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短兵相接的总体对决，结果中国节节失败。”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当然又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遗憾的是，柏杨史传作品对中国儒家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到20世纪初期就戛然而止。但是从阅读效果上来看，柏杨达到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梳理、分析儒家思想变迁史的史传写作的目的。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606页。

② 同上书，第606—607页。

③ 同上书，第625页。

从以上的分析来说，儒家知识分子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依附帝王君主而生存的特点，以及作为帝王的“帮凶”和“酱缸蛆”的角色，但是并非意味着他们不能被改变，作为中国历史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儒家知识分子在人格上也存在着“现代化”的可能性。儒家知识分子在元朝摆脱掉儒家思想的控制后，不但恢复了个人灵性，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除此之外，柏杨通过五千年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史表明，“窝里斗”、“不思进取”、“麻木不仁”等国民性痼疾，并不是包括儒家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国民与生俱来的缺点和弱点，而是儒家思想在特殊历史阶段产生的一个特殊产物。随着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现代中国的建立，以及现代市民阶层主体性的建构成功，是完全有可能消灭和消除国人的这些国民性缺陷的。这亦是柏杨在后期杂文中以“建设”为主，不同于前期的以“破坏”为主的重要原因。正是在梳理儒家思想流变的历史过程中，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打破或是澄清“酱缸”文化的举措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节　中国帝王君主文化本性的现代性反思

虽然关注中国女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命运遭际，考察女性解放之路、思考历史女性的“现代化”问题，以及批判中国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包括对帝王后妃的压迫、戕害，始终是贯穿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体系——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体系的一个主题。但是柏杨在深入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酱缸文化”的源流时，发现男性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地位非常复杂和矛盾——不仅是压迫、戕害同一历史时期女性的凶手和帮凶，而且也是深受中国封建社会“酱缸文化”戕害的另一个受害者。他们一方面在家庭和社会中对同阶层的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进行压迫，另一方面又是生活在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奴才”，受到高于他们的“主子”，即帝王和“官崽”的任意压迫和杀戮；而且即便是手握民众的生杀大权、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封建帝王君主，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保持人性尊严，同样成为“酱缸”文化的牺牲品，不能够逃脱被侮辱和被杀戮的命运。这是柏杨在“史传十年”的一个重要发现。此阶段的柏杨不仅写下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以及总标题为《皇后之死》的三部作品，还写出了以《帝王之死》为总标题的、集中探索中国历朝历代死于非命的帝王命运的两部史传作品——《可

怕的掘墓人》和《忘了他是谁》。不但通过梳理中国儒家思想在历史中的脉络,探讨儒家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可能性,而且力图寻找出包括中国帝王君主在内的其他历史人物的“现代化”出路。为了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甚至是延伸到几万年前“神话时期”的远古历史中来探讨“酱缸”文化在中国历史不同阶段中产生、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演化史,柏杨还以死于非命的中国封建帝王的性格命运为中心线索来进行考察。唯有在中国“酱缸”文化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中国历史人物——以帝王君主、后宫妃嫔以及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现代化”问题才能够被凸显出来。也只有在这些历史人物和“酱缸”文化的错综复杂、多向交织的关系上,才有可能深入了解“酱缸”文化的构造成分,以及它是如何发酵、演变成今日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酱缸”文化流毒的,这样才有彻底清除它的可能,才能够从“历史现代化”的角度达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可以这样说,柏杨此阶段的“历史现代化”的思想,显然是把女性和男性均纳入“现代化”的范畴之内,明显与60年代《死不认错》集等早期杂文时期的历史观不同,他对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的批判不止于乱伦的“禽兽”、“地头蛇式人物”和“畸形人物”,而是看到他们性格的多面性,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的多重社会角色,亦包括很多皇帝君王虽曾握有无限的政治权力、掌握着全国其他民众的生杀夺予大权,但是最终又无法避免被“酱缸”吞噬的悲剧命运。柏杨由此认识到,用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来考察包括帝王君主在内的历史男性的“现代化”问题,同样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因为中国男性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和女性的一样,均是“酱缸”文化的受害者,他们是受到迫害的男人,也需要维护自己的人性尊严,同样有“现代化”的需要。这亦是柏杨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的合理延伸。著者在上一章节中所探讨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问题,亦是一个证明。

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也就是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权”观念不仅包括维护女权,也包括维护男权——受迫害的男人之人权。正如他在《新城对》卷中的《女权与人权》一文中提出的:“我想与其单独的提出女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这是整个人权?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妇女是人、男人是人、儿童也是人;大官是人、囚犯也是人;大商是人、穷人也是人,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尊严,不但不可以迫害妇女,也不可以迫害儿童,也不可以迫害男人。”①还要看到,柏杨在“十年史传”时期探讨历史人物“现代化”问题时,所选取的历史人物除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儒家知识分子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8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91页。

外，更多时候是以中国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各朝各代帝王和他们的妃嫔为代表的人物形象。这显然与柏杨在小说、杂文和诗歌中建构现代市民主体性所选择的普通市民有所不同。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柏杨其实并没有改变其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中的“民本”立场：虽然中国历史中不同朝代的帝王君主和他们的后宫妃嫔们并不属于平民阶层，而是集权势、地位和全国财富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不过在充满战争苦难和朝代不断更迭变化的中国历史中，他们也经常不可避免地和自己统治的黎民百姓一样遭受死于非命的悲惨命运。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非正常死亡的帝王，以及“帝王之死”的事件中所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涉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以及人性等复杂因素，更能够反映出中国历史的本质和真实面目。柏杨在《可怕的掘墓人》中已经指出：“从黄帝姬轩辕先生起，到最末一个帝王爱新觉罗溥仪先生——这个可怜的家伙止，也就是从纪元前二六九八年，到纪元后一九四五年止，共四六四三年间。中国共出现了八十三个像样的或不像样的，长命的或短命的王朝。也共有五五九个像样的或不像样的，长命的或短命的帝王，包括三九七个‘帝’‘皇帝’，和一六二个‘国王’King。……在这五五九个称帝称王的头目之中，粗略的估计，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死于非命。不是因疾病的缘故，在床上断了尊气；而是被绞死，被饿死，肚子上被戳个洞，等等手法，一命归阴。很少头目在惨死时候，仍能保持他们活着时的威仪。大多数都如猪如狗，丑态毕露。我们就针对这三分之一左右的帝王，一一研究，寻觅他们死于非命的来龙去脉，探讨所以死于非命的前因后果，看看其中真相。呜呼，每一桩凶杀案都是一幕悲剧；而把帝王干掉的凶杀，除了是一幕悲剧，还是一首悲歌。它包涵了太多的音符，人性的和兽性的，人权的和官权的，智慧的和愚昧的，供人沉思。”①

由此中亦可以看出，与其他史学家钻进历史典籍中专注历史考据和史实研究的考据式研究方式不同，柏杨撰写的历史传记作品依然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中国人的命运遭遇为线索。这是柏杨从《中国人史纲》开始就已经奠定的一个基调和其现代化史学观的指导思想：“但‘史纲’既以‘中国人’为名，可知柏杨之用心，乃在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转折处产生影响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人？被放大特写的，不是圣君贤相，英雄美人，不然就是大奸巨恶之徒，而其中有人性的善恶、人情的冷暖、人权的浮沉，皆发人深省。”②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3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同样也有考察以帝王君主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之"现代化"的必要性。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封建制国家结构始终占据主流，所谓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就是真实写照。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家天下"观念——国家只是皇帝一人的天下，由皇帝子孙后代或父系家族成员代代继承皇位的传承制度，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其家庭建构模式都模仿封建皇宫，只是根据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而逐级简化和简单化，帝王与亲属、臣民之间横亘着尊卑贵贱的、无法逾越的等级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可把封建王朝中的皇宫看成是其他所有中国人家庭模式的一个缩影；进而言之，在柏杨所列举的四类"畸形人"中——集特权和凶残于一身的封建帝王，依附于帝王政权生存并是其"帮凶"的知识分子和"圣崽"，狂热追求做官和权势的"官崽"，以及以做官和当圣人为最高目的的普通民众——除封建帝王之外，封建社会中的圣崽、官崽和普通民众均以依附和遵从帝王为最高人生目的和生存目的，如果说封建帝王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大"家长"的话，那么他对一个封建王国的管理可比拟为管理一个大家庭，那么后三类"畸形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帝王"家长"的"子女"和"后辈"。反之亦然，中国封建社会家庭中的男性家长对子女和亲人具有无上的权威，在家庭范围的等级内处于最高阶层，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说是一个家庭中的小型"帝王"。更何况中国历史中的男性，从未成年起就在家庭中处于特殊地位，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下)》中指出："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①继承王位之前的帝王君主亦不例外。因而解剖分析封建帝王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就具有多重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不仅关涉到中国历代王朝的帝王与中国"酱缸"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亦可看成是解剖封建社会家庭中男性家长和其家庭奇特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从而可以这样说，柏杨史传作品选择以不同朝代的帝王君主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一种代表，显然也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身份和所扮演的多种角色，由此考察他们"现代化"的可能性。

概而言之，中国历史中各个朝代的死于非命的帝王既是中国"酱缸"文化的一个体现者和执行者，又是受害者，这种双重身份可说正是柏杨全面考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607页。

察“酱缸”文化对所有中国人进行戕害、压迫之本质的绝佳视角，同时再次证明了柏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另类思想所提倡的打碎或是澄清“酱缸”文化举措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为中国“酱缸”文化的最集中体现者，中国历代帝王君主最突出的一个特征表现在拥有的无限特权所导致的人性之异化上。换言之，是中国“酱缸”文化赋予他们至高无上的特权，由此导致了正常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具体来说，中国帝王君主的人性异化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种人性异化体现为他们根本不顾及民众生死存亡和国力的承受能力，盲目追求个人野心的无限扩张。也就是说，作为拥有最高层和最集中国家特权的帝王君主，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的人力资源和财富达成他们的个人愿望，因此一部分帝王就变成无限扩张领土的野心家——既不考虑战争对广大黎民百姓造成的灾难，也不顾国力贫弱的事实，而是通过发动战争、对外侵略其他国家的方式来扩张领土。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统治范围和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被这种特权剥夺了话语权和人权的普通民众，却要承受这些人性被异化后的野心家们造成的所有灾难性后果。柏杨禁不住义愤填膺地指责此类野心家：“为了一个蠢才的私欲，有多少人伤亡？呜呼，无论什么时候，野心家都是人类的一大灾祸，而愚蠢狂妄的野心家，除了为人类带来灾祸，更为自己带来灾祸。古之子滋甫（战国时的宋襄公）先生，今之希特勒先生和五人帮大亨之类，层出不穷，而且将来还会不断登台亮相。这种人物啥时候绝了迹，人类啥时候才有真正的幸福。”①

无限的制特权不但使中国历史中的诸多君王拥有不顾实际情况扩张领土和侵略其他国家的野心，他们还经常因个人野心的膨胀而失去正常理性判断，在处理国内事务时高估特权，忽略滥用特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其中一个负面效果体现在随便更换皇位继承人而导致发生宫廷政变，乃至国家政变。柏杨指出：“当君王的都有点怪，从不记取历史上血迹斑斑的教训，总是一再反复的犯同一类型的毛病。爱某一位漂亮老奶时，迫不及待的立她的儿子当太子。等到又爱上另一位漂亮老奶，迫不及待的又要立她的儿子当太子。问题是，太子只有一个，宫廷悲剧只好发生。”②帝王的家庭事务不仅是作为父亲角色的帝王个人的家事，因为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和废除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公事”，更是属于国家大事范畴。中国帝王君主拥有绝对特权所产生的更严重后果则是毁灭掉国家，这亦是野心无限膨胀后导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36页。

致的一种常见后果。柏杨把其总结概括为“掘墓人定律”:“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埋葬一个王朝,往往由该王朝的君王,亲自担任掘墓人。呜呼,任何王朝都是庞然大物,如果它们的君王不自己猛砍自己的命根,它根本就不可能死亡。这种特殊的运转,我们姑且称之为‘掘墓人定律’。”①而且拥有绝对权力还使君王们出现一种错觉,认为权力是压迫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有效工具,因此当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暴政时,帝王就异化成使用特权疯狂屠杀和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但实际的历史情况往往相反,“暴君总以为酷刑和虐杀,可以根绝叛变造反,而暴君们却往往死于叛变造反者之手。压力越大,一旦反弹,其力越强”②。拥有特权的帝王君主反而被自己手中的特权摧毁,成为特权的牺牲品。

帝王君主的另一种人性异化则是他们情欲的异化和扭曲,这亦是权力所导致的一种最常见的人性异化现象。柏杨在《死不认错》等早期杂文集中的很多作品中就曾经专门探讨过中国帝王的“乱伦”问题,认为禽兽式的“乱伦”是封建帝王君主的一种生活常态。在十几年之后出版的《帝王之死》一书中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且以具体的历史事例来加以说明:“如果以‘乱伦’为标准来作判断的话,中国帝王恐怕不是禽兽的,没有几个。舅父纳甥女根本算不了啥,比较起来,弟杀兄,兄杀弟,子杀父,父杀子,其凶其恶,又逊一筹。而且这还只限于亲属,帝王们对平民的迫害,那股疯狂发作出来,人权人道,全都勾消,连禽兽都不如。芈熊恽(即楚成王,著者特此说明)先生不过杀掉了老哥,奸淫了甥女,罪恶还算是第三四流的——也就是,不过是个禽兽而已。”③

需要注意的是,拥有无上特权之后,不仅使男性当权者利用特权满足自己的泛滥情欲,就是女性当权者的情欲亦被扭曲。在《可怕的掘墓人》和《忘了他是谁》两部史书著作中,柏杨把中国历史朝代中当权者情欲异化的现象总结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男当权者的情欲异化,当帝王君主看上臣子或是小民的妻子时,经常通过强夺豪抢的手段达到目的。如果被强抢女子敢于反抗特权者淫威的话,其结局总是自身死亡,甚至是家破人亡。虽然这些贞烈的历史女性千百年来成为中国文学家不断歌颂的对象,但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当权者并不担心受到相应惩罚以及来自当时社会伦理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18—119页。

② 同上书,第260页。

③ 同上书,第208页。

层面的谴责，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仁义道德体系就是为这些特权阶层服务的，是他们的“保护伞”。因而，当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庄公因为勾引大臣的妻子而被杀死，被扣上“弑君”罪名的却是那位本应该为受害者的大臣，“鸣呼，姜光先生（齐庄公）奸淫恩人之妻，以当时社会规范，被宰掉本是活该，可是姜光先生不是一个普通小民，而是一个国君，身价就忽然不同，为奸夫复仇，竟成了他妈的‘大义’矣”①。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等级关系的一种典型反映。

另一种模式则为女当权者看上男性臣子或是小民，这在中国历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只要手握大权，男人看上女人，女人固然难逃。女人看上男人，男人同样无法招架。息露女士拒绝宋偃先生，自杀身死，千古留名。杜伯先生抗拒女宛女士，结果被斗臭后处决，苏秦先生知道，如果拒绝文夫人，下场准惨不忍睹。文夫人召他进宫，他不敢不进宫；文夫人教他上床，他不敢不上床。噢，文夫人不是普通民女，她可是国王的娘，换了老圣人孔丘先生，也得如此这般”②。如果有些男性敢于反抗的话，女当权者就通过诬陷的方式迫害这些反抗者。柏杨把这种模式称为是“约瑟模式”，这是从《圣经·旧约》中约瑟拒绝女主人勾引而被后者陷害的故事中概括而出：“这是倒打一耙的约瑟模式，威力无比，一个臭男人只要被套牢，就是如来佛亲自出马，都无法洗刷清白。而对一个老奶而言，因拥有这项秘密武器之故，简直横行无阻，想玩谁就玩谁，胆敢拒绝，她只要玉口一张，保证其效如神。即以约瑟先生而论，我们看到的是一面之辞，如果同时看到那位女主人一把鼻涕一把泪，一枝梨花春带雨，恐怕对约瑟先生，也可能失去信心。”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属于拥有无限权力的特权阶层，就很容易因为情欲的无限制膨胀被异化为迫害其他非特权阶层的“非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证明了男女之间的尊卑关系并非是天然形成的，而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是男性统治下的男权社会，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自然占据首要位置，女性的“温柔和以男性为天”等特点均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建构出的一种产物，所以女性的地位卑下，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如果中国历史女性处于高于男性的权力阶层，她们不但在政治权谋上并不比男性差——这在《皇后之死》等专著中探讨的吕雉等历史女性身上可以明确看出，而且同样具有人性的缺点和优点。换言之，柏杨用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国男性帝王君主具有的情欲异化特点同样会出现在女当权者的身上，或曰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44页。

② 同上书，第346页。

“酱缸”文化中的无上特权会腐蚀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这可以成为一个反例，说明中国历史中男性帝王君主的人性异化是因为他们拥有极端的、不受约束的特权，如果他们的特权受到广大民众的监督和限制的话，他们同样存在“现代化”的可能性。

无限的特权集中到中国帝王君主一人的手中，不但导致帝王们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而且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无“人权”观念和缺乏“法治观念”等“酱缸”文化特产，显然均与帝王君主的人性异化密切相关。“诏狱”现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出现和长期流行，正是封建君王被特权异化后制造出的专为特权者服务的一个产物。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柏杨以汉朝出现的“诏狱”现象为出发点，较详尽地分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诏狱”现象的特征：“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法庭——军法系统”，“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纹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①] 也就是说，“诏狱”实际上是直接为皇帝服务，被认为犯罪的臣民们根本不需要经过审判、确认犯罪事实等法律程序，皇帝个人的喜好和命令就是法律，可以直接为犯人定罪。而且“诏狱”的牵涉面非常广泛，“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冲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当敢如此残虐的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零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人毛骨悚然”[②]。这种民众无人权、人性尊严得不到尊重的现象也曾经被一些有识之士看到。汉朝低级官员路温舒曾经上书给当时的皇帝，建议改革司法的黑暗，可说是最早的人权呼吁，但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柏杨指出“诏狱”横行的根源在于使中国封建帝王拥有无限特权的国家制度：“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变悠久传统，因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的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像司马迁、周亚夫、颜共，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但路温舒的奏章，使我们发现中华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71页。

② 同上书，第371—372页。

到任何效果。”①

“诏狱”现象发展到唐代，则演变成“酷吏”现象，其本质依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缺乏人权的一个产物，“法律的好坏，不在‘发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只追求口供。一个人明知道一旦诬服谋反，即将全族被屠，而仍‘坦诚不讳’‘自动招认’，这便是酷吏的功能”②。与遭受“诏狱”牵连的人员的遭遇相比，落到酷吏手中的所谓“罪犯”更不被看做是具有人格和人权的“人”，后者在肉体上遭受的非人酷刑充分表明，特权阶层已经把除自己之外的、包括士大夫在内的所有民众的人权和人格均踩在铁蹄下任意蹂躏：“我们必须了解，酷吏酷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纪元前一世纪路温舒所指出的现象，一直存在，并没有改善。来俊臣之流的手段，并不能跳出这个传统范畴。儒家学派政治制度下，‘礼不下平民，刑不上大夫’，刑罚只是专为平民而设，不可用来对付士大夫。所以任凭路温舒怎么为平民呼吁，士大夫并不注意，因为自信自己并没有被政府酷吏酷刑拷打的危险。武照一下子用它来广泛的对付士大夫，士大夫才震惊哀号，奔走相告。所以酷吏酷刑对士大夫的影响大，对平民的影响小，社会结构如故。至于宫廷政变，更只限于宫廷。平民对谁当皇帝，既无力量干预，也无兴趣过问，社会的发展与运行也如故。”③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曾经指出：“明王朝是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④而“文字狱”现象的出现也与掌握特权的帝王君主之人性异化有关。因为“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景，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与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老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犹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洲人明明是背后垂着猪尾巴的夷狄，自然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⑤ 司法部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373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③ 同上书，第83页。
④ 同上书，第316页。
⑤ 同上书，第503页。

门对“文字狱”牵涉到的罪犯和罪刑的审判过程，更是暴露出中国封建社会毫无人权的普遍现象：“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①

除以上所列举的现象之外，中国历史中的“宦官制度”亦是帝王人性异化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具体来说，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宦官”制度是中国封建帝王多妻制度的副产品，“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②。宦官制度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亦是因为拥有特权的帝王君主的个人需要：“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官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官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人数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③从某个角度来说，“宦官”制度是拥有特权的男性对普通男性，特别是最底层男性的残害和压迫。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7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10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32页。
③ 同上。

因为中国封建宫廷中的太监基本上都是穷苦人家孩子出身，父母因为太过贫穷而被迫卖掉这些男孩子。成为太监的孩子的命运通常很悲惨，“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中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成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会，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护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①。

可以这样说，至高无上的特权不但导致中国历史不同朝代的帝王之人性异化，而且作为特权者人性异化产物的诏狱、文字狱等现象，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法律体制系统，又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帝王的特权地位，亦进一步拉大封建帝王作为“主子”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奴才”之间的距离。柏杨在杂文和史传作品中反复进行批判的三类畸形人——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圣崽”、以作官为己任的“官崽”和以当“圣人”与“做官”为最高目标的普通民众——则完全丧失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只能够依靠特权者帝王“主子”生存，任其宰割而不知反抗，也无法反抗的“奴才”。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就是拥有特权的封建帝王之人性异化的历史，加诸在中国民众身上的奴性不断深化的历史，“酱缸”文化中的糟粕越积越多、亟待后人清除的历史。

但是这并不是说处在特权阶层的中国封建帝王君主是“酱缸”文化的全部受益者，他们自身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酱缸”文化的受害者。据柏杨的统计，中国历史上大概有近三分之一的帝王死于非命。如此庞大数量的帝王的非正常死亡，死因背后隐藏的各种因素更加耐人寻味，从中亦可分析出“酱缸”文化对所有中华民族人民的戕害——不但借手握特权的封建帝王君主和儒家思想中的文化糟粕对“奴才”级别的三类“畸形人”进行毒害和压迫，而且对封建帝王君主等特权阶层亦不放过，把他们异化成凶残的、毫无人性的一类畸形人，最后再把他们也吞噬掉。进而言之，包括中国封建帝王在内的所有历史人物都需要维护自己的人权，均存在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434—435页。

"现代化"的需要,这亦是柏杨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现代性的世俗化思想中倡导"历史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基础。

死于非命的中国帝王的死因各式各样,但是概括而言,大概主要有四种非正常死亡原因。中国封建帝王最常见的一种横死方式是死于改朝换代的战争灾难,这亦是一种历史常态。中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战争苦难史,除了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五胡乱华时代等战乱时期之外,其他所谓的"和平"时期也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究其原因,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土地、领土和财富等客观原因爆发战争之外,还有更主观的原因:一个王朝经常在衰朽的末期由于天怨人怒而爆发起义战争,甚至引起改朝换代的战争。这在中国历史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在残酷的战争杀戮中,千万普通小民死于战火,帝王君主拥有的特权也并不能够使他们保全自身,他们也经常在战火中或是被人杀死,或是被迫自杀身亡,无法逃避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大变动中,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微弱的,中国封建帝王同样如此,均抗拒不了战乱灾难巨轮的碾压。而对一个王朝的覆灭,该朝代帝王们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有历史的偶然性因素在里面起作用,例如前秦帝国的覆灭[①],各种因素过于错综复杂,这也并不在本书要讨论的范畴之内,亦不符合柏杨撰写《中国人史纲》和《帝王之死》等史传作品的初衷。

但是柏杨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关照下,对中国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一些封建帝王死因重新进行整理和分析。他发现,导致中国帝王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件虽然与改朝换代的战乱灾难等客观原因有关,但是还有其他三种死亡原因是属于"人祸",即在很大程度上封建帝王的死于非命都与人为因素有关,与"酱缸"文化的戕害密切相关。这三种死因背后的诸多因素更是耐人寻味。这亦是柏杨史传作品的一个独特发现。

导致中国历史封建帝王非正常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被他人谋杀,但是"谋杀"事实常常被"自杀"的假相所遮盖。儒家知识分子撰写的中国史书也并不如实记载这类帝王横死的真正原因,反而导致出现很多历史疑案。正是在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的宏观指导下,柏杨对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第一位主动上吊自杀的君王芈围(楚灵王)之真正死因质疑并进行推理,认为

---

① 可参考李瑞腾主编的《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502—507页。在第16册"史学卷"所包括的《中国人史纲(上)》一书中,作者柏杨在"第十七章第四世纪"中的"八、淝水战役——历史的命运"一节中指出,前秦王国的灭亡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可知的历史命运。

可能是被打着“报恩”旗号的申亥谋杀的。柏杨把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作为推理的出发点:“申亥先生冒生命危险,为父报恩,这种胸襟道义,我们感动至深。一脸忠贞学之辈,一有风吹草动,都作鸟兽散,或则破口大骂,或者落井下石矣。然而,更进一步教自己亲生女儿去陪芈围先生上床,便太离谱,如果女儿自己愿意这么做,我老人家举双手赞成。但老爹逼着她们这么做,该老爹便是畜牲。他没有权力伤害女儿们独立人格,更没有权力夺取女儿们独立生命。他这种画蛇添足的行为,使他的义举蒙受可耻的污点。”[①]柏杨谴责这个所谓的“忠贞之辈”申亥牺牲了两个女儿的幸福和生命,依然不脱离“畜牲”范畴。虽然柏杨用现代人的人权观念来批判古人的愚昧忠君观念有失偏颇,但是柏杨对楚灵王被谋杀的推理是以事实细节为依据的:“然而,问题还不止此,而在芈围先生(楚灵王)伸脖子上吊。两个女儿奉命共同陪伴老家伙,该老家伙忧心如焚,好像鞋子是租来的,走来走去,走了一夜,难道二位老奶竟视若无睹,迳自呼呼沉睡如猪乎哉?老家伙上吊,同在一个卧房,岂能悄悄无声?上过吊的或看过别人上吊的朋友都知道,把尊脖伸到圈套里之后,必须把脚下的板凳踢翻,才能了账。板凳踢倒时,岂能不忽咚哐啷,二女难道一点也听不见?为啥不当时呼叫,却要等到天明?”[②]柏杨还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其他可疑之处:“似乎有一种可能,申亥先生也是一脸忠贞学之辈,不过更为老奸巨滑,他要女儿代他下手。否则,叫一个女儿陪宿就足够啦。似乎是申亥先生要杀芈围先生,而又不愿承当凶手的恶名。所以,说不定芈围先生不是悬梁,而是被二位女儿绞死床头。然后,申亥先生为了保护自己,再杀掉亲生二女灭口。”[③]虽然此桩谋杀君王案件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而无法肯定其真伪,成为一桩历史悬案,不过柏杨坚信自己推论的正确性:“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申亥先生干出这种勾当,只是根据一项观察推论。该凡做的过度违反人性的人,一定有一副恶毒奸诈心肠。申亥先生杀掉两位女儿就足够我们肯定矣。”[④]换言之,在没有人权和现代法治观念的封建专制特权统治之下,失去皇权和特权的中国君王通常只有死路一条,“酱缸”文化不会允许他们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存活下去,他们不但成为“酱缸”文化的牺牲品并被后者吞噬掉,而且在以“为尊者讳”、“政治挂帅”为宗旨的中国史书中也未必会得到公正的评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59—26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60页。

④ 同上。

价，其真正死因亦常被掩盖和湮没。由于最高特权已经转移到新任帝王的手中，那些"圣崽"、"官崽"和以当圣人和官员为人生目标的普通民众也已经抛弃了原来的帝王"主子"，改投并依附于新王朝的帝王"主子"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又是必然的，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酱缸"因素所决定："盖中国传统文化是，无论是青面獠牙型的匪徒恶棍，或白面书生型的大奸巨滑，只要夺取到政权，立刻就会把旧王朝一笔勾销，重敲锣，另开张，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王朝。……忠于某一个王朝，事实上就是忠于君王的那一个姓，形成一种生殖器崇拜的奴才性格。"①

中国封建帝王还经常成为帝王家族内部"夺嫡战争"的牺牲品，这是他们非正常死亡的第二个原因。至于"嫡子制度"的概念内涵，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柏杨详细指出，其产生根源在于中国封建家庭的家长或是国君解决内部诸子的权力继承问题："封建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继承，中国大概至晚从纪元前十二世纪起，就实行诸子均分制度。父亲遗留下的财产，每一个儿子都有一份。但父亲遗留下来的如果是一个不能均分的宝座，或是一个不能均分的世袭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时，问题就发生了。必须有适当的方法解决，才可以保持国家和家族的完整。否则的话，每一个国王或每一个有爵位的贵族死亡，都可能爆发一次骨肉残杀，因而导致国家和家族的崩溃。"②具体到周朝来说，"周王朝的解决方法是宗法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儒家学派的学者往往穷一辈子的精力，都弄不清楚它的细节。但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即'嫡子继承制度'，也可以称为'亲属等差递减制度'。那就是以母亲的身份和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儿子划分为'嫡''庶'"，"诸子的'嫡''庶'既然分明，宗法制度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唯一有权继承国王或爵位的人。庶子即令比嫡长子年龄大，比嫡长子有才能，都不能继承。嫡长子即令是一个白痴或神经病，宝座也只有他的屁股才能坐。这个继承法案，可归纳为两句话：'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假使嫡长子死亡，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即嫡长孙）继承。所有庶子固然不能问津，即令同母的胞弟嫡次子也不能问津，除非嫡长子无后"。③ 从"嫡子制度"的历史作用来说，"宗法制度最大的功能是，为继承顺序，提出一个可行的标准。它虽然不能根绝阴谋、流血和战争，但它至少已成功地阻止或避免更多次的阴谋、流血和战争"，"这个宗法制度，被此后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144—145页。
③ 同上书，第145—146页。

历代王朝所接受,一直到二十世纪清王朝覆亡,才跟着消灭。它的力量控制中国社会达三千年之久"①。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嫡子制度"明确规定只有嫡子才有资格和权利继承父亲的权力地位,帝王家族中亦只有嫡子才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但是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至高无上的特权和皇权对中国封建帝王宫廷内部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皇帝的儿子们,均是致命的诱惑,后者经常不可避免地卷入"夺嫡战争"——宫廷内部特权阶层的"窝里斗"的斗争中。柏杨曾经在《可怕的掘墓人》一书中凭借分析姚重华(即舜帝)的继母和其子象伙同其亲父杀害前子的历史故事,分析出现这种家庭人伦惨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中的"嫡庶之分"。从某个角度来说,"嫡庶之分"是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在家庭中的一种变相体现,这是"酱缸"文化中多妻制度所产生的一个直接恶果。不同老婆生的诸多儿子在权力继承问题上有着明确的等级关系:"在多妻制度的宗法社会中,君王权力转移给下一代时,有两大法则,曰'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大老婆,也就是原配夫人生的儿子,称之为嫡子,老大为'嫡长子',天经地义的要接收老爹的大权。以下为'嫡次子''嫡三子'。小老婆群生的儿子,年纪最大的为'庶长子',以下为'庶次子''庶三子'。这种'嫡''庶'之分,比美国的'黑''白'之分,还要一清二楚。"②中国封建家庭内部这种不公平的等级问题,以及夺取家庭或是宫廷至高特权对庶子们的诱惑,往往激起残酷的"夺嫡斗争":"但对一个在权力中心打滚的庶子而言,只要他自认为他的力量已强大到可以'夺嫡'的时候,他一定'夺嫡':或用谋用计,或动刀动枪,使自己摇身一变——把'庶子'的包袱变掉,而变成妙不可言的'嫡子'。呜呼,只有这种权力欲望,才能使生死决斗,接二连三,永不停止。"③一些帝王就在残酷的"夺嫡战争"中死于非命。可以这样说,即使手中掌握着至高的特权,中国封建帝王君主也无法逃避"夺嫡战争"带来的伤害。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宫廷内部夺取权力时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夺嫡战争"从所谓的圣贤尧舜禹时代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的"夺嫡斗争"表面上披着"禅让制"的美名,中国传统史书亦经常用"瞒"和"骗"的手法来美化那些所谓的古代帝王"圣君",从而用"禅让制"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47页。

②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3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之名遮掩住帝王家族内部进行着的残酷争夺王位或是部落首领之斗争的历史事实。柏杨专门以周代周文王姬昌两位伯父把王位“禅让”给其弟的事迹,以及尧帝把王位“禅让”给舜帝和舜帝也把其王位“禅让”给大禹的历史事迹为例证,剖析出“禅让制”掩盖下的“夺嫡斗争”本质。

具体到作品文本来说,柏杨主要是从当时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对儒家史学家笔下的所谓“禅让”进行揭批。举例来说,柏杨认为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姬季历代替两位兄长成为继承人的所谓“禅让”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很多疑点:“呜呼,老狗变不出新把戏,这可又是伊祁放勋(即尧帝)、姚重华(即舜帝)‘禅让’的那种老掉牙了的闹剧。老爹之所以要传位给非法继承人,只因为那小子‘贤’。该‘贤’又有一个‘圣子’——这圣子不是耶稣先生,而是姬昌先生。咦,一定是老哥姬太伯、姬仲雍不贤矣,然而,如果不贤,他们二人岂肯为了‘避位’,逃到边陲蛮荒,剃掉头发,满身刺出狼虫虎豹的花纹乎哉?仅这一点,就足够证明二位先生不但贤,而且贤得冒烟,贤得要命。对这样胸襟,这样见解,以及这样能力,(他们把蛮荒地区人民组织起来),竟然排除,而只为了姬季历有一个‘圣子’,而那是姬昌的儿子姬发建立了周王朝,有了政治权柄,才‘圣’起来的。当姬昌还是娃儿时,固跟任何一个小孩一样,他妈的‘圣’个啥。”[1]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周王朝传统宗法制度是,立嫡不立庶,传长不传贤。身为一个严正的酋长赫一个仁慈的家长,绝不可能胆大如斗,自动自发的破坏这种严格的规定。真的胆敢破坏,便是瞽叟之类的王八蛋矣。可是,看史书记载,姬亶父先生又不像是瞽叟之类的王八蛋”。柏杨接着进行分析:“即令老爹姬亶父先生决定把宗法打烂,姬太伯和姬仲雍也用不着落荒而逃。必须逃走之后,姬季历先生才能成为合法继承人,而老爹的命令岂不等于放屁乎哉?即令要逃,也用不着逃那么远,从镐京(西安市)到梅里(江苏省锡山市),航空距离一千二百公里。纪元前十三世纪时,那里可是世界上最可怖的烟瘴地带之一,兄弟二人,在没有道路的烟瘴地带乱闯,恐怕要摸一年才能摸到。他们满可停顿在同样烟瘴的淮河流域,为啥直走到东海之滨?”[2]在最后部分,柏杨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残酷的“夺嫡斗争”:“这显然是一场夺嫡斗争,两位老哥在夺嫡斗争失败后,被放逐到那里——甚至,他们可能就死在中途。反正史书掌握在有权大爷手中,血腥政变,遂成了可歌可泣的风流韵事。写史书的朋友顺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2 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第 393—394 页。

② 同上书,第 394 页。

便把他们装在吴王国的头上，拿来耀耀门面。和烘托姬季历——姬昌——姬发，祖孙三代，可是'贤'得很妙，兼'圣'得很凶。"在实行"禅让"之后，原帝王或是部落首领的结局无一例外地因被放逐到蛮荒之地而死亡。

柏杨还发现，以封建制社会秦朝"家天下"的统治为开端，"禅让制"直接被帝王家族内部的"夺嫡斗争"所代替。从这个角度来说，后世的夺嫡斗争其实只是揭去了"禅让制"虚假、温情脉脉的表面形式，而是直接彼此争斗，其实质依然是血腥味十足的宫廷内部战争，失败的帝王只有用死亡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所谓的备受后人称颂和怀念的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圣贤时代，其实始终是一种不切合真实历史现实、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的时代。正是因为儒家史学家的"为尊者讳"、"势利眼主义"的史学观，中国史书才掩盖了中国历史的血腥气。正如上文所言，无论是"禅让制"还是"夺嫡战争"，都是中国历史中不同朝代的封建帝王经常要面对的"窝里斗"现象，是生活在"酱缸"文化中的帝王君主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

相比中国封建社会后宫嫔妃等历史女性的命运遭遇，中国封建帝王君主的"现代化"则困难得多。他们不仅经常面临被其他人谋杀，或是在残酷的夺嫡斗争中失败而死的悲剧命运，有时候还要面对自己统治的封建王朝处于"瓶颈危机"造成的诸多困境。所谓"瓶颈危机"，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给出定义："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地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①一个王朝发生"瓶颈危机"的原因并不复杂："主要的是，王朝建立伊始，人民还没有养成效忠的心理惯性作用。新政权就好像一个刚刚砌好的新砖墙，水泥还没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动都会使它倒塌。一旦统治者不负众望，或贪污腐败，或发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内讧之类，都是引发震动的炸药。不负众望往往促使掌握军权的将领们兴起取而代之的欲望。贪污腐败则完全背叛了建国时的政治号召，跟当初赖以成功的群众脱节。外患内讧之类的伤害，更为明显。"②有些封建帝王就在本王朝"瓶颈"时期的战争叛乱中被杀死。举例来说，生活在纪元前三世纪齐王国的第二任国王齐湣王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48页。

② 同上。

田地的横死，与齐王国当时处于“瓶颈危机”时代有很大关系。在齐湣王田地统治时期，齐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断，他的统治并不稳固，加上他性格中的傲慢无知和愚昧自私，导致最后的结局是被宰相淖齿捉住后遭受剥皮抽筋的酷刑而死，成为“死的最惨”的中国君王。作为一代帝王，田地之所以被部下用酷刑杀死，按照柏杨的分析，“柏杨先生胡思乱想，认为可能跟田地先生的傲慢态度有关。田地先生危机之秋，还在卫、鲁、邹三国摆出的架子，三国国君都不能忍受。回到自己绝对可以控制的莒城，对于屈身为宰相的淖齿先生，他阁下摆出的架子，恐怕更使人难堪。淖齿先生这么恶毒的对待他，可能是太多屈辱累积下来的反击。你阁下不是猛端嘴脸乎，俺就看看你被剥皮时的容貌。你阁下不是架子十足乎，俺就看看你抽筋时伟大的姿态。人际关系复杂，小小的怨毒，常能招来滔天大祸，田地先生为他的颟酐傲慢，付出可怕代价”①。这是柏杨从人性人情等主观方面推测出的原因，客观原因则在于齐湣王没有能力处理好齐王朝“瓶颈”时期的各种危机事件，导致死于非命的悲剧结局。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各朝代的帝王君主们的“现代化”问题比其他历史人物的难度更大，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酱缸”文化给予的无限特权，是一个国家和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手下的臣民，他们拥有掌握后者生死命运的大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帝王君主作为“酱缸”文化的体现者，“酱缸”文化就通过他们之手间接对其他人进行戕害和毒害。但是这些帝王亦经常会面临被封建特权反噬的命运，他们同样可能成为“酱缸”文化的牺牲品。一部分死于非命的帝王之悲惨命运就是证明。因而在思考中国帝王君主这类历史人物的“现代化”问题时，柏杨史传作品不仅采用“破”的方式来批判他们身上的人性异化等现象，还通过“立”的方式从中国帝王身上找寻中国历史“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某些闪光点。尽管这些闪光点微弱地摇曳在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并不能够照到被“酱缸文化”浸泡的所有历史角落，但是柏杨从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存在，看到了国人改造国民性、打破“酱缸文化”流毒的希望。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另类思想的指导下，柏杨自始至终把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创新精神看成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必然措施，在史传作品中亦不例外：“现代化的意义，是指：向最进步的其他国家，学习最进步的东西——包括生活方式和战争方式。这正是货真价实的‘崇洋’，柏杨先生就是这种货真价实的崇洋分子之一。此生为崇洋而活，下世为崇洋而生。有些人僵固得像一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75页。

粒干屎橛，总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好，自己既不求长进，还唯恐别人长进（甚至唯恐怕民富国强），遂在‘崇洋’之下，装上《西游记》哪吒先生的风火轮：‘媚外’而成了‘崇洋媚外’。只要把这件法宝念念有词地祭出来，当着无不脑浆迸裂。呜呼，‘崇洋’跟‘媚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如果弄不清，或者故意弄不清，中国就永远死气沉沉，人民也将永远受不尽苦难。”①顺理成章，柏杨把勇于吸取外来文化、具有改革精神的中国封建君王看做是具有“现代化”素质的历史人物。柏杨极力赞美生活于公元前四世纪七十年到前三世纪初的武灵王赵雍的改革精神：“赵雍先生是中国历史上主动采取现代化行动，也就是主动采取崇洋行动的第一位君王。大多数君王都是固步自封，把政权看成玻璃罐，捧到手里，连姿势都不敢改变，唯恐啪玻璃罐掉到地下跌个粉碎。结果酱在那里，捧得筋疲力尽，最后来一个倒栽葱，还是稀里哗啦。赵雍先生不然，他盖世英姿，具有超越时代的构想。”②作为赵国的第六任国君，赵雍排除守旧势力奉行改革，让国内人民均改穿胡服并学习骑射，不但增强了国家战斗力，而且使赵国国力日渐强大起来。

赵雍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规律性。柏杨指出：“站在使国家强大立场，革新变法的效果，立竿见影。赵雍先生之前，秦王国经公孙鞅先生革新变法，使那个半开化、野蛮，而又落后、没人瞧得起的国度，十年之间，旱地拔葱，突然间冒出来，成为一等一级的超级强国，横冲直撞，天下无敌。而今，赵雍先生再度作为见证。”③柏杨借助赵雍改革赵国成功，以及秦王国在改革后成为中国战国后期超强封建帝国的事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酱缸”文化糟粕，还孕育着改革创新的优良文化因子，中国封建君王身上也有现代化的萌芽存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民劣根性和封建王朝文化中的超稳定、怕变革等“酱缸”文化成分最终占据上风，阻止了其他封建王国像秦王国一样去大胆变法：“秦王国自从商鞅先生变法之后，国势突然跃升。呜呼，每一个国家都知道秦王国所以突然跃升的原因，是政治和司法的彻底革新，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都会同样的突然跃升。可是，那伤害到太多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用种种理由保持现状，各国唯一的办法是，在现存的腐败的结构和腐败的体制上，再行结盟——南北合纵同盟，用以对抗秦王国的侵略。”④其他诸国拒绝改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2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9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10页。
④ 同上书，第383页。

革的后果必然是造成国力衰落，最终被秦国灭掉。虽然改革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必然之路，“可是，从此之后，改革变法之举，在中国却成了绝响。我们真搞不懂，当权老爷为啥不走这条立竿见影的路，却坚持着僵化了的传统。坚持的结果是，逼出革命，玉石俱焚，身败名裂，政权覆亡。偏偏当权老爷宁可身败名裂，政权覆亡，也不肯改革变法，使自己强壮如牛。这是中国的传统悲剧，嗟夫”①。

柏杨还认识到，虽然中国封建帝王大部分被“酱缸”文化异化成人性扭曲的“地头蛇”式人物，但是中国历史中也存在着个别的具有很高灵性和美德的帝王。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的一位君王。柏杨不禁赞叹：“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功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②

上文所列举的中国封建帝王的这些优点，虽然在中国历史中如流星一闪而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能够去除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中国封建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手中所掌握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受到监督和限制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拥有正常的人性和灵性，他们的改革精神或许也能够保持下来，国人的人权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中国历史的“现代化”问题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中国的命运也许会像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早就跨入世界现代化强国行列，成为尊重人性、人权和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民族国家。

作为一名现代史学家，柏杨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和对中国历史人物“现代化”问题的考察，亦是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另类思想——现代性世俗化思想在历史层面的必然体现：历史既是其现代性思想的一种新载体，新的呈现状态，又是其现代性思想的一种具体化与细化。在与历史的对话中，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既找寻到了自己的合法性，也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历史性。而在与现代性世俗化思想的对话中，中国历史也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本相，重新恢复了自己的生动性、灵性和生命力。可以说，柏杨在历史与现代性的对话中完成了两者的一次双向建构，也将自己的现代性世俗化的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

①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7 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第 310—311 页。

② 同上书，第 47 页。

参考文献

1. 柏杨:《柏杨谈历史》,三联书店,2007 年。
2. 李瑞腾主编:《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3 年。
3. 李瑞腾:《情爱挣扎》,台北汉光出版社,1994 年。
4. 黄守诚:《国家不幸诗家幸》,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5.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
6. 陈晓明:《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7.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8.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
9. 计璧瑞:《文学台湾论稿》,华文出版社,2001 年。
10. 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2. 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3.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海南出版社,2002 年。
1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 年。
15. 黎活仁等主编:《柏杨的思想与文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6. 柏杨:《柏杨小说选》,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6 年。
17. 张颐武主编:《现代性中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8.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9. 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0.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下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1. 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 年。
22. 雷锐:《柏杨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 年。
23. 古继堂:《柏杨传》,作家出版社,1999 年。
24. 柏杨:《柏杨版资治通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8 月第 1 版,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5. 柏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6. 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湾前卫出版社,1996 年 7 月 1 版,1997 年 6 月 2 版。
27. 福建省台湾研究会主编:《台湾文学的走向》,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 年 4 月 1 版。
28. 许俊雅:《台湾文学论——从现代到当代》,台北南天出版社,1997 年。
29. 胡民祥编:《台湾文学入门文选》,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 年 1 版,1998 年 10 月 2 版。
30.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台湾文学界杂志社,1987 年。
31. 王晋民主编:《台湾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32.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湾新地出版社,1995 年。
33. 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年。
34. 朱双一等:《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5. 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年。
36. 黎湘萍:《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1994 年。
37. 黎湘萍:《文学台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38. 余光中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1970—1989)》,九歌出版社,1989 年。
39. 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40.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 年。
41.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出版社,1998 年。
42. 吴浊流:《无花果》,台湾出版社,1984 年。
42.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业印书馆,2003 年。
43.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 年。
44.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 年。
45.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
46. 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
47. 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
48.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49. 张忠栋:《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台湾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 年。
50. 任育德:《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51. 安科亨、阿拉托:《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 年。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4. 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55. 陆卓宁主编:《20 世纪台湾文学史略》,民族出版社,2006 年。
56. 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7. 王雅各:《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9 年。
58.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 1939—1942 年作品》散文卷一,哈尔滨出版社,2003 年。
59. 陈漱渝、肖振鸣主编:《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二 1923—1925》,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6年。
60.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61.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62. 柏杨:《柏杨回忆录》,周碧瑟执笔,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6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64.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6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67.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68.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
6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70.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
71. 陈映真:《归乡》,昆仑出版社,2001年。
72. 柏杨:《死不认错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3. 柏杨:《玉雕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4. 柏杨:《怪马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5. 柏杨:《堡垒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6. 柏杨:《凤凰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7. 柏杨:《红袖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8. 柏杨:《立正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79. 柏杨:《牵肠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0. 柏杨:《蛇腰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1. 柏杨:《剥皮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2. 柏杨:《高山滚鼓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3. 柏杨:《道貌岸然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4. 柏杨:《神魂颠倒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5. 柏杨:《鬼话连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6. 柏杨:《大智若愚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7. 柏杨:《越帮越忙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8. 柏杨:《心血来潮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9. 柏杨:《活该他喝酪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90. 柏杨:《按牌理出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91. 柏杨:《闻过则怒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92. 柏杨:《前仰后合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93. 柏杨:《圣人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94. 柏杨:《大男人沙文主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95. 柏杨:《早起的虫儿》,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96. 柏杨:《踩了他的尾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97. 李汉伟:《台湾小说的三种悲情》,台湾骆驼出版社,1997 年。
98. 白烨:《文学观念的新变》,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年。
99.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00. 程光炜:《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101. 董之林:《走出历史的雾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02. 韩毓海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03.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4. 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05. 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 年。
10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 年。
107. 刘再复:《读沧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08. 王若水:《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 年。
109. 柏杨:《求婚记》,古吴轩出版社,2004 年。
110. 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 年。
111. 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台北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
112. 陈枢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 9 期。
113. 托里莫以:《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湾骆驼出版社,2006 年。
114. 王尔德:《谎言的衰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15. 江源:《大陆杂文与台湾杂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7 期。
116. 张骥亮等:《潘君密眼中的李敖与柏杨》,《三月风》2004 年第 3 期。
117. 殷海光:《重整五四精神》,《自由中国》第 16 卷第 9 期,1957 年 5 月 5 日。
118. 林语堂:《幽默杂话》,《晨报·副刊》1924 年 6 月 9 日。
119. 曹文轩:《20 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20. 施咸荣:《西风杂草》,漓江出版社,1986 年。
130.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1.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2.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3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3. 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4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4.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4 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2000 年。
135.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5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6.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6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7.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7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8.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8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9.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9 册 · 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40.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0 册 · 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41.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1 册 · 散文卷书信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2.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2 册 · 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3.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3 册 · 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4.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4 册 · 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5.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5 册 · 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6.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6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7.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7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8.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8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49.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9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0.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0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1.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1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2.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2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3.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3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4.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4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5.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5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6.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6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7.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7 册 · 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8. 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8 册 · 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附　录

柏杨作品在台湾和海外出版的各种版本统计

一　散文集

1.《玉雕集》,收入《倚梦闲话第一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2年。

《玉雕集》更名为《动心集》,收入《柏杨选集1》,台北:星光出版社,1979年。

《玉雕集》,《倚梦闲话1》,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年。

《玉雕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玉雕集》,收入《倚梦闲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怪马集》,收入《倚梦闲话第二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2年。

《怪马集》更名为《妙猪集》,收入《柏杨选集6》,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年。

《怪马集》,收入《倚梦闲话2》,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年。

《怪马集》,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怪马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3.《堡垒集》,收入《倚梦闲话第三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3年。

《堡垒集》更名为《降福集》,《柏杨选集2》,台北:星光出版社,1979年。

《堡垒集》,收入《倚梦闲话3》,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年。

《堡垒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堡垒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4.《圣人集》,收入《倚梦闲话第四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3年。

《圣人集》更名为《候骂集》,收入《柏杨选集8》,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年。

《圣人集》,《倚梦闲话4》,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年。

《圣人集》,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2000 年。

《圣人集》,收入《倚梦闲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5.《凤凰集》,收入《倚梦闲话第五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3 年。

《凤凰集》更名为《咬牙集》,收入《柏杨选集 7》,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 年。

《凤凰集》,收入《倚梦闲话 5》,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 年。

《凤凰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凤凰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6.《红袖集》,收入《倚梦闲话第六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3 年。

《红袖集》更名为《红颜集》,《柏杨选集 3》,台北:星光出版社,1979 年。

《红袖集》,《倚梦闲话 6》,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 年。

《红袖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红袖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7.《立正集》,收入《倚梦闲话第七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5 年。

《立正集》更名为《跳井救人集》,收入《柏杨随笔 5》,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 年 3 月初版,1982 年再版。

《立正集》,收入《倚梦闲话 7》,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 年。

《立正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立正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8.《牵肠挂肚集》,收入《挑灯杂谈 1》,台北:平原出版社,1968 年。

《牵肠挂肚集》更名为《玉手伏虎集》,收入《柏杨随笔 10》,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 年。

《牵肠挂肚集》,收入《倚梦闲话 8》,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 年。

《牵肠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3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牵肠集》,收入《倚梦闲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2002 年。

9.《蛇腰集》,收入《倚梦闲话第九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7 年。

《蛇腰集》更名为《孤掌也鸣集》,收入《柏杨随笔 7》,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 年。

《蛇腰集》,收入《倚梦闲话 9》,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 年。

《蛇腰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3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蛇腰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0.《剥皮集》,收入《倚梦闲话第十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7 年。

《剥皮集》更名为《水火相容集》,收入《柏杨随笔 8》,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 年。

《剥皮集》,收入《倚梦闲话 10》,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 年。

《剥皮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3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剥皮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剥皮集》,收入《倚梦闲话 10》,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1.《高山滚鼓集》,收入《西窗随笔第一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3 年。

《高山滚鼓集》更名为《骡子集》,收入《柏杨选集 4》,台北:星光出版社,1979 年。

《高山滚鼓集》,香港:中华图书出版公司,1980 年。

《高山滚鼓集》,收入《西窗随笔 1》,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 年。

《高山滚鼓集》,收入《西窗随笔》,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高山滚鼓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4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2.《道貌岸然集》,收入《西窗随笔第二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3 年。

《道貌岸然集》更名为《马翻集》,收入《柏杨选集 9》,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 年。

《道貌岸然集》,收入《西窗随笔 2》,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道貌岸然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道貌岸然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4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3.《前仰后合集》,收入《西窗随笔第三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4 年。

《前仰后合集》更名为《不悟集》,收入《柏杨选集 10》,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 年。

《前仰后合集》,收入《西窗随笔 3》,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前仰后合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前仰后合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4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4.《闻过则怒集》,收入《西窗随笔第四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4 年。

《闻过则怒集》更名为《不学有术集》,收入《柏杨随笔 3》,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 年。

《闻过则怒集》,收入《西窗随笔 4》,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 年。

《闻过则怒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闻过则怒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4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5.《神魂颠倒集》,收入《西窗随笔第五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4 年。

《神魂颠倒集》更名为《眼如铜铃集》,收入《柏杨随笔 1》,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 年 8 月初版,1982 年 3 版。

《神魂颠倒集》,收入《西窗随笔 5》,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 年。

《神魂颠倒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5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神魂颠倒集》,收入《西窗随笔》,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6.《鬼话连篇集》,收入《西窗随笔第六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5年。

《鬼话连篇集》更名为《乱做春梦集》,收入《柏杨随笔2》,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年。

《鬼话连篇集》,收入《西窗随笔6》,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年。

《鬼话连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鬼话连篇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5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7.《大愚若智集》,收入《西窗随笔第七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5年。

《大愚若智集》更名为《笨鸟先飞集》,收入《柏杨随笔4》,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年2月版,1982年再版。

《大愚若智集》,收入《西窗随笔7》,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年。

《大愚若智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5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大愚若智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8.《越帮越忙集》,收入《西窗随笔第八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5年。

《越帮越忙集》更名为《吞车集》,收入《柏杨选集5》,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年。

《越帮越忙集》,收入《西窗随笔8》,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年。

《越帮越忙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越帮越忙集》,收入《西窗随笔》,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9.《心血来潮集》,收入《西窗随笔第九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6年。

《心血来潮集》更名为《勃然大怒集》,收入《柏杨随笔6》,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年。

《心血来潮集》,收入《西窗随笔9》,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年。

《心血来潮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心血来潮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0.《死不认错集》,收入《西窗随笔第十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7年。

《死不认错集》更名为《猛撞酱缸集》,收入《柏杨随笔9》,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年。

《死不认错集》,收入《西窗随笔10》,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年。

《死不认错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死不认错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6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1.《鱼雁集》,收入《倚梦闲话第八辑》,台北:平原出版社,1966年。

22.《鼻孔朝天集》,收入《挑灯杂记2》,台北:平原出版社,1966年。

23.《活该他喝酪浆》,收入《柏杨专栏》,台北:星光出版社,1978年。

《活该他喝酪浆》,收入《柏杨专栏1》,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年。

《活该他喝酪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活该他喝酪浆》,收入《柏杨专栏1》,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4.《按牌理出牌》,收入《柏杨专栏》,台北:星光出版社,1979年。

《按牌理出牌》,收入《柏杨专栏2》,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年。

《按牌理出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按牌理出牌》,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5.《大男人沙文主义》,收入《柏杨专栏》,台北:星光出版社,1979年。

《大男人沙文主义》,收入《柏杨专栏3》,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年。

《大男人沙文主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大男人沙文主义》,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7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6.《早起的虫儿》,收入《柏杨专栏》,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年。

《早起的虫儿》,收入《柏杨专栏4》,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年。

《早起的虫儿》,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8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早起的虫儿》,收入《柏杨专栏》,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7.《踩了他的尾巴》,收入《柏杨专栏》,台北:星光出版社,1982年。

《踩了他的尾巴》,收入《柏杨专栏5》,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年。

《踩了他的尾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踩了他的尾巴》,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8册·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8.《丑陋的中国人》,台北:林白出版社,1985年。

《丑陋的中国人》,东京:光文社出版社,1988年。

《丑陋的中国人》,汉城:文潮社出版社,1988年。

《丑陋的中国人》,汉城:文学思想社,1989年。

《丑陋的中国人》,澳洲:ALLEN UNIWIN PRESS, 1992年。

《丑陋的中国人》,台北:星光出版社,1992年。

《丑陋的中国人》,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丑陋的中国人》,收入《柏杨精选集37》,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29.《酱缸震荡》,台北:星光出版社,1995年。

《酱缸震荡》,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7册·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酱缸震荡》,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30.《柏杨语录》,台北:平原出版社,1967 年。

《柏杨语录》更名《录柏杨语》,收入《柏杨丛刊④》,台北:四季出版集团,1983 年。

31.《柏杨反孔杂文选》,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4 年。

32.《柏杨谈人生》,收入《柏杨妙语集第一辑》,台北:学英出版社,1984 年。

《柏杨谈人生》,收入《柏杨妙语:社会篇》,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33.《柏杨谈社会》,收入《柏杨妙语集第一辑》,台北:学英出版社,1984 年。

《柏杨谈社会》,收入《柏杨妙语:社会篇》,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34.《柏杨谈女人》,收入《柏杨妙语集第一辑》,台北:学英出版社,1984 年。

《柏杨谈女人》,收入《柏杨妙语:女人篇》,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35.《柏杨杂文选》,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7 年。

36.《柏杨说文化》,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 年。

37.《柏杨谈爱情》,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 年。

38.《带箭怒飞》,台北:林白出版社,1986 年。

39.《奋飞》,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8 册 · 散文卷杂文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奋飞》,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40.《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香港:明报月刊,2002 年。

41.《天真是一种动力》,收入《柏杨精选集 36》,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42.《新城对——柏杨访谈录》,收入《柏杨精选集 33》,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新城对——柏杨访谈录》,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7 册 · 特别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43.《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44.《猛撞酱缸集》,收入《柏杨随笔 9》,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 年。

45.《柏杨精选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46.《我看中国女人》,柏杨,许素朱编,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 年。

47. 应凤凰选编:《柏杨妙语 · 社会篇》,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48.《是龙还是虫——一九八七台湾现实批判》,收入《当代批判文存 18》,台湾高雄:敦理出版社,1988 年。

49.《谁在说真话——一九八六台湾现实批判》,收入《当代批判文存 11》,台湾高雄:敦理出版社,1988 年。

50.《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香港:香港书城公司,1987 年。

51.《黄河之旅》6 版,台北:号角出版社,1986 年。

52.《柏杨选集》,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 年。

53.《倚梦闲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54.《西窗随笔》,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二 小说

1.《蝗虫东南飞》,台北:文艺创作出版社,1953年。

《蝗虫东南飞》易名《天疆》,台北:平原出版社,1967年。

《蝗虫东南飞》,台北:星光出版社,1987年。

《蝗虫东南飞》,台北:跃升出版社,1991年。

《蝗虫东南飞》,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5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2.《辩证的天花》,台北:中兴文学出版社,1953年。

3.《魔鬼的网》,易名《打翻铅字架》,台北:红蓝出版社,1955年。

《打翻铅字架》,收入《柏杨小说全集2》,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1月版,1984年3版。

《打翻铅字架》,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年。

《打翻铅字架》,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5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打翻铅字架》,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4.《生死谷》,台北:复兴书局,1957年。

5.《周彼得的故事》,易名《天涯故事》,台北:复兴出版社,1957年。

《天涯故事》,收入《郭衣洞小说全集6》,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年8月版,1982年再版。

《天涯故事》,收入《小说系列6》,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年。

《天涯故事》,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4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天涯故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6.《苍穹下的儿女》,易名《凶手》,台北:正中书局,1958年。

《凶手》,收入《郭衣洞小说全集7》,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年。

《凶手》,收入《小说系列7》,台北:跃升出版社,1990年。

《凶手》,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4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凶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7.《挣扎》,台北:平原出版社,1959年。

《挣扎》,收入《郭衣洞小说全集4》,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年。

《挣扎》译名 *A Farewell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y*,香港:三联出版社,1988年。

《挣扎》,收入《小说系列4》,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年。

《挣扎》,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3册·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挣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8.《红苹果》,香港:亚洲出版社,1957 年。

9.《旷野》,台北:平原出版社,1961 年。

《旷野》,收入《郭衣洞小说全集 3》,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 年。

《旷野》,收入《小说系列 3》,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旷野》,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3 册 · 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0.《莎罗冷》,台北:平原出版社,1962 年。

《莎罗冷》,收入《郭衣洞小说全集 2》,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 年。

《莎罗冷》,收入《小说系列 2》,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莎罗冷》,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2 册 · 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莎罗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1.《怒航》,台北:平原出版社,1964 年。

《怒航》,收入《郭衣洞小说全集 5》,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 年。

《怒航》,收入《小说系列 5》,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怒航》,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4 册 · 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2.《秘密》,台北:平原出版社,1965 年。

《秘密》,收入《郭衣洞小说全集 1》,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 年。

《秘密》译名 *In Secret: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y*,香港:Cheng Tusi 出版社,1985 年。

《秘密》,收入《小说系列 1》,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 年。

《秘密》,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2 册 · 诗卷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秘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3.《云游记》(第一集),台北:平原出版社,1965 年 11 月。

《云游记》(第二集),台北:平原出版社,1967 年。

《云游记》两集并为《古国怪遇记》,收入《柏杨小说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

《古国怪遇记》,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 年。

《古国怪遇记》,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5 册 · 小说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古国怪遇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4.《柏杨短篇小说选》,新加坡:万里出版社,1974 年。

15.《柏杨小说选集》,香港:纵横社出版集团,1979 年。

16.《柏杨小说选》,香港:文艺风出版社,1986 年。

17.《柏杨小说选读》,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 年。

三　传记散文和报导文学：

1.《家园》,台北:林白出版社,1989年。

《家园》,东京:光文社出版社,1989年。

《家园》,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2.《柏杨回忆录》,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柏杨回忆录》(光碟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柏杨回忆录》,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0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柏杨回忆录》,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3.《宝岛长虹》,台北:大道半月刊社,1960年。

4.《异域》,台北:平原出版社,1961年。

《异域》,台北:星光出版社,1977年。

《异域》,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年。

邓克保(笔名柏杨):《异域(修订本)》,台北:星光出版社,1991年。

《异域》,伦敦:JANUS出版社,1996年。

《异域》,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9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2000年。

5.《金三角・边区・荒城》(后易名《金三角・荒城》),台北:时报出版集团,1982年。

《金三角・荒城》译为 *Golden Triangle: Frontier and Wilderness*,香港:三联出版社,1987年。

《金三角・荒城》,台北:跃升出版社,1988年。

《金三角・荒城》,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9册・散文卷报导与传记类》,2000年。

四　书信与诗集

1.《柏杨说故事——写给女儿的小棉花历险记》,台北:汉艺色研出版社,1988年。

《柏杨说故事》,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1册・散文卷书信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2.《柏杨在火烧岛——写给女儿的信》,台北:汉艺色研出版社,1988年。

《柏杨在火烧岛》,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1册・散文卷书信类》,2002年。

《柏杨在火烧岛》,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3.《路,要你自己走》,台北:星光出版社,1993年。

《路,要你自己走》,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11册・散文卷书信类》,2002年。

《路,要你自己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4.《柏杨诗抄》,《柏杨丛刊1》,台北:四季出版社,1982年。

《柏杨诗抄》,学英出版社,1984 年。

《柏杨诗抄》,香港:Cheng Tusi 出版社,1986 年。

《柏杨诗抄》,香港:三联出版社,1986 年。

《柏杨诗抄》,台北:跃升出版社,1992 年。

《柏杨诗抄》,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2 册 · 诗卷小说卷》,2002 年。

五 史学著作

1.《史纲文选》,台北:星光出版社,1982 年。

2.《中国历史年表》,台北:星光出版社,1981 年。

《中国历史年表(上)》,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0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中国历史年表(下)》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1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3.《柏杨品秦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4.《中国人史纲》10 版,台北:星光书报社,1983 年。

《中国人史纲(上)》,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6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中国人史纲(下)》,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16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5.《柏杨品三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6.《帝王之死第一集 · 可怕的掘墓人》,台北:四季出版公司,1983 年。

《帝王之死第一集 · 可怕的掘墓人》,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 年。

《可怕的掘墓人》,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2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7.《帝王之死第二集 · 忘了他是谁》,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 年。

《帝王之死第二集 · 忘了他是谁》,台北:学英文化事业公司,1983 年。

《忘了他是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忘了他是谁》,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2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8.《皇后之死第一集》,台北:星光出版社,1980 年。

《皇后之死第一集 · 姑苏响鞋》,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姑苏响鞋》,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3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9.《皇后之死第二集 · 温柔乡》,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 年。

《温柔乡》,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温柔乡》,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 23 册 · 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0.《皇后之死·第三集》,台北:跃升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

《皇后之死·第三集》,台北:星光出版社,1982年。

《皇后之死第三集·长发披面》,台北:跃升出版社,1989年。

《长发披面》,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长发披面》,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第23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11.《柏杨版资治通鉴》全集

(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册·战国时代》,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

(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吞并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10月版,1984年再版。

(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册·楚汉相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11月版,1984年再版。

(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册·匈奴崛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12月版,1984年再版。

(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册·黄老之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月版。

(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册·开疆拓土》,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七册·宫廷斗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八册·万里诛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九册·昏君辈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册·王莽篡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一册·全国混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二册·马援之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三册·燕然勒石》,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四册·跋扈将军》,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五册·黄巾民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六册·东汉瓦解》,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1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七册·赤壁之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1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八册·三国鼎立》,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1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九册·寿春三叛》,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册·司马夺权》,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一册·司马夺权》,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册·大分裂》,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三册·五胡乱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四册·石虎肆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五册·符坚大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六册·淝水之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七册·参合杀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2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十八册·王始帝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2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廿九册·统万碑文》,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3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册·自毁长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3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一册·南北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3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二册·刘彧诏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3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三册·全盘汉化》,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3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四册·箫鸾眼泪》,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1986年。

(3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五册·洛阳暴动》,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3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六册·河阴屠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月版,2005年第2版。

(3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七册·遍地血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3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八册·饿死宫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3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十九册·禽兽王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4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册·黄龙汤》,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4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一册·突厥可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4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二册·南北统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4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三册·官逼民反》,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4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四册·江都政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4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五册·玄武门》,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4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六册·贞观之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4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七册·黄金时代》,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4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八册·武照夺权》,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4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十九册·恐怖世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

(5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册·恶妻恶女》,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5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一册·开元盛世》,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5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二册·范阳兵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53)《柏杨版资治通鉴五十三册·睢阳之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5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四册·皇后失踪》,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5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五册·泾原兵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5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六册·猪皇帝》,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5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册·元和中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5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册·牛李党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5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册·甘露事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6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册·大中之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61)《柏杨版资治通鉴. 第六十一册·黄巢民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6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二册·狼虎谷》,台北远流出版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6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三册·军阀混战》,台北远流出版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6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四册·大黑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6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册·五代时代》,台北远流出版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6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六册·小分裂》,台北远流出版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6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七册·千里白骨》,台北远流出版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6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册·半截英雄》,台北远流出版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6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册·儿皇帝》,台北远流出版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7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七十册·横挑强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7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七十一册·高平之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1993年。

(7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七十二册·分裂尾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12.《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全集

(1)《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范雎漂亮复仇》,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2)《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2·汗血马战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5月1版,2003年4版。

(3)《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3·巫蛊恐怖》,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5月1版,2005年6月4版。

(4)《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4·床上巨星赵合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5月1版,2005年3月4版。

(5)《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5·逐鹿型大混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6)《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6·惨烈窝里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7)《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7·第一次宦官时代》,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8)《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8·三国周郎赤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9)《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9·诸葛亮北伐挫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0)《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0·十三王之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11)《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1·五胡乱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9月1版,2001年10月3版。

(12)《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2·祖逖击楫渡江》,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9月1版,2001年10月3版。

(13)《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3·星坠五将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4)《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4·桓玄篡位闹剧》,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9月1版,2001年10月3版。

(15)《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5·慕容超传奇》,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6)《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6·王师北定中原日》,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7)《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7·鲜卑幕中华》,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18)《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8 · 南北乱成一团》,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19)《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9 · 最美丽的蠢女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0)《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0 · 最严重的一次叛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1)《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1 · 人渣家族》,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2)《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2 · 驴老爷,你赢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3)《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3 · 改朝换代大混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4)《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4 · 唐王朝一再夺嫡》,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5)《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5 · 贞观对》,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6)《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6 · 恐怖帝国:武照发扬“告密”“诬陷”文化》,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7)《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7 · 安史之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28)《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8 · 第二次宦官时代》,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29)《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9 · 大黑暗来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0)《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30 · 兵变 · 兵变 · 再兵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1)《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31 · 牛李两党殊死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2)《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32 · 黄巢终结虎狼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3)《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33 · 独柳下,天才之辩》,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4)《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34 · 大屠杀与小分裂》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5)《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35 · 狗崽长大咬死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36)《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36·英雄与流氓》,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37)《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37·致命的横挑强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38)《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38·陈桥兵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15.《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1》,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2》,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3》,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4》,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5》,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6》,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柏杨曰(一)》,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24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柏杨曰(二)》,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25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柏杨曰(三)》,收入李瑞腾主编《柏杨全集26册·史学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柏杨作品在大陆出版的各种版本统计

一 散文集

1.《柏杨谈女人和男人上·自珍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柏杨谈女人和男人下·自珍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带箭怒飞·台湾纵横》,华文出版社,1988年。
4.《牛仔裤和长头发》,花城出版社,1989年。
5.《柏杨谈男女情爱自珍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6.《西窗随笔1·高山滚鼓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7.《西窗随笔2·道貌岸然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8.《西窗随笔3·前仰后合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9.《西窗随笔4·闻过则怒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0.《西窗随笔5·神魂颠倒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1.《西窗随笔6·鬼话连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2.《西窗随笔7·大愚若智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3.《西窗随笔8·越帮越忙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14.《西窗随笔9·心血来潮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15.《西窗随笔10·死不认错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16.《玉雕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17.《怪马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18.《堡垒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19.《圣人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0.《凤凰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1.《红袖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2.《立正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3.《踩了他的尾巴》,收入《柏杨专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4.《活该他喝酪浆》,收入《柏杨专栏》,中国友谊出版社,1994年。
25.《大男人沙文主义》,收入《柏杨专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6.《早起的虫儿》,收入《柏杨杂文选》,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早起的虫儿》,收入《柏杨专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7.《按牌理出牌》,收入《柏杨专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8.《牵肠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9.《蛇腰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30.《剥皮集》,收入《倚梦闲话系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31. 欧阳哲生编:《柏杨奇语》,岳麓书社,1995年。
32.《柏杨专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
33.《西窗随笔》,收入《柏杨杂文选》,群言出版社,1992年12月。
34.《西窗随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
35.《倚梦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
36.《柏杨谈女人》,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柏杨谈女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37.《红尘静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8.《暗夜慧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9.《中国人与酱缸》,新世纪出版社,1998年。
40. 潘亚暾等主编:《台湾八大家散文精品集》(罗兰、柏杨卷),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
41.《透视人性弱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43.《丑陋的中国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
《丑陋的中国人》,时事出版社,1986年。
《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丑陋的中国人》,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

《丑陋的中国人》，时事出版社，1988年。
《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
《丑陋的中国人（漫画演绎版）》，古吴轩出版社，2008年。
《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44.《柏杨妙语》，作家出版社，1988年。
张香华编选：《柏杨妙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45.《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46.《柏杨谈社会》，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柏杨谈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柏杨谈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
47.《智慧九宫：柏杨谈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
48.《柏杨谈人生》，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柏杨谈人生》，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柏杨谈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柏杨谈人生》，三联书店，2007年。
49. 蔡志忠绘：《元亨利贞——柏杨谈男女》，三联书店，2007年。
50. 蔡志忠绘：《伏羲九九——柏杨谈历史》，三联书店，2007年。
51. 蔡志忠绘：《契丹三角——柏杨谈人生》，三联书店，2007年。
52. 柏杨与张香华合：《男左女右》，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
53.《柏杨谈男女》，三联书店，2007年。
54.《柏杨谈历史》，三联书店，2007年。
55.《吓人的国粹教育》，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文明大整合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56.《权势——官崽哲学的流弊》，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传统大反思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57.《反说西方取经》，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文明大整合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58.《"鬼话"中国正史》，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文明大整合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59.《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传统大反思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60.《劣根——国民灵魂的桎梏》，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传统大反思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61.《女人：天生是尤物》，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疯狂红颜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
62.《女人，危险的投资》，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疯狂红颜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

63.《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收入陈晓明主编《柏杨杂文精选集·疯狂红颜系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 年。

64. 李淑玲绘:《爱情毒药(漫画版)》,作家出版社,2003 年。

65.《柏杨作品系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年。

66.《情爱思语》,收入《柏杨经典杂文·情爱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67.《世象新语》,收入《柏杨经典杂文·社会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68.《人生奇语》,收入《柏杨经典杂文·人生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69.《柏杨经典杂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70. 戴逸如绘:《戴逸如图说柏杨格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 版,2001 年 2 版。

71.《新城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

72. 柏杨、林清玄等:《诸子百家看金庸》,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年。

73.《柏杨专栏 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74.《柏杨专栏 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75.《倚梦闲话 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76.《倚梦闲话 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77.《倚梦闲话 3》,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78.《倚梦闲话 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79.《西窗随笔 1》,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80.《西窗随笔 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81.《西窗随笔 3》,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82.《西窗随笔 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83.《崇洋西崽情意结》,现代出版社,2010 年。

84.《柏杨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

二 小说作品

1.《杨小说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年 8 月。

2. 常君实主编:《柏杨小说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3.《古国怪遇记》易名《西游怪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年。

《古国怪遇记》易名《西游怪记》,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年。

《古国怪遇记》,古吴轩出版社,2004 年。

《古国怪遇记》,现代出版社,2010 年。

4.《求婚记》,古吴轩出版社,2004 年。

5.《旷野》,作家出版社,1987 年。

《旷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

6.《秘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

7.《凶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

8.《莎罗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9. 徐雅柠插图:《天涯故事(插图珍藏版)》,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三 传记散文和报导文学

1. 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
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看过地狱回来的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插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四 书信与诗集

1.《柏杨家书》,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
《柏杨家书:给亲爱的佳佳》,文汇出版社,2011年。
2.《柏杨在火烧岛》,群众出版社,1995年。
3. 柏杨、张香华:《我们的和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4. 秦启安:《柏杨狱中诗词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
5.《柏杨诗抄》,作家出版社,1993年。

五 史学著作:

1.《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1)《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一辑 · 秦风汉雨》,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一辑 · 秦风汉雨》,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一辑 · 秦风汉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2)《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二辑 · 后汉兴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二辑 · 后汉兴亡》,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二辑 · 后汉兴亡》,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三辑 · 魏晋纷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三辑 · 魏晋纷争》,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三辑 · 魏晋纷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4)《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四辑 · 南北分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四辑 · 南北分立》,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四辑 · 南北分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5)《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五辑 · 乱世烽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五辑 · 乱世烽烟》,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五辑 · 乱世烽烟》,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6)《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六辑 · 贞观之治》,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六辑 · 贞观之治》,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第六辑 · 贞观之治》,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7)《柏杨白话资治通鉴第七辑·安史之乱》,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第七辑·安史之乱》,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第七辑·安史之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8)《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第八辑·晚唐暮景》,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第八辑·晚唐暮景》,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第八辑·晚唐暮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柏杨白话资治通鉴第九辑·五代十国》,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第九辑·五代十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第九辑·五代十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2.《柏杨资治通鉴》(修订本)

(1)《柏杨资治通鉴第一册·公元前四〇三至前一六一年(战国时代/吞并六国/楚汉相争/匈奴崛起)》(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公元前一六〇至前二一年(黄老之治/开疆拓土/宫廷斗争/万里诛杀)》(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三册·公元前二〇至七九年(昏君辈出/王莽篡夺/全国混战/马援之死)》(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四册·八〇至二〇三年(燕然勒石/跋扈将军/黄巾民变/东汉瓦解)》(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五册·二〇四至二八八年(赤壁之战/三国鼎立/寿春三叛/司马夺权)》(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6)《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六册·二八九至三五四年(八王之战/大分裂/民族融合/石虎肆暴)》(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7)《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七册·三五五至四一四年(苻坚大帝/淝水之战/参合杀俘/王始帝国)》(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8)《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八册·四一五至四七九年(统万碑文/自毁长城/南北朝/刘彧诏书)》(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9)《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九册·四八〇至五三一年(全盘汉化/萧鸾眼泪/洛阳暴动/河阴屠杀)》(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10)《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册·五三二至五七五年(遍地血腥/饿死宫城/禽兽王朝/黄龙汤)》(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11)《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一册·五七六至六二一年(突厥可汗/南北统一/官逼民反/江都政变)》(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12)《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二册·六二二至六八八年(玄武门/贞观之治/黄金时代/武照夺权)》(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13)《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三册·六八九至七五六年(恐怖世界/恶妻恶女/开元盛世/范阳兵变)》(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14)《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四册·七五七至七九九年(睢阳之围/皇后失踪/泾原

兵变/猪皇帝)》(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年。

(15)《柏杨版资治通鉴第十五册・八〇〇至八六六年(元和中兴/牛李党争/甘露事变/大中之治)》(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年。

(16)《柏杨资治通鉴第十六册・八六七至九〇一年(黄巢民变/狼虎谷/军阀混战/大黑暗)》(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年。

(17)《柏杨资治通鉴第十七册・九〇二至九三二年(五代时代/小分裂/千里白骨/半截英雄)》(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年。

(18)《柏杨资治通鉴第十八册・九三三至九六〇年(儿皇帝/横挑强邻/高平之战/分裂尾声)》(修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年。

3.《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白话译本资治通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1993 年。

(1)《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战国时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年。

(2)《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吞并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3)《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楚汉相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4)《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匈奴崛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5)《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5・黄老之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6)《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6・对外扩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7)《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7・宫廷斗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8)《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8・万里征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9)《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9・昏君辈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年。

(10)《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0・王莽篡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11)《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1・全国混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12)《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2・马援之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年。

(13)《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3・燕然勒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年。

(14)《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4・跋扈将军》,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年。

(15)《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5・黄巾民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年。

(16)《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6・东汉瓦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

(17)《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7・赤壁之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

(18)《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8・三国鼎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

(19)《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19・三国衰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

(20)《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0・司马夺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

(21)《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1・八王之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

(22)《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2・大分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

(23)《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3・民族融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年。

(24)《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4・石虎肆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年。

(25)《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5・符坚崛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年。

(26)《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6・淝水之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27)《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7 · 北魏兴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28)《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8 · 十国并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29)《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29 · 刘裕篡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30)《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0 · 南北朝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31)《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1 · 南北大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32)《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2 · 南齐兴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33)《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3 · 孝文改革》,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34)《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4 · 南齐衰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35)《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5 · 洛阳暴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年。
(36)《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6 · 河阴屠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
(37)《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7 · 遍地血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38)《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8 · 饥死宫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39)《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39,禽兽王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0)《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0,北周禁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1)《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1 · 突厥可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2)《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2 · 南北统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3)《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3 · 官逼民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4)《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4 · 江都政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5)《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5 · 玄武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6)《现代语文资治通鉴 46 · 贞观之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7)《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47 · 黄金时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8)《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48 · 武尧夺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49)《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49 · 女皇登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0)《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0 · 韦后乱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1)《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1 · 开元盛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2)《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2 · 范阳兵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3)《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3 · 睢阳之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4)《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4 · 皇后失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5)《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5 · 泾原兵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6)《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6 · 猪皇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年。
(57)《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7 · 元和中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58)《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8 · 牛李党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59)《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59 · 甘露事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0)《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0 · 大中之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1)《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1 · 黄巢民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2)《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2 · 狼虎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3)《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3 · 军阀混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4)《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4 · 大黑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5)《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5 · 五代时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6)《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6 · 小分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7)《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7 · 千里白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8)《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8 · 半截英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69)《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69 · 儿皇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70)《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70 · 横挑强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71)《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71 · 高平之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72)《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 72 · 分裂尾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
4.《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 · 范雎漂亮复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2)《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2 · 汗血马战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3)《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3 · 巫蛊恐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4)《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4 · 床上巨星赵合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5)《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5 · 逐鹿型大混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6)《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6 · 惨烈窝里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7)《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7 · 第一次宦官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8)《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8 · 三国周郎赤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9)《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9 · 诸葛亮北伐挫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年。
(10)《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0 · 十三王之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11)《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1 · 华乱五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12)《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2 · 祖逖击楫渡江》,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13)《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3 · 苻坚大帝悲剧》,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14)《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14 · 桓玄篡位闹剧》,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15)《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5.《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 第三部》,中信出版社,2008 年。
6.《皇后之死》,海天出版社,1987 年。
《皇后之死》,海天出版社,1988 年。
《皇后之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年。
《皇后之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
《皇后之死:历史上命运最难看的三十九位皇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
7.《帝王之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年。
易名为《皇帝之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年。
《帝王之死——历史上命运最难看的二十七位帝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 1 版,2007 年再版。
8.《柏杨品秦隋》,中信出版社,2007 年。
9.《柏杨品三国》,中信出版社,2006 年。

10.《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
《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敦煌资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
《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11.《中国人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
12.《柏杨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
《柏杨曰》,海南出版社,2006年。
《柏杨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3.《中国历史年表》,海南出版社,2006年。
14.《中国最短命的王朝:秦隋论》,现代出版社,2010年。
15.《权谋治天下》,现代出版社,2010年。

六　柏杨全集

1.《柏杨全集第1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柏杨全集第2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3.《柏杨全集第3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4.《柏杨全集第4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5.《柏杨全集第5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6.《柏杨全集第6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7.《柏杨全集第7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8.《柏杨全集第8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9.《柏杨全集第9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0.《柏杨全集第10册·杂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1.《柏杨全集第11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2.《柏杨全集第12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3.《柏杨全集第13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4.《柏杨全集第14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5.《柏杨全集第15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6.《柏杨全集第16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
17.《柏杨全集第17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8.《柏杨全集第18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19.《柏杨全集第19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0.《柏杨全集第20册·历史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1.《柏杨全集第21册·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2.《柏杨全集第22册·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3.《柏杨全集第23册·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4.《柏杨全集第24册·其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5.《柏杨全集第25册·其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柏杨热 北大博士生来台专访*

陈希林/台北报导



以《丑陋的中国人》、《异域》等作品享誉文坛的作家柏杨(左)16日在住家接受北京大学博士生(张清芳)访问,夫人张香华(右)坐在一旁不时予以协助补充。(王锦河摄)

时而眯眼大笑,经常沉思不语,刚刚度过八十七岁生日的作家柏杨,昨天在家中与来访的中国内地学人畅谈他自己作品中的男女平权议题,轻松度过一下午。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张清芳预定以柏杨杂文、史学观点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特别来台访问柏杨,于昨日前往柏杨在北县的家中拜会。张清芳说,柏杨的文章里时时可见女性的婚姻、恋爱、家庭议题,颇能反映时代的背景与写作者本人的立场,也说明性别平权的观念早就根植柏杨心中。

"刚来台湾的时候",柏杨首先指出:"台湾女性比较没有被男性平等对待。"他认为这是文化问题,非关是非对错,"就好像日本人,男主人回家了,妇女、孩子出来迎接,有时还要跪着迎接"。

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想要写作的柏杨就从这个他觉得敏感的议题着手创作。柏杨妻子张香华补充,这样的写作,"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的批判",而且越写越精彩。"我当然写得很精彩",柏杨从椅子上挺直了背,说:"如果写得不精彩,怎么会写到最后去坐牢?"

在柏杨早期小说《秘密》里,女主角叶琴因为所爱的富家子弟不能承继产业,弃他而去。另一方面,柏杨在杂文中感叹夫妻之间"穷是致命伤",女性应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张清芳认为这似乎透露出一种矛盾,一方面作家对拜金女性不予认同,另一方面又主张女性要追求经济地位。

柏杨解释,这是期勉男性认清现实的残酷,要注意到家里的妻子、儿女是否吃得饱,衣着暖,否则"贫穷从前门入,幸福从后门溜"。但张香华认为,柏杨早年的作品受限于写作技巧还不够成熟,仍无法承载"男女平权"这么沉重的使命。

张香华又指出,文学不是药方,不必期盼文章一出,社会病除。她因此格外看重柏

*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Moment/newfocus-index/0,3687,9504170121+0+0+100646+0,00.html(中国时报网址)

杨作品里面反映人生实情的价值，以及柏杨以杂文创造出独特文体的珍贵。她援引诗人佛洛斯特的“诗始于喜悦，终于智慧”这一名句，表示柏杨的作品应从文学角度分析，看是否能启发人的智慧与思考。

话题进入柏杨为何对女性平权议题感兴趣，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柏杨说，一方面是当时写稿赚钱生活的现实考虑，另一方面，在张香华的看法上，“柏杨是个男的嘛！这很自然。”张香华的话逗得现场每个人大笑：“他也喜欢女性的朋友喔，还先后娶了五个太太！”

张清芳接着问到柏杨与张香华早年相识的情形，是否柏杨在狱中读了张香华的诗。张香华依旧逗着柏杨说：“他（柏杨）哄我的！”柏杨则在一旁满脸严肃地回应：“真的（有读）！真的！”（张清芳）再问：“柏杨当时帅吗？”这下柏杨大笑了，直说自己帅。

柏杨刚在上月欢度八十七岁生日。昨天他还开玩笑，以后他要和上帝打个商量，造人的时候，让人在世上度过一定年岁之后“就像用钉子钉住一样，外貌不再改变了，但内心的智慧可以持续增加”。

反威权 煞到中国内地E世代

“我们从小都看柏杨啊”，正在北京大学修读博士学位，以柏杨为论文主题的（张清芳）说。

她说，中国内地的年轻一代，都读过《丑陋的中国人》等作品。“那个时候”，她说，“1980年代，柏杨、金庸、三毛、琼瑶是我们每个学生都会阅读的作品”。纵使在1989年中国内地一度查禁《丑陋的中国人》，（张清芳）记得这本书并不难取得，学生想看都看得到。

中国内地学界常将柏杨、李敖两人并列为反抗威权的作家，中国内地的学者也多半认同中国内地出版的《简明台湾文学史》之分类。但张清芳认为，除此之外，柏杨还可以从史学的角度分析，他的治史思想颇有鲁迅的风格，杂文及其他文学作品也值得研究者深究。

张清芳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言谈爽朗干脆，与柏杨、张香华谈话中不时呵呵大笑。在北大“中国当代文学”的专业当中，她是第一位以柏杨为论文主题的研究者，推崇柏杨在史学上的见解，以及杂文的文学意义。青年一代的中国内地研究人员纷纷注意台湾当代作家的成就，她说她还有同学拿张大春的作品来写博士论文。

中国内地陕西师范大学规划中的柏杨研究中心，近日内即将成立。柏杨的妻子张香华说，该中心内将设有五位专任教授。与柏杨相关的学术著作，也在中国内地开始累积。

三年前北大教授陈晓明来台参加“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在中国内地编纂完成《女人，危险的投资》、《女人，比了解上帝都难》、《女人，天生是尤物》等多册“柏杨杂文精选集”，成为中国内地研究柏杨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晓明认为，柏杨的批判，其效果并不以政治批判为限制，更重要的是柏杨杂文当中还存有独树一帜的“世俗批判”，而显得可贵。他在《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一

文当中分析，柏杨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自己也对中国文化的病症有着切肤之痛，所以有勇气说出文化病症，且说到痛处。

如此带来的影响，陈晓明认为，柏杨“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疾恶如仇，从不姑息，绝不手软”。而这一切，都源自柏杨的坦白与彻底。陈晓明强调，当今中国文化病症依旧，柏杨的作品依旧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